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Histor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國家、政黨與歷史：國史館在臺灣（1957—2016）

Nation, Political party, and Historiography :

Academia Historica in Taiwan (1957-2016)

陳梅萱

Chen, Mei-Hsuan

指導教授：陳惠芬 博士

Advisor : Chen, Hui-Fen, Ph.D.

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October 2021

謝辭

時光飛逝，四年的研究所生涯，終於要畫下句點。猶記得當初回到師大念書時，腦海中浮現的是：當學生真好！沒想到之後的道路卻走得跌跌撞撞，除了對人生方向感到迷茫，對自我也感到懷疑，此中過程，真是歡笑與淚水交織，很慶幸能順利度過這段既痛苦又甜蜜的歲月。

能夠完成這篇論文，首先，我要向指導教授陳惠芬老師致上最深的敬意與感謝！感謝您沒有放棄我，願意在我最無助、人生最徬徨的時候拉我一把，盡心盡力幫我想題目、規劃論文架構、引導我思考與寫作，並逐字逐句地修改論文。在疫情如此嚴峻的時刻，還不時關心我的身體健康與生活起居，像家人般親切的叮嚀，真正讓我體會到所謂的「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在求學生涯中，能得到老師的關照，真是我莫大的榮幸，我永生難忘。

接著，我要特別感謝我的論文口試委員李達嘉老師和歐素瑛老師，在論文上給予許多寶貴的建議與鼓勵。李達嘉老師從整體的角度，幫助我從諸多的問題中，釐清思考脈絡，並提供思考方向，讓我的討論得以聚焦；歐素瑛老師以在國史館長期擔任修纂人員的經歷，大方分享許多來自工作現場的第一手經驗與感想，使我的論文撰寫得以更加確實與完善。論文口試時，兩位老師更以親切的口吻，細心的給予指導與糾正錯誤，舒緩我的焦慮與緊張，再次由衷地感謝！

在就讀研究所的過程中，在葉高樹主任、楊彥彬老師、林麗月老師、呂春盛老師、吳文星老師、周東怡老師、林滿紅老師、黃自進老師，以及臺灣史研究所的蔡錦堂老師、陳佳宏老師、陳志豪老師與近藤正己老師課程中的教導，拓寬了我的視野，豐富與增長我各領域的歷史知識。系上的美芳助教和文珠助教，熱心提供了各種協助，使我能專心撰寫論文，順利完成考試，也在此表示感謝。

學習的道路上，也要感謝我的好友兼讀書會成員寶雯、盈如、鍾安、曼云、宥惟、令偉、信愷和寧遠，每周一次的聚會是我重要的精神糧食，讓我感受到研究的道路並非孤單一人，而是團隊互相幫忙共同前進。其中，我要特別感謝室友寶雯，懷念每個晚上妳考我日文，我考妳英文，一起準備檢定的日子，因為有彼此的督促才能獲得甜美的果實。我也要感謝從碩一以來就患難與共的盈如，我們一同度過許多焦慮、掙扎的時刻。尤其在最後這一年每天密集的早餐與圖書館之約，能夠迎來這一刻，一切盡在不言中。還要感謝羽球好夥伴濟寬、翊禎、戶田，

還有像姊妹般的室友韵文、貞吟和瑩庭，以及畢業後遠在日本為我加油的蒲地等伯伯。能在師大遇見你們，是我的福氣，我會好好珍惜這得來不易的緣分。

最後，感謝我的父母，沒有你們努力的工作與無條件的付出，辛苦地養育我長大，就沒有今日的我，謹以此論文獻給最敬愛的父母！

陳梅萱

2021 年 10 月



中文摘要

本論文旨在透過國史館在臺復館後的組織與修史工作變遷，考察戰後臺灣國家、政黨與史學的關係，以及該機構在國家治理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本研究發現，作為官方修史機構的國史館，其與國民黨黨史會的關係，自中華民國在中國大陸時期，即相當密切。1957年國史館在臺復館後，館、會除了繼續維持合作夥伴關係，在戒嚴時期的黨國體制下，官方修史活動多由黨史會主導，國史館扮演協助角色，國史修纂也以國民黨黨史為依歸，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爭奪中國之正統，以維護國民黨政權的統治合法性。1980年代中期以後，由於臺灣民主化與政治變遷，國史館與黨史會的關係開始受到民進黨立委的質疑，〈檔案法〉的制定過程更引發國史館的定位問題與存廢爭議。嗣後，國史館嘗試提升學術地位，逐步調整工作環境與相關業務，修纂成果的質與量皆有明顯改善，但仍無法跳脫中國本位的框架。2000年政黨輪替後，館長改由學者擔任。除了修纂國史，國史館還新增職掌，成為兼具歷史研究、檔案典藏與總統副總統文物展示的特殊政府機構。民進黨執政時期，在新館長主導下，「臺灣史」逐漸躋升為國史的一環，國史館的學術地位也大幅提升，並取代黨史會，成為官方修史活動的主導機構。2008年國民黨重返執政後，「中華民國史」的地位再度獲得確立。作為政府機構的國史館，其國史修纂活動，除了各館長學術專業領域的差異，更是深刻地受到執政黨政治理念的影響，而呈現不同的風貌。

關鍵詞：國史館、黨史會、官方修史、正統、合法性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tion, political parties, and historiography in post-war Taiwan and the role of the Academia Historica in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through the changes in the organization and the compiling of history after its restoration in Taiwan.

The study finds that as an official historical institution, the Academia Historica has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Party's History Council of Kuomintang (KMT) since the days of the ROC in China. Under *Dang Guo* during the martial law period, the compiling of official history activities are mostly led by the Party's History Council of Kuomintang, with the Academia Historica playing a supporting role. Afte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Academia Historica in Taiwan in 1957, the Academia Historica and the Party's History Council of Kuomintang continued to maintain a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National history is also based on the history of the Kuomintang, with the aim of competing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r the legitimacy of the KMT regime in China.

After the mid-1980s, due to the democratiza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s in Taiwa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cademia Historica and the Party's History Council of Kuomintang began to be questioned by the legislators of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The process of enacting the "Archives Act" has led to controversies over the positioning of the Academia Historica and its retention or abolition. The Academia Historica then attempted to raise its academic status and gradually adjust its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related operations.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the compiling results hav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but it is still impossible to break away from the China-based framework.

After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party in 2000, the DPP government came to power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Academia Historica was replaced by an academic. In addition to compiling national history, the agency has added new responsibilities, becoming a special government institution that combines historical research, archival collections, and the display of Presidential and Vice Presidential Artifacts. With the new director at the helm, the "Taiwan History" has gradually become a part of national history, and the

academic status of the Academia Historica has been greatly enhanced. It has replaced the Party's History Council as the leading organization for official history compiling activities.

After the KMT returned to power in 2008, the status of th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reaffirmed. As a government institution, the Academia Historica is still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the agenda of the ruling party an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academic expertise of its directors, and thus presents a different picture of its national history compilation activities.

Keywords: Academia Historica, Party's History Council, Official Compiling History, Orthodox, Legitimacy



目次

謝辭.....	i
中文摘要.....	iii
Abstract.....	iv
目次.....	vi
第一章 緒論.....	1
一、研究動機.....	1
二、研究回顧.....	5
三、研究方法與史料介紹.....	15
四、章節內容說明.....	19
第二章 國史館在臺復館	22
第一節 民國建立與國史館的成立.....	22
一、北京政府時期國史館的成立與解散.....	22
二、訓政時期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的先行設置.....	24
三、抗戰時期國史館的籌設.....	26
第二節 國史館在臺復館之規劃.....	31
一、黨史會與國史館史料編纂委員會.....	31
二、在臺正式恢復國史館.....	37
三、初期的組織架構.....	42
第三章 戒嚴時期的修史工作	49
第一節 初期工作計畫與限制.....	49
一、1957 年國史館施政綱要.....	50
二、修史工作的限制.....	54
第二節 戡亂復國與國史編纂.....	70
一、反共抗俄與開國五十年文獻.....	71
二、國民革命與國父百年誕辰學術論著.....	76
三、倡導國史研究與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81
四、奠定國基與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92
五、維護法統與「中華民國建國史」的協力纂修.....	96
第四章 民主化的衝擊與修史工作的調整	103

第一節 國史館定位與存廢爭議.....	104
一、與黨史會的職司混淆.....	104
二、檔案開放問題.....	106
三、制定〈檔案法〉的提出.....	107
第二節 積極推動國史修纂.....	112
一、「中華民國國史」編撰計畫之擬定.....	112
二、相關業務的改革.....	116
第三節 國史纂修成果.....	122
一、清史與民國史事紀要.....	123
二、志書與傳記.....	124
三、專著、論文與期刊.....	131
四、檔案移轉與史料彙編.....	138
第五章 政黨輪替與國史館的轉型	142
第一節 組織之再造.....	142
一、組織條例的修訂.....	142
二、學者執掌館務.....	144
第二節 國史編纂重心之移轉.....	146
一、「臺灣史」躋升國史的一環.....	146
二、「中華民國史」地位的再確立.....	151
第三節 修纂人才甄選與國史解釋.....	155
一、高考「史料編纂科」的考試科目異動.....	155
二、抗戰歷史的解釋.....	160
第六章 結論.....	165
參考文獻.....	170
附錄.....	185

表次

表 1	1958 年至 1979 年國史館預算員額與實際員額（單位：人）	44
表 2	1956 年 7 月至 1957 年 6 月「國史館史料編纂委員會」預算（單位：新臺幣）	45
表 3	1957 年 7 月至 1958 年 6 月「國史館」開辦費及經臨費預算（單位：新臺幣）	45
表 4	1957 年 7 月至 1979 年 6 月經常費、臨時費總預算（單位：新臺幣）	46
表 5	1969 年 7 月至 1978 年 6 月經常費、臨時費決算數（單位：新臺幣）	46
表 6	復館以來歷任館長任期一覽表（1957-2016）	47
表 7	1950 年至 1968 年羅家倫館長時期國史館、黨史會出版品	55
表 8	1968 年至 1984 年黃季陸館長時期國史館、黨史會出版品	57
表 9	2000 年以前國史館的辦公地點及其相關建築一覽表	64
表 10	國史館人員簡歷表（1965 年）	65
表 11	全國公務人員高考—首屆史料編纂科錄取名單（1973 年）	69
表 12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書目	74
表 13	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出版之學術論著	79
表 14	國父百年誕辰學術論著編纂委員會職員名單	80
表 15	各館長完成編纂《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之年份	95
表 16	中共編寫《中華民國史》之出版年份	97
表 17	《中華民國建國史》編纂委員會成員	100
表 18	《中華民國建國史》篇章名稱	101
表 19	第一至第五任國史館在臺館長生平一覽表（1957-2000）	105
表 20	國史館學術討論會報告主題（1993 年）	118
表 21	公務人員高考史料編纂科人數統計（1973-1998）	121
表 22	中華民國史各志書出版時間及召集人	125
表 23	《中華民國史》公職志、地理志編纂委員會委員名單及其經歷	126
表 24	瞿韶華館長以後各志書編纂委員會委員名單	127
表 25	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1 至第 27 期〈國史擬傳〉（1987.1-1999.12）	130
表 26	《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與《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主題分類與斷代分期統計	133
表 27	《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與《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作者統計（1971-2001）	134
表 28	《國史館館刊》復刊文章類別與作者統計（第 1 至 27 期）	137
表 29	《國史館館刊》復刊「專著」類別統計表（第 1 至 27 期）	138
表 30	國史館史料叢書出版品分類表（1984-2000）	139
表 31	國史館重要典藏史料一覽表	139
表 32	第六至第八任國史館在臺館長資歷（2000-2016）	146
表 33	1998 年至 2016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中國近代史」考科試題	157
表 34	2011 年 9 月至 2016 年 4 月國史館舉辦之學術活動	160

圖次

圖 1 國史館組織架構圖（1957-2001）	42
圖 2 1969 年 7 月至 1978 年 6 月經常費、臨時費決算數額	47
圖 3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組織架構（1969 年）	89
圖 4 國史館現階段重點工作（1987 年）	115
圖 5 國史館組織架構圖（2002 年 1 月—）	144



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動機

官方修史制度是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也是中國傳統史學的重要組成。「史」字最初的涵義即是「史官」，其原始職務與祭祀、卜筮、星曆相關，並負冊命與記事之責。¹春秋時期，周天子與各諸侯開始有意識地記載自身歷史，史官的職務遂趨向單純的人文記事；²東漢明帝下詔修纂《東觀漢記》後，史官始增加纂修本朝國史之任務。《東觀漢記》的結構參照《史記》、《漢書》，採帝王世系、朝廷活動為中心的紀傳體體例，不僅成為往後官修正史的主要體裁，也標誌著官方史學開始涉入修史活動，中國傳統史學自此走向官方與私家著史並進之路，兩者形成互補卻又相互制約的社會運行機制。³魏晉南北朝以後，官方修史活動逐漸朝建置史館、集體修史的方向前進。⁴此時期政權分立、社會動盪，各政權皆以正統自居，而有史官之設，私家史學也大為興盛，紛以不同立場書寫歷史。⁵其中南朝的宋文帝命謝靈運撰寫《晉書》，開官方纂修前代史之先河；北魏孝文帝亦另置起居令使，成為後來唐朝政權起居注體制的先聲。

在官方的控制與管理下，唐朝的官方修史活動已逐步形成標準化、規範化的制度。西元 629 年，唐太宗詔修梁、陳、北齊、北周、隋等前朝史，交由中書省負責；另設置「史館」，由宰相率領史官纂修本朝的「紀傳體國史」與「編年體實錄」；起居注部分，分由門下省與中書省的起居郎、起居舍人負責。⁶自此，由新朝纂修前代正史成為往後官方修史的慣例，正史纂修之權乃由官方壟斷，⁷史官與史館建置亦成為政權組織的重要一環。⁸宋代以後，在文人治國的思維下，統

¹ 杜維運，〈中國史官的及時記事與修史〉，收入氏著，《憂患與史學》（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頁 87-91。

² 喬治忠，《中國史學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頁 35-37。

³ 喬治忠，《中國史學史》，頁 88-91。

⁴ 王紀錄，〈百餘年來中國古代史館制度研究述評〉，《殷都學刊》，2007：2（安陽，2007.6），頁 67。

⁵ 杜維運，〈中國文化中的歷史觀念與史學的綿延發展〉，收入氏著，《中國史學與世界史學》（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 56-66。

⁶ 喬治忠，《中國史學史》，頁 118-120。

⁷ 倪道善，〈古代史館述評〉，《歷史教學（下半月刊）》，1988：8（天津，1988.8），頁 11。

⁸ 杜維運，〈中國的史官記事制度與修史事業〉，收入氏著，《中國史學與世界史學》，頁 91-92；喬

治者對官方史學活動實行嚴密的監視與管控，皇帝破除禁止觀看起居注的傳統，更可直接干預史書修纂，致使官方修史更加貫徹統治者的意志，難以如實呈現客觀歷史記載，由是遭致譏評。清朝以後，官方修史活動更在乾隆皇帝廣設各類史館、全面纂修各類型史書與嚴密管控文人思想等一連串作為中達到高峰，二十四史的「正史」地位也經由皇帝欽定而得到確立；直至嘉、道以後，清政權面臨日漸增強的內外交迫情勢，官方修史活動始因朝廷無力維持而逐漸衰退。⁹

由上可知，中國的官方修史制度實是歷經史官記事、修纂史書，再到建置史館、集體修史的制度化過程，成為一項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¹⁰杜維運曾用現代的語言將此發展比喻為「修史的國營企業化」。¹¹凸顯出史學與政權的關係，隨著朝代的不斷更迭更加緊密，掌握政權的統治者經常藉由纂修前代史與本朝史，來確立新王朝的正統地位，並以修史活動籠絡士人，消除敵對意識，進而壟斷修史控制褒貶之權。

然而，十九世紀下半葉以後，西方政治思潮的傳入，使中國傳統的「天下」（All-under-Heaven）觀逐漸為「國家」（nation）所取代，中國不再被視為世界秩序的中心，變成「國際大家庭」（family of nations）的一個成員；¹²「國家」、「國民」、「群」等新概念的出現，亦促使史學與現代「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產生緊密連結。這些觀念的轉變對中國傳統史學造成巨大衝擊，因史學被賦予保國救民的新任務，受到新思潮洗禮的中國知識分子認為，傳統史學已難以回應新的政治需求，而出現史學革命的呼聲。¹³官方修史制度也開始受到猛烈的抨擊。

率先對官方史學發難的是舉起「史界革命」旗幟的梁啟超。1901、1902年，他先後發表〈中國史緒論〉與〈新史學〉二文，其中〈新史學〉一文開章明義，指稱史學為「國民之明鏡」、「愛國心之源泉」，稱讚史學促進歐洲民族主義的發

治忠，《中國史學史》，頁160-163。

⁹ 喬治忠，〈清朝官方修史活動述論〉，收入氏著，《中國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頁82；杜維運，〈中國的史官記事制度與修史事業〉，收入氏著，《中國史學與世界史學》，頁107，註釋內容。

¹⁰ 喬治忠，《中國史學史》，頁164。

¹¹ 杜維運，〈中國的史官記事制度與修史事業〉，收入氏著，《中國史學與世界史學》，頁98。

¹² Yü Ying-shih（余英時），“Changing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in Erik Lönnroth, Karl Molin and Ragnar Björk (eds.),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94), pp. 155-161.

¹³ 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收入氏著，《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頁7-8。

達與文明的進步；相較之下，中國之舊史卻有「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等四大弊端。梁氏呼籲，史學應該改變書寫對象，從君主、英雄人物，改以「國家」、「國民」與「社會」為主體，重新書寫與研究中國歷史來重構中國人的國族認同，凝聚國家意識。¹⁴他的主張獲得中國知識界廣泛的迴響，與改革派立場相左的革命派，如章太炎、劉師培等人，亦皆贊同史學必須改革，並試圖重新建構中國歷史，以通史形式對中國歷史加以分期並進行專題研究。¹⁵〈新史學〉成為引領中國傳統史學走向現代中國史學的里程碑，不僅重新界定「歷史」，更對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產生重大影響。¹⁶

在上述影響下，「國史」(national history)的概念也發生轉變，不再是以朝廷活動為中心的「朝代正史」，而是轉變成以國民、社會為中心且帶有民族主義內涵的「國族歷史」。¹⁷史學被視為建構「民族國家」的重要工具，二十世紀初以來中國知識分子透過「國史」書寫，重新定義「中國」的範圍與主體，在西方進步史觀的影響下，將中國歷史做單向的線性敘事，並在時間序列下對中國歷史加以分期，探究中國上古史以找出民族國家的起源，研究中國近代史以構築當代國族的合理性。¹⁸這帶有民族主義的「國史」至 1930 年代後期抗日戰爭爆發後得到進一步的昇華，如在錢穆於對日戰爭期間書寫的《國史大綱》一書中，國史被當作一首由民族的血淚與奮鬥交織而成的「民族史詩」(national epic)，錢氏寄望透過國史的書寫來喚醒「國魂」，創造國民認同，進而使民族復興。¹⁹

民族主義因而成為中國傳統史學轉型至現代中國史學的關鍵，目的是建構

¹⁴ 梁啟超，〈新史學〉，收入《飲冰室文集全編（三）》（上海：廣益書局，1948），頁 32-37。

¹⁵ Yü Ying-shih (余英時)，"Changing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in Erik Lönnroth, Karl Molin and Ragnar Björk (eds.),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pp. 157-161.

¹⁶ 王汎森指出近代中國史學發展歷經三次革命，這三次革命的主要代表人物與發展重心為：（一）梁啟超（1873-1929）：重新界定何謂歷史；（二）胡適（1891-1962）、傅斯年（1896-1950）：如何研究歷史；（三）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興盛。參見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收入氏著，《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頁 6-7。

¹⁷ Yü Ying-shih (余英時)，"Changing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in Erik Lönnroth, Karl Molin and Ragnar Björk (eds.),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pp. 155-161、163-164.

¹⁸ 劉龍心，《知識生產與傳播—近代中國史學的轉型》（臺北：三民書局，2019），頁 22-25、134-135。

¹⁹ 黃俊傑，〈錢賓四史學中的「國史」觀：內涵、方法與意義〉，《臺大歷史學報》，26（臺北，2000.12），頁 3-6。

「民族國家」，致使二十世紀上半葉以來，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與書寫基本上以民族主義為主調，²⁰印裔美籍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曾就此一情形作出批判。²¹然而作為官方修史機構的國史館，卻因民族主義作為中國近代史學的敘事主軸，得以在中國對日作戰期間展開籌設，1947 年戰爭結束後於南京正式成立，被視為近代民族國家建立工程之一環。²²1949 年國民黨政府遷臺以後，雖國史館未隨政府撤臺，然而其業務由中國國民黨的黨史會兼辦，直至 1957 年國史館始正式在臺復館。²³

國史館復館後，由於其係為官方修史機構，在戒嚴時期的國民黨黨國體制下，無論是館長的人選或修史工作，皆與國民黨密切相關，國史修纂主要是配合國民黨政府的政治需求，強調中華民國之正統，鞏固政權的統治合法性。因此，1987 年解嚴以後，國史館的組織定位及其與黨史會的關係乃開始受到在野立委的質疑，甚至出現存廢爭議。國史館不得不尋求改變，力圖提升學術地位。2000 年政黨輪替以後，國史館的組織與職掌都產生巨大變化，除了國史修纂，亦負有管理典藏總統副總統文物之任務，館長也改由學者出任，使國史館的學術地位進一步提升。然而在民主化的政黨政治時代，各政黨對於國家定位持有不同主張，民進黨政府強調臺灣主體性，國民黨政府則強調中華民國之正統，在兩黨先後執政下，國史館的修史重心也隨執政黨的政治理念而有所移轉。

由上可知，國史館在臺復館之後，其組織與業務時有調整變化，其中，尤與國家定位、政黨理念尤有緊密的關聯。本文即欲透過國史館在臺復館後的組織運作與修史相關工作，考察戰後臺灣國家、政黨與史學之間的糾葛關係。本文以 1957 年國史館在臺復館至 2016 年第二次政黨輪替結束作為時間斷限，此因這段

²⁰ 關於民族主義、現代化與中國近代史的書寫問題，參見劉龍心《知識生產與傳播—近代中國史學的轉型》一書中第二章的討論。劉龍心，《知識生產與傳播—近代中國史學的轉型》，頁 129-217。

²¹ 杜贊奇曾提出「複線的歷史」（bifurcated history）概念，對此種以「民族」作為主要的歷史敘述結構進行批判，認為「民族主義」實為一種在宣稱統一、追求民族認同的目的下，以相對性的身分、容納某些群體，卻常以暴力形式或邊緣化其他群體的歷史建構。為此，他主張應反省過去線性歷史的目的論，了解現代的人如何透過書寫決定過去的歷史，以發掘、「拯救」真正的歷史。參見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著，王憲明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 4、14。

²² 林映汝，〈舊瓶裝新酒：朱希祖與國史館籌備委員會（1939-1942）〉，《國史館館刊》，65（臺北，2020.9），頁 74-75。

²³ 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新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77），頁 179、187。

期間臺灣歷經戒嚴、解嚴與兩次政黨輪替，得以就國民黨政府遷臺初期的黨國體制到轉型為民主體制政治形勢的變化，作一較完整的觀察，從而瞭解國民黨和民進黨執政時期國史館所面臨的問題及修史內涵之轉變。

二、研究回顧

國史館為官方修史機構，而官方修史又是中國傳統史學的特色，因此首先回顧中國傳統官方修史制度；其次介紹近代中國史學學科建置，以及戰後臺灣史學發展研究概況。最後，說明民國建立以後乃至戰後國史館的相關研究成果，並介紹有助於本研究討論的相關文章。

首先，中國傳統官方史學的相關研究。2007 年王紀錄的〈百餘年來中國古代史館制度研究述評〉一文，曾回顧近一百來學界有關官方修史與史館制度的討論。全文可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中國官方修史制度的貫時性論著；第二部分為魏晉南北朝以迄清代，關於個別朝代史館的研究。作者指出，這一百年來學界對史館的研究集中於兩個時期，第一期是 1940 年代，因當時各界期盼政府設置國史館，而引發學界對史館的初步探討；第二期是 1980 年代以後，學界對史館制度有了較為深入的討論，唐、宋時期的史館研究最先成為討論的焦點，研究內容也較為深入，除了史館制度的建置、管理機制，更延伸至政治與學術關係的探討；1990 年代以後，學界逐漸將眼光轉移至唐、宋兩朝以外的史館發展，清代史館的研究取得較大的突破，遼、金、元時期的討論次之。²⁴

2011 年喬治忠的《中國史學史》一書，以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互動所構成的中國傳統史學運行機制為論述重點。全書分九個篇章，介紹中國上古時期自 1949 年以前的中國史學發展。作者對民國建立以前各朝代的官方修史活動與中國史學之開展有細緻而清楚的描述，有助於了解中國傳統史學與政治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就史學思想而言，作者指出，傳統史學的「經世致用」觀念使史學始終無法避免成為政治的附庸，過去史家因而時常在「實事求是」與「經世致用」之間出現矛盾與掙扎。二十世紀初以來，受西方史學思潮影響的新史學成為學界主流，然官方史學並未就此消失，經世精神仍影響著部份學人的治學取向，並對近代中

²⁴ 王紀錄，〈百餘年來中國古代史館制度研究述評〉，《殷都學刊》，2007：2（安陽，2007.6），頁 66-71。

國的史學發展產生重要影響。²⁵可惜的是，作者對民國建立以後的官方史學，僅將焦點放在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的流行以及毛澤東對「革命史學」體系的建構，對於民國以後國史館的發展與國民黨政府治下在史學方面的活動則未嘗說明。

其次，近代中國史學建立之相關研究，可以劉龍心的論著為代表。2002 年劉龍心的《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一書，從制度建構的角度探討現代中國史學如何藉由西式教育體制的引進，逐步打破傳統的國學框架，進而建立學科的主體性與學術規範，成為現代學術體制下的一門專業學科。作者認為，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與教育的改革相伴而行，西式教育制度的引進，帶動近代中國學術的轉型，晚清至民國建立以後，史學經過學術分科、學院化與專業化的發展，逐漸擺脫依附於經學之角色，且與原本性質相近的文學、哲學疏離，逐步確立學科範圍，並在現代學術體系中找到自我定位，成為一門獨立且帶有社會科學性質的專業學科。²⁶相對於此，中國傳統的官方史學卻隨著清政權的衰亡，失去賴以維生的政治土壤及因現代史學學科體系的建立而迅速邊緣化。²⁷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述及 1917 年北京大學中國史學門的成立，實是現代中國史學學院化的起點，其成立的契機則是以協助國史編纂處（前身為國史館）纂修國史為由，自北京大學文科中獨立。也因為如此，其人事與課程處處受制於國史編纂處，直至 1919 年國史編纂處改隸於國務院後，北大中國史學門才在蔡元培、朱希祖的帶領下展開第一次改革，進而推動史學系的轉型，完成史學的學科建置。²⁸

2019 年，劉龍心再行出版《知識生產與傳播—近代中國史學的轉型》一書，進一步深究傳統史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差異及轉型問題。全書分為六章，前兩章探討中國上古史與中國近代史知識的產生與近代國族建構之關聯，三至六章則分別從社群、網絡、傳播等方面論述歷史知識形成的社會條件。作者認同前文提及的印裔美籍學者杜贊奇提出的「複線的歷史」觀點，認為歷史是使非民族國家變成民族國家的重要工具，當民族國家成為主流話語時，其他群體的特徵將被掩蓋，此理論可反映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學人在中國歷史的書寫模式上。²⁹此書的討論有助於從國族建構的角度來理解民國時期國史館的成立原因。

²⁵ 喬治忠，《中國史學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²⁶ 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臺北：遠流，2002），頁 118-143。

²⁷ 劉永祥，〈民國時期國史館的變遷〉，《學術研究》，2015：2（廣州，2015.2），頁 123。

²⁸ 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頁 124-132、143。

²⁹ 劉龍心，《知識生產與傳播—近代中國史學的轉型》（臺北：三民書局，2019）。

其三，戰後臺灣史學的發展之相關研究。此方面的研究成果甚多，在此不一贅述。³⁰其中與本文最為相關的討論是林正慧的〈遷臺後民國史之定位及思考〉一文。作者為國史館協修，從文末可知其書寫該文之目的乃是思索未來纂修《中華民國史》可行的方向。作者指出，目前國史仍以「中華民國史」居主要位置，中華民國政府遷臺至今的時間已超過其在中國大陸時期，然分析《中國現代史》與《中華民國史》相關著作，「遷臺後民國史」佔其內容比例皆偏低，且和「戰後臺灣史」相比，兩者差異之處在於「遷臺後民國史」多以政權為論述主體，1949年為關鍵時間點；「戰後臺灣史」則以土地、人民為主體，關鍵時間點為1945年。兩者討論的時間與空間在1949年以後開始重疊，學界對民國史和臺灣史之間卻有一條隱形的界線。作者認為，雙方須展開對話，方能編寫具有共識、以凝聚國人國家認同的《中華民國史》。為了說明「遷臺後民國史」與「中國現代史」、「戰後臺灣史」三者之間的糾葛，作者對戰後臺灣史學的發展脈絡做清楚的交代。其中，作者指出，韓戰後國際冷戰情勢形成後，國民黨政府為了反共抗俄的國策，開始重視中國近代史的教學與研究，不僅在1952年將中國近代史列為大專院校必修課程，亦於1955年成立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籌備處；1970年代以後，一連串的外交失利，使國民黨政府為建立「正確的民國史」，開始重視中國現代史，於1973年將「中國現代史」課程列為大專院校的必修科目。然而，直至1987年解嚴前後，民國史的研究仍受限於官方主導的國民革命史觀，檔案史料不公開亦不利於史學研究，顯示前述政府的歷史政策實為重教育、輕研究。³¹此文的討論，

³⁰ 根據張隆志的整理，可做以下分類：（一）文獻目錄整理和評介：高明士主編，林玉茹、李毓中編著，《戰後臺灣的歷史學研究（1945-2000）》（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4），第七冊：臺灣史；（二）個別領域專題回顧：黃富三、古偉瀛、蔡采秀主編，《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三）量化統計期刊論文：彭明輝，《臺灣史學的中國纏結》（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四）史家作品個案研究：許雪姬，〈楊雲萍教授與臺灣史研究〉，《臺大歷史學報》，39（臺北，2007.6），頁1-75；（五）具有史學史問題意識：1.以歷史意識變遷為視角：吳密察，〈「歷史」的出現：臺灣史學史素描（一）〉，收入黃富三、古偉瀛、蔡采秀主編，《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頁1-21；2.以史學傳統引介為視角：王晴佳，《臺灣史學五十年（1950-2000）：傳承、方法、趨向》（臺北：麥田出版，2002）、杜正勝，《新史學之路》（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4）；3.以民族主義史學觀點，認為當代臺灣史從地方史轉變為國家史：Q. Edward Wang, "Taiwan's Search for national History: a Trend in Historiography," *East Asian History* 24(December 2002), pp.93-116。參見：張隆志，〈當代臺灣史學史論綱〉，《臺灣史研究》，16:4（臺北，2009.12），頁162-163。

³¹ 林正慧，〈遷臺後民國史之定位及思考〉，收入吳淑鳳等編，《近代國家的形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下）》（臺北：國史館，2013），頁1067-1128。

有助於本文理解戰後臺灣國史館的修史活動可能面臨的困難與阻礙，進而如何影響國史館的修史成果。

其四，民國以後的國史館研究。1990 年代中期以後，民國時期的國史館研究才逐漸獲得關注。此項研究以中國方面的討論較早，然多為概述、沿革等介紹性質的文章，近年研究多有從重要成員對國史館的規劃及其貢獻進行深入探討，論述方式也漸從單純引用直接或二手史料，進而試圖以社會科學的理論來解釋國史館的存在意義。以下分別敘述之。

最早關注民國時期國史館的沿革發展是中國官方檔案管理機構。1996 年，上海市檔案館的官方刊物刊登習之的〈民國時期的國史館〉一文，該文係摘自曾刊載於《中國檔案報》的一則新聞。《中國檔案報》創刊於 1995 年，由中國國家檔案局主管的中國檔案報社發行，因此可視為中國當局對於民國時期國史館的看法。該文概述民國時期各個階段國史館的發展，關注焦點為檔案收集、整理的政府政策與負責單位。此文肯定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國史館籌備委員會對於檔案的收集所做的努力，卻也指出由於經費與客觀環境等緣故，許多檔案不僅散失，「檔案總庫」始終未能成立。³²之後，歷史學界始有民國時期國史館的討論。1998 年陳光的〈民國國史館述略〉一文，以三頁篇幅，簡單說明國史館從提議設置到遷臺之前的組織變化，稍微述及國史館主事者的身分地位與工作成果。³³

前述文章皆為簡介、沿革性質，對民國時期國史館的組織發展進行深入討論的研究，可以 2006 年夏雨的碩士論文〈民國國史館研究〉為代表。該文主要運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有關國史館文獻，探討民國時期國史館的變遷、工作開展成果，以及但濤、朱希祖與金毓黻等三位重要成員與成就等。作者認為國史館籌備委員會時期的貢獻最多，此時期不僅為後來國史館的成立與工作方針奠定基礎，並已展開部分實際編纂工作。³⁴然全文僅有三十餘頁，敘述內容也僅在國史館組織內部的變化，較無法和當時的政治情勢與學術思潮做呼應。對於當時的統治者為何設置「國史館」，並未多做說明。

夏文對國史館重要成員的討論，則開啟了後來學界多從國史館重要成員的構想與貢獻作為民國時期國史館研究的主要視角。如 2017 年賈紅霞發表〈民國時期金毓黻在國史館的修史活動述論〉一文，以國史館纂修金毓黻為對象，主要運

³² 習之，〈民國時期的國史館〉，《檔案與史學》，1996：5（上海，1996.10），頁 75-76。

³³ 陳光，〈民國國史館述略〉，《民國春秋》，1998：1（南京，1998.2），頁 15-17。

³⁴ 夏雨，〈民國國史館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6。

用民國時期《國史館館刊》所收錄的工作及會議紀錄、金毓黻的《靜晤室日記》，分別探討金氏在南京時期國史館的制度規劃：包含制定新的國史體例、建議制訂史官選拔辦法及職能分配、制定史料蒐集流程以及撰修國史的具體實踐等。作者指出，金毓黻的規劃延續了古代史館的優點，並呼應時代潮流，融入新的史學理念，使本朝人修本朝史的理念有機會得以實踐。作者也認為，金毓黻在南京時期國史館的史料蒐集與編纂工作有助於奠定後世民國史研究的基礎；此外，在臺灣復館的國史館，重新復刊《國史館館刊》、編纂《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及《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等皆延續自南京時期的國史館，因此金毓黻及其史館同仁的工作，對於大陸與臺灣的民國史研究都具有開創之功。³⁵又如2019年劉寶璋〈國史館成立與民國史體例之爭〉一文，也是運用《國史館館刊》與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藏有關國史館之檔案，論述中華民國在大陸時期有關纂修民國史的學術論爭。該文指出，這場學術論爭共有兩次，第一次在1940年國史館籌備委員會成立時，主要爭論國史體例該繼承傳統或有所創新；第二次為1947年國史館在南京正式成立後，除了延續國史體例的爭論，進一步擴及編寫內容的稱謂、斷限與分期等問題。作者從國史體例、編纂方法與類目的擬定來分析但燾、朱希祖、金毓黻等人之主張，指出他們的看法不同程度地延續了傳統史學體例，同時也呼應時代的轉變與需求而有所創新。³⁶然而對這些不同議論之間的關係為何？三人的學思歷程與政治經歷對於這些主張的形塑有何影響？作者並未論及。

再如2020年林映汝發表〈舊瓶裝新酒：朱希祖與國史館籌備委員會（1939-1942）〉一文，主要運用朱希祖的日記與文集、國史館所藏《國民政府檔案》中《國史館沿革》等資料，探討曾任國史館籌備委員會總幹事的朱希祖，在中國傳統史學面臨西方史學與中國「新史學」的衝擊下，對國史館所做的規劃與實踐。作者首先從朱希祖〈請建立總檔案庫籌設國史館議〉一文分析此一提議的背景以及當時南京國民政府對設置國史館及檔案館的態度。作者指出，國民革命軍北伐完成後，各界要求設置國史館的原因在於與中國共產黨爭奪歷史詮釋權，並肯定國民黨的革命正當性。接著，說明抗日戰爭時期，國史館籌備委員會從決議設置

³⁵ 賈紅霞，〈民國時期金毓黻在國史館的修史活動述論〉，《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2017：1（北京，2017.8），頁245-259。

³⁶ 劉寶璋，〈國史館成立與民國史體例之爭〉，《東岳論叢》，2019：11（濟南，2019.11），頁77-85。

到朱希祖規劃的過程以及實際的工作情形，包含設計、採訪、編輯與工作的困難點等。作者兼顧時代的學術發展與政府當局的政治考量，對國史館籌備委員會的來龍去脈做了細緻的分析，認為在朱希祖的領導下，籌委會的性質已脫離傳統的史館，反映在修史的體例、方法與人才的培養上；此外，在戰爭時期，將為國犧牲及對國家有功之人宣付國史館立傳的作法，宛如近代國家國族建構過程中的紀念儀式，因此，作者認為國史館不僅是「近代國家化」過程的一環，「國史館」的名稱也同時具備「國族」或「現代民族國家」之意涵。³⁷此文將民國時期國史館放在國族建構脈絡的觀點作考察，對本文的討論深具啟發性。

比起單純說明組織的變化，2015 年劉永祥的〈民國時期國史館的變遷〉一文，探討民國時期國史館的設立與設館理念，乃至後來的建制過程，在研究視角上已有所突破。作者指出，民國時期國史館有兩種轉變：（一）官方史學有從中心走向邊緣的趨勢；（二）國史館非單純學術性機構，其政治屬性隨著國民黨的統治需要而被挖掘與強化，先後被用來當作團結民族以及與中共爭奪歷史詮釋話語權的工具。該文藉由相關文本，留意到國史館的政治屬性有逐漸加強之趨勢，然而僅有事實的描述，對於提議設置國史館的時機點、提議者的身分背景以及當時的黨政關係並沒有深入分析。例如，作者認為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林森等人試圖將「黨史」作為「國史」，呈請將黨史編纂委員會改名為國史編纂委員會，以及抗戰結束後，張繼主張國史館應堅守三民主義，以中國國民黨為正統的立場來修史，這些都顯示國史館的政治意義逐漸強化。³⁸此文並未說明為何國史館於 1947 年才正式成立？國民黨的黨史編纂委員會為何於 1930 年先行設置？1949 年國史館為何沒有隨國民黨政府一同遷臺？若要回答這些問題，勢必對當時的歷史情境做更進一步的了解。然而此文確已有別於以往史學史的探究角度，有助於本文從政權的角度來思索國史館與不同政治派別之間的權力角逐問題。

此外，2019 年出版的吳宇凡《從存史到資政：民國以來檔案管理政策與制度變革（1912-1987）》一書，主題非國史館，但有所論及。³⁹該書係作者 2016 年的博士學位論文〈民國以來檔案管理制度之研究〉。⁴⁰此書主要探討中華民國政府遷

³⁷ 林映汝，〈舊瓶裝新酒：朱希祖與國史館籌備委員會（1939-1942）〉，頁 57-98。

³⁸ 劉永祥，〈民國時期國史館的變遷〉，《學術研究》，2015：2（廣州，2015.2），頁 119-124。

³⁹ 吳宇凡，《從存史到資政：民國以來檔案管理政策與制度變革（1912-1987）》（臺北：國史館，2019）。

⁴⁰ 吳宇凡，〈民國以來檔案管理制度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6）。

臺以前檔案管理制度的緣起、做法與影響，試圖瞭解政府遷臺後至 1987 年間政府機關檔案管理的依據，以釐清戰後臺灣檔案管理制度化過程中的承襲與轉型。由於國史館在此制度變革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作者花了部分篇幅來論述重設國史館與成立國立檔案庫之間的論爭，並述及國史館籌備委員會和黨史會於抗戰結束後聯合開展的檔案徵集作業，藉以論證國史館的設置與檔案管理、典藏之間的關聯。但與本文關懷重點的不同，作者對於國史館主要的修史職掌與設置目的並未深入探究，多以「姑且不論」帶過，且對於國史館在臺復館後檔案徵集與典藏的情況也未特別著墨。不過，此書仍對本文的撰寫有相當的助益，如藉由作者對於政府行政改革的討論，本文得以了解 1950、60 年代政府行政改革的思維，以及行政改革過程中黃季陸主持委員會時的發展與構想。黃季陸後來被總統特任為國史館館長，或與此經歷有關，我們亦可檢視他在主持國史館期間，推動的工作計畫與成果是否與他此前的行政改革理念有所關連。

最後，值得說明的是，關於戰後國史館臺灣復館相關活動的討論文章，多為國史館成員所撰寫，發表於國史館官方刊物，這些文章對於本文的撰寫助益頗大。如 1998 年國史館副館長朱重聖的〈民國以來國史館之修史工作〉一文，介紹了國史館的修史成果。作者將民國成立以後的國史館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在臺復館後的國史館為第三階段。他首先說明國史體例最初的研訂，指出自民國成立以來，有關國史體例的研訂共有三次：第一次為民國初年國史編纂處時期；第二次為 1947 年國史館在南京成立之後；第三次則是在 1984 年，國史館因應中共欲以「修前朝史」的觀念修纂「中華民國史」，緊急召開會議，制定「國史館編撰中華民國史計畫綱要」。其次，分別概述了國史紀、志、傳（包含史事紀要、志書、傳記）、前代史之刊正（清史稿校註、新清史整修）、專題研究（人、事、地區、研究論文）、史料蒐採彙編（建國文獻、重刊舊史料、職名錄與年表日誌、口述史料、專題史料、臺灣史料）等國史館的各項修史成果。最後，作者對於國史館的修史成果進行總檢討。他將國史館的修史分為三個層次：研訂國史體例、修纂國史紀志傳、刊正前代史為最高層次；研究專題次之；蒐採彙編史料為最低層次，指出國史館的修史工作僅在最低的蒐採彙編史料層次較受外界肯定，國史館的出版品雖數量頗多，然「質」卻有待提升，主要原因在修史人才的晉用與栽培問題。

⁴¹此文對於 1998 年以前國史館修史成果的整理，有助於本研究迅速掌握國史館

⁴¹ 朱重聖，〈民國以來國史館之修史工作〉，收入《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第二

的修史方向。此外，作者為國史館的高階主管，其對國史館修史成果的檢討，亦可視為理解國史館成員反思修史工作的一手材料，有助於了解國史館修史工作所面臨的困難。

又如 2017 年國史館修纂處處長許瑞浩的〈國史館在臺復館後的組織變革與發展（1957-2017）〉一文，除將國史館在大陸時期的成立經過與組織職掌做簡要陳述，第二章至第三章即論述國史館在臺灣復館後，前五位館長的館務發展重點及此過程中國史館的組織變革與新增職掌，第四章介紹首次政黨輪替後上任的國史館館長張炎憲至 2016 年包含林滿紅、呂芳上館長時期的館務發展，第五章則為時任館長的吳密察時期的館務與未來展望。作者指出，當今的國史館面臨國史館本身的定位、檔案開放、文物典藏空間與展示等三大問題以及一些結構性問題，國史館除了須設法對外尋求支援，更應該順應時代潮流與社會脈動，提升國史館的功能，以提升機關的定位並獲得社會大眾的支持。⁴²此文依照時序的脈絡，對戰後臺灣國史館的發展與具體的工作成果進行清楚的系統的梳理，有助於了解國史館組織基本的輪廓與工作成果，但也由於此篇文章性質較偏向國史館的沿革介紹，因此較無法看出國史館的修史工作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同年，任國史館纂修吳淑鳳的〈遷臺後國史館的昔與今〉一文中，作者以自身在國史館的工作經驗，闡述國史館在臺灣復館以來的發展情形，分別探討國史館的修纂業務、檔案法對國史館的衝擊，以及國史館參與「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推廣成果與行銷等。此文除說明國史館業務，更有諸多作者對組織內部的檢討及建言，其中包含早期國史館修纂人員的組成、學經歷與後來修纂處內部的規畫及敘述檔案法的看法。此外，作者也明白指出，檔案主管機關的設立實際上是政黨之間的政治角力問題，頗能作為本文撰寫之參考。⁴³

另外，由於本文希望從國史館的修史活動來看國家、政黨與歷史的關聯，這牽涉了政權與統治合法性、國家認同的問題，以及中華民國政府如何因應中共的修史工作，以下相關論著將有助於建立本文的討論背景。

首先是關於國民黨政府與統治合法性的歷史性研究。家近亮子的《蔣介石與

冊》（新店：國史館，1998），頁 1195-1246。

⁴² 許瑞浩，〈國史館在臺復館後的組織變革與發展（1957-2017）〉，《國史研究通訊》，13（臺北，國史館，2017），頁 4-28。

⁴³ 吳淑鳳，〈遷臺後國史館的昔與今〉，《國史研究通訊》，13（臺北，國史館，2017），頁 29-41。

南京國民政府》⁴⁴與薛化元、楊秀菁的〈強人威權體制的建構與轉變(1949-1992)〉⁴⁵分別探討國民黨政府在南京時期以及遷臺後如何塑造統治正當性的問題，可作為本文的參考。前書第四章與本文討論背景最為相關。此章論述南京國民政府如何在對內與對外塑造正統性的過程中，逐步確立反共、反蘇、以實現現代化為主要發展的路線，其中對於胡漢民、蔣介石、汪精衛與白崇禧等人之間的意見紛歧與權力糾葛有精彩的描述。藉由本書的討論，有助於思索國史館與黨史會的組織如何受國民黨內部不同勢力所牽制。後文則從政權內、外部正當性的角度來論述1949年以後國民黨政權「強人威權體制」的建構與轉變。作者認為，韓戰以後，中華民國政府取得外部的正當性，成為國際上的唯一中國代表，有助於對內推動強人威權體制，以自由與民主自居的定位徒具形式；1979年臺美斷交以後，中華民國政府的外在正當性論述弱化，因此必須在民意上強化內部的統治基礎，朝自由化的改革方向前進。此文有助於本研究掌握戰後國民黨政權的政策與國際局勢變化之連動影響。政府對國史館修史工作的不重視、修史工作的各種困難，乃至1979以後開始推動中華民國史的編纂，似可說明國史館的修史工作與中華民國政府的外部正當性之間存在緊密關聯。

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華民國史》的修史工作與本文甚有關連。1986年周振剛的〈中華民國史研究及其在海內外反映〉一文，概述1949年以後中共官方纂修中華民國史的經過。該文指出，1949年毛澤東就曾指示編寫《中共黨史》、《帝國主義侵華史》及《中華民國史》；1956年《中華民國史》的編纂被列為中國科學院的重點項目之一，然而1960年代歷經一連串的階級鬥爭與文化大革命使編纂工作暫停，直自1972年始由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負責《中華民國史》編寫任務。在中共當局的指導方針下，《中華民國史》採斷代史形式，時間起迄為1905年至1949年，「以中華民國的統治階級為對象，書寫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與變化」，撰寫目的是以「中華民國史從興起到衰亡」的歷史作為借鑑。1979年中共正式對外公布這項編纂任務，隨即引發海內外強烈的反應，其中尤以臺灣方面反應最為激烈，質疑在中共指導方針下所編纂的中華民國史並非「信

⁴⁴ 家近亮子著，王士花譯，《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第四章，〈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及其正統性的確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73-111。

⁴⁵ 薛化元、楊秀菁，〈強人威權體制的建構與轉變(1949-1992)〉，收入李永熾、張炎憲、薛化元主編，《人權理論與歷史論文集》（新店：國史館，2004），頁268-315。

史」。⁴⁶

1999 年汪朝光發表〈50 年來的中華民國史研究〉一文，說明中共建國半世紀以來的民國史研究概況。⁴⁷有助於掌握 2000 年以前中國學界民國史研究的動態。作者指出，1978 年以前民國史尚未被中國學界視為一門學科，少數研究成果皆以批判帝國主義侵略和國民黨統治為主要觀點，淪為政治附庸工具；1978 年以後，中國的學術空間逐漸自由，民國史學科也逐步建立，學人可突破既有框架進而提出新觀點，如肯定資產階級對推翻封建帝制的貢獻；1990 年代以後，隨著檔案資料的開放而得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從歷史資料與歷史事實深入研究具體個案。最後，作者提醒當前民國史研究的幾個問題，包含：研究論題過大尚無法取得共識、研究水平低弱與課題重複、研究論述公式化、缺乏嚴格的學術規範，以及受非學術因素影響失去價值判斷等，作者因此期盼重新定位民國史的研究體系和研究對象，進而以多元的評價標準建立民國史研究的學科規範。

2008 年王剛也是反思民國史研究，其〈50 年曲折《民國史》〉一文，雖為報導性文學，然作者以身為記者的敏銳眼光敘述 1949 年至 2008 年間中共纂修《中華民國史》的經過與後續發展，指出中共提出纂修民國史的時機點經常與民國人事的紀念日有關，如 1955 年毛澤東發表專文紀念孫中山 90 週年誕辰，隔年《中華民國史》便被列為中國科學院的重點項目；1971 年適逢辛亥革命 60 週年，周恩來召開「全國出版工作會議」，將《中華民國史》正式列入出版計畫；2001 年辛亥革命 90 週年，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改變以往官方立場，稱讚辛亥革命為偉大的民族、民主革命，化解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意見的分歧，被視為思想上從革命史觀到民族史觀的轉變，具有劃時代意義。⁴⁸此文有助於本文從國民黨的建黨、革命、抗戰與重要領袖之紀念節日，來考察國民黨政府的決策動機。對此，2013 年周俊宇的《黨國與象徵—中華民國國定節日的歷史》一書，從中華民國國定節日的誕生、重整、獨佔到功能的轉變，來探討 1912 年至 2008 年中華民國的政治變遷，其對國定節日的整理與相關紀念活動之描述有助於本文對此一問題有更清楚的掌握。⁴⁹

⁴⁶ 周振剛，〈中華民國史研究及其在海內外反映〉，《貴州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3（貴陽，1986.3），頁 81-86。

⁴⁷ 汪朝光，〈50 年來的中華民國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5（北京，1999.5），頁 157-177。

⁴⁸ 王剛，〈50 年曲折《民國史》〉，《看歷史（先鋒國家歷史）》，2008：8（成都，2008.8），頁 26-29。

⁴⁹ 周俊宇，《黨國與象徵—中華民國國定節日的歷史》（臺北：國史館，2013 年）。

最後，在國家認同方面。如 1993 年戴寶村的〈歷史教育與國家認同—國民中小學臺灣史教育之檢討〉與 2001 年施正鋒的〈臺灣人的國家認同〉兩篇文章分別從歷史教育與政治學角度討論臺灣社會國家認同分歧的原因。前者從國民義務教育的角度探討國民黨政府如何透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結合政治法統與文化道統，以三民主義與民族精神教育為核心，壟斷教育文化與大眾傳媒，藉以鞏固自身的統治合法性，更將臺灣人的國家認同放在心理學的統合理論中加以檢視，認為歷史教育造成臺灣人與現實環境產生疏離，難以完成「定向型統合」，致而缺乏明確的國家認同。⁵⁰後者則是重新釐清「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兩個概念，進而分析「臺灣人」、「中國人」的具體內涵，最後從民族與國家兩個向度來分析臺灣與中國之間可能會有的各種關係。透過作者的論述，可知「國家認同」往往與「政治認同」、「文化認同」概念糾纏，三者無法分開探討，目前學界對於「national identity」的翻譯仍沒有共識。從作者的論述脈絡可知作者更傾向「民族認同」，意在傳達以多元的「臺灣民族」建立「臺灣共和國」的理想。⁵¹此種理想或可從政黨輪替後的國史館修史活動中更深入的觀察。

綜上可知，中華民國成立以來的國史館，無論戰前或戰後，其發展皆深受政治因素與史學知識變遷的影響，然而學界有關國史館的討論多集中於大陸時期的發展，且多從史學史的角度探討傳統史學與新史學的磨合與調整，近年已有部分文章能從近代國家的角度探討國史館與國族建構的關聯。本文將在前人研究基礎上，進一步從國家治理與統治權威的角度，以國民黨政府遷臺後，在臺復館的國史館為中心，闡析國家、政黨與史學的互動關係，以了解國史館在國家治理體系中扮演的角色。

三、研究方法與史料介紹

本文採文獻研究法，利用第一手與二手資料探討 1957 年至 2016 年間國史館的組織職掌、修史理念、實際的修史工作及其相關業務情形。所引用的資料包括國史館、黨史會與相關機構出版品，人物自傳、文集、回憶錄與日記，以及報

⁵⁰ 戴寶村，〈歷史教育與國家認同—國民中小學臺灣史教育之檢討〉，收入財團法人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編，《國家認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稻香出版社，1993 年），頁 115-138。

⁵¹ 施正鋒，〈臺灣人的國家認同〉，收入臺灣歷史學會編輯委員會編，《國家認同論文集》（板橋：稻鄉出版社，2001 年），頁 145-180。

紙及線上資料庫等，簡單敘述如下：

（一）國史館、黨史會與相關機構出版品

1. 國史館出版品，包括重要專書與期刊：

（1）專書方面：主要有國史館編《國史館紀要（初稿）》（1977年）、《復館以來的國史館》（1979年初版，1980年二版）、《國史館概況》（1985年、1991年）四本專書。其中，《國史館紀要（初稿）》及《復館以來的國史館》可說是研究國史館早期在臺發展不可欠缺的材料。前者按年月日排列，提綱敘述1912年至1977年國史館的史事，並收錄相關會議記錄、政府公報、個人傳記與組織成員名錄等；後者收錄1957年至1978年國史館各項工作概況及大事記，包含黃季陸館長的國史編纂方針、國史館館址、史料、檔案、編纂計畫、經費預算及人事業務檢討等由承辦該項業務之負責人撰寫的文章。⁵²兩書為本文最主要的史料來源，將用於第二章至第四章的討論，藉以了解1912年至1978年國史館的重要發展。

（2）期刊方面：包含《國史館館刊》、《國史館館訊》、《國史研究通訊》、《國史館學術集刊》。《國史館館刊》於1987年復刊，刊載內容包含學術類與館務類文章，共三十期，2001年起，學術類與館務類文章分離，分由不同期刊刊載。其中，《國史館館刊》專載館務類文章，後改名為《國史館館訊》（2008年12月至2011年6月，共六期），之後又改名為《國史研究通訊》（2011年12月至2017年12月，共十三期，目前已停刊）；學術類文章則另刊登於《國史館學術集刊》（2001年12月至2008年12月，共十八期），2009年再改名為《國史館館刊》並發行至今。⁵³分析國史館所出版的官方期刊，可了解1987年以後國史館的館務動態、工作檢討及其與外界的交流，藉以檢視解嚴以後國史館的轉型與發展。

2. 有關黨史會工作之出版品，包含史料彙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黨史史

⁵² 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新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77）；國史館秘書室編印，《復館以來的國史館》（新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80，二版）。

⁵³ 現在發行的《國史館館刊》期數係接續自《國史館學術集刊》（最後一期為18期），專載學術性文章，館務性質文章於《國史研究通訊》2017年12月底後出版最後一期後即停止刊行。

料編纂工作》⁵⁴及黨史會沿革性質專書《汗青一甲子》。⁵⁵前書分上下兩冊，涵蓋時間為 1930 年 5 月至 1950 年 8 月，收入 1930 年黨史會成立以後至 1950 年遷臺初期的史料編纂相關資料，包含相關法規、組織成員、史料徵集與編纂成果、史料展示以及會議記錄等，有助於深入了解民國時期黨史會的組織運作；後書為慶祝黨史會成立六十周年的官方宣傳品，全書將黨史會發展分為四個時期：南京草創時期、西遷重慶時期、播遷南投時期以及匯聚臺北時期。該書分別介紹各時期的發展概況、相關法規、黨史史料徵集與編纂成果，並附有大量圖像史料與文字作一對照，有助於本文掌握黨史會成立以來的重大轉折與重要工作內容。

3. 中國歷史學會曾發行《歷史教學》、《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及《中國歷史學會會訊》等期刊；⁵⁶中國近代史學會也曾發行《近代史學會通訊》；⁵⁷被號稱是「野史館」的傳記文學雜誌社發行的《傳記文學》期刊亦收入許多軍政領袖乃至一般市民的人物評傳、日記、回憶錄與紀念文等民國史料，可作為重要補充材料，以補國史館和黨史會官方出版品的不足之處。

（二）人物自傳、文集、回憶錄及日記：

1. 民國時期國史館相關人物，如黨史會主委兼國史館館長張繼、國史館館長居正、國史館籌備委員會總幹事朱希祖、國史館纂修金毓黻等人皆有相關日記與文集整理出版，可用來檢視民國時期國史館的實際工作狀況。

⁵⁴ 陳鵬仁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黨史史料編纂工作（上）》（臺北：近代中國，1999）；喬寶泰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黨史史料編纂工作（下）》（臺北：近代中國，2000）。

⁵⁵ 劉偉鵬主編，《汗青一甲子》（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0）。

⁵⁶ 《歷史教學》於 1988 年 7 月創刊，只發行兩期，於 1979 年 7 月停刊；《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於 1969 年創刊，至今已發行 43 期，最近一期的發行時間為 2011 年；《中國歷史學會會訊》自 1980 年創刊以來，至今已發行至 84 期，距離至今最近一期的發行時間為 2009 年。

⁵⁷ 中國近代史學會於 1995 年成立，同年創刊《近代史學會通訊》，發行至 2002 年，共 15 期。

2. 復館後的國史館相關人物：國史館館長羅家倫⁵⁸、黃季陸⁵⁹亦有相關文獻整理出版。曾長期服務於黨史會與國史館的李雲漢亦有回憶錄。⁶⁰可呈現在臺復館後的國史館與黨史會之間的人事與運作情形。

3. 中研院近史所方面：《郭廷以先生訪問紀錄》（1987）、《走過憂患的歲月—近史所的故事》（1995）、《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2012）、《近史所一甲子：同仁憶往錄》上、下兩冊（2015）。⁶¹以上包含中研院近史所創所所長郭廷以的日記與訪談錄、該所沿革之文章及該所研究人員的口述歷史訪談集，有助於了解國史館與中研院近史所兩機構的學術交流與互動。

（三）報紙方面：國民黨黨營的《中央日報》、《臺灣新生報》、《中華日報》及民

⁵⁸ 《羅家倫先生文存》共十二冊，1976年由國史館出版、羅家倫先生文存編輯委員會編輯，其中第一冊為政法與黨務、教育與文化論著，第二冊為史學與哲學、邊政與外交論著，第三冊為孫中山倫敦蒙難史料考訂，第四冊為英文書籍譯著，第五、六冊為演講，第七冊為書信函札，第八冊為日記與回憶、藝文，第九冊為詩歌，第十冊為記傳序跋，第十一冊為評論，第十二冊為遊記、雜著、英文著述與附錄。1996、1999年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分別出版《羅家倫先生文存·附編》、《羅家倫先生文存·補編》收錄師友函札、通信與回憶錄等。2009年羅久芳、羅久蓉編輯《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

⁵⁹ 《黃季陸先生論學論政文集》共三冊，1986年11月出版，由國史館編印，彙編1928年至1984年間黃季陸的論著與講述，依內容性質與時間順序編排，分為專論、講詞、函電、談話、憶述、序跋與書評等六大部分。《黃季陸先生與中國近代史研究》由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印，1986年4月出版，收錄黃季陸與國民黨黨務的重要函札文件、主持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學術討論會時的講話、紀念文與論集、年表等四大內容。《黃季陸先生懷往文集》收錄黃季陸於《傳記文學》雜誌所發表的68篇文章，包含自述、革命活動的追憶、懷思故舊好友及從政和治史紀錄等內容，時間範圍從1964年至1985年，由傳記文學社長兼黃季陸的莫逆之交劉紹唐親手完成選、編與史實校正，1986年由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

⁶⁰ 李雲漢，《史學圈裏四十年》（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

⁶¹ 陳三井主編，《走過憂患的歲月—近史所的故事》（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近史所一甲子：同仁憶往錄》，上冊及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兩書共包含20位近史所成員的受訪口述記錄與自述；張朋園等訪問，陳三井等紀錄，《郭廷以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郭廷以，《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2013年，中國北京的九州出版社從中研院近史所兩百多種的口述歷史中挑選出22位學者的訪問紀錄及7篇回憶錄，出版《南港學風—郭廷以和中研院近史所的故事》一書，在出版說明中，特別指出此書為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的重點引進出版項目，對某些字句做「中性處理」，並改為西元紀年，對臺灣當局的相關機構與職務加上引號，其餘內容則保留原貌。

營的《公論報》、《中國時報》、《聯合報》，有助於反映政府與臺灣社會對於編修國史看法之轉變。

(四) 線上資料庫：國史館的「國史館檔案史料文物查詢系統」、黨史會的「館藏檔案目錄檢索系統」、國家圖書館的「政府公報資訊網」、立法院國會圖書館的「立法院公報影像檢索系統」及行政院主計處網站等亦收入許多官方檔案(如國史館藏有國民政府時期的〈國史館沿革史案〉、〈國史館經費案〉，及總統文物相關文件)、政府公報、會議記錄、預算及統計資料，可用來作為分析國史館工作與政府施政動態之素材。

四、章節內容說明

本文擬以政府遷臺後，在臺復館的國史館為中心，藉由分析國史館有關國史修纂的重要出版品，得以掌握從戒嚴到解嚴以後國史館的具體工作樣貌與修史重點，進而理解深受國際冷戰結構情勢影響的國民黨政府，乃至臺灣政治民主化後，經由政黨競爭完成兩次政黨輪替取得執政權的不同中央政府，如何影響國史館的運作，以釐清國史館在現代政府的統治體系中扮演的角色。本文將先簡述大陸時期國史館的成立經過，再依時序脈絡，分別就戒嚴時期、解嚴到第一次政黨輪替、民進黨首次執政至國民黨再度取得執政權，這三個時期國史館的修史工作分為三個章節進行論述。

本文除「緒論」、「結論」外，共分為四章。

第二章為「國史館在臺復館」，主要探討民國時期國史館的成立，到國民黨政府遷臺後在臺復館之經過，共分二節討論。第一節「民國建立與國史館的成立」，旨在了解中華民國建立後，北京政府時期國史館從成立到解散，訓政時期國民黨政府先行設置黨史會，抗戰期間國史館由黨史會主委提議籌設，抗戰結束國史館正式成立之發展過程。第二節「國史館在臺復館之規劃」旨在探討國民黨政府遷臺前，國史館與黨史會的合作夥伴關係，以釐清遷臺之初何以由黨史會兼辦國史館的職務，以及 1957 年國史館正式在臺復館的原因。最後觀察國史館復館初期

的組織架構、工作職掌、職員編制、經費預算與在臺歷任館長的任期變化等，藉以了解初期國史館的組織結構如何影響往後組織的發展。

第三章為「戒嚴時期的修史工作」，主要探討戒嚴時期黨國體制下國史館的修史工作可能遇到的阻礙及其如何進行，共分二節。第一節「初期工作計畫與限制」，分析復館後首位館長羅家倫對國史館的初步規劃如何融入其修史理念，進而說明人才、經費、史料以及環境的限制對修史工作造成的困難，以及第二任館長黃季陸上任之後所進行的調整。第二節「戡亂復國與國史編纂」，檢視國史館實際的修史成果，論述 1960 年代國史館與黨史會如何配合國家重要慶典與戡亂復國的目標，合作編纂《開國五十年文獻》與《國父百年誕辰學術論著》；接著，討論 1970 年代一連串的外交失利，國史館與黨史會如何加強合作，成立「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提倡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並編纂《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以奠定國家邦基。1978 年中共改革開放宣布纂修《中華民國史》後，國民黨政府又如何透過集體纂修《中華民國建國史》來維護中華民國的法統，以鞏固政權的統治正當性。

第四章為「民主化的衝擊與修史工作的調整」，主要探討 1980 年代中期政治民主化對國史館造成的衝擊，以及國史館如何調整行政與修史業務，以落實修史職掌，並提升其學術地位，共分三節加以討論。第一節「國史館定位與存廢爭議」，旨在說明 1987 年解嚴以後，國史館與黨史會的關係如何受到外界質疑，乃至於〈檔案法〉的立法過程中面臨的定位問題與存廢爭議。第二節「積極推動國史修纂」，旨在了解第三任館長接掌以後對國史館內部進行的調整與改革措施，以及如何加強對外的聯繫，力圖提升國史館的學術地位。第三節「國史纂修成果」，主要透過國史館的修史成果，以觀察國史館的改革成效，並分析國史纂修的內容，了解國民黨政府在國際地位的轉變如何改變其統治策略與國家論述。

第五章為「政黨輪替與國史館的轉型」，主要探討政黨輪替後，國史館的組織與職掌如何隨政治變遷而轉型，臺灣內部國家認同的歧異與不同政治理念的政黨競爭又如何影響國史館的修史工作，共分三節加以討論。第一節「組織再造與轉型」，旨在了解〈國史館組織條例〉修訂以及〈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總統副總統文物管理條例〉立法通過後，國史館組織與職掌的變化，而館長改由學者接

任後，對國史館學術地位的提升及其在國家治理體系中扮演的角色是否有實質的改變與影響。第二節「國史編纂重心之變化」，旨在探討不同政黨派任的館長，是否能將其學術精神與執政黨的政治理念結合，落實在國史館的修史業務與國史編纂重心的轉移。第三節「修纂人才甄選與國史解釋」，旨在透過公務人員高普考中「史料編纂科」的考試科目與抗戰歷史的解釋歧異，了解國家認同的歧異如何影響國史館的用人取才及修史方向的改變。

第六章 結論



第二章 國史館在臺復館

1946 年 11 月 23 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公布施行〈國史館組織條例〉後，隔年（1947 年）1 月，國史館在南京正式成立。¹由於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失利，1949 年 12 月，中華民國政府播遷臺灣。因應憲政時期國民政府改組為中華民國政府，國民政府時期公布施行的法律條文亦須進行政府機構名稱的修正。其中有關〈國史館組織條例〉部分，立法院於 1956 年 5 月 10 日修正通過。該條例係以 1946 年公布的〈國史館組織條例〉為基礎，僅對部份條文作文字上的細部調整，主要職掌與組織架構維持不變。此後 40 多年，〈國史館組織條例〉未再修訂。直至 2001 年 10 月 24 日，第一次政黨輪替後，總統陳水扁公布立法院三讀修正通過的〈國史館組織條例〉與新制訂的〈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組織條例〉，國史館的組織架構、工作職掌與人事結構才有大幅度的轉變。

大體而言，至少在 2000 年第一次政黨輪替以前，在臺國史館的組織與職掌基本上依循南京時期的規劃，其成立之精神亦為遷臺後的國民黨政府所繼承與延續，對在臺復館的國史館發展，影響深遠。因此，本章首先簡述民國時期國史館的設置提議與成立經過，再探討國民黨政府遷臺後於 1957 年恢復國史館的原因。

第一節 民國建立與國史館的成立

一、北京政府時期國史館的成立與解散

1912 年民國肇建，胡漢民等革命黨人已意識到國史修纂對鞏固新政權合法地位的重要性，因此聯名向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提議儘速設置「國史院」，希望編纂一部能頒示海內外的《中華民國建國史》，以彰顯革命先烈事蹟，鞏固中華民國立國的基礎。孫中山對此提案表示贊同，並批示：「不有信史，何以焜耀宇內，昭示方來」，²隨即將此案交付南京臨時參議院審議。然嗣後孫中山退位，臨時大總統一職由袁世凱接任，臨時政府與臨時參議院亦北遷。同年 10 月，北京臨時

¹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下）》，（臺北：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77 年初版、1983 年第五版），頁 705；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頁 137、139、141、143。

² 〈大總統咨參議院議決胡漢民等呈請設立國史院文〉，《臨時政府公報》，第 42 號，1912 年 3 月 19 日。

參議院開始審查「國史館官制案」，議員們圍繞著共和體制是否官修國史、國史館館長地位及其聘任方式兩大問題進行激烈辯論，最後仍決定設立國史館，並於是年 10 月 28 日，由袁世凱公布實施〈國史館官制〉。³國史館於是在袁世凱主持的北京政府下，1914 年 5 月正式成立。1916 年袁世凱於洪憲帝制失敗後逝世，大總統一職由副總統黎元洪接任，實權則由國務總理段祺瑞所掌握。段祺瑞上任後，認為國史館「設館數載，成績未彰，近更主持無人、形同虛設」，因此自行在國務會議議決「暫行停辦」。1917 年 4 月，大總統黎元洪發布指令，由教育部接收國史館。⁴教育部因此酌定辦法，將國史館併入北京大學，使其隸屬在即將於暑期開辦的中國史學門所設立之國史編纂處，由北大校長兼任處長。在此，國史館隸屬於教育部，國史編纂轉由高等教育機構負責。⁵

當時的北大校長是蔡元培，其曾就國史編纂處的組織與編纂方向制定計劃。預計編纂民國史與中國歷代通史，其中，民國史擬先編輯長編，並分為年表、大事記、志、列傳等四類。⁶1918 年，蔡氏與編纂員張相文聯名致函時在上海的孫中山，請其指示國史徵集及編纂意見。⁷蔡元培等人希望編纂《國史前編》一書，記錄清季秘密會黨到南京臨時政府取消這段期間的革命史事，以示民國開創之艱難。然而孫中山認為，秘密會黨「內部組織，仍為專制」，「於共和革命，關係實淺，似宜另編為秘密會黨史，而不以雜側民國史中」，反對將秘密會黨納入民國史，並表示願意「通告海外各機關，徵集材料」。蔡元培對此興奮，因其曾託海外友人搜羅相關資料，可惜經過年餘，卻無多大進展。嗣後蔡氏更懇請孫中山抄示其著作中「革命緣起」之章節，讓他們「先睹為快，得以略識指歸」。⁸惜以未及兩年，1919 年 9 月，國務院即以「國史有關制作，僅由學校附設機關，不足以昭鄭重」為由，將國史編纂處改歸國務院。據蔡元培回憶，北大國史編纂處最終僅有屠敬山編成《蒙兀兒史》一書，其餘所有努力前功盡棄。⁹

³〈臨時大總統令：公布「國史館官制」〉，《政府公報》（重印版），第 181 號，1912 年 10 月 28 日，頁 233。

⁴〈國務總理呈請暫行停辦國史館以節經費〉，《教育公報》第 4 年第 7 期，1917 年 5 月 20 日。

⁵〈呈大總統遵令接收國史館擬併入大學文科酌定辦法數條請核文并指令〉，《教育公報》第 4 年第 11 期，1917 年 9 月 20 日。

⁶〈指令第二百六十六號〉（1918 年 2 月 28 日），《教育公報》第 5 年第 6 期，1918 年 4 月 30 日。

⁷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頁 46-47；羅家倫主編；黃季陸、秦孝儀增訂，《國父年譜（下）》，（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85），頁 830。

⁸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頁 48-49。

⁹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頁 68-71。

從 1919 年 9 月至 1927 年 9 月國史編纂處改歸國務院後的 8 年間，根據後來擔任南京國史館纂修的金毓黻所聞，該處編有紀、表、志及記事本末共 45 冊，列傳 45 篇，大半出於清末進士黃維翰之手。由於北京政府各機關經常欠薪，修史事業難有起色。該處修纂成果可謂寥寥可數，當時所撰之稿亦未留存。1927 年 9 月，張作霖於北京開置大元帥府，將國史編纂處改設國史館。1928 年 6 月，國民革命軍攻下北京，國史館未及數月，即被解散。¹⁰

綜上所述，自民國成立以後，同盟會等革命黨人便提議設立國史編纂機關，孫中山也表示欣然同意。然而國史館係在袁世凱主持的北京政府下成立。嗣後歷經政治變遷，國史館被降為國史編纂處，時而附屬北京大學，時而改隸國務院，後再恢復為國史館，北伐結束後便被解散。整體言之，北京政府時期的國史館受限於政局的紛亂，加上經費、人才與史料的不足，修纂工作難以有所進展。

二、訓政時期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的先行設置

1928 年下旬，北伐事業即將完成之際，國民政府內政部長薛篤弼首先提議設立「國民革命紀念館」，以保留與宣傳革命事蹟，並計畫在現有部院添設一處，負責編纂國史。¹¹南京新聞記者聯合會等四團體也擔憂「中華民國光榮史實，湮沒弗彰，陷於共產黨徒抹殺歷史之謬誤」，因此呈請國民黨中央黨部，應盡速於首都設立「國史館」。¹²同時，江蘇省政府主席鈕永建也認為，「新都定鼎之先，正朔雖存，僭叛屢作」，「今總理奉安有期，中山實錄宜有以宣示中外者」，因此呈請政府設立「國史館」。¹³嗣後，國民政府雖決議設立「國史館籌備處」，然而直到 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設立國史館一事始終未得到政府當局的重視。¹⁴

相較於國史館的設立不斷受阻，國民黨則是在訓政時期「以黨建國、以黨治

¹⁰ 金毓黻，〈舊京史館述聞〉，《國史館館刊》，1：2（南京，1948.3），頁 75-76。

¹¹ 〈國民政府委員會會議紀錄（三）〉，《國民政府》，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01000004309A。

¹² 「首都設立國史館」（1928 年 11 月 20 日），〈國史館沿革史（一）〉，《國民政府》，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01000002172A。

¹³ 「鈕永建呈國民政府為請設立國史館」（1928 年 11 月 28 日），〈國史館沿革史（一）〉，《國民政府》，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01000002172A。

¹⁴ 1934 年 1 月，邵元沖等人曾在國民黨四中全會提請重設國史館，然當時行政院正在推動行政改革，認為應先著手整理、保存檔案，方能增加行政效率且有助於實證性的歷史研究，因此最後決定先在行政院及其所屬各部會設置檔案整理處，國史館的設置提議遂遭擱置。吳宇凡，《存史到資政：民國以來檔案館政策與制度變革（1912-1987）》（臺北：國史館，2019），頁 123-127。

國」的原則下，率先在黨中央成立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以下簡稱「黨史會」）。¹⁵促成該會成立的關鍵人物是時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委員的邵元冲。¹⁶1929年3月，以邵元冲為首的15位國民黨員聯名，在國民黨三屆一中全會提議設置黨史會。他們認為，「黨事國事，皆有密不可分之關係」，因此應保存整理國民黨努力革命的史蹟，否則目前的工作「無由鑑往知來，而將來國史之編修亦無準繩可言」。在他們的構想中，黨史會的成立是為未來纂修國史做準備，國史應以黨史為依歸。該案獲得大會通過後，由國民黨秘書處擬定組織大綱，經中常會審查核議後，陸續推定委員、常務委員與名譽委員。1930年5月1日黨史會正式成立，直屬於中央黨部執行委員會。¹⁷該會設有徵集、編輯、總務三科及史料檔案庫、史料陳列室，其任務除調查、徵集史料以及編纂黨史外，亦須將史料公開展覽，增進人民及黨員對國民黨歷史的了解。¹⁸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在國內共產黨的威脅及日本侵華的情況下，國民黨更加亟需鞏固其統治權威，黨史的編纂與發揚成為其運用的策略之一。除了編纂黨史，黨史會舉辦黨史史料展覽，期能藉由陳列革命事蹟，從思想層面加深黨員對領袖的效忠以及一般大眾對國民黨的認同。1934年1月，邵元冲等人以「國難日亟，思以振發人心」、「為振聵起靡，共勵衛國復興之志」為由，在國民黨四屆四中全會提議建造一鞏固場所，以用來收藏史料並做長期展示。1935年2月「中央黨史史料陳列館」開始動工，於3月29日「革命先烈紀念日」舉行奠基儀式，1936年7月下旬完工後，黨史會隨即於10月10日「國慶日紀念日」舉行史料展覽。以革命先烈日和國慶紀念日作為黨史史料陳列館的動工與首次對外開放日期，意味著國民黨試圖彰顯該館作為國民黨領導革命為國犧牲之精神，以

¹⁵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下）》，頁456；劉偉鵬主編，《汗青一甲子》，頁8。實際上，1928年8月4日國民黨召開二屆五中全會時，蔣中正、丁惟汾、陳果夫等人曾提議在黨中央設置黨史會，當時雖獲大會通過，然因北伐戰事尚未結束而未實行。劉偉鵬主編，《汗青一甲子》，頁6。

¹⁶ 邵元冲曾在日記中寫到，他必須趕在十點參加國民黨三屆一中全會前，準備纂修黨史的提案並作函。邵元冲，〈三月十九日 星期二〉，王仰清、許映湖編，《邵元冲日記（1924-193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頁518。

¹⁷ 黨史會創會11名委員為：蔣中正、吳敬恆、王寵惠、胡漢民、鄧澤如、古應芬、戴傳賢、邵元冲、葉楚傖、林森、張繼，其中胡漢民、林森、戴傳賢、葉楚傖、邵元冲等5人為常務委員，實際負責會務；另聘請陳少白、蕭佛成、張靜江3人為名譽委員。劉偉鵬主編，《汗青一甲子》，頁6、8。

¹⁸ 陳鵬仁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黨史史料編纂工作（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9），頁137-140。

及創立中華民國光榮事蹟。¹⁹

1936 年 1 月，黨史會擴大組織，由常務委員制改為主任委員制，主任委員一人負責總理會務，副主任委員二人則協助襄理。²⁰黨史會的首任主委為邵元冲，副主委為梅公任、羅家倫二人。是年邵元冲在西安事變中殉難，主任委員一職由張繼接任。²¹自 1936 年 12 月到 1947 年 12 月 15 日在南京病逝，張繼主持黨史會的時間長達十一年，期間歷經八年抗戰及戰後還都南京兩階段。在此期間，黨史會除了徵集大量抗戰與革命史料，尚編有《中國國民黨年鑑》、《總理年譜長編稿》、《黨史史料叢書》、《中國國民黨大事年表》、《總理史蹟初稿》、《黨史紀要初稿》、《本黨簡史初稿》、《中國國民黨五十週年紀念特刊》等多部書稿，也曾借用中央圖書館、中央大學等場地舉辦多次史料展覽。²²可以說，黨史會在大陸時期的重要業務發展，泰半都在張繼任內所完成，不僅奠定了黨史會的發展基礎，也為未來遷臺後黨史會的工作提供了有利條件。身為黨史會主委的張繼更是國史館得以重設的重要關鍵人物。

三、抗戰時期國史館的籌設

1937 年 7 月，中日戰爭爆發，同年 11 月 20 日國民政府宣布遷都重慶。²³隔年春天，黨史會亦奉令遷往。²⁴1939 年 1 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五中全會，黨史會主委張繼聯合吳敬恆、鄒魯等十三人，提出「建立檔案總庫籌設國史館案」。²⁵此一提案成為國史館得以成立的重要關鍵。該案實際上係由歷史學者朱希祖代筆，

¹⁹ 劉偉鵬主編，《汗青一甲子》，頁 20-21；周俊宇，《黨國與象徵：中華民國國定節日的歷史》（臺北：國史館，2013），頁 418、420。

²⁰ 「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組織條例」（1936 年 1 月 9 日通過），陳鵬仁、喬寶泰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黨史史料編纂工作（下）》（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頁 406-409。

²¹ 劉偉鵬主編，《汗青一甲子》，頁 19。

²² 劉偉鵬主編，《汗青一甲子》，頁 42-43、45、50、54。

²³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下）》，頁 596、604。

²⁴ 陳鵬仁、喬寶泰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黨史史料編纂工作（下）》，頁 481-482。

²⁵ 十三名提案人為：張繼（1882-1947）、吳敬恆（1865-1953）、鄒魯（1885-1954）、王用賓（1881-1944）、焦易堂（1880-1950）、丁惟汾（1874-1954）、程天放（1899-1967）、夏斗寅（1885-1951）、茅祖權（1883-1950）、覃振（1885-1947）、方覺慧（1886-1958）、梁寒操（1899-1975）、王子壯（1907-1948）。其中，張繼、鄒魯、茅祖權、覃振等四人皆曾參與 1925 年在北京召開的西山會議。焦易堂曾任西山會議的上海中央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

得到諸多早期曾追隨孫中山的國民黨員支持。²⁶該文開宗明義，闡述「國史」對於國家存亡的重要性，指出「中國國史不可自吾黨而絕，猶中國國祚不可自吾黨而亡」，「民族之所以悠久，國家之所以綿延，全賴國史為之魂魄」。²⁷這種「國可滅，史不可滅」的歷史觀念，可追溯自宋朝即將亡於蒙古政權之時，清朝以後受民族觀念影響蔚為風行。²⁸為故國存史的想法，意指國家即使滅亡，若種族能繼續繁衍，有朝一日方能重新復國。張繼等人在中華民國面臨危急存亡之秋時，向黨中央提出設置國史館，即是希望透過國史的書寫，延續中華民族的靈魂與生命，中華民國亦能永存不絕。

由於國史撰寫根基於史料，其中政府公文書具有重要史料價值，宜需重視與妥善保存。因此該文也建議政府設置一檔案總庫，典藏少數秘密及重要案卷，由國府文官掌管，並認為可仿效英國的藍皮書制度，將可公開發表的檔案印在藍皮書公布發賣，秘密檔案則存放在特別檔案庫，用作將來的史料。此外，有關國史體例，該文認為「宜參酌新史，略為變通」；史料方面可以黨史會編纂之黨史、將來國史館編撰的時政記、日曆、國民政府總檔案庫之檔案以及史館所藏的政府公報及私人筆記、文集等作為參考資料；修史者則應由兼具政治、史學、文藝，且具有聲望的人來擔任，並建議先修「民國元年以來，至國民政府成立以前之國史」，劃清黨史、國史界限，使其各司其職。²⁹

在抗戰方興未艾、民間反日情緒高漲之時，該提案順利通過。事後，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認為應先徵詢其他五院的看法。五院中，考試院長戴傳賢贊同盡速籌

²⁶ 根據林映汝的研究指出，此份建議案實際上是出自於朱希祖之手。朱希祖時任中央大學史學系主任，其可能是透過其師章太炎的關係結識張繼，此後朱、張二人時有來往。1938年12月，朱希祖曾拜訪張繼，討論保存政府檔案一事，張繼請其作文一篇，遂為後來的〈建立檔案總庫籌設國史館議〉。參見林映汝，〈舊瓶裝新酒：朱希祖與國史館籌備委員會（1939-1942）〉，頁67-68、72。

²⁷ 原文如下：「中國在宋末曾滅於元，不百年而復，在明末又滅於清，不三百年而復，蓋吾族自有其歷史，決不甘屈服於他族之下。是故亡史之罪，甚於亡國，國亡而歷史不亡，則自有復國之日。何則，其魂魄永存，決不能消滅也，自古以來，滅人之國，必以滅其歷史為先務，端繇於此。古人有言，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則史亦必自滅，而後人滅之。」。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頁101-107。朱希祖著，羅香林、朱倓編，《史館論議》（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8），頁1-16。

²⁸ 杜維運，〈中國文化中的歷史觀念與史學的綿延發展〉，收入氏著，《中國史學與世界史學》（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71-72。

²⁹ 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頁101-107。1939年1月22日，朱希祖代筆之原文請參見朱希祖著，羅香林、朱倓編，《史館論議》，頁1-16。

辦國史館，也認為總檔案庫的建立，「實屬目前刻不容緩之舉」。行政院長孔祥熙認為，應先聘請專家組織委員會，負責檔案總庫及國史館的籌備。監察院長于右任也表示，「張繼等提案，至為切要，籌設國史館，為樹立國史基礎，尤為當務之急」。司法院長居正則是針對庫房的興建、檔案的送庫典藏與保管、時政記的印行以及國史館的成立時間、條例制定等四個問題提出意見。他認為「國史與黨史同屬重要，黨史既有編纂機關，國史館似應著手組織早日成立」，同時指出，「國史與黨史兩者有相互關聯之處，往往不易劃分，尤須詳密研究，務使界線清晰」。立法院長孫科也表示「宜先設國史館籌備委員會」，並建議「於籌備期中，由委員會或半年或一年出版與國史材料有關之特刊，既為當時之實錄，兼備將來國史之採擇」。³⁰綜上可知，五院院長基本上都持贊同意見，認為應儘速設置國史館與總檔案庫的籌備單位，也認同國史與黨史應有所區別。

林森則反對另外設置國史館，甚至在 1939 年 11 月 17 日五屆六中全會中提議直接將「黨史編纂委員會」改名為「國史編纂委員會」。他指出，黨史會不是只編纂黨史，凡經由國民政府褒揚者，均交付該會備列史料，因此建議可直接更改會名，「以符事實」。事實上，抗戰期間，國民黨為了穩固黨的統治基礎，完成抗戰建國之使命，因而在五中全會中特別強調黨魂、黨德、黨史與黨紀，以這四大基石將國家民族之生命與黨的命運做結合。³¹林森化「黨史」為「國史」的提案卻遭致大會反對。大會認為，如因經費、人力與物力困難，則可先設立國史館籌備處。³²1939 年 12 月 26 日，國民政府召開臨時會議，決議設立「國史館籌備委員會」，由張繼、鄒魯、葉楚傖、鄧家彥、胡毅生、王伯羣、楊庶堪等七人出任委員，由張繼擔任主任委員。³³1940 年 2 月 1 日，籌委會終於在重慶成立，直隸於國民政府，負責國史館成立前的各種籌備事宜，包含國史資料的徵集、整理與國史體裁的擬訂等，自此國史館的設立得以進入實質的籌備階段。³⁴

³⁰ 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頁 107-113。

³¹ 〈對於黨務報告之決議案〉（1939 年 1 月 28 日通過），秦孝儀主編，《中國國民黨歷屆歷次中全會重要決議案彙編（一）》（臺北：中央委員會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79），頁 460。

³² 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頁 116-117。

³³ 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頁 117。夏雨的碩士論文指出，葉楚傖、鄧家彥、胡毅生、楊庶堪等人都只是名義上的委員，沒有實際參與籌委會的工作。夏雨，〈民國國史館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6，頁 6。

³⁴ 劉永祥，〈民國時期國史館的變遷〉，《學術研究》，2015：2（廣州，2015.2），頁 123。

根據該會的「籌備大綱」，籌委會原定籌備時間為一年。³⁵然而，由於時局不靖、戰況緊張、經費吃緊，加之政府視軍事為第一要務，國史館的籌備工作只能一再延期，直至抗戰結束，政府還都，戰後復員工作告一段落後，始有餘力設置新的機構。在張繼「國父創之於前，總裁成之於後。凡茲史實，洵足垂範千秋，流美當代」的美言下，國防最高委員會通過改國史館籌備委員會為國史館的提案。在立法院修正「國史館組織條例」後，國史館終於 1947 年 1 月於南京正式成立。在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特任下，張繼出任首任館長，副館長由但燾擔任。

有關「國史館籌備委員會」及南京時期國史館的工作情形及成果，學界已有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本文不再贅述。大體而言，學界對於籌委會的工作多給與正面評價，認為籌委會為將來的修史工作，在檔案的徵集、整理與保存、檔案學的知識傳入方面做了許多努力，其中，該會邀請黨國元老進行演講以蒐集口述史料是一大特色。除了史料搜集，籌委會也提前編撰了部分國史史料長編、志稿及國史擬傳，為將來的修史工作做了鋪墊。³⁶另外，籌委會總幹事朱希祖的規劃，更推動了國史館的轉型，使國史館從傳統的史館逐步成為近代國家體制的一環。其對修史體例的規劃亦能夠呼應新的時代潮流，融合新舊史學之優點，使檔案館與史館結合，預示著國史館發展的新方向。³⁷

南京國史館正式成立後，館長張繼在首次修纂人員會議中明白指出，國史館是一「學術機關，不是一個普通衙門」，「今日修史，當維持中國之正統」，期許修纂人員在史觀上能夠「以三民主義，為吾今日撰述之依據」，在方法上可「採取外國史學之優點，以補吾國以往史學之不足」。另外，他也強調修纂人員「最為重要」，但因「經費之支絀，不能悉數羅致，殊為遺憾」。³⁸身兼黨史會主委與國史館館長張繼的這一段話，雖清楚表明國民黨當局將國史館的定位為一隸屬於政府的學術機關，也指示纂修國史必須融合新的史學方法，以符學術潮流，然而國史館畢竟為官方所設，始終無法擺脫政治干預，仍須配合黨的意識形態。³⁹由

³⁵ 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頁 118-119。

³⁶ 夏雨，〈民國國史館研究〉，頁 13、16-18。

³⁷ 林映汝，〈舊瓶裝新酒：朱希祖與國史館籌備委員會（1939-1942）〉，頁 92-94。

³⁸ 〈國史館纂修人員第一次座談會紀錄〉，《國史館館刊》，1（南京，1947.12），頁 109。

³⁹ 例如籌委會時期，張繼與朱希祖便因用人理念不合，而致使朱希祖辭去總幹事一職；國史館成立後的「館刊編輯委員會」上，張繼也明白指示「本館受命纂修國史，應堅守三民主義之立場，以中國國民黨所組織之合法政府為正統」。參見林映汝，〈舊瓶裝新酒：朱希祖與國史館籌備委員會（1939-1942）〉，頁 92-93；〈館刊編輯委員會會議紀錄〉，《國史館館刊》，1（南京，1947.12），

此可知，國史館雖經過近代國家化以及新史學思潮的洗禮，卻仍舊保有為新政權確立正統地位以及歷史事件解釋權的傳統史學特性，這或許也是國民黨當局保留傳統史館修史制度的重要考量之一。表面上，黨史會與國史館是分屬黨政不同機構，主事者則一，兩機構之間的往來合作頗為頻繁，這樣的模式一直延續至國民黨政府遷臺之後。關於國史館與黨史會的關係往來，將於後文再加闡述。

儘管有諸多困難，國史館在張繼的號召下，仍是延攬了許多具有史學專業背景的學者入館。除了籌委會時期的部分成員繼續留用外，還新增了多位著名的文史學者，如陳垣、柳詒徵、顧頡剛等人。一時之間，國史館人才濟濟，人數規模達到 130 餘人，且以修史職位者居多，頗能彰顯其作為一學術機構的定位。除了繼續徵集與編纂史料，亦重新探討國史體例，並校正部分《清史稿》，以及編輯出版《國史館館刊》，為後世的民國史研究奠定了基礎。⁴⁰可惜國史館成立後不久，中國又陷入國共內戰的局面。局勢紛亂，嚴重阻撓國史館的修史工作。此外，張繼接任館長未及一年，即於 1947 年 12 月病逝南京，據聞戴傳賢自請接任國史館，總統蔣中正於是特任其為第二任館長。然而戴氏亦因身體病弱，尚未就任，便於 1949 年 2 月病逝廣州。⁴¹

1949 年 1 月 21 日，蔣中正在南京宣布引退，總統一職由李宗仁代理。⁴²蔣中正仍以國民黨總裁，主持黨務；政務則由代總統李宗仁負責，分屬政府機構與黨組織的國史館和黨史會於是有了不同的發展。國史館方面，代總統李宗仁先是特任居正為館長，然居正也因四處奔走，未能上任，館務則由副館長劉成禺負責。嗣後，由於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失利，劉成禺在代總統李宗仁的指示下，將國史館的人員與史料陸續遷往桂林、重慶，然未及撤出而被迫終止，國史館因此未能完成國史纂修，所存的大部分資料與編纂之志稿也被中共的南京市解放軍軍管會

頁 126。

⁴⁰ 夏雨，〈民國國史館研究〉，頁 21-22；賈紅霞，〈民國時期金毓黻在國史館的修史活動述論〉，《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2017：1（北京，2017.8），頁 258-259。

⁴¹ 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頁 137、143、153、156、169；張、戴二人雖於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前即逝世，然現在國史館新店館區仍設有溥泉、季陶兩館，以尊傳統。林滿紅訪問，曹慧如紀錄，〈復館初期的國史館—李雲漢先生訪問記錄〉，《國史館館訊》，5（臺北，2010.12），頁 115。

⁴² 此為蔣中正的第三次下野（第一次在 1927 年、第二次在 1931 年）。此次下野除了因為徐蚌戰爭的軍事失利，政府內部普遍與中共求和的心態，桂系將領挑戰蔣中正權威的政治爭權才是造成他下野的真正原因。參見劉維開，〈蔣中正第三次下野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7 期，分冊（臺北，2000.6），頁 154。

接收，存放於現今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黨史會方面，則聽命於蔣中正所領導的國民黨黨中央，於 1949 年年底一同遷臺。⁴³

綜上所述，國民政府北伐完成後，國民黨中央在訓政時期的黨國體制下，率先成立黨史會，希望藉由黨史強化黨員的效忠與人民對國民黨的認同。外國勢力的入侵，尤其是 1930 年代以後日本逐步加深的軍事進逼，則是國史館重新展開籌設的重要因素，希望藉由國史的書寫來團結中國人民、鼓舞民族精神。抗戰結束後，國史館的正式成立成為了國民黨領導抗戰，繼承國父孫中山的遺志，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重要象徵。

第二節 國史館在臺復館之規劃

一、黨史會與國史館史料編纂委員會

前文提到，南京時期黨史會與國史館的往來已頗為頻繁，兩者的互動關係可追溯至 1940 年國史館籌委會初成立時。籌委會七名委員中，有五人同時具有黨史會委員身分，其中張繼兼任黨史會主委，鄒魯、葉楚傖、鄧家彥等三人為黨史會委員，楊庶堪於稍後不久兼任黨史會副主委。⁴⁴抗戰結束後，國史館籌委會與黨史會於 1946 年 4 月 20 日聯合組成臨時辦事處，結合兩會的人物與物力，徵集政府各機關舊日檔案，並擬具清冊加以保存。⁴⁵1947 年 1 月國史館成立後，繼續與黨史會保持聯繫，於〈徵集國史資料計畫大綱〉中，除了表示應加強與中央、地方各機關的聯繫，更明確指出黨史會蒐集整理了許多革命史料，因此國史館應與黨史會「隨時協商，取得密切聯繫，藉收合作之效」。⁴⁶基於此項理由，張繼也聘請了黨史會纂修馮自由擔任國史館特約纂修。⁴⁷

另一方面，國民黨內部也有將黨史會改隸政府機關，使其與國史館合併的呼聲。此因憲政實施後，黨務支出費用將不再由國庫支應，必須自籌經費。因此，

⁴³ 夏雨，〈民國國史館研究〉，頁 10-11；國史館秘書室編，〈復館以來的國史館〉，頁 2-3。

⁴⁴ 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臺北：國民黨黨史會出版，近代中國發行，1994），頁 153-154。

⁴⁵ 吳宇凡，〈從存史到資政：民國以來檔案管理政策與制度變革（1912-1987）〉，頁 207-209。

⁴⁶ 〈徵集國史資料計畫大綱〉，收入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頁 143-144。

⁴⁷ 陳鵬仁、喬寶泰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黨史史料編纂工作（下）〉，頁 557。

為了節省黨的開銷，國民黨決定縮編黨中央組織，將現有與政府業務有關之單位改隸政府，或直接撤銷編制。最後國民黨中常會雖同意黨史會續留黨中央，但附帶兩條件：（一）「黨史史料陳列館」改稱「開國文獻館」，其經費由政府支應；（二）黨史會的員額必須縮編。於是，1948年起，該會所屬的「中央黨史史料陳列館」正式改稱為「開國文獻館」，⁴⁸黨史會亦被賦予「國史館史料編纂委員會」的名義，該會的預算被改列於國史館項下，其員工薪給、業務經常費及臨時費等，轉由國史館向總統府報請支領。⁴⁹自此，黨史會的主要經費來源從政黨變成了政府。⁵⁰由上可知，國史館與黨史會在大陸時期關係即相當緊密，國民黨政府遷臺後，兩者關係尤甚。

1949年12月7日，國民黨政府因國共內戰失利而遷臺。由於延續國共內戰的戰時體制，國家財務甚為吃緊，如何調整黨部組織、精簡與整併中央政府機構便成為國民黨黨內討論的焦點。其中，隸屬於總統府的國史館一度成為考慮裁撤的機構之一，因其和中央研究院一樣，皆為學術機關，在戡亂時期無法立即有效支援軍事作戰。最後在軍事優先的狀況下，國民黨元老于右任等人雖同意保留國史館的編制，但為節省政府開銷，決定予以縮編。⁵¹於是在國史館未隨政府遷臺的情況下，其業務交由黨史會兼理，黨史會持續以「國史館史料編纂委員會」名義，具領政府經費。⁵²

雖然國民黨黨中央仍有編列黨史會預算，但在實際支出時經常對國庫有所挪

⁴⁸ 〈中央黨史陳列館 改稱開國文獻館 今後陳列內容亦將擴充〉，《中央日報》，1948年1月1日，4版。

⁴⁹ 李雲漢，〈黨史會七十年〉，《近代中國》，140（臺北，2000.12），頁116-117；王文隆，〈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及其檔案遷臺〉，《臺灣文獻》，66：4（南投，2015.12），頁106。另見陳鵬仁、喬寶泰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黨史史料編纂工作（下）》，頁603。

⁵⁰ 林滿紅訪問，曹慧如紀錄，〈復館初期的國史館—李雲漢先生訪問記錄〉，頁115。

⁵¹ 「總裁辦公室設計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紀錄」（1949年12月30日），〈中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業務會報紀錄〉，《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02000003128A；陳鵬仁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非常委員會及總裁辦公室資料彙編》，頁68、71、78、81、84-85。

⁵² 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頁179。

用，而這種情形尤以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秘書長張其昀⁵³的立場為關鍵。⁵⁴對黨史會的主事者而言，經費無法自主反倒不利該會的獨立運作。1952年10月，當時的黨史會主委羅家倫⁵⁵即曾以「畸形」一詞來形容國史館與黨史會之間的關係，指出「現在國史館實際上已無此設置，但本會則仍兼國史館史料編纂委員會的名義與重任」，「兩年來除一部分指定的事業費外，所有經臨各費則並不由本黨支付」，致使黨史會地位不明，⁵⁶羅氏因而呼籲「此種畸形的現象，甚盼黨政中樞的有關部門，加以商討與決定，不宜久懸。」⁵⁷

羅家倫對於黨史會地位不明的情況深感困擾，因其不僅會影響到黨史會業務的發展，也間接說明了黨史會及身為該會主委的羅家倫處在黨政權力結構的邊緣。羅氏畢業於北京大學，師事自由主義大師胡適，與傅斯年發起五四運動，留學歐美大學多年。雖長年參與黨政事務，卻非黨內核心人士。如蔣中正在國民黨改造前，雖曾諮詢羅家倫的意見，但在蔣提名的改造委員名單中卻沒有他的身影。⁵⁸

⁵³ 張其昀（1901-1985），字曉峰，浙江鄞縣人。1923年自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進入上海商務印書館擔任編輯。1927年受其師柳詒徵推薦，回母校（更名為國立中央大學）任教。1936年應國立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之邀，於該校創辦史地系。其在大陸時期曾創辦《史地學報》、《國風》、《思想與時代》等學刊與雜誌，並於1934年與翁文灝、竺可楨等人在南京組成「中國地理學會」，為著名史地學家及教育家，頗受國民黨高層器重。1949年來臺，歷任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秘書組長、中央宣傳部部長（1950.3-1950.8）、改造委員會秘書長（1950.8-1952.10）、國民黨秘書長（1952.10-1954.5）、教育部部長（1954.5-1958.7）、國防研究院主任（1959-1973）等要職。參見李仕德，〈提倡出版事業以謀中華文化復興的張其昀〉，《國史研究通訊》，10（臺北，2016.6），頁188-204。

⁵⁴ 黨史會主委羅家倫曾在1952年1月19日的日記中寫到，身兼中央改造委員會秘書長及黨史會委員的張其昀堅持由總統府負擔黨史會工作同仁的部分年終獎金。羅久芳、羅久蓉編，《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頁519。

⁵⁵ 羅家倫（1897-1969），浙江紹興人。1919年就讀北京大學期間，曾起草〈北京學界全體宣言〉，為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之一。1920年赴海外留學，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學習歷史與哲學、後轉入哥倫比亞大學、英國倫敦大學等校深造，攻讀歷史，並遊歷德國柏林大學、法國巴黎大學等名校。1926年回國後，受聘東南大學歷史系教授，隔年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的信賴，參加北伐，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議。其後，歷任中央黨務學校教務副主任、中央政治學校教務主任兼代教育長、國立清華大學校長、國立中央大學校長、中華民國駐印度大使。1950年初來臺，旋出任黨史會主任委員。1952年任考試院副院長，1954年任國策顧問。1957年國史館在臺復館後，出任首任館長。參見劉維開編著，《羅家倫先生年譜》（臺北：國民黨黨史會，1996）。

⁵⁶ 羅家倫，〈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概況〉，收入羅家倫先生文存編輯委員會，《羅家倫先生文存（二）》（臺北：國史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6），頁438。

⁵⁷ 羅家倫，〈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概況〉，頁438。

⁵⁸ 中央改造委員會的委員共有16人，名單如下：陳誠、張其昀、張道藩、谷正綱、鄭彥棻、陳

從羅家倫的日記亦可看到，他的學術理念和對張其昀及主張文化復興的人士不合，因而時常對他們的作為表示不滿。例如 1951 年 4 月 9 日，他和即將返美的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蔣廷黻晤談，言及蔣氏批評張其昀的號召方式已經過時，無法感動知識分子及青年；⁵⁹1952 年 1 月 23 日，他的學生郭廷以前來拜訪，提到張其昀有大量印書的計畫，他認為張氏所擬書單「保守性太重，不免復古趨勢」；⁶⁰1955 年 2 月 22 日，羅家倫批評張其昀提出的以政府為中心來領導的「新文化改造運動大綱」，讓人有「官督商辦」之感，不容易引起文化教育界人士的共鳴。⁶¹此外，1952 年 5 月，當時的考試院院長賈景德曾主張高普考要考四書五經，同時作為考試院副院長的羅家倫則批判此事為「復古投機的逆流」，更指賈景德在總統府月會中的報告是「頑固保守的空氣，令人難受」。⁶²從他日記中頻繁出現的「過時」、「復古」、「頑固」、「保守」等字眼，可知他內心充斥著國家政務由保守派人物把持的反感。1953 年 11 月，其好友總統府秘書長王世杰被免職的風波，更使他對政治環境感到失望，不禁在日記中慨嘆：「政治，遠望是樂園，進去是火坑，愚者驕傲的場合，智者寒心的所在」。⁶³

羅家倫主持黨史會期間，張其昀同時擔任黨史會委員。姑且不論兩人在學術理念上的不同見解是否會影響黨史會的運作，即就當時政治環境，實際上也不利於黨史的客觀書寫。1955 年 1 月 5 日，國民黨開工作檢討會，祕書長張厲生與負責管海外黨務的主任鄭彥棻，都建議黨史會應該盡速完成中央核定本之黨史。然而羅家倫以張繼時期遇到的困難為例，指出他受到黨內兩派人士的夾攻（分別以林森、鄒魯為代表），難以寫出公允客觀的黨史。羅氏並認為當前撰寫中國當代史，僅能寫背景與事實，不能寫人物，否則會有麻煩。⁶⁴

而就黨史會史料整理的狀況而言，羅家倫也曾表示無奈。黨史會遷臺之初，曾將史料放在臺中市政府內暫時存放，不久後搬至彰化糖廠的倉庫，1950 年 3 月再搬往南投草屯，借用當地的民宅洪氏宗祠、文昌廟以及里民會所存放該批史料，

雪屏、胡健中、袁守謙、崔書琴、谷鳳翔、曾虛白、蔣經國、蕭自誠、沈昌煥、郭澄、連震東。
參見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頁 266。

⁵⁹ 羅久芳、羅久蓉編，《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頁 506。

⁶⁰ 羅久芳、羅久蓉編，《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頁 520-521。

⁶¹ 羅久芳、羅久蓉編，《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頁 609。

⁶² 羅久芳、羅久蓉編，《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頁 539-543。

⁶³ 羅久芳、羅久蓉編，《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頁 588-589。

⁶⁴ 羅久芳、羅久蓉編，《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頁 598。

史料因而分散三地，不利維護。1950年8月羅家倫接掌黨史會後，首要任務便是尋找適當、安全，能躲避空襲的地點來存放史料。自1952年1月起，羅家倫向黨中央爭取經費，並設法向國民黨籍企業家爭取捐助，在2月購得草屯洪姓民屋一所，名為「荔園」。黨史會的史料因而得以集中一地，也可展開史料的整理與分類工作。⁶⁵

當時羅家倫期許能夠將黨史會的工作「推到現代化，科學化的路上」，並希望能使史料的保存、分類和運用逐漸合於「近代圖書館，博物館和治歷史學的原理與方法」。⁶⁶羅家倫所說的「現代化」、「科學化」，也正是國家最高學術研究機關——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朱家驊以及院內知識分子們「科學救國」、「學術救國」的共同理想。⁶⁷因此或可理解為羅氏希望黨史會能成為國民黨內、如同中研院般的學術研究單位，而在此之前必須以科學、現代的方式蒐集、整編黨史資料，進而書寫黨史，來完成救黨、復國的任務。不過這畢竟是理想，在他實際前往黨史會史庫，指示員工如何整理史料與編制卡片後，無奈地在日記中寫下：「辦事人員全無科學頭腦與圖書館常識。」⁶⁸之後，他請他的得意門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籌備處主任郭廷以至草屯史庫查驗史料，並為黨史會擬定一套分類與編目辦法，便利管理與運用，作為一般史料的編目準則。⁶⁹這套辦法，據後來黨史會秘書邵銘煌所述，在他1994年公開演講時仍在使用。⁷⁰

儘管如此，史料管理的問題依然為人攻訐，尤其是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這將近半年的時間，更是頻繁遭到質疑。如1956年9月，前黨史會主委張繼之夫人、監察委員崔震華上書蔣中正，指責黨史會史料保存不周。⁷¹又如1957年3月1日，立法委員廖維藩以書面方式向行政院提出質詢，直指「國史館史料編纂委員會」的兩大缺失：一為「虛糜國帑，國史未修」；二是「史料毀損，典

⁶⁵ 據前黨史會主委李雲漢所述，羅家倫當初提出的建造史庫計畫不受黨中央財務委員會負責人的支持，於是只好對外求援。不過若從羅家倫的日記來看，國民黨中央黨部曾匯款三萬元供作黨史會購置防空房屋的費用。李雲漢，《史學圈裏四十年》（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6），頁45；羅久芳、羅久蓉編，《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頁521。

⁶⁶ 羅家倫，〈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概況〉，頁438。

⁶⁷ 黃麗安，《朱家驊與中央研究院》（臺北：國史館，2010），278。

⁶⁸ 羅久芳、羅久蓉編，《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頁525。

⁶⁹ 李雲漢，《史學圈裏四十年》，頁44。

⁷⁰ 邵銘煌演講，史政官葉高樹整理，〈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史料之典藏與運用〉，收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史政學術講演專輯（四）》（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7），頁219。

⁷¹ 劉維開編，《羅家倫年譜》（臺北：國民黨黨史會出版，近代中國發行，1996），頁296。

藏無罰」，⁷²批判羅家倫擔任主任委員以來無積極作為。⁷³對於崔震華的質詢，羅家倫曾就史料保存一事向國民黨總裁蔣中正提出報告，⁷⁴歷史學者吳相湘也曾在《中央日報》投書為黨史會辯護，認為史料保存狀況良好。⁷⁵然而該年3月，崔震華依舊對羅家倫提出彈劾案。⁷⁶經過調查，彈劾案不成立而被撤銷。這些批判是否屬實，是否摻雜私人恩怨暫且不論，有幾件事卻可從此次質詢得到證實：其一，至少到1957年3月時，中央政府皆有編列「國史館史料編纂委員會」的預算；其二，「國史館史料編纂委員會」的業務一直是由黨史會辦理；其三，對於黨史會的業務批判，與國史館修纂相連結，而從報紙以及國會立委的指稱中，亦可得知「黨史會」與「國史館史料編纂委員會」的名稱常被混用，顯見兩者在時人眼中並無根本區別。

在以上爭議過程中，史料保存問題成為黨中央開始處理國史館與黨史會合併或分設問題的關鍵。1956年監察委員崔震華上書蔣中正後，國民黨紀律委員會便在該年底針對黨史會的史料保管情形進行過調查，並做成書面檢討報告，交付國民黨中常會討論。國民黨第七屆中常會第321次會議針對以下三項問題進行討論：（一）國史館與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應否合併或分設問題；（二）保管史料房屋之遷建問題；（三）國史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之編制，待遇與預算問題。該會決議，由秘書長張厲生、主任委員羅家倫、副主任委員張壽賢及秘書續琅等人，約邀總統府及行政院研擬具體處理辦法，並由黨史會草擬初步意見，以便討論。⁷⁷至此，國史館與黨史會的合併或分設問題，終於在政府遷臺後的第七年被正式提出來討論，成為國史館得以在臺復館的重要契機。

⁷² 〈任臺灣省政府主席時：立法院第十九會期議事錄〉，《嚴家淦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0600000030A。

⁷³ 〈任臺灣省政府主席時：立法院第十九會期議事錄〉，《嚴家淦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0600000030A。

⁷⁴ 劉維開編著，《羅家倫先生年譜》，頁297。

⁷⁵ 吳相湘，〈我所看到的黨史會史料保管情形〉，《中央日報》，1957年2月22日，第2版。

⁷⁶ 劉維開編著，《羅家倫先生年譜》，頁300。

⁷⁷ 「中國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三三九次會議紀錄」（1957年2月25日），〈中國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八）〉，《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08000000724A。

二、在臺正式恢復國史館

1957年2月25日，國民黨第七屆中常會召開第339次會議，⁷⁸該會議指出，黨史會的現狀確有改進之必要，而改進之關鍵即在國史館與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之分立。經過討論，會議中作出了如下的決定：

- (一) 國史館為政府修史機關，黨史會為黨內組織，體制及性質，既不相同，自以分設為宜。其編制與待遇亦應分別依照各該機構之規定辦理。
- (二) 自四十六年度起，國史館應即正式建置，現行工作人員究任職於國史館或服務於黨史會，由各該同志自行擇定，但分立之後，黨史會人員編制應切實整頓。
- (三) 國史館建置以後，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每年所需人事經費及目前建築保管史料房屋所需經費由會函請行政院從政主管同志設法籌撥。
- (四) 在國史館尚未正式建置以前，現行工作人員准由中央按月酌予補助，自四十六年二月起支，至國史館建置時為止。⁷⁹

該決議於3月20日獲得總裁蔣中正的批准。⁸⁰自此黨史會與國史館的性質有了明確的劃分，國史館復館成為下一步要思索的問題。1957年5月31日，立法院召開第1屆第19會期第7次秘密會議，通過該年度國家總預算案，其中對於總統府主管應請辦理事項，作出了「國史館應即恢復成立」的建議。⁸¹困擾羅

⁷⁸ 主席為副總統陳誠，出席者有：陳誠、蔣經國、俞鴻鈞、黃少谷、張道藩、谷正綱、陶希聖、周至柔、陳雪屏、張其昀等10人；列席者則有：張厲生、周宏濤、鄧傳楷、黃啟瑞、郭驥（代）、葉翔之（代）、董世芳（代）、馬星野、上官業佑、陳建中、崔書琴、張壽賢（代）、徐柏園、羅家倫、錢劍秋、郭澄等16人。

⁷⁹ 「中國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三三九次會議紀錄」（1957年2月25日），〈中國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八）〉，《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08000000724A。

⁸⁰ 「中常會第三三九次會議紀錄」，〈一般資料—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記錄（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02000001994A。

⁸¹ 〈中華民國四十六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第一組審查報告〉，《立法院第十九會期第二次全院各委員會聯席秘密會議關係文書》，頁69。資料檢索自立法院議事日程及議事錄檢索系統，網址：

<https://lis.ly.gov.tw/lymtsysc/lymtsystp?ID=2&SECU=13952999&FRBR1=mtallutf8:001004:%E7%>

家倫多年的國史館與黨史會之「畸形」關係終於獲得解決。自此以後，國史館隸屬於總統府，為中央政府機構；黨史會則為國民黨中央黨部內的組織。不過，僅從後來羅家倫身兼國史館館長及黨史會主委一事來看，國史館與黨史會依然保持著密切的關聯。

事實上，黨史會的管理問題固然重要，然而國民黨政府在 1957 年才決定在臺恢復國史館，除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以後，以蔣中正為首的威權體制已漸穩固外，尚與國內、外的學術環境變遷——尤其是近代史的研究發展有關，1950 年代後期政府始有餘力發展國內的學術事業。以下就國內的史學環境與中共方面的史學活動分述之。

（一）1950 年代國內的史學環境

首先就大學歷史教育機構來看。1957 年以前設有歷史學相關科系的學校僅有臺灣大學、東海大學及省立師範學院（今臺灣師範大學），1960 年代以後各大學歷史系所始陸續成立。（參見附錄八）另一方面，自 1950 年代中期以後，我國最高學術機構——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為「中研院」）的組織運作始步入正軌。1948、1949 年中研院遷臺之初，僅有歷史語言（以下簡稱為「史語所」）、數學兩研究所跟隨渡海來臺。由於國民黨政府當局以軍事為優先，學術研究環境低迷，史語所及數學所不僅無地可駐且苦無經費。其中，史語所人員只能在臺灣大學校長傅斯年的協助下，在臺大兼課賺取生活費用，並暫以楊梅鐵路局的倉庫作為所址。當時的中研院代理院長朱家驊因此卸下黨政重要職務，以重建中研院為職志，想方設法向各界爭取經費、積極尋覓適合從事學術研究的地點，最終選定今南港現址，於 1954 年將史語所及數學所搬遷至南港，並展開中研院的復院及研究所增設計畫。⁸²

近代史研究所（以下簡稱為「近史所」）的籌設，便是朱家驊重建中研院計畫的一環。其背後動機，除了有來自當局對近代史研究的關切，⁸³1953、1954 年

AC%AC5%E5%86%8A&PAGE=main_all，檢索日期：2020/9/6。

⁸² 有關朱家驊在臺重建中研院，擇定南港院址前之經過，可參見黃麗安，《朱家驊與中央研究院》，頁 282-299。

⁸³ 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呂實強根據近史所籌備處主任郭廷以的親耳口述指出，蔣介石曾多次和院長朱家驊強調近代史的重要性，但當時史語所的研究人員多不贊同於所內增設近代史組，因史料、人才皆有所不足，然而朱家驊考量近代史與當前政治及國際關係息息相關，實有研究之必要，遂決定於史語所外另行成立近史所籌備處。參見呂實強，〈郭（廷以）所長筆路藍縷創

間國內立法院的督促以及國外學術界的鼓舞，亦是驅使他積極推動近史所籌設的重要原因，其中「亞洲基金會」(Asian Foundation)負責人饒大衛(David N. Rowe)表示願意提供中研院美金補助以從事近代史研究的口頭承諾，是促使朱家驊決意創設近史所的關鍵。⁸⁴美國華盛頓大學，主持遠東及蘇俄研究所的泰勒教授(George E. Taylor)亦表示願意與中研院合作，以獲得研究近代中國的原始資料。於是，朱家驊屬意由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授郭廷以(1904-1975)來籌畫近史所，⁸⁵由其擬定「中國近代史研究所計畫大綱草案」。朱家驊隨後四處奔走、積極說服院內外人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籌備處」遂在1955年2月1日正式成立，由郭廷以擔任籌備處主任。⁸⁶

1957年4月2日，中央研究院舉行第二次院士會議。朱家驊在開幕式中首先指出：此次會議的召開距離上屆已經相隔多年(第一次院士會議日期為1948年9月23日)，照當時會議規定，每年皆須召開一次院士會議，並選出中研院下屆評議員，然不久便爆發徐蚌戰爭，中研院各所人員只好開始往臺灣、廣東或廣西各地搬遷，後集中於上海，但因交通工具及經費困難，許多人員與設備未及遷出。朱家驊在會議中表示，「科學技術不斷進步，已走上革命的時期，我們應迎頭趕上，才能在世界找到容身之地」。他期盼中研院能夠成為「臺灣的學術中心」。⁸⁷會議中也通過了諸多有關學術方面的重要決議。值得注意的是，總統蔣中正親自主持開幕會，勉勵院士們「要記取對國家文化責任之重大，為發揚學術而努力」，

所與辭職風波》，收入陳儀深等訪問，王景玲等紀錄，《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04)，頁512-513。

⁸⁴ 李國祁指出，當時中研院內號稱第一大所的史語所之重量級人物不贊成設立近史所，有人更當面和他們表示若傅斯年還健在，決不會容許近史所的成立。不過，李國祁認為近史所之所以被看重，係因饒大衛願出一萬元美金，補助近史所編纂《籌辦夷務始末索引》之故。參見陳三井主編，《走過憂患的歲月—近史所的故事》(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頁33。

⁸⁵ 朱家驊與郭廷以為舊識，郭廷以曾於1946年初在南京擔任教育部邊疆教育司司長，當時的教育部部長為朱家驊。參見陳三井主編，《走過憂患的歲月—近史所的故事》，頁219。

⁸⁶ 郭氏網羅其師大史地系的同事及學生如張貴永、陶振譽、王聿均、呂實強、李國祁、王爾敏、李恩涵、張朋園、張玉法、陳三井等人先後加入近史所投入籌備與研究工作。王聿均，〈朱家驊與近代史研究所〉，收入陳三井主編，《走過憂患的歲月—近史所的故事》，頁198-203；沈懷玉訪問；周維朋紀錄，〈賀忠儒先生訪問記錄〉，收入陳儀深等訪問，王景玲等紀錄，《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頁410、413。

⁸⁷ 朱家驊，〈第二次院士會議開幕致詞〉(民國四十六年四月二日)，收入王聿均、孫斌編，《朱家驊先生言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頁99-100。

⁸⁸強調學術研究與國家發展的密切關係。近史所的成立便是一個顯例。由於中國近代史與民國成立的時間最為接近，研究此時代不僅可從歷史的發展推測將來國際及政治局勢的變化，作為施政參考，亦可回應國際冷戰情勢下，美國學者欲以臺灣方面擁有的中國原始資料來研究遠東及中國問題的需求，更可以在學術上與中共當時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來重新解釋中國歷史進行抗衡，特別是對近代中國歷史的詮釋。

（二）中共改寫中國歷史的「五大紅花時期」

1949 年中共在北京建立政權。其在史學發展上，主要表現在以馬克思主義來解釋中國的歷史，主張「厚今薄古」、「古為今用」、「以論帶史」，強調史學研究不應脫離現實環境，必須為革命、階級鬥爭服務。在此原則下，史學成為政治的工具。

1954 年中共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歷史研究》期刊，標誌著中共改寫中國歷史的「五朵紅花時期」的到來。1954 年至 1957 年期間，中共史學家陸續在《歷史研究》熱烈討論「漢民族形成」、「農民戰爭」、「封建土地所有制度」、「資本主義萌芽」以及「中國歷史分期」等五大問題。他們依照毛澤東的指示，以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與方法重新研究中國歷史，試圖推翻傳統的歷史解釋。與此同時，1956 年中共制定了「全國十二年科學規劃」，首次將「中華民國史」列為重點項目，之後便開始大量編印「中國近代史料」，收集有關中華民國的史料；次年（1957 年）開始，中共的史學發展進入所謂的「史學革命時期」，尤其是在 1958 年，配合三面紅旗運動，提出「厚今薄古」、「先紅後專」的口號，在史學界同樣展開大躍進，建立解釋中國歷史的理論體系。⁸⁹其中，對中華民國史的研究對臺灣標榜延續中華民國正統的國民黨政權衝擊甚大。

在「五朵紅花」中的「中國歷史分期」問題中，明白揭示中共對於中華民國採取的立場，其中以李新的主張最具代表性，被後來中共史家奉為編寫中國近代

⁸⁸ 朱家驊，〈第二次院士會議開幕詞〉（民國四十六年四月四日），收入王聿均、孫斌編，《朱家驊先生言論集》，頁 103-104。

⁸⁹ 秦孝儀，〈對中共編寫「中華民國史」及其相關問題之研究〉，《近代中國》，18（臺北，1980.8），頁 11、13；如俠，〈從中共竄改歷史談到中國現代史的編寫問題〉，《近代中國》，20（臺北，1980.12），頁 239；陳木杉，〈從中共控制下之文史刊物觀其史學之演展〉，《近代中國》，42（臺北，1984.8），頁 222。

史的圭臬。⁹⁰依據李新的分期，「中華民國」被納入「中國近代史」的範疇，意即「中華民國」已經滅亡，成為中國近代歷史中的一個朝代，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才是「中國現代史」的開端；此外，孫中山領導國民黨展開的國民革命亦被視作資產階級的革命，五四運動的爆發代表資產階級領導革命的失敗。⁹¹明顯可知，中共將中華民國納入中國近代史，除了對內塑造其政權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對外彰顯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當前「正統」之中國政府。

在中共對近代中國歷史解釋的挑戰下，堅持漢賊不兩立，以及宣示為真正中國的「中華民國」自是必須有所回應。1950年代的臺灣，學術發展實為起步階段，而纂修需要充分的史料與專業的人才。史料的收集、整理與保存尤須仰賴大量的人力、經費與政策的配合。此時決定恢復國史館與中共計畫纂修中華民國史實不無關係。國史館館長由總統特任，當時總統蔣中正特任黨史會主委羅家倫出掌國史館，亦有將國民黨「黨史」視同中華民國「國史」的意味。此在黨國體制的時代亦是可以理解。1957年7月，國民黨當局亦將國防部史政處擴編為史政局，希望藉由編纂國軍戰史、正面宣傳國軍的革命與抗戰事蹟，強化軍方及百姓的團結與精神上的戰鬥力。⁹²凡此作為，均是刻意突顯了中國國民黨革命的傳統與作為中國正統的意義。

⁹⁰ 秦孝儀，〈對中共編寫「中華民國史」及其相關問題之研究〉，頁5-6、11。

⁹¹ 李新的中國近代史分期如下：

（一）上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1840-1919）

1. 第一篇（1840-1864）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和農民革命戰爭
2. 第二篇（1864-1895）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秩序的形成
3. 第三篇（1895-1905）民族危機的加深和人民愛國運動的高漲
4. 第四篇（1905-1919）資產階級革命的興起和失敗

（二）下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1919-1949）

1. 第一篇（1919-1927）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
2. 第二篇（1927-1937）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
3. 第三篇（1937-1945）抗日戰爭
4. 第四篇（1945-1949）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

參見李新，〈關於近代史分期的建議〉，收入歷史研究編輯部，《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討論集》（北京：三聯書店，1957），頁153-156。

⁹² 李庭瑜，〈從史料局到史政局：戰後臺灣軍方史政制度之演變及其編纂事業（1946-1973）〉，臺北：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3，頁255。

三、初期的組織架構

遷臺後的中華民國政府基本上是延續 1949 年以前南京時期的組織架構以及相關的法令規章。南京時期的國史館係依據 1946 年 11 月 23 日公布的〈國史館組織條例〉而成立。遷臺後的立法院因應行憲後政府與部分單位的名稱有所更動，將該條例的文字微幅調整，於 1956 年 5 月 10 日修正通過。是故 1957 年在臺復設的國史館，其組織架構實際上是延續自 1947 年 1 月在南京正式成立時的國史館。2001 年 10 月 24 日，再修正為今日的〈國史館組織條例〉。因此，可以說，至少在法律層面，國史館的組織架構及其職掌在第一次政黨輪替後才有了大幅度的調整，在此之前長達四十多年的時間，基本上維持南京時期奠定的框架。

依據 1956 年、1958 年陸續修正通過的「國史館組織條例」、「國史館辦事細則」及相關法規命令，可知復館初期國史館的組織大抵如下圖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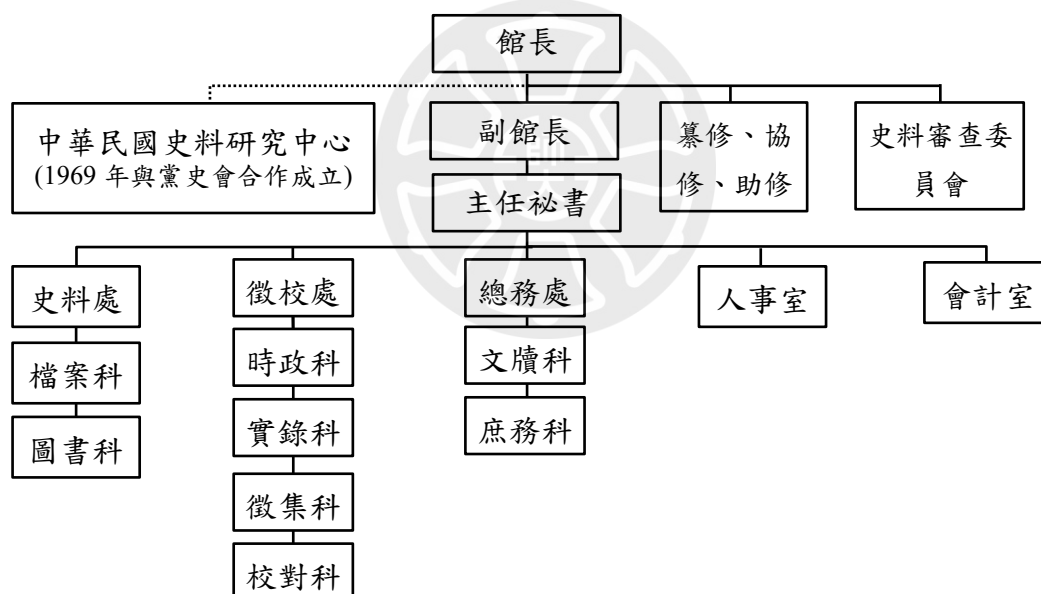


圖 1 國史館組織架構圖（1957-2001）

國史館主要職掌為撰修國史事宜。依照單位性質，如上圖所示，可分為行政與修纂兩大系統及館內學術諮詢單位「史料審查委員會」。1969 年另增加與黨史會合作成立的史學研究機構——「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在行政方面，設有三處二室，分別為史料處、徵校處、總務處、主計室及人

事室。各處的下設單位與職掌如下：一、史料處：設有檔案、圖書二科，分別負責檔案與圖書的編目整理、統計、保管及調閱；二、徵校處：設有時政、實錄、徵集、校對四科。前二科分別負責時政與實錄材料的記錄、考訂、整理與彙輯，後二科分別負責史料的徵集、初步審閱、簽註、登記、編目以及校核、繕寫、複印與校對；三、總務處：設有文牘、庶務二科。前者負責文件、印信、電報、新聞、典禮與集會、會議記錄、國史館檔案等文書相關事項，後者負責公用物品、公款、員工實物配給、代金、福利及宿舍、交通車輛、工人、警衛消防、招待及交際聯絡等庶務有關事項。至於主計室與人事室，則分別負責歲計、會計、統計及人事管理相關事務。

在修纂系統方面，設有纂修、協修與助修，其性質如同古代史官，負責承館長之命，分別辦理指定之編撰事宜。⁹³值得一提的是，有關修纂人員的職稱，「纂修」、「協修」之職稱，實際上源於清代的國史館。民國建立以後，袁世凱時期設立的清史館、國史館皆沿用此名稱。⁹⁴「助修」之名則源自 1946 年制定公布的「國史館組織條例」。

至於史料審查委員會，係國史館的學術諮詢單位。根據 1958 年 3 月 5 日公布施行的「國史館史料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該會設有主任委員一人及若干名委員。⁹⁵委員來自館內的纂修、協修及館外專家，皆由國史館館長指定或聘任，為無給職（得致送館外專家出席費）。該會每月舉行一次會議，負責審查史料的徵集、考訂、編印及史稿的審議及其他有關修史及館長交議事項。

國史館內另設有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是由國史館與黨史會合作，於 1969 年 11 月 24 日成立，適值中國國民黨建黨 75 週年紀念日。根據「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組織簡章」，該中心在「從事及聯繫並協助國內外學術機關團體及個人研究中華民國史料及有關史學」。⁹⁶其成立背景及其組織人員將於後文詳述。

根據國史館組織條例（1956 年）及辦事細則（1958 年），國史館設有館長一人統領全館事務，另有副館長、主任秘書及各處室主任，皆受館長指揮辦事，其餘職員則分別聽命於單位主管。職等方面，除館長為總統特任、部分纂修為聘任外，其他職員皆為簡、薦、委任。所有職員皆應遵守公務員服務法及其他有關服

⁹³ 蕭良章，〈十年來人事業務之檢討〉，收入國史館秘書室編，《復館以來的國史館》，頁 131。

⁹⁴ 朱希祖，〈史官名稱議〉，《說文月刊》，3：8（重慶，1942.9），頁 31。

⁹⁵ 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頁 191-192。

⁹⁶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組織簡章」，收入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頁 267-268。

務之一切法令；聘任纂修之薪給及考成，亦依照公務人員俸給法、公務人員考績法之規定辦理。整體而言，國史館組織體系為科層化的官僚體制，除館長外，原則上都需具備公務人員資格，否則僅能用酌用方式在館內擔任雇員。

而在員額配置方面，依照「組織條例」，至多可達 174 人。然而由於當時政府實施預算員額編制，因此實際的人員配置遠低於此（見表 1）。⁹⁷直至 1973 年起國史館增列臨時人員預算，聘僱大學或研究所畢業學生 11 人，並函請考試院於公務人員高等考試增列「史料編纂」一科，續錄取 26 人，至 1975 年正式職員加上臨時人員之總數達到 69 人。⁹⁸此外，國史館雖有副館長的編制，然而前三位館長皆未指定人選，直至 1994 年 11 月瞿韶華館長時期，始有國史館主任秘書朱重聖兼任副館長一職。⁹⁹

表 1 1958 年至 1979 年國史館預算員額與實際員額（單位：人）

年分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預算	31	31	31	31	31	31	31	31	31	31	31
實有	15	17	19	21	26	23	22	24	24	24	24
年分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預算	31	31	31	31	31	31	31	31	46	46	46
實有	23	23	26	27	25	31	30	30	36	37	38

資料來源：整理自行政院主計處編，《中華民國統計提要》，民國四十七年度至民國六十八年度。

除了人員配置，纂修國史亦需有相當的經費以為支持。國史館為隸屬於總統府的二級機關，其預算列在總統府主管項下。因國史館於 1957 年 7 月 1 日復館，該年屬於四十七年會計年度（1957 年 7 月至 1958 年 6 月）。因此，即以四十六、四十七年度的「國史館史料編纂委員會」與「國史館」之預算作比較。（見表 2、表 3）國史館的開辦費為 25 萬元，經常費和臨時費加總約 60 萬餘元，和前一年國史館史料編纂委員會的經臨費預算相比，僅約增加 24 萬元，前後差距不大。顯示國史館並未因正式復館而獲得更多經費，難以展開新氣象。間接說明國民黨

⁹⁷ 遲景德，〈十年來的徵集與校對〉，收入國史館秘書室編，《復館以來的國史館》，頁 57、88。

⁹⁸ 黃季陸報告；唐元甫紀錄，〈工作會報紀錄〉（1975 年 7 月 2 日），收入國史館秘書室編，《復館以來的國史館》，頁 315。

⁹⁹ 簡筌簧，〈國史館歷任館長、主管、纂修任期一覽表〉，《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42 期（新店，2007.6），頁 223。

政府將國史館復館非出於急迫性需求，相反的，更像是捍衛「正統中國」地位的象徵性宣示，以表示中華民國政府繼承清朝，合法統治中國，因而即將纂修國史。

表 2 1956 年 7 月至 1957 年 6 月「國史館史料編纂委員會」預算（單位：新臺幣）

項	科目名稱	概算數（元）	備註
1	經常費	308,000	含人事費 21,053 元、業務費 4,650 元
2	史料防護整理費	60,000	
3	國父史蹟陳列經費 ¹⁰⁰	36,000	
4	臨時費	60,000	
5	公務汽車應納稅款	15,000	
	總計	479,000	

資料來源：財政部編，《中華民國四十六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臺北：財政部，1957），頁 151。

表 3 1957 年 7 月至 1958 年 6 月「國史館」開辦費及經臨費預算（單位：新臺幣）

項	科目名稱	概算數（元）	備註
1	開辦費	250,000	
2	臨時費	171,030	
3	經常費	436,046	含前史料委員會轉匯部份經費 140,790 元
	總計	857,076	

資料來源：王羽鵬，〈歷年來經臨費預算之分析比較〉，收入國史館秘書室編，《復館以來的國史館》，頁 127。

1970 年代黃季陸館長上任後，國史館的經費預算開始大增。從表 4 可知，單就數據來看，黃季陸館長上任後十年間，國史館的總預算是羅家倫館長時期的 6 倍。若將這 20 年來的物價波動納入考量，平均物價為上漲 1.94 倍，¹⁰¹低於國史

¹⁰⁰ 國父史蹟紀念館原名為「梅屋敷」，1913 年惠州之役後，孫中山曾前往臺灣並於該處用餐，戰後國民黨政府將之改名為「國父臺灣史蹟紀念館」，並請當時的國史館館長張繼為該館撰寫碑文，由吳稚暉在碑石上題字。1954 年 11 月 24 日國民黨建黨 60 周年時重修，改稱為「國父史蹟紀念館」。參見張繼，〈國父臺灣史蹟紀念館記〉（1946 年 10 月 10 日），收入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編，《張溥泉先生全集（續編）》（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2），頁 465-466；羅家倫，〈重修國父史蹟紀念館行館記〉（1954 年 11 月 24 日），收入羅家倫先生文存編輯委員會，《羅家倫先生文存（二）》（新店：國史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6），頁 470-471。

¹⁰¹ 本數據係根據行政院主計處以 105 年為基期公布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及其年增率」，將民國 48 至民國 68 年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作統計後得出。資料檢索自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網址：<https://www.stat.gov.tw/ct.asp?xItem=35375&CtNode=487&mp=4>，檢索日期：2021/6/21。

館增加的幅度，表示黃季陸館長時代，政府編列的國史館總預算確實有所提昇。從表 4 亦可看到，1972 年起，國史館的經常費與臨時費皆逐年增加，尤其是 1972 年臨時費的部分大增，顯示國史館開始購買土地、擴建史庫、新蓋道路與添購圖書儀器設備，說明國史館逐漸開展業務，其花費也相對提高。

由此可知，1970 年代以後國史館的經費確實有了大幅度的增長，此和黃季陸館長時期國史館的組織與業務量開始擴張有關。值得注意的是，由於 1970 年代中華民國政府逐漸面臨一連串的外交困境，在國際外交中逐漸居於劣勢，國史館經費的增長，國際局勢的變化與國民黨政權加強中華民國史的修纂實有一定的關聯，此一情形將在下一章進行討論。

表 4 1957 年 7 月至 1979 年 6 月經常費、臨時費總預算（單位：新臺幣）

年度	科目名稱	概算數（元）	備註
47-58	經常費+臨時費	13,426,194	不包括眷屬補助費、房租補助費各項補助等統一項目
59-68	經常費+臨時費	85,561,992	
	（以上總計）	98,988,186	

資料來源：王羽鵬，〈歷年來經臨費預算之分析比較〉，收入國史館秘書室編，《復館以來的國史館》，頁 127。筆者按：由於 1999 年以前，政府的會計年度採七月制（自上一年 7 月 1 日起至當年 6 月 30 日止），而非歷年制（自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故本表以中華民國紀元年次呈現之。

表 5 1969 年 7 月至 1978 年 6 月經常費、臨時費決算數（單位：新臺幣）

年度	經常費決算數	臨時費決算數	年度	經常費決算數	臨時費決算數
59	1,824,064	無	64	5,927,485	1,135,870
60	1,926,184	無	65	7,993,147.5	1,090,370
61	2,449,541.6	5,820,100	66	8,906,860	1,080,000
62	3,688,352	1,700,620	67	13,066,086	1,980,000
63	3,708,692	1,214,370			

資料來源：王羽鵬，〈歷年來經臨費預算之分析比較〉，收入國史館秘書室編，《復館以來的國史館》，頁 127-130 間的附表。筆者按：經常費的用途包含人事費、事務費、業務費、維護費、旅運費、設備費及特別費等；臨時費的用途包含：土地購置、房屋建築、交通運輸設備購置、圖書儀器設備購置、其他設備購置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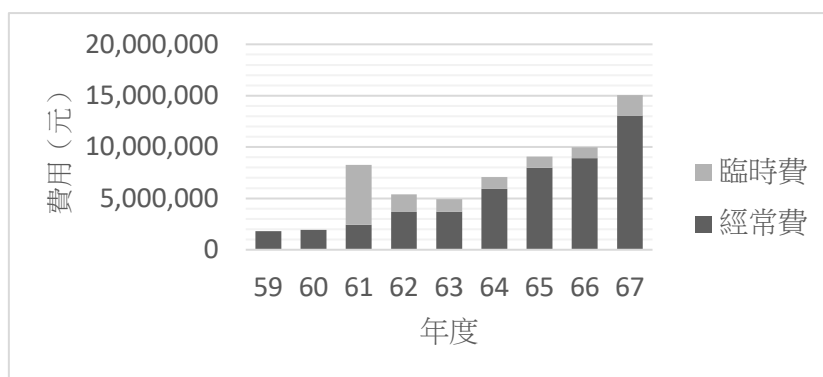


圖 2 1969 年 7 月至 1978 年 6 月經常費、臨時費決算數額

最後，從復館後的歷任館長來看，自 1957 年在臺復館至 2016 年第二次政黨輪替結束為止，國史館總共歷任八位館長，其中包含一位代理館長。從下表歷任館長的任期可知，羅家倫及黃季陸兩位館長的任期涵蓋整個戒嚴時期，且兩人橫跨黨政，同時出掌國民黨的黨史會主委（黃季陸僅在前三年出任黨史會），第三任館長朱匯森的任期則是在戒嚴時期的尾聲至解嚴以後。前三任館長係由蔣氏父子所特任；第四、五任館長則由李登輝任命。第六任以後的館長，隨著政黨輪替，分別由民進黨的陳水扁、國民黨的馬英九特任。這些館長的修史方針與執政黨政治理念之關聯，將是後文討論的重點。

表 6 復館以來歷任館長任期一覽表（1957-2016）

No.	姓名	就職時間	卸任時間	備註
1	羅家倫	1957 年 6 月 29 日	1969 年 2 月 26 日	蔣中正任命；同時擔任黨史會主委；自 1968 年 8 月 11 日館務由黃季陸兼代
2	黃季陸	1969 年 2 月 26 日	1984 年 6 月 6 日	蔣中正任命；擔任黨史會主委（1968.11-1971.5）
3	朱匯森	1984 年 6 月 6 日	1990 年 9 月 12 日	蔣經國任命；解嚴
4	瞿紹華	1990 年 9 月 12 日	1995 年 3 月 16 日	李登輝任命
5	潘振球	1995 年 3 月 16 日	2000 年 4 月 1 日	李登輝任命
6	張炎憲	2000 年 5 月 20 日	2008 年 5 月 19 日	陳水扁任命；第一次政黨輪替
7	林滿紅	2008 年 5 月 20 日	2010 年 12 月 15 日	馬英九任命；第二次政黨輪替

	劉寶貴	2010 年 12 月 16 日	2011 年 1 月 19 日	代理館長
8	呂芳上	2011 年 1 月 20 日	2016 年 5 月 19 日	馬英九任命

資料來源：整理自簡筌簑、林秋敏整理，〈國史館復館 50 週年大事記〉，《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42 期（新店，2007.6），頁 276、279、286、298、303、311；國史館，〈本館 97 年 1 至 6 月份大事記〉，《國史館館訊》，1（臺北，2008.12）頁 236；〈國史館長 請辭獲准〉，《中國時報》，2010 年 12 月 16 日，A4 版；國史館，〈國史研究大事紀事（2011.1-2011.10）〉，《國史研究通訊》1（臺北，2011.12），頁 285；〈總統令任免官員〉，《總統府公報》，第 7247 號，2016 年 5 月 20 日，頁 15；劉偉鵬主編，《汗青一甲子》（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0），頁 64。



第三章 戒嚴時期的修史工作

本章主要以戒嚴時期羅家倫、黃季陸兩位館長所主持的國史館為分析對象，首先，討論首任館長羅家倫對於國史館擬定的工作方針，以了解復館初期國史館的工作目標。其次，討論對於修史工作所遇到的困難與限制，以及後來的黃季陸館長如何因應。最後，檢視國史館實際的修史成果，觀察其撰寫體例及書寫立場，以了解戒嚴時期國史館的修史工作如何配合國民黨政府從「反共抗俄」、「反共復國」到「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基本國策。

第一節 初期工作計畫與限制

前章提到，南京政府時期的代總統李宗仁曾特任居正（1876-1951）為國史館館長，然居正並未到館就職，實際館務由副館長劉成禺主持，最後因國民黨政府在國共內戰中的失利，國史館的史料與人員皆全部淪陷於大陸。不過，當時被任命為國史館館長的居正跟隨政府撤往臺灣，且似乎於政府遷臺初期便有準備復館之意。1951年6月，他曾約集黨史會正、副主任委員羅家倫、狄膺二人，一同前往臺中視察史庫，不幸數月後他即因病逝世。¹當時正值國民黨改造時期，國史館與黨史會的合併或分設問題仍未有定論。直至1957年國史館與黨史會分立前，國史館的業務皆由黨史會兼理。因此，國史館在臺復館之初，不過是「承其名義，繼其所司職掌而已」。²

被任命為首任國史館館長的黨史會主委羅家倫，其首要任務便是思考如何運用黨史會既有的人力與物力資源，以及結合自身在黨內、教育、文化、學術界方面的人脈，為國史館的復館工作奠定基礎。1957年7月1日，羅家倫約集楊毓生、王藹雲、許師慎等人，³共同商討該年度國史館的施政綱要、預算編制及擇定

¹ 許瑞浩，〈國史館在臺復館後的組織變革與業務發展（1957-2017）〉，《國史研究通訊》，13（臺北，2017.12），頁6。

² 遲景德，〈十年來的徵集與校對〉，收入國史館秘書室編，《復館以來的國史館》，頁56。

³ 楊毓生為黨史會的會計主任。王藹雲長期擔任羅家倫的秘書。許師慎是監察院院長于右任的秘書，大陸時期即於黨史會擔任處長，來臺後更是協助羅家倫處理黨史會及國史館業務的重要助手，從羅家倫的日記可看到許師慎向其回報黨史會的工作情形，亦可見到許師慎負責處理國史館內的人事糾紛問題。羅久芳、羅久蓉編，《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頁457、483、486。

館址等，正式展開國史館的重建工作。⁴

一、1957 年國史館施政綱要

1957 年，羅家倫撰寫〈國史館四十六年度施政綱要〉一文，首次發表他對國史館擬定的初步工作規劃，內文擇要如下：

- (一) 為尊重國家體制，凡屬總統明令宣付史館事蹟，理應盡先詳實處理。
- (二) 編纂史乘，首藉史料之收集……凡屬有關開國建國之史料，均應周諮博訪，盡其可能以從事於收集與保存之工作；最近八年抗戰時期之歷史，與正在繼續從事的反共抗俄之艱巨事業，均屬我中華民族偉大之光榮與不可磨滅之教訓……此二項切近之史事，乃應提前妥速籌劃進行者也。
- (三) 國史館注重之史料範圍，自應包括公私兩方面之記錄。……不能不從速：1、建造庫房，以資存儲；2、選用若干有史學訓練之人才，從事鑑別與編訂工作。
- (四) 調查與收集流傳於外國之中文史料與外國文中之中國史料，實為必不可少之工作。……處今之世，我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面，莫不與世界局勢息息相關，此事理之顯著者。
- (五) 凡國內公私機關從事於歷史工作者，自當密切聯繫，妥定辦法，以收互助合作之效。
- (六) 清史係民初設置之清史館所纂修……近來常有修訂之議，理屬當然，為惜當年清史館文獻早已失散。現存故宮所存，僅有「實錄」為原始文件，可供考訂「本紀」之用。如欲詳加修正，則茲事體大，非短期所能畢事，容當另定計畫。至於分別卷帙，加以考訂，自當視力能所及，隨時進行。⁵

⁴ 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頁 188。

⁵ 〈國史館四十六年度施政綱要〉，收入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頁 188-190。另收入於羅家倫先生文存編輯委員會，《羅家倫先生文存（一）》，（臺北：國史館、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76），頁 345-348。

除了第一點「宣付史館」，羅家倫認為應先詳實處理外，第二至第四點皆與史料問題有關。羅氏於該文詳細闡述史料收集的急迫性，他指出許多史料因戰事紛亂而散佚，因此有關「開國建國」與「八年抗戰」時期之史料應當在有關人員俱在尚能取得之時，盡力訪視搜求與保存。另外，除了接收已逾時效之公家機關檔案，私人文書及國外所藏有關中國的原始文件、專著、回憶錄等，國史館亦須設法商借抄錄或購置。接著，應建造史庫妥善典藏這些史料，然後交由史學專業人才進行鑑別與編訂，因此最好與館外的歷史工作者取得聯繫並互相合作。最後，則為前代史—「清史」的整修，羅家倫認為此一工作「非短期所能畢事，容當另定計畫」。凡此種種，可知羅家倫的國史纂修計畫有其優先順序，史料的收集與整編被視為第一要務。

羅家倫如此重視史料的原因，可能與中國近代史學的發展趨勢及其求學過程累積的學習經驗有關。首先，自二十世紀初梁啟超揭櫫「新史學」的主張後，中國近代史學的發展便朝「科學化」的史學研究方向前進，試圖找出中國歷史演變過程中的通則與規律，並希望能在科學實證的基礎上，注意史料的整理與批判。1920 至 1930 年代，以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等人所代表的「史料學派」在中國史學界及學術界佔據主導地位。1949 年以後，中國學界幾乎被馬克思主義所覆蓋，許多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學者，如學者王晴佳所述，對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多帶有一種「天然的反感」，因而選擇離開中國大陸流亡海外，或隨國民黨政府前往臺灣。這批大陸來臺學者（當中不乏史料學派的要角，如傅斯年、姚從吾、李濟、毛子水、董作賓等），將其研究方法與精神自大陸移至臺灣，引領兩大學術重鎮—中研院史語所及臺灣大學，成為了 1950 至 1960 年代中期臺灣史學界的主流。⁶

這些「史料學派」的要角多出身北京大學，與羅家倫素為好友與舊識。以羅家倫本身的求學經驗而言，1919 年其就讀北大期間，正值國史館被教育部併入北大，成為北大附設國史編纂處時期。當時校長蔡元培身兼該處處長，羅家倫深受其影響，對其人格與「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教育方針相當崇拜。⁷羅氏曾

⁶ 王晴佳，《臺灣史學五十年（1950-2000）：傳承、方法、趨向》（臺北：麥田，2002），頁，333、335-338。

⁷ 李雲漢，〈羅志希先生的大學時代〉，收入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羅志希先生傳記暨著述資料》（新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76），頁 86。

協助其蒐集辛亥革命時期的相關印刷品，作為編纂國史的參考材料。在蒐集過程中他便體認到史料容易散失、收集不易，若不即時加以保存，「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後人將難以了解今日發展的全貌。⁸

另一方面，羅家倫最親近的同窗好友，當屬「史料學派」總舵手——傅斯年（1896-1950）。兩人理念相近、志趣相投且都師事自由主義學者胡適，受其「科學方法」之薰陶，常在胡適家中高談闊論。他們更與其他北大同學創辦《新潮》雜誌，秉持「批評的精神」、「科學的主義」及「革新的文詞」等理念，繼續提倡新文化運動。⁹1920年，在蔡元培的推薦下，羅家倫得到赴美留學的機會，先後進入普林斯頓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在此期間，羅氏經常與蔣廷黻談論中國史學及研究方法問題，並鼓勵蔣氏投入中國近代史的研究。1923年，羅家倫再赴德國柏林大學就讀歷史研究所，與朱家驊、傅斯年、俞大維、陳寅恪、毛子水、姚從吾、趙元任及徐志摩等人時有交往。1926年，羅家倫遊歷巴黎大學、牛津大學期間，即曾提出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計畫，當時他便主張研究的第一步為收集史料。

10

以上種種，造就了羅家倫講求史學研究必須秉持「無徵不信」的實證精神。他回到中國，於1928年受命接任北京清華大學校長，並在該校講授中國近代史時，便開設專題課程介紹中外史料，尤其強調中、西史料的比較，引導學生蒐集、考訂與批評史料。¹¹1931年，羅家倫受聘為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期間，發表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一文，該文對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方法做了系統性的論述，顯示羅氏對於近代史研究的構想已趨於完整與定型，進而提出編訂「史料叢書」的主張：

要有科學的中國近代史……非先有中國近代史料叢書的編訂不可。所以若

⁸ 羅家倫，〈近代中國文學思想的變遷〉，收入《羅家倫先生文存（二）》，頁23。

⁹ 李雲漢，〈羅志希先生的大學時代〉，收入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羅志希先生傳記暨著述資料》，頁89-89、91；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上）〉（臺北：唐山，1996），頁140、205、221。

¹⁰ 蔣永敬，〈羅家倫先生的生平及其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貢獻〉，收入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羅志希先生傳記暨著述資料》，頁43-44。

¹¹ 呂芳上、夏文俊，〈羅家倫先生大事年系〉，收入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羅志希先生傳記暨著述資料》，頁119-120；劉龍心，〈知識生產與傳播—近代中國史學的轉型〉（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19），頁154。

是我在中國近世史方面要做任何工作的話，我便認定從編訂中國近代史料叢書下手。¹²

羅家倫於此文中不斷強調史料的重要性，以凸顯「史學」與「科學」的關聯。除了中文史料，他也認為外文材料不容忽視，因中國近代歷史不論在國際戰爭或外交方面皆深受外國影響，且無論中文或外文史料，都可分為檔案、官書、禁書、當事人文件和記載、專家著述、定期刊物及圖畫等公私文字與非文字史料，皆應盡可能地廣泛蒐集。此外，他也主張研究大問題之前，應先解決小問題，因專題研究是史學成為一門「科學」的必經階段。¹³全文重點無一不是指向史學研究需有堅實的史料為基礎。為此，他將編訂「史料叢書」視為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首要工作。羅家倫日後在臺主持黨史會與國史館所制訂的工作計劃與出版方針，可說是源自此一時期的設想。

1953年3月，黨史會召開遷臺後的首次會議，該次會議中，羅家倫表示決定擴大徵集國史資料以及編印革命文獻叢刊。是年五月，黨史會即出版《革命文獻》第一輯，採混合編法形式，不定期公布有關革命與國民黨的原始文件。《革命文獻》陸續發行至1989年，共有117輯；1990年以後始改為發行《中國現代史資料叢編》。¹⁴

羅家倫在《革命文獻》第一輯的「前言」中即開門見山的表示：「要『文獻足徵』才能寫歷史，而『無徵不信』更是治史的名言。」¹⁵三年後，其在〈國史館四十六年度施政綱要〉的結尾再度強調：

歷史工作「無徵不信」，為我國聖哲之遺規。現在國史館在草創時期，尤感史料缺乏，不敷應用。故為忠實國史起見，自當首先大量徵求文獻，再

¹² 羅家倫，〈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收入《羅家倫先生文存（二）》，頁61。

¹³ 羅家倫，〈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收入《羅家倫先生文存（二）》，頁57、61-66、69-74。

¹⁴ 呂芳上、夏文俊，〈羅家倫先生大事年系〉，收入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羅志希先生傳記暨著述資料》，頁134；該刊物前40輯每輯收錄的史料不限同一時代或同一事件，同一事件之史料亦可能分散在各輯，資料頗為散亂，因此41輯以後改變編法，確定好每輯主題，以作為體系完整的史料專輯。參見：〈序言二〉，秦孝儀主編，《第一至第一〇一輯 革命文獻總目》（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5）；劉偉鵬主編，《汗青一甲子》，頁118-119。

¹⁵ 羅家倫，〈革命文獻第一輯前言（一）〉，收入秦孝儀主編，《第一至第一〇一輯 革命文獻總目》。

詳慎考訂，然後編印長篇，以備公開研討，最後方能期待平實之信史公諸世人……國史館在重建時期，實當努力從事於準備工作。為其樹立良好基礎，則後之史家，得此堅實史料之憑藉，能繼續發揚國史之光輝於無極！

16

由此可知，「文獻足徵」、「無徵不信」是羅家倫一貫的治史態度，是以他試圖將現代化的實證科學精神融入修史工作，期許將來官方纂修的國史能合乎現代的學術標準。是故無論黨史會或國史館，在羅家倫的主持下，其工作項目及出版方針皆以史料的蒐集與整編為重點。

二、修史工作的限制

由於羅家倫將蒐采史料視為修史工作的第一步，因此在他任內相當重視史料的徵集，尤其是外文史料的徵集與翻譯。不過，根據後來曾任國史館史料處長的簡筌簧所述，羅家倫時期尚未建立一套檔案管理制度，資料可能被退休或離職的承辦人員帶走，因此無法得知當時有哪些具體的徵集或翻譯成果。¹⁷

然而，史料不足亦非短期能克服之事。曾任國史館主任秘書兼纂修的李雲漢表示，國史館復館初期，總統府與黨史會雖曾移交過部分政府檔案與國民黨所藏文獻，然仍不足以修史，即便羅家倫曾計畫編纂「開國實錄」與「抗戰實錄」兩部國史，並分別交由主任秘書許師慎、纂修柳長勛負責，¹⁸惜以最終皆未出版，而招致學者吳相湘譏評「羅家倫修史不成編」。¹⁹

的確，若檢視 1957-1984 年羅家倫、黃季陸兩位館長在任期間的國史館出版成果，從表 7、表 8 的整理可看到，這 27 年間國史館發行的出版品，依其性質可分為修纂國史紀志傳、研究專題、蒐采彙編史料及其他等四大類。從出版年份

¹⁶ 〈國史館四十六年度施政綱要〉，收入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頁 190。

¹⁷ 簡筌簧口述，田南萍、洪宜楨紀錄整理，〈羅家倫館長時期國史館同仁群像（一）〉，頁 183。

¹⁸ 林滿紅訪問，曹慧如紀錄，〈復館初期的國史館—李雲漢先生訪問記錄〉，頁 116。

¹⁹ 吳相湘撰述的《民國百人傳》（共四冊）中，學術教育界人士約佔四分之一，據其自述，目的在於強調興學、育才及救國的重要性，以及倡導面對現實的風氣。從該書的各篇標題即可看出吳相湘對傳主的評價，如「傅斯年學行並茂」、「蔣廷黻學以致用」，羅家倫則是「修史不成編」。不過在內文中仍是肯定羅家倫對於促進中國現代學術發展有所貢獻。參見吳相湘，〈增強信心，培植人才：民國百人傳自序〉，《傳記文學》，18：1（臺北，1971.1），頁 7、10。

可知羅家倫時期國史館的出版品僅有兩種，分別為 1967 年的《國父當選臨時大總統實錄》，及 1968 年的《西北建設考察團報告》。前者係由許師慎編纂、羅家倫主編、黃季陸撰序，收錄中華民國開國的原始資料及附錄若干當事人的事後追憶，係一完整的史料專輯；後者則是 1943 年羅家倫率團考察陝、甘、青、寧、新等五省的實地考察報告。²⁰因此嚴格來說，1957 年至 1968 年這十一年間由國史館獨立修史的成果僅有《國父當選臨時大總統實錄》一書，難免遭致外界質疑。

表 7 1950 年至 1968 年羅家倫館長時期國史館、黨史會出版品

No.	出版名稱	編撰者	出版年分	備註
一、史料				
1	革命文獻	黨史會	1953	70 冊，黨史會出版
2	開國文徵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	1963	2 冊，黨史會出版
3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		1961	第 1 編 16 冊；第 2 編 5 冊
4	共匪禍國史料彙編		1961	4 冊，黨史會出版
5	中日外交史料叢編	中華民國外交問題研究會	1964	9 冊，黨史會出版
6	國父當選臨時大總統實錄（上、下）	國史館許師慎	1967	國史館首部出版品
7	西北建設考察團報告	國史館	1968	1943 年羅家倫等撰
二、孫中山、蔣中正之著作及思想闡揚				
8	國父畫傳	羅家倫主編	1954	中英文本各 1 冊，黨史會出版
9	總理全書	羅家倫主編	1952	12 冊，黨史會出版
10	國父年表	羅家倫主編	1952	1 冊，黨史會出版
11	國父墨蹟	羅家倫主編	1961	2 冊，黨史會出版
12	國父批牘墨蹟	羅家倫主編	1955	1 冊，黨史會出版
13	國父年譜初稿	羅家倫主編	1958	各 2 冊，黨史會出版
	國父年譜：增訂本	羅家倫主編、黃季陸增訂	1965	1994 年再度增訂，黨史會出版
14	國父全集	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	1957	3 冊，黨史會出版
15	國父孫中山先生傳		1965	1 冊，黨史會出版
16	國父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		1965	5 冊，黨史會出版

²⁰ 國史館與黨史會曾於 1966 年合編《前國民政府主席林公子超遺集》，由黨史會出版，但就國史館獨立編纂而言，以許師慎的《國父當選臨時大總統實錄》為最早。李雲漢，〈各種史料專集的編刊〉，收入國史館秘書室編，《復館以來的國史館》，頁 123-124。

17	蔣總統對國父思想之實踐篤行與融會貫通	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先總統蔣公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	1965	1 冊，黨史會出版
18	國父手訂本三民主義	孫文	1963	黨史會出版
19	三民主義對照校勘本	孫文	1965	黨史會出版
20	蔣總統對中國及世界之貢獻叢編	蔣總統對中國及世界之貢獻叢編編纂委員會	1967-1969	18 種，20 冊，黨史會出版
三、中國國民黨黨史				
21	六十年來之中國國民黨與中國	羅家倫	1954	黨史會出版
22	國民革命畫史	羅家倫主編	1957	1958 年再版，黨史會出版
23	七十年來之中國國民黨與中國	羅家倫	1964	黨史會出版
24	辛亥武昌首義記	李廉方	1961	黨史會出版
25	臺灣畫史	朱傳譽編	1962	黨史會出版
26	中國國民黨七十年大事年表	黨史會	1964	黨史會出版
27	國民革命史	李守孔	1965	黨史會出版
28	中國國民黨與臺灣	朱傳譽	1964	黨史會出版
29	中國近代畫史	朱傳譽	1966	黨史會出版
30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畫史	龔弘主編	1961	以中、英、法、西、荷等 5 種文字發行，黨史會出版
31	黃埔建軍三十年概述	黨史會	1954	黨史會出版
四、先烈先進圖像、傳記、墨蹟、著作				
32	黃克強先生書翰墨蹟	羅家倫主編	1956	黨史會出版
	黃克強先生全集	羅家倫主編	1968	黨史會出版
33	吳敬恆先生傳記	張文伯	1964	黨史會出版
	吳稚暉先生選集(上、下)	黨史會編	1964	黨史會出版
	吳稚暉先生墨蹟	黨史會編	1964	2 冊，黨史會出版
	吳稚暉先生全集	羅家倫、黃季陸主編	1969	黨史會出版
34	張溥泉先生全集	黨史會編	1951	各 1 冊
	張溥泉先生全集補編	黨史會編	1952	黨史會出版
35	戴季陶先生文存	陳天錫編	1959	黨史會出版
	戴季陶先生文存續編	陳天錫編	1967	黨史會出版
36	狄君武先生遺稿	狄膺	1965	黨史會出版
37	林公子超遺集	林森	1966	與國史館合編，黨史會出版

38	居覺生先生全集	居正	1954	2 冊，黨史會出版
39	二百年來之俄患	宋教仁	1952	黨史會出版
40	開國名人墨蹟	羅家倫主編	1961	2 冊，黨史會出版
41	革命先烈先進詩文選集	中華民國各界紀念	1965	6 冊，黨史會出版
42	革命先烈先進闡揚國父思想論文集	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	1965	3 冊，黨史會出版
43	革命先烈先進傳	中華民國各界紀念 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	1965	黨史會出版
44	中華民國開國名人像第一輯	羅家倫撰、郎靜山等	1951	黨史會出版
45	黃花崗革命烈士畫史	繪	1952	黨史會出版
五、其他一般出版品				
46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專刊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	1964	黨史會出版
47	國父百年誕辰紀念叢書介紹	中華民國各界紀念 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	1968	黨史會出版
六、黨史會成員研究專著				
48	從容共到清黨	李雲漢	1966	黨史會出版
49	鮑羅廷與武漢政權	蔣永敬	1963	黨史會出版

資料來源：整理自劉偉鵬主編，《汗青一甲子》，頁 71-74。

表 8 1968 年至 1984 年黃季陸館長時期國史館、黨史會出版品

No.	出版名稱	編撰者	出版年分	備註
一、修纂國史紀志傳				
1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前十八—十五年	國史館	1974	革命建國八十週年紀念
2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前十四—十三年	國史館	1975	
3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前十二—十一年	國史館	1977	
4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前十一—八年	國史館	1977	
5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前七年	國史館	1975	革命同盟會創立七十週年
6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前六年	國史館	1979	
7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前五年	國史館	1981	
8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前四年	國史館	1979	
9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前三年	國史館	1982	
1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前二年	國史館	1982	
11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前一年	國史館	1973	

12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元年 1—6 月	國史館	1971	最早出版，慶祝建國六十年
13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元年 7—12 月	國史館	1972	
14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二年 1—6 月	國史館	1981	
15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二年 7—12 月	國史館	1981	
16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三年 1—6 月	國史館	1982	
17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三年 7—12 月	國史館	1982	
18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四年	國史館	1981	
19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五年	國史館	1982	
2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六年	國史館	1976	
21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七年 1—6 月	國史館	1981	
22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七年 7—12 月	國史館	1982	
23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八年 1—6 月	國史館	1979	
24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八年 7—12 月	國史館	1981	
25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九年	國史館	1980	
26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十年 1—6 月	國史館	1982	
27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十年 7—12 月	國史館	1982	
28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十一年 1—6 月	國史館	1983	
29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十一年 7—12 月	國史館	1983	
3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十二年 1—6 月	國史館	1980	
31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十二年 7—12 月	國史館	1980	
32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十三年 1—6 月	國史館	1983	
33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十三年 7—12 月	國史館	1983	
34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十四年 1—6 月	國史館	1975	3 月 12 日出版(孫中山逝世五十週年)
35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十四年 7—12 月	國史館	1975	1978 年再版
36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十五年	國史館	1978	
37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十六年 1—6 月	國史館	1975	
38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十六年 7—12 月	國史館	1978	
39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十七年 1—6 月	國史館	1978	北伐統一五十週年
4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十七年 7—12 月	國史館	1982	
41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二十二年 1—6 月	國史館	1984	
42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五十年 1—4 月	國史館	1980	
43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五十年 5—8 月	國史館	1982	
44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五十年 9—12 月	國史館	1982	
45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六十年 1—6 月	國史館	1973	
46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六十年 7—9 月	國史館	1974	

47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六十年 10—12 月	國史館	1974	
48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六十一年 1—3 月	國史館	1980	
49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六十一年 4—6 月	國史館	1980	
50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六十一年 7—9 月	國史館	1983	
51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六十一年 10—12 月	國史館	1983	
52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六十二年 1—6 月	國史館	1984	
53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六十四年 1—4 月	國史館	1976	4 月 5 日出版(蔣中正逝世 一週年)
54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六十四年 5—8 月	國史館	1976	
55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六十四年 9—12 月	國史館	1976	
二、研究專題				
56	國父軍事顧問—荷馬李將軍	黃季陸	1969	
57	國史館館刊（一）（二）	國史館	1969	重印南京時期的館刊
58	劃時代的民國十三年	黃季陸	1973	與黨史會合作出版
59	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一輯	中華民國 史料研究 中心	1979	
60	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二輯		1972	
61	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三輯		1973	
62	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四輯		1974	
63	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五輯		1976	
64	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六輯		1976	
65	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七輯		1977	
66	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八輯		1978	
67	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九輯		1979	
68	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十輯		1981	
69	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十一輯		1984	
70	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與史學	黃季陸等	1975	
71	人類的前途與世界新道德標準之樹立—第二次中日戰爭的追憶	黃季陸	1978	原刊於中國歷史學會第十期，國史館重印
72	先總統蔣公有關論述與史料	中華民國 史料研究 中心	1979	與黨史會合作出版
73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十週年紀念論文集			
74	李烈鈞先生百年誕辰紀念集	國史館	1981	
75	張溥泉先生百年誕辰紀念集	國史館	1981	
76	國史館基本組織與權責問題之研究	蕭良章	1981	
77	孫中山先生與辛亥革命（上、中、下）	中華民國 史料研究 中心	1981	與黨史會合作出版
78	民主典例與民主憲政	黃季陸	1983	

79	國父生辰的考證	黃季陸	1983	
80	我們的總理	黃季陸	1983	
81	西北中蘇航線的經營	簡筌簫	1984	
三、蒐采彙編史料				
(一) 重刊舊史料				
82	重印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 1—222 冊	國史館	1972	原編者：國民政府文官處
83	重印中華民國總統府公報 1—150 冊	國史館	1981	原編者：總統府第三局
84	中華民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冊		1982	國史館重印
(二) 修編職名錄與年表日誌				
85	國民政府建制職名錄	許師慎	1984	
(三) 彙編專題史料				
86	中華民國史料叢編	黨史會	1968	1 至 4 集，共 33 種 115 冊
87	有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各方意見彙編(上、下)	許師慎	1979	
88	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史料初輯	國史館	1979	
89	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史料續輯	國史館	1982	
90	辛亥年四川保路運動史料彙編(上、下)	國史館	1981	
91	東北義勇軍	國史館	1981	
92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史料專輯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1984	
93	中國鐵路沿革史	國史館	1984	
(四) 蒐編傳記史料				
94	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續編	陳天錫編	1971	黨史會出版
95	革命人物誌	黃季陸主編	1969-	黨史會出版
96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	羅家倫先生文存編輯委員會	1976	國史館與黨史會共同出版；出版日期為 12 月 21 日(羅家倫誕辰)
97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二冊		1976	
98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三冊		1976	
99	羅家倫先生文存第四冊		1976	
100	于右任先生墨寶	于右任先生百年誕辰紀念籌備委員會	1978	國史館、監察會、黨史會共同出版
101	于右任先生年譜		1978	
102	于右任先生文集		1978	
103	于右任先生詩集(上、下)		1978	
104	胡漢民先生遺稿	國史館	1978	紀念胡漢民百年誕辰
105	中華民國褒揚令集	國史館	1984	共 14 冊
四、其他				

106	國史館紀要	許師慎	1977	
107	國史館（總書庫）圖書目錄（一）	國史館	1980	
108	國史館（公報譜牒方志、文史研究室）圖書目錄（二）	國史館	1980	
109	國史館（清史研究室）圖書目錄（三）	國史館	1980	
110	復館以來的國史館	國史館	1979	

資料來源：整理自國史館，《國史館概況》（新店：國史館，1985），頁 50-62。該書遺漏兩書，分別為 1966 年國史館與黨史會合編的《林公子超遺集》、1977 年許師慎編纂的《中華民國行憲三十年簡史》，且原書所列出作品未作分類，故此表自行分類，分類標準及名稱係借用自：朱重聖，〈民國以來國史館之修史工作〉，收入《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二）》（新店：國史館，1998），頁 1195-1246。

不過，若比較同一時期同樣由羅家倫主持的黨史會，其出版成果明顯較為豐富。從表 7 可知，羅家倫擔任黨史會主委期間（1950-1968 年）刊布了不少文獻史料，並重新編印孫中山、蔣中正及國民黨革命人物的相關文集，除前文曾提及的《革命文獻》外，尚包含《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國父百年誕辰紀念叢書》、《中華民國史料叢編》等多部史料彙編。²¹其中，《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國父百年誕辰紀念叢書》兩套叢書係配合國民黨中央慶祝中華民國開國五十週年（1961 年）及紀念孫中山百年誕辰（1966 年）而規劃出版的學術論著。羅家倫先後擔任「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學術論著編纂委員會」的召集人，因此結合國史館、黨史會及館外專家學者的資源，陸續編印這兩套叢書，由黨史會發行。²²而李雲漢認為，羅家倫對黨史會最大的貢獻在於使該會的職能「由消極的保管史料，改變為積極的應用史料，由單純的整理史料，改變為有計畫的刊布、展覽和研究」。²³

儘管如此，外界認為羅家倫時期黨史會公開的史料仍十分有限。如致力於中國現代史研究、立志書寫抗戰史的臺大教授吳相湘，因其缺乏政界人脈與學術資源，無法自由閱覽黨史會所藏的檔案，加上與羅家倫及近史所所長郭廷以二人的私人恩怨，因而對兩人主持的機構多有批評。同時，他也不滿兩人身兼多職，違背相關法令規定，而於《中央日報》發表文章，更質疑近史所領取福特基金會補

²¹ 〈序〉，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一）》（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8），頁 2。

²² 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頁 234、245。

²³ 李雲漢，〈黨史會與民國史研究〉，《近代中國》，84（臺北，1991.8），頁 164。

助卻「迴避民國史的研究」，擔憂日後「抗戰後中國被共匪竊據問題」的最大發言權將被同樣取得福特基金的日本東洋文庫學人搶先一步；²⁴香港學者許冠三亦直指羅家倫的「首要任務是看守該會所藏史料，不容外人染指」。²⁵

此外，羅家倫在國史館方面原計畫編纂的「開國實錄」和「抗戰實錄」，也因人力、經費問題而未能完成出版。李雲漢指出，此事不僅是羅家倫的一生之憾，也是國史館備受外界批評之處。²⁶

從羅家倫時期國史館的出版品來看，當時國史館的工作成果確實不盡理想，不過當時的國史館面臨不少工作限制也是事實。除了史料不足、經費支絀，辦公環境不佳和缺乏足夠人才亦是導致修史成效低落的四大原因。

（一）辦公環境吵雜，空間狹窄

首先就辦公地點而論。中央政府決定恢復國史館後，始由館長羅家倫籌備復館工作，因此復館初期的國史館沒有辦公室，亦無任何設備，凡事皆須從頭做起。羅家倫等人於是假借黨史會做為討論籌備復館事宜的工作地點。**1958 年 1 月**，羅家倫租得臺北市南京東路的兩棟民房，作為國史館的臨時辦公處所，嗣後行政院同意撥給臺北市北平路 2 號的前民防司令部房屋一棟，羅家倫等人加以整理修葺後，於隔年 8 月遷入辦公，國史館始有正式的館址。²⁷

這樣的情況其實與 1947 年國史館在南京成立時的窘境頗為相似。該年 4 月 25 日，時任館長的張繼召開修纂人員第一次座談會，由於當時尚無「國史館」建物，因此假借中央飯店舉行會議。會議甫一開始，張繼便向修纂人員表示國史館：「租購之房間，為數不多，且未修理完竣，深以為歉」。²⁸雖然後來南京國史館終於有了正式的辦公場所，然此一地點仍係張繼自行在南京淮海路購得民間宅邸作為館址。²⁹由此可知，國史館無論在南京或是臺灣，其成立伊始皆由館長籌措經費、自行尋覓地點，或也間接顯示了國史館此一機構無論在十年前或十年後皆未得到政府的充分重視。對當時的黨政高層而言，國史館的重要性，多半取決於其

²⁴ 楊金華，〈郭廷以與吳相湘緣何走向對立〉，《傳記文學》，116：1（臺北，2020.1），頁 50、51、52、63；吳相湘，〈為什麼要迴避民國史的研究〉，《中央日報》，1961 年 12 月 28 日，版 4。

²⁵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一九〇〇（下）〉（臺北：唐山，1996），頁 264。

²⁶ 李雲漢，〈史學圈裏四十年〉，頁 45。

²⁷ 談龍濱，〈國史館遷館經過及新址擴建〉，收入國史館秘書室編，〈復館以來的國史館〉，頁 51。

²⁸ 國史館，〈國史館纂修人員第一次座談會紀錄〉，《國史館館刊》，1（南京，1947.12），頁 109。

²⁹ 唐豐姣，〈國史館裡的人與事〉，《書屋》，2019：6（長沙，2019.6），頁 25。

承載的象徵意涵，意味著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才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權，國史修纂與否並沒有強烈的急迫性。

有了正式的館址後，國史「館」終於名符其實，得以開始辦公。當時國史館坐落於行政院的后方，鄰近行政中樞，與其他黨政機構的往來相對便利，不過空間過於狹小，不太適合辦公。曾在國史館工作過的陶英惠回憶，當時國史館的對面是臺北市公共汽車管理處，車輛進出頻繁，空氣中時常瀰漫著廢氣與汽車的噪音，加上館內的各處室，雖有隔間但未頂到天花板，因此基本上沒有隔音，不時可聽見「脾氣很大」的史料處長倪寶坤傳來的斥責聲。³⁰此外，當時也沒有印表機、電腦，桌子的大小又是取決於職等的高低，因此臨時人員只能在狹小的桌椅上，以最省成本的方式用複寫紙抄寫黨史會調來的報紙，相當克難。³¹

另一方面，纂修國史需要史料，因此必須有足夠的空間與良好的存放地點。總統府曾移轉國民政府檔案至國史館，不過館內存放空間不夠，直到羅家倫在新店青潭買地建造庫房後，始於 1964 年將該批檔案入藏史庫。³²根據簡筌簧的研究，羅家倫原本曾考慮將國史館設在南港，與中研院相鄰，增加兩機構的合作機會，因此曾向中研院商借土地，後來中研院也有通過此案，不過羅家倫不滿意中研院提供的地點，最後選擇和其舊識購買位於新店青潭的土地。³³

青潭位於臺北近郊，四面環山，竹林茂盛，交通雖然不便，但地點相對安全。1962 年時，配合政府的防空政策及避免史料遭遇空襲，羅家倫於是向中央爭取經費在青潭修建史庫，作為存放重要檔案及疏散時預備辦公地。³⁴如此一來，大宗的案卷便存放於新店庫房，與國史館的辦公地點分離，兩地相隔遙遠，往返相當費時，反而不利於史料的入藏與調閱。³⁵黃季陸就任館長後，為改善此一情形，乃決定遷建國史館，俾使辦公地點與史庫集中。（見表 9）不過，這也導致國史館遠離市區，隱沒深山，變得更加冷僻，外界鮮少人了解其工作性質。黃季陸即曾

³⁰ 陶英惠，〈在國史館服務雜憶〉，《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42 期，（新店，2007.6），頁 259。

³¹ 陶英惠，〈在國史館服務雜憶〉，頁 257。

³² 簡筌簧口述，田南萍、洪宜填紀錄整理，〈羅家倫館長時期國史館同仁群像（一）〉，頁 190。

³³ 簡筌簧，〈國史館早期館舍爭取與修建之探討—從北平路到北宜路（1957-1973）〉，《國史館館訊》，5（臺北，2010.12），頁 102、103。

³⁴ 羅家倫在 1962 年 3 月 31 的日記中提到：「上午，到國史館召集館會，為了接到總統府及行政院通知，為萬一戰事發生，如何防護史料並繼續辦公，應預為籌辦事。決定即就青潭原有地址，及以前省下之十八萬元與鋼筋二十噸，修建庫房數間，為貯藏及辦公之用。」。羅久芳、羅久蓉編，《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頁 689。

³⁵ 談龍濱，〈國史館遷館經過及新址擴建〉，收入國史館秘書室編，《復館以來的國史館》，頁 51。

表示國史館「不被重視，也很少人知道國史館到底是什麼機關」；³⁶國史館的現職人員也曾聽聞過去在新店的館員，因鮮少被總統府交辦業務，而有過一段「山中無甲子」的悠閒歲月。³⁷

表 9 2000 年以前國史館的辦公地點及其相關建築一覽表

項目	地點	時間	備註
辦公地點	臺北市南京東路 120 巷 5 弄 15 號（現伊通街 59 巷）	1958 年 1 月 5 日	羅家倫選定
辦公地點	臺北市北平路 2 號	1959 年 6 月 15 日	
購置土地	新店大崎腳（今青潭）基地千坪，作為史庫用地	1959 年 6 月	羅家倫選定
興建史庫	新店大崎腳庫房與宿舍完成啟用	1963 年 3 月 4 日	羅家倫時期
興建史庫	新店史庫 4 樓樓層「志希樓」	1969 年 7 月 30 日	黃季陸時期
成立中心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成立「志希樓」	1969 年 11 月 24 日	黃季陸時期
興建大樓	新店北宜路辦公大樓工程破土	1971 年 9 月 1 日	黃季陸時期
興建大樓	新店北宜路辦公大樓及學人宿舍「溥泉館」落成	1972 年 12 月 11 日	黃季陸時期
辦公地點	新店北宜路 3 段 225 號（地址後改編為北宜路 2 段 406 號）	1973 年 1 月 3 日	黃季陸選定
改建橋樑	改建通道橋梁落成（傳賢橋）	1978 年 6 月 20 日	黃季陸時期
修通道路	借用民地修通館後道路（富國路），自此車輛始可直達國史館	1978 年	黃季陸時期
興建大樓	「季陸樓」興建工程破土	1985 年 12 月 17 日	朱匯森命名
修通道路	委託新店市公所辦理傳賢路建案驗收完竣，至此國史館始有正式對外通道	1995 年 4 月 17 日	潘振球時期
興建大樓	「韶華館」啟用典禮	1996 年 11 月 26 日	潘振球時期

資料來源：整理自簡筌簃、林秋敏，〈國史館復館 50 週年大事記〉，頁 276、277-281、284、289、304、305。

（二）人力稀少，缺乏史學專業人才

次就人事問題而言，除了編制員額稀少外，更重要是缺乏史學專業的人才。

³⁶ 唐元甫紀錄，〈工作會報紀錄〉（1975 年 7 月 2 日），收入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頁 320。

³⁷ 吳淑鳳，〈遷臺後國史館的昔與今〉，《國史研究通訊》，13（臺北，2017.12），頁 38。

如表 10 所示 1965 年的國史館，扣除臨時人員後，正式職員僅有 24 人，其中一人身兼二職（纂修歐陽鶯同時擔任徵校處處長）。從年齡、省籍與性別來看，當時國史館職員的平均年齡為 47 歲，且清一色都是外省籍男性，僅有一名女性科員；學經歷方面，多曾服務於黨政、軍事機構，有的為學校教員，部分人具有大學學歷，但僅有秘書熊守暉為歷史本科系出身。³⁸

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曾提及他大學畢業後曾短暫進入國史館工作（1974-1975 年），當時「大部分人員都是退伍軍人或軍人轉文職」。³⁹張炎憲進入國史館時，正值黃季陸館長調整人事與發展國史館業務的初期，由此可間接了解到此前羅家倫館長時代，受過正規史學訓練的人才亦相當稀少。

表 10 國史館人員簡歷表（1965 年）

職稱	姓名	性別	出生年	籍貫	學歷	經歷
館長	羅家倫	男	1897	浙江紹興	國立北京大學	中央政校教育長、清華、中大校長、駐印度大使、考試院副院長
纂修	陸徵麒	男	1897	廣西桂林	國立北京大學商學士	行政院善後經濟總署專門委員、膠濟鐵路管理局教育股主任、師大附中國文教師
	歐陽鶯	男	1914	江西興國	馮庸大學、西藏拉薩哲邦寺果茫扎倉學院	光復大陸會兼秘書、國立政治大學兼教授、省立師範大學兼教授
協修	孫葆	男	1908	安徽蕪湖	燕京大學研究院、光華大學文學院	天長縣初中教導主任、國民政府文官處編審、總統府編審、臺灣省政府專門委員
	孫常煒	男	1924	浙江天臺	浙江大學畢業	省立新竹中學教員、省立高雄中學導師、陸軍官校副教授
	張則貴	男	1912	北平市	日本京都帝國大學	臺灣大學副教授、國語推行委員會視導
助修	陳勤	男	1931	福建林森	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	基隆市立中校教員、桃園省中教員
主任秘書	許師慎	男	1907	江蘇無錫	江蘇公立商專	立法院科員、中央黨部黨史會科長、監察院秘書
秘書	熊守暉	男	1930	湖北黃陂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	臺中省立二中教員
史料處處長	倪寶坤	男	1903	南京市	金陵大學畢業	中央政治學校組長、國立政治大學副教授、內政部專門委員、省立師範大學社教系教授
徵校處處長	歐陽鶯 (兼)	男	1914	江西興國	馮庸大學、西藏拉薩哲邦寺果茫扎倉學院	光復大陸會兼秘書、國立政治大學兼教授、省立師範大學兼教授
總務處處長	王藹雲	男	1906	浙江杭縣	浙江公立法政專學畢業	國立中央大學秘書、新疆監察使署科長、臺灣省教育廳專門委員
主計室主任	王俊	男	1926	湖北黃岡	臺灣省立行政專校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書記官會計

³⁸ 據陶英惠所述，熊守暉是其臺大歷史系的同班同學，他們還有一位同班同學，即知名學者李敖，三人曾一同在「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輯委員會」工作一段時間。陶英惠，〈在國史館服務雜憶〉，頁 255、258。

³⁹ 〈張炎憲接國史館長 反對修國史〉，《聯合報》，2000 年 5 月 24 日，第 14 版。

						主任
人事室主任	張公衡	男	1916	河北河間	國立西北大學畢業、中央訓練團黨政班結業	河北省黨部秘書、河北省社會處科長、省立建中總務主任、行政院國民住宅興建會專員
科長	王新盤	男	1921	南京市	成美中學畢業、軍需學校畢業	財政部國庫署科員、陸軍裝甲兵司令部經理處副處長、福利事業總管理處副主任
	趙牖文	男	1911	遼寧海城	中央政治學校畢業	中央政治學校訓導、內政部科長、省立新竹中學教員
	孫森	男	1909	河北定縣	北平民國大學畢業	南京警衛部書記、空軍第三供應處文書官行政官
科員	盧象璧	女	1923	南京市	上海大同大學肄業	南京鍾英中學教員、臺灣省教育廳科員
	楊豔昌	男	1909	甘肅渭源	隴西中學畢業	寧夏保安司令部軍需寧夏捐揮所科長、臺灣高法院錄事
	唐元甫	男	1923	湖南邵陽	嶽雲中學畢業	湖南清縣縣政府科員、浙江孝豐縣政府科員
	何繼曾	男	1924	山東惠民	濟南中學畢業	山東商河縣政府科員、山東臨淄縣政府科員、考試院雇員
書記官	趙慶鑒	男	1922	山東利津	山東省立惠民中學畢業	十九軍官隊隊員、第二綏區司令部文書股股員、聯勤分區司令部文書員
	陳鈞廉	男	1926	山東歷城	濟南縣黎明中學畢業	榮民醫院人事管理員、大同農場人事管理員
雇員	蕭良章	男	1931	湖南邵陽	安徽省立鳳臺師範畢業	初任雇員

資料來源：〈國史館現任人員簡歷冊（1965年3月1日）〉，《總統府》，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11000001856A。

事實上，羅家倫就任館長後，緊要任務是先安排各處的行政主管，方能支援修纂單位，兩者互相配合，因此約莫花半年時間找尋適合人選。從以上名單來看，這些人多為羅家倫的舊識，曾與其共事過，部分則由其他機構調派。例如首位主任秘書許師慎，其為黨史會的資深員工，也是監察院院長于右任的秘書，善於速記且熟悉民國史料，是國史館最高級的行政幕僚，館內行政事務多由他負責處理；總務處處長王藹雲，早在大陸時期便一路跟隨羅家倫，曾協助其完成艱鉅的中央大學遷校任務，是羅家倫的重要副手；史料處處長倪寶坤畢業於金陵大學圖書館學系，著有《檔案管理學》一書，曾任政治大學圖書館館長，羅家倫應是在政治大學兼課期間與他結識，⁴⁰希望借助其專長管理圖書檔案。⁴¹徵校處處長由英文能力佳的留美碩士郁鳳岐接任，因羅家倫相當重視外文史料的編譯，不久郁鳳岐

⁴⁰ 羅家倫於1954年11月至1958年2月間應聘為國立政治大學研究部兼任教授，教授民族主義課程。劉維開編著，《羅家倫先生年譜》（臺北：國民黨黨史會，1996），頁285。

⁴¹ 林滿紅訪問，曹慧如紀錄，〈復館初期的國史館—李雲漢先生訪問記錄〉，頁116；簡笙簧口述，田南萍、洪宜楨紀錄整理，〈羅家倫館長時期國史館同仁群像（一）〉，頁189、190。

便調至外交部，改由纂修歐陽鷺兼任該處處長。⁴²由上可知，至少在行政主管方面，羅家倫用人有一定的標準，會考量於其專長是否能配合國史館業務需要，並非隨意找人安插職位。

最大的困難在於缺乏史學專業的人才，尤其是民國以後的近代歷史方面。羅家倫雖找來姚從吾、李濟、李宗侗、蕭一山、毛子水、全漢昇、凌鴻勛、劉詠堯、廣祿、郭廷以等多位來自臺大與中研院的知名學者擔任國史館的史料審查委員會委員，協助國史館審查史料並提供修史意見。⁴³然而國史館內有能力寫史的人才不多，委員之一的郭廷以曾在日記中感嘆：「下午出席國史館史料審查會，商抗日戰爭實錄軍事篇。志希師有其計劃與看法，惟缺乏切實工作之人才，參加會議者又多一知半解，喜放言高論，不切實際，真不知如何做去。」⁴⁴

國史館為公家機關，礙於制度限制，不論纂修、協修或助修，皆須具備公務員身分，否則只能雇用，無法升遷。如此一來，許多初入社會的青年學子被拒於門外，即便有機會入館也不願久待。以中研院近史所退休研究員陶英惠為例，他曾在國史館短暫服務三年（1961年5月至1964年6月），期間曾參加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但未及格，因此只能在館內擔任職位最低的雇員，無法升遷，後來中研院近史所籌備處主任郭廷以有意延攬他加入近史所，因而決定辭職：

當時近史所有福特基金，待遇較一般機關好，工作亦屬單純，自然令人嚮往！我因沒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在國史館無法升遷，如果當一輩子雇員，總是有點心有未甘！近史所為一學術研究單位，只看學歷及研究成績，沒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的限制。如能到近史所工作，當可解決我所面臨的一大難題。⁴⁵

陶英惠的想法也許是許多人的心聲，前面提到的熊守暉後來也離開了國史館去美國發展。⁴⁶但人才獲致不易，因此羅家倫最初不願放行，直至郭廷以親自上門與他懇談，且明瞭陶英惠辭意堅決後，始同意批准辭呈。此事反映了國史館受限於

⁴² 簡筌簧口述，田南萍、洪宜嬪紀錄，〈羅家倫館長時期國史館同仁群像（一）〉，頁190。

⁴³ 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頁261。

⁴⁴ 郭廷以，《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頁112。

⁴⁵ 陶英惠，〈在國史館服務雜憶〉，頁268。

⁴⁶ 林滿紅訪問，曹慧如紀錄，〈復館初期的國史館—李雲漢先生訪問記錄〉，頁116。

公務體系，難以留住專業人才，反倒成為青年學子踏入其他研究機構的跳板。

羅家倫也深知一般公務人員難以承擔修史工作，因此曾擬定「國史館聘任纂修遴聘規則草案」，對聘任纂修的資格加以限制，於 1958 年 8 月經考試院通過公布施行。⁴⁷根據該規則，無論是國內外的大學教授、研究院所的研究員，抑或是館內的簡任協修，皆需有特殊著作或學術貢獻，才能取得「聘任纂修」的資格。因此像是纂修歐陽鶯、陸徵麒皆是依循該規則，分別著有《大旺調查記》、《中華民國中央政治沿革史》，經由中央研究院審查通過後，得以獲聘為纂修。⁴⁸

但也有例外，如纂修柳長勛，畢業於中央大學地理系，因無中研院審查通過的著作，所以最初國史館是以「兼任纂修」的名義聘任之，國史館人員簡歷表中也因此未列出他的名字，直至 1967 年 9 月才合格實授簡任八級的纂修身份。1970 年立法院廢除〈聘用派用管理條例〉後，羅家倫制定的「國史館聘任纂修遴聘規則」也一併失效。⁴⁹由上可知，羅家倫希望藉由纂修資格的限制，聘任具有專業的人才，但從他聘任的人員來看，這些人皆非史學專業出身。

羅家倫館長期間，還有一大難題，即館內人員意見不合、人事管理成效不彰。國史館人員稀少卻「人少是非多」。羅家倫曾囑咐主任秘書許師慎調解糾紛未果，而與之長談，希望他能「敏於事而慎於言」，從後續事件來看，應和人員考績有關。⁵⁰另外，人事單位對於職員的出缺勤時間亦未嚴格管理。根據陶英惠的回憶，當時上下班的簽到簿就放置在大門附近的小房間內，館內人員可隨時去簽名，纂修陸徵麒「基本上不會去簽到簽退」，多請他的工讀生拿印章一次蓋滿一週。⁵¹甚

⁴⁷ 簡筌簧口述，田南萍、洪宜嬪紀錄，〈羅家倫館長時期國史館同仁群像（一）〉，頁 186。

⁴⁸ 不過兩人進入國史館的管道不同。歐陽鶯為黃教喇嘛，堪稱「臺灣藏學之父」，入國史館前，曾在臺灣南部的國、高中擔任英文教師，也曾任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委員兼秘書，後在政治大學邊政系教授西藏語文和西藏史，其於大陸時期便與當時的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有所往來，曾協助搜查西藏情資，入國史館後亦在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兼課，教授佛學概論；陸徵麒原本在師大附中教授國文，後經由臺大教授姚從吾的推薦，調至國史館擔任簡任協修。蕭金松，〈歐陽無畏教授（君庇亟美喇嘛）的學術貢獻與影響〉，《蒙藏季刊》，20：1（臺北，2011.4），頁 59、66；簡筌簧口述，田南萍、洪宜嬪紀錄，〈羅家倫館長時期國史館同仁群像（一）〉，頁 186。

⁴⁹ 陶英惠稱柳長勛為湖南才子，據其親耳聽聞柳氏所言，其曾繪製一本有關中國人文地理的書籍，請他的老師、時任教育部部長的張其昀審閱，事後張其昀卻以自己的名字逕行出版，讓他相當無奈。陶英惠，〈在國史館服務雜憶〉，頁 265；簡筌簧口述，田南萍、洪宜嬪紀錄，〈羅家倫館長時期國史館同仁群像（一）〉，頁 187-188。

⁵⁰ 羅久芳、羅久蓉編，《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頁 630、632、636。

⁵¹ 陶英惠，〈在國史館服務雜憶〉，頁 266。

至還有職員「十一時尚未到館辦公」，羅家倫對此頗感無奈。⁵²此外，亦有底下人員不配合主管，計畫難以執行者。羅家倫曾計畫編纂中華民國大事記，但無法推動，因此只好請主任秘書許師慎兼任纂修，與陸徵麒共同合作，但最後也沒有具體成果。⁵³

黃季陸館長上任後，致力於「提高修纂人員的素質」，「促進館內人員的新陳代謝」。先是與考試院洽談，在公務人員甲種考試中增設「史料編纂與管理人員」一科；復於 1973 年函請考試院同意，於是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增列「史料編纂人員」，一次錄取 30 名具有史學專長的青年，當中即包含後來的國史館館長張炎憲（名單見表 11）。雖然該次錄取人員及至 1979 年為止，僅剩三分之一仍在館內工作，但國史館整體職員的專業素質確實有所提升。⁵⁴

表 11 全國公務人員高考—首屆史料編纂科錄取名單（1973 年）

優等（5 名）	石萬壽	陳俊夫	梁惠錦	劉筱齡	曾華璧
中等（25 名）	張炎憲	蔡學海	林聖芬	丁崑健	黃秀政
	王芳礪	劉芳銘	李康成	卓遵宏	賴榮三
	江錫賢	余雪聰	施薰滿	李志仁	徐明星
	洪喜美	張淑娟	謝培屏	郭鳳明	吳瑞櫟
	葉淑娥	劉德美	陳怡禎	簡笙簫	葉飛鴻

資料來源：〈六十二年全國性公務人員高考錄取名單〉，《中央日報》，1973 年 11 月 18 日，6 版。

然而，當時「甲等特考」的錄取方式卻頗具爭議。此因通過「甲等特考」者，可直接以簡任十職等任用，僅限學界可以參加；1986 年以後卻大幅放寬資格，因此被外界批評為「權貴進入公務體系的後門」。⁵⁵國史館內，的確有不少行政主管與纂修係透過該管道得以升遷，如曾任主任秘書的李雲漢、徵校處處長兼纂修遲景德、纂修賴賢、洪桂己等，皆是 1979 以前考試及格者。⁵⁶朱匯森館長上任後，亦分別於 1986、1988 年舉辦甲等特考，錄取者包括後來的纂修陳孟堅、史料處

⁵² 羅久芳、羅久蓉編，《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頁 668。

⁵³ 簡笙簫口述，田南萍、洪宜填整理，〈羅家倫館長時期國史館同仁群像（一）〉，頁 189。

⁵⁴ 蕭良章，〈十年來人事業務之檢討〉，收入國史館秘書室編，《復館以來的國史館》，頁 135、137。

⁵⁵ 〈甲考過關 直升 10 職等〉，《聯合報》，2010 年 1 月 4 日，第 A8 版。

⁵⁶ 郭鳳明，〈近年來本館同仁的進修與研究〉，收入國史館秘書室編，《復館以來的國史館》，頁 165。

處長簡筌簑，及主任秘書兼副館長朱重聖。⁵⁷姑且弗論上述人員對國史館的付出與貢獻，單純從這角度來看，此一時期館內人員的升遷與高考制度的調整或者不無關係。

整體而言，羅家倫館長時期草創維艱，工作環境克難，史料、經費、人才皆相當不足，加上制度的限制及人事問題未有效管理，致使修史工作成效有限，以國史館內職員的話來說，可謂國史館的「開創期」；1970年代以後，雖「國際上姑息主義猖狂熾烈」，然國內經濟發展快速，在黃季陸館長的改革下，工作環境明顯改善，經費與職員的數量、素質亦有所提升，使國史館進入「發展期」。⁵⁸

第二節 戡亂復國與國史編纂

每逢國家重要節慶或政治領導人物誕辰及逝世週年，政府往往會與民間合作，發起相關活動以茲慶祝或紀念。其中，舉辦學術活動也是常見的方式，通常會配合特定日期出版相關文獻或舉辦演講、研討會及展覽，因此學界將這種配合國家節日而舉辦的學術活動稱為「慶典學術」。⁵⁹如中華民國建國 50 年有《開國文獻》、《國父百年誕辰紀念叢書》；建國 60 年有《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元年 1-6 月)》、《中華民國建國六十周年紀念論文集》；建國 70 年有《中華民國建國史》、《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中華民國建國七十年紀念叢書》；建國 80 年有《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學術討論集》、《建國八十週年紀念中正先生學術叢書》、「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一屆討論會」；建國 100 年時更擴大舉辦一系列的展覽、學術演講，以及提出《中華民國發展史》的撰寫計劃等。⁶⁰

這些出版品的編纂主導機構不一，就戒嚴時期而言，多來自黨史會、國史館、國防研究院及教育部等黨政機構。職是之故，戒嚴時期國史館的修史工作多是圍

⁵⁷ 〈公務人員甲等特考錄取名單〉，《中央日報》，1986 年 6 月 28 日，2 版。總統馬英九亦是於此年錄取普通行政人員行政組；〈今年甲等特考錄取名單〉，《中央日報》，1988 年 11 月 18 日，12 版。第一試名單，錄取 2 名：朱重聖、王正華；〈七十七年特種考試公務人員甲等考試榜單〉，《考選周刊》，1989 年 1 月 3 日，4 版。僅錄取「優等壹名 朱重聖」。

⁵⁸ 蕭良章，〈十年來人事業務之檢討〉，收入國史館秘書室編，《復館以來的國史館》，頁 134。

⁵⁹ 周惠民，〈傳承與轉型：「《中華民國發展史》撰寫計畫」簡介〉，《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3：1（臺北，2011.12），頁 4-5。

⁶⁰ 中華民國建國 90 年時，因政黨輪替，官方未有特別慶祝活動。吳淑鳳，〈遷臺後國史館的昔與今〉，頁 30；周惠民，〈傳承與轉型：「《中華民國發展史》撰寫計畫」簡介〉，頁 4-5。

繞著中華民國及其相關重要事件與人物來開展，一方面是為了配合慶祝或紀念與中華民國有關的特定節日，另一方面也有向海內外宣傳國民黨政府的功績，維護中華民國的統治正當性以及與中共進行學術文化上爭勝之意味。

一、反共抗俄與開國五十年文獻

1950 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的第一個元旦，尚處於下野狀態的蔣中正向全臺人民發表〈告全國軍民同胞書〉。蔣氏以國父孫中山的繼承者自居，開頭便稱中華民國正遭遇開國以來最大的國難，中華民族亦面臨前所未有的變局，不僅國土受「外族異俄的侵略」，國號亦被其「傀儡漢奸朱毛污毀」，億萬同胞皆「淪陷在黑暗的共產國際鐵幕」中，值此國家民族存亡之際，身為「自由中國」的同胞，應團結一致、共同奮鬥，擔負「救國家」、「爭自由」、「維護歷史文化」的責任，完成「反共抗俄，救國保種的神聖使命」，使民族復興。⁶¹

此番慷慨激昂、充滿民族大義的類似字句，在往後每年的元旦文告與蔣中正的公開演講中反覆出現。「反共抗俄」、「反攻復國」、「民族復興」成為戒嚴時期國民黨政府一貫的口號與既定方針。不過，中華民國政府是否是唯一的中國代表，其是否合法取得臺澎金馬等島嶼的主權，在國際上仍有相當多的爭議。隨著韓戰爆發，美國政府秉持「臺灣海峽中立化」的政策，以「臺灣地位未定論」的立場派遣第七艦隊駛入臺灣海峽，試圖維持臺海現狀。此舉雖使風雨飄搖的國民黨政權轉危為安，但也讓中華民國政府「一個中國」的主張充滿矛盾，蔣中正「反攻大陸」的美夢也遭致封鎖，反映了國民黨政權的對外政策深受美國態度的影響，其外部正統性其實相當脆弱。早在 1950 年代後期，臺灣島內的知識分子及政府官員便已體認到武力反攻大陸難以實現。⁶²

即便如此，總統蔣中正仍宣稱「局部的正義戰爭，可以贏得全面的和平」，不願放棄軍事的隔空較勁。1961 年，在中華民國開國五十週年的元旦布告上，蔣氏再次強調臺灣為反共復國的基地，抨擊「臺灣問題」、「兩個中國問題」及「聯

⁶¹ 秦孝儀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三十二卷》（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4），頁 244、249-250。

⁶² 薛化元，〈中華民國與臺灣國家定位的再檢討—以「兩國論」為中心的討論〉，收入現代學術專刊編輯委員會編，《戰後臺灣歷史省思》（臺北：稻香出版社，2004），頁 26-29；若林正丈著，洪金珠、許佩賢譯，《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臺北：月旦出版，1994），頁 86、88。

合國席次問題」皆為荒謬邪說，始終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⁶³

為了維持政權的安定，強化中華民國政府內外部的正統性，蔣中正主張擴大慶祝中華民國開國五十週年，並在 10 月 10 日國慶日當天宣告反攻復國的三大行動指標：一為爭取反共革命的勝利，保證復國建國的成功；二是朝倫理、民主、科學方向，重新建設；最後目標是消除共產匪禍，實現三民主義。⁶⁴

羅家倫亦認為國民黨是開國、救國的黨，「黨史與國史早就成為不可分的現象」。早在 1952 年時，他便主張應儘速徵集反共抗俄的史料。⁶⁵因此，1961 年中華民國開國五十週年時，有鑑於中共方面曾印行材料不完備、立場偏頗的《辛亥革命》，羅家倫乃擬定「編纂開國五十年文獻計畫」，欲結合國史館、黨史會及相關機關的人力與物力，一同收集、研討、編輯、選印在臺的公私檔案和記錄，一方面作為提供海內外史學研究的參考材料，另一方面當作為將來國史館纂修「開國實錄」的張本。擬好計畫後，羅家倫與同為黨史會委員的陶希聖洽商，共同將該計畫簽報總統蔣中正，並獲得批准。⁶⁶嗣後，國民黨中央決定成立「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以下簡稱「開國文獻會」），正式展開文獻收集與編印工作。

雖然開國文獻的編纂計畫是由羅家倫提出，不過實際主持該計畫的人是主任委員陶希聖，羅家倫擔任副主委。曾參與該計畫的陶英惠指出，開國文獻會的成員多為陶希聖的同鄉、親戚、同僚與部屬，國史館人員除了羅家倫館長外，只有他和他的臺大同學熊守暉。⁶⁷

眾所周知，陶希聖為研究中國社會史最具代表性的史家之一。其以「社會史觀闡釋三民主義與國民革命」，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建立了革命的理論基礎，從思想文化上幫助國民黨左派批駁了中共的社會革命和階級鬥爭革命路線，從而引發了 1932 年後影響中國史學發展深遠的中國社會史論戰。⁶⁸更重要的是，有人

⁶³ 秦孝儀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三十三卷》（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4），頁 270、273。

⁶⁴ 秦孝儀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三十三卷》，頁 288。

⁶⁵ 羅家倫，〈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概況〉，收入羅家倫先生文存編輯委員會，《羅家倫先生文存（二）》，頁 438。

⁶⁶ 羅家倫，〈民國五十年大事述要〉，收入羅久芳、羅久蓉編，《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頁 665。

⁶⁷ 陶英惠，〈在國史館服務雜憶〉，頁 258。

⁶⁸ 陶希聖主要探討中國歷史上的社會結構問題，提出兩大史論—「商業資本論」及「士大夫階級論」，認為中國的商業與生產各自發展，不利於國內經濟的統一，反倒產生同時掌握經濟與政治的士大夫階級，他們為了維持自身利益，依附軍閥、擔任西方帝國主義的買辦，使中國直到

認為，他為蔣代筆之《中國之命運》一書。⁶⁹因此，蔣中正屬意由陶希聖來領導該計畫，用意至為明顯。該計畫一開頭即清楚地表明：

開國五十年文獻之編印，係將五十年國民革命之艱辛歷程，與建立民國以後實踐三民主義之事蹟，作有系統的介紹，以擴大國內外之宣傳，並在文化思想上予共匪及變造偽造歷史者以嚴重之打擊。

.....

為求以原始文獻，舉事實真相，以達成宣揚開國五十年來革命之偉績，維護國家法統，與匪偽在文化思想上作堅決之鬥爭起見，凡有關資料，均同時搜求，詳加考訂，並傍及美、日等國之文書，多方印證。⁷⁰

說明了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向國內外宣傳孫中山領導中國革命的歷史，在學術文化上與中共進行對抗，確定國民黨在中國近現代史中的革命領導地位，以維護中華民國的法統。

事實上，中共在建國後便積極以政治力量干預學術工作，尤其在史學方面，於 1957 年至 1963 年期間展開「史學革命」。在中共政策的指引下，中國的史學工作者以「厚今薄古」與「先紅後專」兩大原則，根據現實的政治需要，結合革命與史學，從中共的立場，依據馬克思主義重新解釋中國的歷史。⁷¹在此期間，中共編印了大量有助其宣傳的「中國近代史料叢刊」，提供海內外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術機構進行相關研究。該叢刊除了以階級鬥爭和農民革命的觀點詮釋「太平天國」和「辛亥革命」，對容共、清黨、北伐、抗戰等事件亦多重新詮釋。使國民黨奉行的三民主義、國民革命及中華民國國體與法統受到嚴峻挑戰。為了避免中共史料「混淆國際社會之觀聽」、「損害我國家與革命之榮譽」，羅家倫、陶希聖等國民黨人決定系統地編纂開國文獻，藉以昭告世界「我革命開國、討袁護

清末仍停留在封建社會，地方缺乏對中央的向心力，因此陶希聖反對會繼續造成國家分裂的社會革命或階級鬥爭，相反的，他主張應有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領導國家發展工業，完成中國經濟和政治的整合，如此國家才能統一，免於外國的干涉。參見陳惠芬，〈抗戰前陶希聖的中國社會史研究〉，《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學報》，3（臺北，1995.7），頁 141、145、151-153。

⁶⁹ 相關的討論參見：陳進金，〈現代中國的建構：蔣介石及其《中國之命運》〉，《國史館館刊》，42（臺北，2014.12），頁 31-62。

⁷⁰ 〈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計畫〉，收入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頁 234、235。

⁷¹ 秦孝儀，〈對中共編寫「中華民國史」及其相關問題之研究〉，頁 6。

法、容共清黨，以至北伐剿匪、訓政建政、全民抗戰之真實史蹟」，以「打擊共匪偽造歷史之歪曲宣傳」，收「與共匪作文化鬥爭」之效。⁷²由是之故，最初為了慶祝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周年而擬定的計畫，遂成為國民黨政府反共抗俄政策的一環。

自 1961 年 10 月至 1967 年 6 月止，開國文獻會總共出版了《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及其附錄—《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共匪禍國史料》等三部史料彙編，並另外編印《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畫史》、《臺灣畫史》及《開國文徵》等宣傳畫冊與影印手稿。其中，《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以下簡稱「開國文獻」）為該計畫最重要的編纂成果，原計畫分三階段，編印「革命之起因與民國建立」、「國體之維護與國家之統一」、「抗戰建國與反共復國」等各時期的重要文獻，不過因史料分散蒐集不易，且資料整理、考證及補充皆需要時間，加上日後經費不繼，最後僅完成第一階段的編印工作（各冊目錄見表 12）。⁷³

表 12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書目

第一編 革命源流與革命運動		
冊別	書名	備註
第一～二冊	革命遠源（上）、（下）	
第三～六冊	列強侵略（一）～（四）	
第七～八冊	清廷之改革與反動（上）、（下）	
第九～十冊	革命之倡導與發展—興中會（一）～（二）	
第十一～十六冊	革命之倡導與發展—同盟會（三）～（八）	
第二編 辛亥革命與民國建元		
第一冊	武昌首義	
第二冊	開國規模	
第三～五冊	各省光復（上）、（中）、（下）	

資料來源：整理自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頁 242-244。

《開國文獻》收錄的史料範圍涵蓋「滿清」入關到中華民國建立為止。不同

⁷² 〈開國五十年文獻序〉，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編，《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總目》（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9）；〈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節略〉（1964 年 4 月），收入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頁 238、240。

⁷³ 〈開國五十年文獻序〉，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編，《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總目》；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頁 234、240。

於以往多以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史論述的起點，該文獻將革命的源流一舉追溯自「滿清」入關。該書首章從明宗室出發，強調清朝入關後各地的抗清活動；接著為清廷的懷柔與高壓政策、民族思想之鉗制、反清復明之思想淵源與秘密組織；再次為列強的侵略與中國失權，在首將帝俄列為侵略中國的開端，嗣後陸續列出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中法戰爭、中日交涉、甲午戰爭等列強侵略；進而即為革命活動、各省光復與起義等重大歷史事件。⁷⁴

此一敘事策略，實際上亦是配合當時的現實政治需要。該書以漢人中心民族主義的觀點，企圖形塑清朝入關以來中國便不斷遭受異族侵略，帝俄更是從康熙皇帝時期就開始逐步侵占中國國土的形象。國父孫中山領導革命，推翻專制的滿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的中華民國，是為了國家民族的生存與自由而奮鬥，有其革命的正當性。今日的中共淪於蘇俄的傀儡，作為繼承孫中山革命精神的國民黨，當應負起民族復興的使命，繼續領導國民革命，將三民主義的理念付諸實現。

值得注意的是，臺灣也被納入此一革命敘事內，成為中國革命的協力角色與中國的邊陲一省。《開國文獻》中，自清朝入關後，臺灣便被納入「閩臺抗清運動」的範疇，尤其強調鄭成功在臺從事反清復明的軍事活動，即便後來鄭氏滅亡，臺灣地區仍陸續爆發朱一貴、林爽文、戴潮春等反清事件。隨著中日甲午戰爭，清朝戰敗，臺灣人民反對被割讓給日本，成立臺灣民主國，卻不幸失敗。孫中山在華南從事革命運動時，曾在臺籌畫惠州起義，而在辛亥革命各省光復時，臺灣即使在異族「殖民」下，仍有羅福星等人響應中國革命。⁷⁵這種將臺灣歷史與中國革命做連結，強調臺灣亦是試圖深化臺人的中國認同，將臺灣塑造為反共抗俄的復興基地，藉以鞏固其黨國體制的一種策略。

大體言之，《開國文獻》的編印並非單純的學術工作或配合國家節慶，而是另有其現實的政治需要。透過公布篩選、編排過的史料，建構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和中共作思想文化鬥爭。雖說「開國五十年」，該文獻所輯，實多為 1912 年中華民國成立以前屬於中國近代史範疇的史料；1912 年之後的相關文獻僅編印三冊的《共匪禍國史料》和九冊的《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前者為研究中共黨史所需的秘本；後者為與外交部合作編輯的國民政府北伐以後的中日關係史料，包含九一八事變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華民國與日本簽訂的中日和約等相關

⁷⁴ 〈目錄〉，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編，《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總目》。

⁷⁵ 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編，《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總目》，頁 16-17、39、92-94、178、424-425。

文獻。⁷⁶

二、國民革命與國父百年誕辰學術論著

孫中山偉人形象的詮釋亦是國共兩黨爭奪正統的一項政治策略。單就國民黨而論，早在孫中山逝世、國民革命軍完成北伐後，國民政府便展開孫中山崇拜的建構工程。國民黨藉由制定一系列的紀念日，凸顯孫中山的個人形象與事蹟，將其塑造為革命偉人，尊其為「國父」，國民黨則將繼承其遺志，繼續領導國民革命，早日實現中國的統一。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國民黨除了繼續尊奉國父孫中山，在 1960 年代以後，更視其為「黨國之父」、「中華文化復興者」，藉由結合三民主義與被國民黨重新定義的中華文化，將孫中山塑造為中華文化的傳人，使中華民國成為兼具法統與道統的正統中國。每逢孫中山的誕辰，國民黨中央往往會舉辦相關的紀念活動，並陸續建造中山樓、中山博物院（今臺北故宮）、國父紀念館等中國宮廷式建築，作為在臺灣「重建孫中山的記憶場域」。⁷⁷

如果說 1966 年 11 月 12 日開始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是國民黨政府正式展開全國性精神動員的標誌，⁷⁸那麼前一年盛大舉行的「國父百年誕辰紀念」或許可視為最重要的提前暖身，為隔年的文化復興運動打下了基礎。

早在 1963 年 8 月，國民黨在第八屆中常會第 463 次會議時，便決定由立法委員張道藩、教育部部長黃季陸擔任召集人，成立「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小組」，研討各項紀念辦法及要點。隔年 9 月 1 日，正式成立「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父百年誕辰籌委會」），籌辦紀念大典的相關事宜，由蔣中正擔任名譽會長，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總幹事分別由總統府資政王雲五、立法委員張道藩、國民黨副祕書長郭驥擔任。⁷⁹1965 年 11 月 12 日，孫中山百年誕辰紀念日當天，蔣中正發表〈國父百年誕辰紀念文〉一文，指出國

⁷⁶ 〈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節略〉，收入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頁 239。

⁷⁷ 周俊宇，《黨國與象徵—中華民國國定節日的歷史》（臺北：國史館，2013），頁 118、275、277、279、282、285、287、291、294；林果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之研究（1966-1975）〉，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研究部碩士論文，2001，頁 45。

⁷⁸ 林果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之研究（1966-1975）〉，頁 1。

⁷⁹ 國父百年誕辰紀念實錄編輯小組，《國父百年誕辰紀念實錄》（臺北：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1966），頁 2、7、323。王雲五時任臺灣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張道藩時任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

父孫中山傳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統，其本人繼承國父遺志，以實行三民主義，發揚中國歷史文化，掃除共匪叛亂，完成國民革命為己任。⁸⁰將孫中山、三民主義、國民革命與中國歷史文化的發揚做了連結。

國父百年誕辰紀念活動的宣傳對象包含全臺民眾、外國政要及海外歸國華僑。當天在總統府前除了舉行隆重的紀念儀式，還有盛大的閱兵典禮、音樂、戲劇、舞蹈等各種表演及大遊行，各地方政府亦同時響應，配合舉辦有關國父及革命歷史的演講比賽與體育競賽。新聞廣播媒體也不斷地向全國放送孫中山革命偉人的形象及事跡，人們對孫中山的敬意油然而生。以上種種作為皆在增強臺灣人民對國父及中華民國歷史的理解與認同，重塑國人的集體記憶。因此，國父百年誕辰紀念活動的盛大舉辦不僅可作為繼承國父革命精神、擁有國家主權的象徵性宣示，也是一場學校以外的全國性社會教育。

除了引人矚目的動態紀念活動，尚有靜態層面的宣傳形式。事實上，國父百年誕辰籌委會規劃的紀念事項共有五大要點：一、建築國父紀念館；二、協助僑胞整修國父海外故居；三、編印有關國父學說史蹟論著；四、籌募中山文化基金，鼓勵學術文化事業；五、舉辦體育、漢學、科學有關活動或國際性學術會議。⁸¹由上可知，建造整修紀念建築、推廣研究國父思想實為該紀念活動的兩大主軸。各項紀念活動動員甚廣，除中央黨政機關及地方各級政府全部投入外，尚包含各界的工商、文教、傳媒、宗教及海外華人團體，幾可說是全國性動員的國家慶典。

依據國父百年誕辰籌委會的組織規程，該會設有慶典活動籌劃、紀念館建築、學術論著編纂及經費籌募等四個委員會及總務、會計二處。⁸²四個委員會中，以慶典活動籌畫委員會的規模最大，負責項目也最為龐雜，包含慶典、體育、學術、影劇、音樂、攝影、美術、文藝、舞蹈、宗教、民間游藝、青年、婦女、新聞與秩序等各種動態的活動項目。⁸³建築方面，以國父紀念館的建造為重點。值得一提的是，國父百年誕辰紀念日當天，除了舉行國父紀念館的奠基儀式，亦同時舉辦中山博物院（即今日臺北故宮博物館）的落成典禮，將孫中山的誕生與中華文化的傳承連結，呼應國民黨將孫中山革命思想做為繼承儒家文化道統的主張。

⁸⁰ 蔣中正，〈國父百年誕辰紀念文〉，收入國父百年誕辰紀念實錄編輯小組，《國父百年誕辰紀念實錄》，頁 1-4。

⁸¹ 國父百年誕辰紀念實錄編輯小組，《國父百年誕辰紀念實錄》，頁 13。

⁸² 「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組織規程」（1964 年 9 月 1 日），〈任行政院長時：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等件〉，《嚴家淦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06000000223A。

⁸³ 國父百年誕辰紀念實錄編輯小組，《國父百年誕辰紀念實錄》，頁 14-15。

學術論著方面，由國史館館長羅家倫擔任學術論著編纂委員會的召集人，國民黨中央第四組主任（負責文宣）謝然之擔任副召集人，另有委員十三人，不乏來自國民黨黨報的重要關係人物，如楚崧秋為《中華日報》的社長、崔垂言為《中央日報》的主筆、何浩若為《中央日報》的創辦人、副主委謝然之為《臺灣新生報》的董事長，另外如清史研究大家蕭一山，師大、政大講授三民主義的教育界學者，以及國民黨內熟悉孫中山政治思想的專家皆包括在內。⁸⁴

該會所擬定的編印計畫包含：一、國父著述及闡揚國父思想之著述；二、國父傳記；三、先烈先進傳記及遺著；四、國民革命史；五、闡揚國父政治經濟社會等學理之著作；以及六、後來增加的編撰詩歌樂章等六大項目。⁸⁵主要運用的史料來自黨史會與國史館所藏，資料不完整的地方，則向各大圖書館查閱搜求，或向私人商借影印，尚有不足，則利用黨營媒體，登報徵求私人蒐藏。同樣地，部分國父思想的學術論文及紀念歌詞也是以登報的形式公開徵求，經過兩次以上的審查，最後錄取者可獲得一千元至五千元不等的獎金。⁸⁶

從表 13 可以看到，該會所編印的出版品共有十三種。前六種皆是與孫中山個人事蹟及其政治思想有關的書籍，第七至第九種則是國民黨的革命先烈先進相關詩文論著，第十和十一種為國民革命歷史的著作，最後兩種則為國內外專家學者，以及前述透過公開徵求審查通過的學術論著與紀念樂章。整體而言，該會編印的資料以人物為主，事件為輔，圍繞在孫中山、革命先烈先進與國民革命這三個主題，彰顯孫中山作為革命的先行者及精神領袖，率領諸多志士推翻清政權，建立中華民國，持續進行國民革命的偉人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為了有助於各階層的民眾及海外人士能快速了解孫中山誕生以後，中華民國的肇建及政府遷臺後的在臺建設，該會特別編印《國父畫傳》、《國民革命畫史》等附有簡單文字敘述、圖像為主的通俗性著作。除了中文版外，亦翻譯成英文版發行。同時，為了凸顯蔣中正為繼承孫中山革命精神的偉大領袖，該會委託長期隨侍在蔣中正身邊，負責新聞言論，曾掌理國民黨文宣的秘書秦孝儀，由其負責整編有關蔣中正宣揚國父思想的言論著作。⁸⁷

⁸⁴ 十三名委員包含：蕭一山、翁之鏞、王鳳喈、袁世斌、孫邦正、何浩若、崔載陽、鄒文海、周世輔、崔垂言、許聞淵、楚崧秋、傅啟學。國父百年誕辰紀念實錄編輯小組，《國父百年誕辰紀念實錄》，頁 203。

⁸⁵ 國父百年誕辰紀念實錄編輯小組，《國父百年誕辰紀念實錄》，頁 203-204。

⁸⁶ 國父百年誕辰紀念實錄編輯小組，《國父百年誕辰紀念實錄》，頁 206-210。

⁸⁷ 楚崧秋，〈一位典型讀書人的凋謝—悼秦故院長孝儀逝世週年〉，《傳記文學》，92：2（臺北，

表 13 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出版之學術論著

No.	書名	冊數	備註
1	國父全集	3	以之前黨史會編印的《國父全書》為藍本增訂重編
2	國父年譜	2	以 1958 年出版之《國父年譜初稿》增訂補充；黨史會編輯（羅家倫主編，沈裕民、李振寬、蔣永敬、李雲漢等協助編輯）
3	國父墨蹟	1	內容為國父手書函電文稿、批牘、題字，附有譯文及考訂
4	蔣總統對國父思想之實踐篤行與融會貫通	1	秦孝儀主編，內容為蔣中正闡揚國父思想之言論的系統性著述
5	國父孫中山先生傳	1	傅啟學編著（黨史會副主委兼臺大政治系教授）
6	國父畫傳	1	有中文本、英文本，含照片、地圖與史畫，有簡明文字敘述
7	革命先烈先進傳	1	黨史會編輯（傅啟學主編，楊本章、孫子和協助編輯）
8	革命先烈先進闡揚國父思想論文集	3	黨史會編輯（金平歐主編），所選文章以胡漢民、戴傳賢為最多
9	革命先烈先進詩文選集	6	黨史會編選（傅啟學主編，楊本章、孫子和協助），含 12 名先烈、24 名先進，所選詩文以胡漢民、宋教仁、戴傳賢三人為最多
10	中國國民革命史	1	李守孔編著（臺大歷史系教授）
11	國民革命畫史	1	內容為 1894 年興中會成立至 1964 年在臺建設這 70 年間的歷史，共有 300 幅圖片
12	國父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	5	為徵集國內外學者專家共 166 篇論著而成，經由崔垂言、王鳳喈、崔載陽、周世輔、孫邦正等五人審查
13	慶祝國父百年誕辰紀念樂章	1	公開徵求獲得 740 首歌詞，經初審複審後，錄取 38 首

資料來源：整理自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頁 256-259。

最後，必須指出的是，該會實際的辦事成員大多來自黨史會，國史館派出的

僅有唐元甫、孫常煒、熊守暉三人（見表 14）。這些黨史會的成員，有超過半數係當初隨國民黨一同撤臺的原黨史會職員，對國民黨史相對熟悉，且有實務經驗。⁸⁸當初國史館在臺復館時，黨中央雖然允許黨史會員工自行選擇是否前往國史館，顯然絕大多數員工決定留在黨史會，或許是因為國史館草創初期，各項資源皆相當缺乏的緣故。如此一來，可資運用的史料和能夠執行編纂任務的人幾乎都在黨史會，此或可說明何以羅家倫掌理館、會時期，大部分的出版品多由黨史會所發行。再加上當時的時代氛圍，政府官員普遍認為黨史為國史的重要骨幹，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華民國，因此羅家倫時期的修史工作大抵由黨史會負責執行，國史館則為協力角色。這樣的情形到黃季陸接任館長後有了明顯的變化。由於國史館的人事、經費、設備、史料、工作內容及辦公環境皆有大幅度的調整與改善，也因此有了較為具體的工作成果。

表 14 國父百年誕辰學術論著編纂委員會職員名單

職稱	姓名	原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原服務單位
召集人	羅家倫	國史館館長	專員	林瓊瑤	黨史會幹事
副召集人	謝然之	中央委員會第四組主任	資料組組長	張恩炳	黨史會總幹事
委員兼執行秘書	傅啟學	黨史會副主委	副組長	李振寬	黨史會專門委員
秘書	沈裕民	黨史會秘書	副組長	李雲漢	黨史會編審
秘書兼秘書組組長	許師慎	國史館主任秘書	繕校組組長	楊毓生	黨史會總幹事
副組長	曾介木	黨史會總幹事	副組長	睦雲章	黨史會編審
專員	唐元甫	國史館科員	副組長	楊本章	黨史會編審
秘書兼編審組組長	金平歐	交通部專門委員	印行組組長	劉世景	黨史會幹事
副組長	蔣永敬	黨史會專門委員	副組長	項達言	黨史會幹事
副組長	孫常煒	國史館協修	副組長	熊守暉	國史館秘書

資料來源：整理自〈學術論著編纂委員會職員錄〉，收入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頁 260；

國父百年誕辰紀念實錄編輯小組，《國父百年誕辰紀念實錄》，頁 327-328。

⁸⁸ 根據李雲漢在〈黨史會七十年〉一文中所收入的 1953 年 6 月黨史會同仁的合照，當時黨史會的辦事成員有：姚薦楠、徐忍茹、居正、狄君武、王紹易、林瓊瑤、邱○○、徐文珊、崔曾植、倪澤澄、劉世景、安懷音、周紹武、楊毓生、王伯立、許師慎、項達言、沈裕民、楊本章、李治中、羅本初、杜仁玉等 22 人。李雲漢，〈黨史會七十年〉，頁 127；王文隆的〈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及其檔案遷臺〉一文，附有李雲漢回憶的早期黨史會成員名單與職稱。王文隆，〈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及其檔案遷臺〉，頁 112-113。

黃季陸是在 1968 年 8 月開始代理國史館館長，其原職是總統府的國策顧問。當時羅家倫已年過七旬，記憶力退化加上臥病在床，而請半年病假，總統府遂將其職務交由黃季陸代理。隔年 2 月，羅家倫提出辭職，總統蔣中正於是特任黃季陸為新任館長，正式接掌國史館。在黨史會主委的職務方面，羅家倫於 1968 年 11 月退休，國民黨中常會決定同樣由黃季陸接任。⁸⁹於是，國史館館長與黨史會主委的人選仍是維持黨國體制的運作模式，由同一人主持。1971 年 5 月，黃季陸響應黨中央鼓勵高齡主管依例自退而卸下黨史會主委一職，因此，實際主持黨史會的時間，僅有兩年半。

黃氏晚年大部分的時間都投入在國史館館務及中國歷史學會的學術活動上。中國歷史學會原名「中國史學會」，1943 年成立於重慶，1954 年在臺北復會，首任理事長為沈剛伯，總幹事為方豪，黃季陸則是在 1969 年至 1984 年擔任國史館館長期間，同時被選為該會理事長。據該學會前總幹事李守孔表示，中國歷史學會在臺北復會以來，「史學界大師甚多，各立門戶，學派分明」，會務遲遲無法推動，黃季陸主持以後，因其德高望重，不論在協調會員或爭取經費補助上，皆較能有效解決，使會務得以順利開展，他也曾以國史館的預算補助該會印刷《史學集刊》，而歷年舉辦的會員大會午餐亦是由國史館與黨史會共同出資。在他主持下，中國歷史學會也透過羅香林的聯絡，吸收了許多來自香港的會員，共同從事反共學術活動。⁹⁰同時，國史館仍與黨史會保持密切聯繫。1984 年 6 月黃氏辭去國史館館長，獲聘為總統府資政，隔年 4 月病逝。⁹¹

三、倡導國史研究與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黃季陸（1899-1985）是革命元老、黨國政要，早年即投入反共，黨內地位崇高。政府遷臺後，黃氏獲蔣中正重用，曾任內政部、考選部及教育部部長，任內完成召開第二次國民大會、實施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確立考用合一制度、開設大專夜間部、推廣科學教育以及促進國際文化、科學交流等多項政策。⁹²李雲漢

⁸⁹ 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頁 262。

⁹⁰ 李守孔，〈黃季陸與中國歷史學會〉，收入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黃季陸先生與中國近代史研究》（新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86），頁 437、439-440。

⁹¹ 林徵祁，〈黃季老之辦報與治史〉，收入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黃季陸先生與中國近代史研究》，頁 429、433。

⁹² 黃季陸（1899-1985），四川敘永人，自幼即隨家人參與革命，曾任小學生保路同志會會長，並

形容他「思想新穎、作風開放」；⁹³其好友國學大師錢穆則認為他是「時代人物」，也是處在「新舊夾縫中」的「文化傳統人物」。⁹⁴

黃季陸主持國史館長達十五年又四個月（1969年2月至1984年6月），是國史館在臺復館以來任期最久的館長，帶領國史館走過許多改變臺灣歷史發展的重要關鍵時刻。首先是外交方面，自1971年中華民國政府退出聯合國後，便遭遇雪崩式斷交潮，尤其是1972、1979年先後與日本、美國斷交，使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逐漸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中華民國的法統地位面臨嚴峻的挑戰；其次是內政方面，1975年總統蔣中正逝世，其長子蔣經國於1978年接任總統職位，完成國民黨領導人物的世代交替，也開啟了政治革新的新時代；經濟方面，1960年代後期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政策，以及1970年代的十大建設，不僅帶動國內經濟的大幅成長，也改善臺灣人民的生活條件，工資逐年提升，從而有餘力開始關心與參與政治社會議題。內外交迫的局勢，促使1980年代黨國威權體制鬆動，中華民國政府漸與臺灣及其附屬島嶼成為命運共同體。作為最高領導者的蔣經國總統衡量局勢變化，審慎度量政治決策，逐步導引國家邁向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中華民國政府遂逐漸從黨國威權體制轉型，過渡至民主體制。

黃季陸時代的國史館，正是處於中華民國政府逐漸喪失國際地位，國民黨政權的「法統」遭受嚴重質疑的時刻。黃氏直言，人們總是在國家發生緊急危難時，才意識到國史的重要。然而「國史」不是古蹟，而是國民共有的文化遺產，影響民族興衰甚鉅。他認為「史必自立而後人立之」，因此期許國史館能善加整理史

得孫中山接見。1915年入革命學府—上海復旦公學，與羅家倫為同班同學。1918年先後入日本慶應大學、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及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攻讀政治學，期間曾主編加拿大《醒華日報》。1923年底回國，受孫中山器重，在廣州市黨部及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內擔任重要幹部。1925年孫中山逝世，赴上海參加西山會議派，從事反共活動。1928年受戴季陶之邀，赴廣州中山大學任教，並任廣州民國日報社長。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曾任三民主義青年團宣傳處處長及四川省黨部主委。1943至1950年任四川大學校長。1950年來臺後，獲蔣中正重用，出任黨政要職，政務方面先後出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內政部長（1952.4-1954.5）、考選部部長（1958.7-1961.2）、教育部部長（1961.2-1965.1）及總統府國策顧問（1965.1-1968）；國民黨黨務方面曾任改造委員會設計委員、黨營文化事業輔導發展委員會委員、設計考核委員會及中山獎學金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黨史會主任委員（1968.11-1971.5）。李雲漢，〈黃季陸先生革命經歷簡記〉，收入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黃季陸先生與中國近代史研究》，頁679-692；黃季陸著，傳記文學雜誌社編，《黃季陸先生往懷文集》（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6），頁592、593。

⁹³ 林滿紅訪問，曹慧如紀錄，〈復館初期的國史館—李雲漢先生訪談記錄〉，頁117。

⁹⁴ 錢穆，〈回憶黃季陸先生（選載）〉，《傳記文學》，48：4（臺北，1986.4），頁45。

料，使人民能夠接近與利用。⁹⁵

在此必須先指出的是，國民黨政府對於歷史學科的態度，向來重視的是有助於培養民族精神的歷史教育，而非客觀的學術研究。事實上，自 1945 年 10 月 25 日，臺灣「光復」以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即展開國語推行運動、加強中華民族意識的學校與社會教育等多項文化重建工作，並以「三民主義」作為官方的政治意識形態，重新形塑臺灣人的國家認同。⁹⁶尤其在張其昀擔任教育部長期間（1954 年至 1958 年），為了推動復國建國教育政策，更是致力於在學校與社會宣揚「文藝復興」理念，其主要內涵便是透過三民主義史學為主體的國史教育，以及發揮文藝復興的精神，保存、延續、發揚中華文化，期能喚起國魂、達成復國建國的使命。⁹⁷

然而在學術研究方面，特別是中國現代史部分，國民黨政府的態度卻頗為消極，甚至是不鼓勵。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張朋園曾提到，在白色恐怖雷厲風行的年代，學術研究的範圍與主題皆有限制，像是「國共關係」的議題就因為過於敏感，不能碰觸，研究者也必須時刻提醒自身的立場要有「左右之分」，使用的材料及措辭都須謹慎，稍有一絲「左傾」即可能被羅織入罪；此外，官方亦有許多機密與政治敏感資料，國民黨當局限制閱讀，也禁止影印，在此種政治氛圍與檔案不公開的雙重限制下，自然不利從事中國現代史研究。⁹⁸即便教育部自 1952 年就把「中國近代史」、「帝俄侵華史」列為各大專院校的必修，然授課範圍多限於十九世紀中葉的鴉片戰爭到清末或北伐時期，直到 1973 年才將「中國現代史」納入必修，相較於西方的中國現代史研究，已經整整落後二十年。做為革命元老的黃季陸因此擔憂政府若再不重視，「民國史的解釋權」將淪於外國人和中共的

⁹⁵ 黃季陸，〈本館同仁要完成國家給我們的任務〉，國史館編，《黃季陸先生論學論政文集（二）》（新店：國史館，1986），頁 1180-1181。

⁹⁶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臺北：麥田，城邦文化出版，2007），頁 225-226。

⁹⁷ 陳嘉翎，〈國家文化政策與國立歷史博物館的演化〉，（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美術行政與管理組博士論文，2019），頁 42。

⁹⁸ 張朋園指出，中研院近史所主任郭廷以曾為了和美國學界合作，數次和羅家倫商討，能否請求中央開放黨史會史料及內政部調查局的中共資料以及陳誠檔案，羅家倫對此相當贊成，並努力向蔣經國爭取同意，最後卻仍失敗，郭廷以更因此被人攻擊出賣檔案給主張「兩個中國」的美國學者費正清，是「共產黨的同路人」，而於 1968 年「出亡」美國。參見陳三井主編，《走過憂患的歲月—近史所的故事》（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頁 95-96、104。

手中。⁹⁹

黃季陸接掌國史館時，臺灣海峽的另一側的中國大陸，毛澤東為爭奪中共政權，掀起了文化大革命；國民黨政府則是以繼承中華文化的道統自居，發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與之對抗。總統府秘書長張群在國史館新舊任館長的交接儀式上，即向眾人表示國史館責任重大，因為國史是歷史，也是文化和教育，不僅可「教育我們面對今天的挑釁」，更能「加強全體國民的愛國心與責任感」。他也指出現代史料四散各地，尚未有通盤性地整理，因此期許國史館能廣泛蒐集史料，早日完成纂修國史的任務。¹⁰⁰

黃季陸對國史始終抱有一份使命感，而能慎重其事。如前人所言，黃季陸為人既傳統又開放。他的史學理念與錢穆、張其昀等人相近，都是站在民族與國家的角度來思考。他認為，「歷史是人類活動的紀錄，累積這些活動的精華，便是我們後人所通稱的文化」，因此應加緊腳步，發揚中國傳統文化，朝「中華文化大國」的目標前進，而其最主要的途徑便是普及教育，提升國民知識水準以及鼓勵研究民國史發揚革命精神。¹⁰¹換言之，研究國史也被視為繼承中華文化的道統，使之繼續傳承的一種方式。

這種觀念與錢穆試圖從中國歷史的演進過程中，找出其背後的精神與意義異曲同工，而錢穆史學也對 1960 年代以後臺灣的史學發展有一定的影響，成為戰後臺灣史學的另一個學術淵源。如華裔美籍學者王晴佳的研究指出，1960 年代以後，錢穆的《國史大綱》經常被作為臺灣各大學歷史系的大一通史教材。¹⁰²

黃季陸主持國史館、張其昀擔任中國文化學院董事長，以及 1970 年代錢穆史學在臺灣的流行，三者時間貼近，幾乎重疊，似乎也預示了將來國史館的修史走向。事實上，這三人素有交情，黃季陸與錢穆在四川大學執教時即有密切交往；錢穆赴香港創辦新亞書院後，亦曾來臺和黃季陸碰面；其來臺定居後，兩人更是經常晤面談論辛亥革命，黃季陸不僅聘請他擔任國史館顧問，¹⁰³也向其請示有關

⁹⁹ 林正珍，〈臺灣五十年來「史學理論」的變遷與發展：1950-2000〉，《漢學研究通訊》，20：4（臺北，2001.11），頁 8；黃季陸，〈中華文化大國的建設與民國史的研究〉，收入國史館編，《黃季陸先生論學論政文集（二）》，頁 1199。

¹⁰⁰ 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頁 263、264。

¹⁰¹ 黃季陸，〈中華文化大國的建設與民國史的研究〉，收入國史館編，《黃季陸先生論學論政文集（二）》，頁 1193、1198、1200。

¹⁰² 王晴佳，《臺灣史學五十年（1950-2000）：傳承、方法、趨向》，頁 38-39、41、71、79、82。

¹⁰³ 1970 年 4 月 25 日，黃季陸聘請錢穆、黎東方及梁敬錚三人擔任國史館顧問。這三人皆曾擔

清史稿整理之意見。錢穆認為清史稿為二十五史的最後一部，應維持舊史體例修史，然現下瞭解舊史體例者不多，建議國史館和富藏清廷檔案的故宮博物院合作，鼓勵兩機構就現有的清史稿進行校勘。¹⁰⁴而這也開啟了往後國史館和故宮博物院合作校註《清史稿》的契機。

是以，黃季陸在思想上是秉持民族復興、發揚中華傳統文化的理念提倡中華民國為中心的中國現代史學術研究，希望史學能「經世致用」，而非為學問而學問。就此點來看，史學仍是因應現實需要，為民族、國家、政黨的利益所用。在實踐的過程中，黃季陸對於黨史會和國史館所進行的改革與擬定的工作方針，可說頗富開創性。以下分述之。

（一）清點黨史會資料與調整人事

首先在黨史會方面。黃季陸剛接任主委時，認為「黨史會百事待舉」，許多事都尚未開展。¹⁰⁵因此主張先清點史料，並以「科學方法，整理黨的文獻，便利學術研究，宏揚黨德與黨魂」，於是將整理原有史料、擴大史料徵集與推廣研究發展列為三大工作重點。¹⁰⁶其上任後，立即成立清點小組，由李雲漢負責帶領新進成員整理原有史料，編制目錄製成索引卡片，且新添設備，購置微捲閱讀機、縮攝機，期能讓史料「管理科學化」。¹⁰⁷接著，擴大徵集「臺灣基地」、「海外華僑革命」等史料，將臺灣之「光復與建設」視為國民黨對國家民族的重大貢獻，同時也進行口述歷史，訪談國民黨員，紀錄其生平事蹟與革命經驗，更另外蒐集「共匪暴行資料」，以「增進國內外學人對共匪險惡之瞭解」。最後，編印文獻、複製史料，和國外研究機構交換資料，並網羅歷史學者與培植人才、充實研究設

任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班的主任或名譽主任，黃季陸本身也有在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兼課，講授「民國史專題研究」，並指導博士生研究論文，國史館纂修郭鳳鳴即是其指導學生。〈國史館復館以來大事記〉，收入國史館編，《復館以來的國史館》，頁216；吳昌廉，〈中國文化學院研究所史學系學術活動報導〉，《近代中國》，2（臺北，1977.6），頁192-193；宋晰，〈黃季陸先生與中國文化大學〉，收入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黃季陸先生與中國近代史研究》，頁446。

¹⁰⁴ 錢穆，〈回憶黃季陸先生（選載）〉，頁44、45。

¹⁰⁵ 李雲漢，《史學圈裏四十年》，頁48。

¹⁰⁶ 黃季陸，〈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史料一整理及研究發展工作報告〉，收入國史館編，《黃季陸先生論學論政文集（二）》，頁1185。

¹⁰⁷ 李雲漢，《史學圈裏四十年》，頁48。

備，向國內外推廣研究國民黨黨史。¹⁰⁸

此外，他也進一步調整黨史會的人事。羅家倫時代黨史會的纂修多為革命元老，係名譽職，雖偶有協助行政事務或參與口述訪談，但甚少到會。黃季陸上任後，這些「老纂修」多已凋零，黃季陸因而將學界出身且有歷史專長的成員調任為「新纂修」，其職等和黨史會的秘書相同。除了要每天赴會辦公，也必須遵守幹部管理規則，使黨史會的機構體質有了改善。¹⁰⁹以上種種改革，都為黨史會與國史館將來的合作建立了基礎。

（二）修改國史館工作計畫，以「公開史料便利研究」為方針

在國史館方面，黃季陸也做了大幅度的調整。除了前文提到的，將國史館遷到新店青潭，使辦公地點與史庫集中，函請考試院高考增列史料編纂科，提升國史館職員的整體素質外，黃氏也考量館內現有職員的員額編制與能力，修正工作計畫，取消羅家倫時期的「開國實錄」與「抗戰實錄」編纂計畫，另外成立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小組，編纂以摘錄公報會議記錄與時事新聞為主的《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此外，並依照職員的學經歷重新分配工作，讓有修史潛能者參與編纂，以在職訓練的方式提升職員的史學素養與寫作能力；之後，又依實際需要，陸續增訂「編輯先總統蔣公年譜」、「整修清史」、「匪版及外版史料之審鑑與澄清」等計畫。¹¹⁰

尤其重要者，黃季陸將「公開資料便利研究」作為國史館與黨史會的工作方針，將不涉及機密的黨史會資料予以開放，供學界利用。過去，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前的重要政治檔案幾乎都存放在黨史會，基本上禁止外界接觸，除非有私人關係，並獲得黨政高層的同意，始有機會進入位於南投草屯的荔園史庫參閱史料。據前黨史會纂修蔣永敬所述，當時黨史會的典藏室係由軍人出身的總幹事張大軍

¹⁰⁸ 黃季陸，〈對於本黨史料整理及運用意見報告〉，收入國史館編，《黃季陸先生論學論政文集（二）》，頁1186-1187。

¹⁰⁹ 擔任過黨史會「新纂修」的名單有：沈裕民、曾介木、劉紹唐、蔣永敬、李雲漢、蘇振申、吳伯卿、劉世昌、郭榮趙、孫子和、劉偉鵬、林泉。李雲漢，〈黨史會七十年〉，頁128-129；蔣永敬，〈黨史會十年「學徒」〉，《近代中國》，149（臺北，2003.6），頁156。

¹¹⁰ 王羽鵬，〈追隨黃館長季陸先生十四年小記〉，收入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黃季陸先生與中國近代史研究》，頁538；蕭良章，〈黃前館長季陸先生的國史修纂方針與實踐〉，《國史館館刊》，復刊第4期（新店，1988.6），頁11-12。

管理，「其作風亦如軍人，對余等亦命令指使」，蔣曾和羅家倫表示難以與之相處，羅氏則回應：「史庫孤懸鄉間，軍人看守較安全」。¹¹¹由此可知黨史會的資料保管之嚴密，一般人難以親近，遑論用來學術研究。

由於史料取得不易，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者，莫不引頸期盼黨史會資料能早日開放。如文化大學教授宋晞，即曾建議公開黨史會資料以提供學界參考，並表示該會可與各大學合作，提供獎學金鼓勵青年學子從事民國史研究。¹¹²黃季陸贊同宋晞的意見，也曾表示「千萬不可保有以往古人奇書珍藏，密而不宣，以作為居奇之手段」。¹¹³他還將開放史料提升至「人權」的層次，認為史料檔案和歷史文物都是國民共有的文化財產，應讓人民有親近它、利用它的機會，因而決定把「公開資料便利研究」作為國史館的工作方針。¹¹⁴根據此一方針，黃季陸將國史館的職責與任務列出以下三點：

第一，國史館不是單純的一個徵集史料、整理史料、保存史料的行政機構，他的目標與價值主要是在服務與發揚。

第二，國史館另一重要任務是在提供歷史背景與經驗以作決定國策，應付時變之根據與參考。

第三，是在提高學術水準，宏揚歷史文化。

故今後史料之處理與管理方法，應以是否達成上述目標為衡量。¹¹⁵

黃季陸的政策，既以便利學術研究為方針，國史館的修史工作也因此以蒐集、整理及編印中華民國史料為重點，如編纂《中華民國史事紀要》、蒐編政府褒揚令及其有關傳略、重印《國民政府公報》、《總統府公報》等。¹¹⁶這種作法，不僅回

¹¹¹ 蔣永敬，〈黨史會十年「學徒」〉，頁 155-156。

¹¹² 宋晞，〈黃季陸先生與中國文化大學〉，收入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黃季陸先生與中國近代史研究》，頁 446。

¹¹³ 黃季陸，〈中華文化大國的建設與民國史的研究〉，收入國史館編，《黃季陸先生論學論政文集（二）》，頁 1200。

¹¹⁴ 黃季陸，〈本館同仁要完成國家給我們的任務—民國五十八年三月十五日國史館新舊任館長交接儀式講〉，收入國史館編，《黃季陸先生論學論政文集（二）》，頁 1180。

¹¹⁵ 黃季陸，〈國史館想作的是些甚麼？正要作的是些甚麼？〉，收入國史館編，《黃季陸先生論學論政文集（一）》（新店：國史館，1986），頁 797。

¹¹⁶ 黃季陸，〈一次最具歷史意義的工作報告〉，收入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頁 304-308。

應了學界的需求，也延續了羅家倫「文獻足徵」的治史態度，講求歷史研究與編纂史籍應建立於足夠且真實的證據，方能成為信史。

（三）國史館與黨史會合作成立「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在黃季陸的主持下，國史館與黨史會的關係也「更趨密切」，對他而言，「黨史與國史是不能分開的，協力推動，是理所當然的事。」¹¹⁷因此，黃氏全力促成兩機構合作，指定兩邊成員共 11 人組成專案小組，共同商定合作辦法與組織簡章，籌設「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並特別選在 1969 年 11 月 24 日中國國民黨建黨七十五週年這天正式成立，作為「黨慶的獻禮」，地點位在新店國史館的志希樓。¹¹⁸

根據組織簡章和簡介所言，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的成立宗旨是「從事中國現代史及革命史的研究，聯繫國內外學術機關及個人，並提供研究上必要的服務」。其主要任務有蒐集與研究史料，聯繫學界交換資料及研究成果，舉辦專題講座與學術討論，出版學術論著及史學書刊等。¹¹⁹在組織架構方面，最高權力機構為國史館和黨史會共同組織的聯合委員會，設有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各 1 人，委員 9 至 15 人，下設研究與行政兩部門。研究委員會負責推行研究計畫，兼有史料編輯與專題研究之責，設有執行秘書 1 人及若干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等；行政事務則由總幹事掌理，下設五組，每組設有組長、副組長、組員，從國史館及黨史會的職員調派兼任，不另外支薪。經費方面，其每月的日常開支由國史館及黨史會提供。¹²⁰

¹¹⁷ 李雲漢，〈黨史會七十年〉，頁 137。

¹¹⁸ 項達言，〈光風霽月 黨人本色—我所親炙的季老〉，收入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黃季陸先生與中國近代史研究》，頁 498-500。

¹¹⁹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簡介〉，收入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頁 273。

¹²⁰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組織簡章〉，收入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頁 268-2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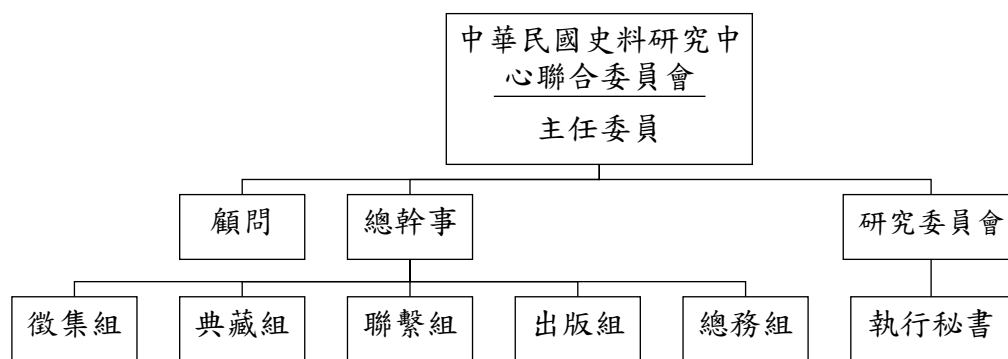


圖 3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組織架構（1969 年）

該中心看似規模宏大、分工細緻，實際的組織運作情形則是不如預期。中心的主任委員為黃季陸，副主任委員為黨史會副主委杜元載擔任，實際規劃及執行整體業務的則是總幹事李雲漢。¹²¹根據李雲漢所述，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的內部組織始終未能按照簡章的規定來設置。因為在人事方面，該中心的委員多由館、會的業務主管兼任，然黨政機關人事異動頻繁，能長期擔負中心業務的人不多；此外，各個行政小組也沒有真正成立，而是從黨史會調派三人分別負責研究、總務及史料業務，其中最主要的史料管理與接待工作，即是由黨史會助理幹事、後來的國史館館長呂芳上負責；另外，該中心也沒有向政府主管機關申請立案。除了沒有專職人員，經費也不固定，因此辦起事來頗為不便。¹²²呂芳上後來也直言，該中心組織先天不健全、經費有限，其「發展確不能一如黃先生的理想」。¹²³

儘管如此，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的成立，對國內中國現代史研究風氣的推動仍有一定的助力。在館、會的合作下，黨史會的史料不再塵封於偏遠的南投草屯。從黃季陸開始，便有計畫將史庫北遷，黨史會人員將揀選過可開放的史料，陸續搬運至史料研究中心存放，國史館也另外修建溥泉館招待所提供學人借住，

¹²¹ 李雲漢原在黨史會任職，1972 年時獲其政大師長黃季陸之邀，入國史館擔任纂修，1977 年時接替許師慎，擔任國史館的主任秘書，直至 1979 年重回黨史會擔任副主委，並於 1992 年正式接替秦孝儀就任黨史會主委一職，至 1996 年退休。參見簡筌箴，〈國史館歷任館長、主管、纂修任期一覽表〉，頁 223、225；李雲漢，〈黨史會七十年〉，頁 120、122。

¹²² 李雲漢，〈十年來的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收入國史館編，〈復館以來的國史館〉，頁 168；林滿紅訪問，曹慧如紀錄，〈復館初期的國史館—李雲漢先生訪談記錄〉，頁 118。

¹²³ 呂芳上，〈黃季陸先生與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收入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印，〈黃季陸先生與中國近代史研究〉，頁 552。

使能免於長途跋涉，就近於臺北近郊從事研究。¹²⁴

此外，自 1973 年起，行政院亦配合國史館，通令各部會局處，將大陸運臺舊檔及在臺已失時效的檔案陸續移送至國史館，館方也另外向國內外各地蒐羅購置近現代圖書文獻，使國史館庫藏大為增加。¹²⁵為了讓學人參考運用，國史館設立檔案研閱室，並在史料研究中心下增設清史、方志、譜牒、公報等四個研究室，和期刊閱覽室、審校史料室等，將圖書資料集中，以方便學人查閱。¹²⁶該中心除了提供閱覽及複印服務，也編制中國現代史料聯合目錄，定期舉辦學術討論及補助大專以上師生專題研究經費，¹²⁷並出版《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及相關學術論著。¹²⁸這些措施皆對中國現代史研究的推展有一定的幫助，也漸能打響名號，吸引外國學者前來臺灣訪問、蒐集資料。

¹²⁴ 根據呂芳上所述，從黨史會選調的資料包含 1800 種雜誌、146 種報紙、32 種公報，及將近三萬冊的書籍史料、照片及微捲；國史館本身亦有八萬件檔案史料，後來又陸續徵集大陸移臺的中央各部會檔案，包含資源委員會、閻錫山、行政院、接收臺灣及總統府等檔案資料。研究者可直接透過史料研究中心選調草屯黨史會史庫的檔案。參見呂芳上，〈黃季陸先生與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收入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印，《黃季陸先生與中國近代史研究》，頁 552。

¹²⁵ 至 1979 年為止，國史館藏有檔案約 312 萬件，包含國民政府（1925 至 1948 年）、行政院（1937 年起）、內政部（1932 至 1948 年）、外交部（1917 年起）、財政部（1915 至 1975 年）、教育部（1941 至 1949 年）、交通部（1896 年起）、司法行政部（1921 至 1974 年）、資源委員會（1939 至 1949 年）、賠償委員會、臺灣省縣市（1945 年起）、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閻錫山遺存（1912 至 1939 年）、日本外務省有關康梁及革命黨人在日活動（1899 至 1937 年）、特種珍藏文獻、個人及視聽等共 17 種類別之檔案。所有類別中，以行政院檔案數量為最多，包含許多抗戰、戰後復原及剿匪戡亂史料。參見張明凱，〈近年來的檔案典藏與整理〉，收入國史館編，《復館以來的國史館》，頁 72-75。

¹²⁶ 張明凱，〈近年來的檔案典藏與整理〉，收入國史館編，《復館以來的國史館》，頁 76、80-81。其中審校史料室是國史館特別用來審校蒐集而來的中共編印書刊，目的是辨別真偽，予以校正，防止中共「竄改」或「歪曲」的史實，被中外人士錯誤引用。

¹²⁷ 1970 至 1980 年共贊助 76 人，文化大學 25 人最多，臺大、政大各 15 人次之，政治作戰學校 14 人，尚有師大、輔大、中原理工學院等各 1 至 3 人。研究所別以歷史、三民主義、政治研究為大宗。詳細名單參見李雲漢，〈十年來的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收入國史館編，《復館以來的國史館》，頁 182-191。

¹²⁸ 《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的內容為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舉辦的學術討論會之專題研究報告及與會者的發言討論紀錄，每十次出版一冊。根據該書「前言」，學術討論會於 1970 年 8 月首次舉辦，之後原則上每月舉行一次，每次由 1 到 2 位學者擔任主講，以中國現代史和革命史為範圍，與會者得參與討論並提出問題，所有的報告及討論內容皆有專人紀錄。《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一輯便是第一至第十次學術討論會的報告及討論內容，於 1971 年 12 月出版，適逢中華民國建國六十周年。1984 年黃季陸館長卸任時出版至第十一輯，共發行至 2001 年 11 月第二十二輯為止。

前來訪問或參與學術討論會的學人，除了有中研院近史所的研究員及臺大、政大、師大、文化大學等師生，更有不少來自歐、美、日、韓等國的知名學者和研究生。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韋慕庭（C. Martin Wilbur）、芝加哥大學教授孔復禮（Philip A. Kuhn）、伊利諾大學教授易勞逸（L. Eastman）及東京慶應義塾大學講師山田辰雄等皆曾到訪。在 1970 至 1980 年這十年間又以美國籍學人為最多，約佔總數的七成。¹²⁹

另一方面，由於中華民國的歷史發展與國民黨息息相關，國民黨重要機密文件仍存放在黨史會。黨史會在秦孝儀接任主委後，延續集中史料、便利運用的政策，更且於 1979 年 4 月開始，陸續將南投荔園史庫及部分存放在史料研究中心的史料，集中運往臺北陽明山的「陽明書屋」保存，並經常公開展示原始史料，提供參閱，使黨史會成為典藏和研究中國現代史料的重鎮。¹³⁰黨史會從南投北遷後，與國史館的距離大幅減短，兩機構的往來也因此更加頻繁，經常共同合作編印書刊、舉辦展覽及研討會，也帶動了國內中國現代史研究的熱潮。

政大教授彭明輝曾對 1945 至 2000 年臺灣地區歷史研究所的碩、博士論文進行量化分析，研究顯示，二十世紀下半葉，臺灣地區歷史研究所的研究重心集中於中國史領域，當中又以中國近現代史最受歡迎，1960 年代以後其所占比例已超越明清史，1970 年代更是逐年攀升，至 1980 年代達到高峰，1990 年代以後受到新興的臺灣史研究風潮影響，而逐漸下降。¹³¹他的研究間接說明了 1970 至 1990 年代，中國現代史研究在臺灣的流行，除了教育部的政策推動，國際局勢的影響，也和國史館與黨史會的政策改變有正向的關聯。

整體而言，國史館與黨史會在黃季陸的「公開史料便利研究」政策方針下，逐漸擺脫以往的故步自封，而與國內外學界展開對話及交流，不僅有助於促進中國現代史研究，在現實政治層面上，也替中華民國在國際的中國現代史研究爭取一席之地。

¹²⁹ 到該中心訪問的外籍人士共有 89 人，依照國籍人數從多至少依序為：美國 62 人、德國 7 人、日本 6 人，加拿大、澳大利亞、法國、香港各 2 人，英國、瑞典、荷蘭、義大利、新加坡、韓國各 1 人。詳細名單參見李雲漢，〈十年來的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收入國史館編，《復館以來的國史館》，頁 169-180。

¹³⁰ 邵銘煌演講，葉高樹紀錄，〈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史料之典藏與運用〉，收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史政學術講演專輯（四）》，頁 221。

¹³¹ 彭明輝，《臺灣史學的中國纏結》（臺北：麥田出版，2001），頁 156-161。

四、奠定國基與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除了「公開史料便利研究」，黃季陸也主張應打破「後朝人修前朝史」、「重古而薄今」的舊觀念，認為「今日之史實為明日以後之歷史」，應積極研究、撰寫民國史或現代史，然後加以出版，方能普及知識，提升歷史的教育意義。¹³²此外，他也承襲前國史館館長張繼在對日抗戰時之精神，強調國史的重要性，認為「歷史不滅，民族永生」。為了「奠立中華民國國基於永固」，國史館決定編纂《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目的在「提供史料，便利研究，並先刊行初稿，廣徵意見，期能逐步增訂，成為一部完整之中華民國編年史」。¹³³

事實上，《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以下簡稱「史事紀要」）的編刊背後有更直接的政治性目的。曾協助審稿的學者黃大受指出，由於過去政府機關多不開放檔案，導致從事現代史的學者只能到國外尋找資料，或引用外國甚至中共出版的史料，其中有許多不利於中華民國政府，甚或刻意曲解的史學書籍，造成外國人對中國史的「誤解」，進而影響他國對中華民國的政策。因此，編纂史事紀要的真正目的是提供史料，「使研究者運用正確的史觀」，了解事件的前因後果，才能得出「正確的解釋」。¹³⁴黃季陸亦曾在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舉辦的一次學術討論會中，公開表示：

共匪現在大陸，正從事於文化及歷史的毀滅工作，我們要積極地研究現代史或民國史，並將之闡揚光大，不但可以端人心、正傾向、辨邪正，且也可以保存我優美的中國文化與歷史，以立民國萬年不拔之基。黨史會和國史館正共同合力來編輯一部民國史事紀要，想從提供資料，便利民國史研究作一番努力。¹³⁵

由上可知，國史館編纂《史事紀要》的主要用意，與鞏固中華民國的法統不無關係。其方法是，透過刊布原始史料，供學界利用，鼓勵青年學子研究中華民國史或中國現代史，與中共在軍事以外的「文化新戰場」上，展開學術鬥爭。對黃季

¹³² 黃季陸，〈一次最具歷史意義的工作報告〉，收入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頁 303。

¹³³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前言〉，收入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頁 284。

¹³⁴ 黃大受，〈「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評介〉，《傳記文學》，18：3（臺北，1971.3），頁 79。

¹³⁵ 黃季陸，〈黃季陸主持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學術討論會講話—第九次討論會〉，收入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黃季陸先生與中國近代史研究》，頁 62。

陸而言，這項工作也能呼應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他曾指出，臺灣若能成為全世界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中心，這樣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也就自然提高了」。¹³⁶

是以《史事紀要》的內容主要是收錄原始史料，編纂體裁也必須有所創新，非傳統正史體例，採取的是一種融合綱目、記事本末、傳記及補充檔案文件為附錄而構成的一種特殊編年體裁。

根據該書「凡例」，全書記事以「革命建國」為主軸，「國父」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被視為中華民國歷史發展前進的動因。因此，在時間範圍上，係以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為起點，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這段時間被編為「前篇」，1912年中華民國開國以後為「正篇」，沒有時間斷限。¹³⁷主持該計畫的國史館纂修賴啓指出，因為中華民國是共和政體，可透過選舉和議會維持此制度，不會像過去的君主專制政體有朝代更迭的問題，「中華民國的法統實可永久綿長不斷」。¹³⁸

紀年方面，以中華民國為正朔，1912年以前稱「中華民國紀元前」，附帶清朝年號與西曆；月日方面先列陰曆，再列陽曆。1912年以後稱「中華民國某某年」，附帶西曆年月日。¹³⁹另一方面，由於該書編纂目的是提供史料，便利學術研究，因此編纂方式也須合乎學術標準。此在「凡例」中有相當詳細的說明，其中特別值得指出的有三點：第一，引用原始文件及他人著述時，均加引號，並附註釋來源，補充說明部分，則於正文後添加編者按語；第二，官方文書與私人文獻著述有歧異時，以官方文書為標準，私人文獻列為附錄；第三，引用史料多來自國史館及黨史會所藏原始文件，兼採報章雜誌與專家著述，有關政治用語和黨派系別的名稱，「皆依照原件，不加更改」。¹⁴⁰從上述原則來看，亦是頗能承襲羅家倫時代重視「文獻足徵」，合乎科學精神，講求事實與證據的主張。

不過，由於該書編纂的主要目的是鞏固中華民國的法統，因此在書寫筆法上是以中華民國為正統，對於未遵守臨時約法，及危害其統治地位的政權或組織，則以地名稱之，或在名稱前冠上「偽」或「逆」字。如國民黨北伐統一前，由北

¹³⁶ 黃季陸，〈與中華民國同在一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七月二日在本館工作會報講〉，收入國史館編，《復館以來的國史館》，頁48-49。

¹³⁷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凡例〉，收入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頁285。

¹³⁸ 賴啓，〈黃季陸先生的修史態度——「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纂簡述〉，收入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新編，《黃季陸先生與中國近代史研究》，頁466。

¹³⁹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凡例〉，收入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頁285。

¹⁴⁰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凡例〉，收入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頁285-287。

方軍閥領導的政權，被稱為「北京政府」，汪精衛政權被稱為「南京偽國民政府」，¹⁴¹以及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等。¹⁴²就此點而言，《史事紀要》仍是具有官方史學的色彩，投射統治者的史觀於其中。

在編纂過程方面。根據表 8 及表 15 可知，黃季陸時期《史事紀要》並非按照時間的先後順序來編纂，而是就當時的人力、物力及可運用的史料，採「點到線，以至於面」的方式進行。¹⁴³意即先編纂重要事件的年份，再求時序的連貫，而所謂的重要事件，則是與國父孫中山、總統蔣中正及國民黨有關的紀念日。如 1971 年首部《史事紀要》（民國元年 1 至 6 月），是為了慶祝「中華民國建國六十週年」而出版；1974 年出版 1894 年份的《史事紀要》，係慶祝興中會成立至今「革命建國八十週年」；1975 年時出版 1905、1925 及 1927 年份，則是分別紀念「國父逝世五十週年」、「國民政府成立五十週年」、「中國同盟會成立七十週年」；1976 年時為紀念「總統蔣公逝世週年」，提早出版 1975 年份；1928 年份的《史事紀要》於 1978 年出版，紀念「北伐統一五十週年」。¹⁴⁴

總體而言，黃季陸時期共完成 1894 至 1928 年及另外六個年份不相連的《史事紀要》，包含中華民國建國前後及政府遷臺後的史事。後來接任的館長則針對尚未完成的年份陸續編纂，直至 2007 年出版最後一冊為止，總共完成 1894 至 1984 年，共 91 個年份、177 冊的《史事紀要》。從發行時間可知，1987 年政府宣布解嚴以前，多是編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的年份，解嚴以後才開始陸續編纂政府遷臺後的史事，其中國共形勢轉變關鍵的一年，如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華民國政府遷臺，更是到了潘振球館長時期，即 1990 年代後期才出版。這應與李登輝總統執政時代，政治檔案的陸續開放、學術相對自由化及臺海關係的改變有關。史料相對容易取得，編修過程也較能擺脫政治顧忌。

¹⁴¹ 國史館史事記要組，《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二十九年一至六月份》（新店：國史館，1993），頁 395。

¹⁴² 國史館史事記要組，《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網文備覽（三）（下）》（新店：國史館，1993），頁 604。

¹⁴³ 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頁 305。

¹⁴⁴ 1894 年興中會成立，1905 年中國同盟會成立，1925 年孫中山逝世、國民政府成立於廣州，1927 年國民政府於南京奠都，1928 年北伐結束，1975 年蔣中正逝世。

表 15 各館長完成編纂《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之年份

館長任內	完成編纂的年份(月份)
黃季陸	1894-1928、1933(1-6)、1961、1971、1972、1973(1-6)、1975
朱匯森	1929、1930(1-6)、1931(1-6)、1932、1933(7-12)、1934-1937、1938(1-6)、1939(1-6)、1945-1946、1953-1954、1955(1-6)、1973(7-12)、1974(1-2)、1976(1-6)
瞿韶華	1931(7-12)、1938(7-12)、1939(7-12)、1940-1942、1943(1-6)、1944、1948(1-6)、1950(1-6)、1951-1952、1955(7-12)、1957-1958、1964(1-6)、1966、1974(7-12)
潘振球	1943(7-12)、1947、1948(7-12)、1949、1950(7-12)、1956、1959、1962(1-9)、1963、1964(7-12)
張炎憲	1962(10-12)、1965、1967-1970、1976(7-12)、1977-1984

資料來源：整理自國史館網站，灰底表示 1949 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以後之年份。

此外，從該書的書寫筆法變化也能看到時代的變遷。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毛澤東」的稱呼，即因編纂時代不同，體現不同時期國民黨政府在兩岸關係立場上的改變。以 1974 年 4 月出版的《史事紀要》為例，該書為 1971 年 10 至 12 月的史事，其中 10 月 8 日的一條綱文如下：

外交部長周書楷在聯大發表演說，指出權宜姑息，適足以危害世界和平，毛共偽政權殘暴黷武，不能代表中國人民。¹⁴⁵

另一冊於 1997 年 10 月出版的《史事紀要》，收錄 1949 年 10 至 12 月的史事，其中 10 月 1 日及 12 月 16 日的綱文標題如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平宣告成立，並舉行「開國典禮」。¹⁴⁶

中共主席毛澤東抵蘇聯莫斯科會晤史達林，商談秘密協定。¹⁴⁷

¹⁴⁵ 國史館史事紀要組，《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六十年（一九七一）十至十二月份》（新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74），頁 63。底線為筆者所加，以下亦同。

¹⁴⁶ 國史館史事紀要組，《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十至十二月份》（新店：國史館，1997），頁 8。

¹⁴⁷ 國史館史事紀要組，《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十至十二月份》，頁 607。

從以上綱文可清楚看出國民黨政府態度之轉變。從「毛共偽政權」及「殘暴黷武」這種帶有明顯政治立場及道德價值判斷的主觀用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共主席毛澤東」等國際稱謂的採用，意味著中華民國政府至 1991 年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後，不再視中共為叛亂組織，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一個政治實體。耐人尋味的是，1971 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史事，是在蔣中正總統執政時期出版；較早發生的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卻是於李登輝總統時期始完成編刊，顯示戒嚴時期《史事紀要》的編纂仍深受政治環境及重要檔案不公開的限制。無獨有偶，1970 年代中共決定編纂「中華民國史」時，也面臨類似的問題。

五、維護法統與「中華民國建國史」的協力纂修

1978 年，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以後，學術研究空間較前為寬，民國史研究成為一門新興學科。在此之前，民國史多被中共當做黨史發展的背景，並以之用來批判帝國主義侵略及國民黨統治。1978 年改革開放以後，在不同形勢要求下，中共學者重新評價辛亥革命，肯定其為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對於推翻中國長久以來的封建帝制、促進中國歷史的進步有所貢獻。¹⁴⁸

另一方面，中共也開始加緊腳步，纂修「中華民國史」。前文曾提到，早在 1949 年時，毛澤東就曾指示編寫「中華民國史」；1956 年，中國科學院將「中華民國史」列為重點項目之一；1971 年，中共總理周恩來又指示將撰寫「中華民國史」列入全國重點出版規劃，並於 1972 年將此任務交由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李新負責。¹⁴⁹

1972 年，中共官方正式展開「中華民國史」的編纂行動。是年 10 月，中國科學院近史所內成立「中華民國史研究組」，負責人李新擬定「中華民國史」、「中華民國大事記」和「中華民國人物志」編撰計畫，並和北京中華書局聯繫合作出版事宜。由於當時文化大革命尚未結束，此計畫引起許多人的擔憂，唯恐涉及政治敏感議題、遭遇風險。李新以此非為統治階級歌功頌德，而是從革命角度書寫

¹⁴⁸ 汪朝光，〈50 年來的中華民國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5（北京，1999.5），頁 158、160-161。

¹⁴⁹ 周振剛，〈中華民國史研究及其在海內外反映〉，《貴州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3（貴陽，1986.3），頁 81-86。

「中華民國的興亡史」為由，安撫部分人的疑慮。編寫工作於 1977 年正式啟動，次年再將「中華民國史研究組」名稱改為「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並出版第一卷《民國人物傳》，1981 年時復出版第一本《中華民國史》，正式標誌中共的民國史研究之展開。¹⁵⁰

按照李新原本的構想，《中華民國史》將分為三編，分別為中華民國的創立、北洋政府統治時期及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李新在《中華民國史》第一編上卷的〈序言〉指出，「中華民國(1911-1949)是中國剝削制度舊社會的最後一個朝代」，「中華民國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在一個長時期的人民大革命的過程中把他推翻的，這個過程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¹⁵¹可以得知，該計畫企圖以 1949 年為中華民國的結束斷限，宣告中華民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已走入歷史。

不過，從表 16 可以看到，此項工作的進行不算順利，尤其在 1990 年代，整整十年僅出版一卷「北伐時期」的史事，直至 2000 年之後才又接續出版，史事的時間亦不相連貫。根據中國科學院近史所民國史研究室主任金以林的解釋，此係 1990 年代以後，臺灣和美國史丹佛大學的胡佛檔案館，皆陸續將檔案解密、予以開放，這些史料皆有助於了解過去的國共和中蘇關係，應當參考引用，因此使中華民國史的編纂工作放慢腳步。¹⁵²直至 2011 年，《中華民國史》一含《中華民國史》、《中華民國史人物傳》及《中華民國史大事記》三大部分，共有 36 卷，始完成出版。

表 16 中共編寫《中華民國史》之出版年份

編名	卷／副標題	出版年份
第一編 中華民國的創立	全一卷：中華民國的創立（上）	1981
	全一卷：中華民國的創立（下）	1982
第二編 北洋政府統治時期	第一卷：中華民國史 第二編 第一卷	1987
	第二卷：北洋政府統治時期（1916-1920 年）	
	第五卷：北伐戰爭與北洋軍閥的覆滅	1996
第三編 國民黨政府時期	第二卷：從淞滬抗戰到盧溝橋事變	2002
	第五卷：從抗戰勝利到內戰爆發前後	2000

¹⁵⁰ 石劍峰，〈《中華民國史》：從「險」學到「顯」學〉，《源流》，2011：21（廣州，2011.11），頁 91-92；汪朝光，〈50 年來的中華民國史研究〉，頁 158。

¹⁵¹ 〈序言〉，李新主編，《中華民國史第一編：中華民國的創立（上）》，（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 1。

¹⁵² 石劍峰，〈《中華民國史》：從「險」學到「顯」學〉，頁 92。

1979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李新公開宣布編寫中華民國史的計畫後，隨即引起臺灣黨政學界的震驚與議論。有人直指，中共編寫中華民國史的目的，是企圖以中國歷代王朝纂修「斷代史」的觀念，暗示「中華民國」的結束，並且以反共與否作為重新評價歷史人物的標準。¹⁵³

由於中共宣稱纂修中華民國史，臺灣學界因此如火如荼地討論是否也應立即纂修國史，然而意見相當分歧。根據林正慧的研究，當時臺灣內部大致有五種不同意見：其一，為了延續中華民國的發展，應該要「趕修」，吳相湘、李璜、沈雲龍、張玉法等人持這看法；其二，只有滅亡的朝代才有斷代史，認為「不可修」，賴淵光、梁敬錚持這意見；其三，待反攻大陸國家統一後再修，現在不須與中共唱和，此為嚴靈峰的主張；其四，官方可纂修年譜，民間進行專題研究，兩者合併即成一部完整歷史，此為李雲漢的見解；其五，加緊從事專題研究、整理史料，累積一定的學術成果，民國史便自然修成，張朋園、李守孔持這看法。¹⁵⁴

國民黨政府決定綜合學界意見，融合第一和第四種看法，由官方和學界合作，共同「趕修」國史。1980 年，行政院指示教育部召集黨史會、國史館和中研院近史所等史政及學術機構，共同籌備「中華民國建國史」的編纂工作。¹⁵⁵ 並於 1981 年 8 月 24 至 28 日，由黨史會、國史館、中研院近史所及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等黨、政、學機構共同主辦，在臺北圓山大飯店盛大舉行國際學術研討會，以「中華民國建國史」為主題，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黨史會主委秦孝儀為總召集人，黨史會且負責籌備並負擔所有費用。¹⁵⁶

事實上，此一會議的召開亦是國民黨政府在文化戰場上對中共所進行的反制行動。中共自 1978 年鄧小平掌權後，除了在經濟上改革開放，在對臺政策方面也有所調整，提出「一國兩制」方案，從武力解放臺灣，改為對臺灣人民及海外華僑和平統戰，且決定在 1981 年辛亥革命七十週年時，於武漢召開國際學術會議，頗有與國民黨政府爭奪辛亥革命紀念領導權的態勢。面臨中共的挑戰與臺灣

¹⁵³ 王壽南，〈我對編纂國史的看法〉，《中國時報》，1980 年 10 月 10 日，第 14 版。

¹⁵⁴ 林正慧，〈遷臺後民國史之定位及思考〉，收入吳淑鳳等編，《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下）》，頁 1097-1099。

¹⁵⁵ 李雲漢，《史學圈裏四十年》，頁 271。

¹⁵⁶ 李雲漢，《史學圈裏四十年》，頁 152。

內部鼓吹「臺灣意識」的在野反對勢力，當時的總統蔣經國除了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為口號，並一再宣示反共與反臺獨。¹⁵⁷

對於「中華民國建國史」研討會的召開，《傳記文學》雜誌創辦人劉紹唐曾明確指出：此次研討會的召開，實際上就是對中共倡言纂修「中華民國史」的被動「招架」，帶有「迎戰」性質。他也表示，自 1962 年《傳記文學》創刊以後便多次呼籲撰寫民國史，然得到的反應極為有限。他認為，長期以來「某些當局」始終將歷史研究當作宣傳工作的一部分，史料缺乏有系統地保存、整理，且有許多檔案被禁止開放，加上研究者必須主動迴避政治上的禁忌，使國內的歷史出版品往往被視為八股，缺乏閱讀價值與說服力，更無法在國際學術界占一席之地。因此，他呼籲有關當局應迅速大量、大膽地開放史料，並編印工具書，供史學研究者利用。¹⁵⁸劉紹唐的大聲疾呼，充分說明了即便黃季陸標舉「公開史料便利研究」的工作方針，秦孝儀亦將黨史會史料集中於陽明書屋，然而遲至 1980 年代，黨政機構公開的史料仍是相當有限。

此次國際研討會結束後，便有立委針對國史館提出質詢。1981 年 9 月 22 日，立委王夢雲以書面形式促請國史館應從速纂修中華民國史，內文還提到：

此次召開之建國史事，由國民黨主持，雖其陳列之史料，琳琅滿目，千真萬確，毫無瑕疵，然恐無聊政客、性僻學者，肆意破壞，誣以國民黨自我杜撰，勢所難免，正所謂人心維危，道心維微也。為期正大光明，防口如防川起見，允宜統由國史館辦理，正符國史由官修之先例。¹⁵⁹

由此可知，雖然法律明定由國史館負責纂修國史，然而在長期的黨國體制下，中華民國史幾乎等同於國民黨黨史，因此黨史會才是真正負責宣揚國史、舉辦學術活動，和國內外學界聯繫的主要窗口，國史館則多扮演協助的角色。前文提到的《中華民國建國史》，也非由國史館主導，而是由教育部主持，動員國內近百位

¹⁵⁷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臺北：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1），頁 679-680。

¹⁵⁸ 劉紹唐，〈寄望於「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會者〉，《傳記文學》，39：2（臺北，1981.8），頁 10。

¹⁵⁹ 〈對行政院孫院長運璿施政報告繼續質詢〉，《立法院公報》，第 70 卷 76 期，1981 年 9 月 22 日，頁 60。資料檢索自「立法院智庫整合檢索系統，網址：<https://lis.ly.gov.tw/lydbc/lydbkmout?.04910B11000000E00000000010001081100000000109C0008F2003c20>，檢索日期：2020/9/10。

學者共同編寫而成，最後由隸屬於教育部的國立編譯館出版。¹⁶⁰

從表 17 可知，《中華民國建國史》編纂委員會的主任委員仍是黨史會主委秦孝儀，委員主要來自中研院近史所、黨史會和國史館。換言之，此計畫雖然是由教育部主持，然而主要執行的單位仍是以黨史會為主，中研院近史所和國史館則為協辦單位。

再從各編纂小組的召集人和執行秘書來看。第一至第四篇對日抗戰以前的部分主要由中研院近史所和黨史會負責，其餘第五篇「戡亂與復國」部分才是交由國史館。¹⁶¹撰寫人員則是由以上三個單位共同推薦國內的專家學者，經教育部同意後，分別組成編輯小組，擬定各篇章節分頭撰寫。¹⁶²除了各領域的專家學者，從名單上亦可見到當時的聯勤總司令蔣緯國、外交部政務次長錢復，以及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局長林克承等有實際經驗或熟悉該事務的黨國政要。

表 17 《中華民國建國史》編纂委員會成員

職稱	姓名
主任委員	秦孝儀
委員	王聿均、李國祁、李雲漢、呂實強、黃季陸、張玉法、許朗軒、許師慎、蔣永敬、賴啓
第一篇：革命開國編輯小組	李雲漢（召集人）、孫子和（執行秘書） 王聿均、王曾才、宋晞、李國祁、呂士朋、呂芳上、呂實強、吳振芝、林能士、孫子和、陳三井、陳捷先、陳驥、張玉法、張存武、陶英惠、蔣永敬
第二篇：民初時期編輯小組	呂實強（召集人）、張玉法（執行秘書） 王聿均、王家儉、王樹槐、李國祁、李毓澍、林明德、范毅軍、陳三井、張玉法、張瑞德、黃嘉謨、黃福慶、陶英惠、趙中孚、劉鳳翰、劉翠溶、賴澤涵、戴玄之、蘇雲峯
第三篇：統一與建設編輯小組	蔣永敬（召集人）、徐鰲潤（執行秘書） 王正華、王樹槐、李又寧、李國祁、李雲漢、林能士、林澤震、胡春惠、徐震、陳存恭、陳哲三、陳聖士、梁尚勇、陶英惠、曾濟群、趙中孚、趙洪慈、閻沁恆、賴澤涵、戴玄之
第四篇：抗戰建國編輯小組	許朗軒（召集人）、呂芳上（執行秘書/前）、邵銘煌（執行秘書/後） 王家樹、李正中、李雲漢、周建卿、林衡道、胡春惠、侯家駒、袁睽九、袁頌西、陳三井、張天開、張維、張達、陸民仁、陸京士、項迺光、郭華倫、

¹⁶⁰ 李雲漢，《史學圈裏四十年》，頁 271；吳淑鳳，〈遷臺後國史館的昔與今〉，頁 30。

¹⁶¹ 許師慎時為國史館榮譽纂修、胡健國為國史館協修。

¹⁶² 李雲漢，《史學圈裏四十年》，頁 272。

	郭榮趙、孫子和、黃大受、曾永賢、鈕長耀、葉楚生、葉蔭民、閔劍梅、黎東方、劉脩如、劉崇齡、蔣緯國、諸大文、錢復
第五篇：戡亂與復國編輯小組	許師慎（召集人）、胡健國（執行秘書） 王洪鈞、王壽南、白俊男、朱沛蓮、沙燕昌、吳聰賢、林克承、施敏雄、郎裕憲、侯家駒、高應篤、梁尚勇、陳孟堅、陶英惠、許師慎、許智偉、張潤書、黃大受、楊叔蓀、雷飛龍、虞德麟、趙洪慈、趙振績、劉錫五、蔣君章、鄭彥棻、錢復、遲景德、賴賢、薄慶玖

資料來源：整理自孫子和，〈教育部主編「中華民國建國史」簡介〉，《近代中國》，93（臺北，1993.2），頁 135-137。

從表 18 可知《中華民國建國史》共分五篇，每篇各有數章，各章之下尚有各節，分由熟悉該領域的學者負責撰寫。該書〈編撰例言〉第一條指「本書敘事以中華民國自革命開國以至今日的建國過程為範圍」，第六條稱「本書為近代通史之形式，撰寫則出以學術研究之態度」，故具備「一般大學教科書與專門著作」的雙重性質，第七條更強調敘事「盡可能引用直接史料及學術專著與研究論文，外文著述亦兼採用之」。¹⁶³由此可知，該書特意採取通史形式而非編年體裁，以避免確立時間斷限，使中華民國陷於斷代史的危機。更強調其為學術論著的性質，可供大學歷史教育或學術研究之參考，亦在凸顯該書係秉持實證史學精神來書寫，而非如中共套入唯物主義的理論公式。不過，從該書的章節內容來看，敘事主軸仍是以孫中山、蔣中正和國民黨為中心，臺灣的歷史始終被依附於中華民國的革命敘事中。

表 18 《中華民國建國史》篇章名稱

篇名	章名	出版年分
一、革命開國	（一）革命背景（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三）革命組織的建立與發展（四）理論與宣傳（五）歷次舉義（六）武昌起義（七）各省光復（八）中華民國的建立（九）各國反應與影響（十）開國規模	1985
二、民初時期	（一）民初政局的演變（二）政府與政治（三）中外交涉（四）經濟發展（五）社會變遷（六）文化與思想	1987
三、統一與建設	（一）護法運動（二）北伐之準備（三）國民政府成立與出師	1989

¹⁶³ 〈編撰例言〉，教育部主編，《中華民國建國史第一篇革命開國（一）》（臺北：國立編譯館，1985），頁 1。

	北伐（四）清黨與完成北伐（五）北伐期間之外交、財政與民運（六）實施訓政與軍政建設（七）各項建設事業（八）剿共之進行（九）內亂之平定	
四、抗戰建國	（一）日本對華之侵略（二）全面抗戰（三）戰時政治建設（四）戰時經濟建設（五）抗戰時期的教育與文化（六）抗戰時期的社會發展（七）戰時外交（八）中共破壞抗戰（九）叛國偽組織（十）臺胞響應抗戰與臺灣光復	1990
五、戡亂與復國	（一）中共叛亂與美俄介入（二）實施憲政（三）戡亂失利與政府遷臺（四）憲政體制之維護（五）政治與國防建設（六）經濟建設（七）教育與文化（八）中共之竊據大陸（九）反攻復國之瞻望	1991

資料來源：整理自孫子和，〈教育部主編「中華民國建國史」簡介〉，《近代中國》，93（臺北，1993.2），頁 135-137。



第四章 民主化的衝擊與修史工作的調整

1984 年黃季陸館長請辭後，國史館館長先後由朱匯森¹、瞿韶華²、潘振球³擔任，至 2000 年首次政黨輪替，始由學者張炎憲接任新館長。這 16 年間，臺灣的政治發展逐漸往自由化、民主化的方向邁進。如學者薛化元所述，1980 年代以後，蔣經國總統開始實施有限度的自由化改革，於 1987 年宣布解嚴；李登輝總統上任後，加速臺灣的民主化進展，啟動憲政改革，於 1991 年終止動員戡亂、廢除「懲治叛亂條例」，又於 1992 年將國會全面改選，並修正刑法一百條，使長期以來的強人威權體制得以終結，人民的言論與思想自由獲得保障。⁴另一方面，日本學者若林正丈也指出，中華民國政府在上述改革過程中，無論政治菁英、政治權力的正統性基礎、國民統合意識形態或國家體制皆邁向「臺灣化」，蔣經國總統逝世後此趨勢尤為明顯。⁵

在上述背景下，本章將探討作為官方修史機構的國史館，在臺灣民主化與中華民國臺灣化的發展過程中會面臨哪些衝擊，對修史工作造成哪些影響。首先，觀察解嚴以後外界對國史館的質疑，了解檔案法制定過程何以引發國史館的定位與存廢爭議；其次，檢視三位館長在國史館內部所作的調整與改革；最後，分析

1 朱匯森（1911-2006），江蘇南通人。1943 年自南京中央大學師範學院教育系畢業後，先後在教育部、南京市政府工作。1948 年底來臺，任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秘書。後曾任臺南師範學校校長、臺中師範專科學校校長、臺灣省政府教育廳主任秘書、教育部部長等職。參見簡笙簧，〈永懷朱館長匯森先生〉，《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40 期（新店，2006.6），頁 176-183。

2 瞿韶華（1914-1996），河北定興人。北平朝陽大學法律系畢業後，從事國民黨黨務工作，曾任北平市黨部幹事、天津市戡亂建國動員委員會秘書長。1949 年來臺，任臺灣省政府教育廳人事室主任，隔年任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總幹事。其後，歷任行政院秘書長、考選部部長、革命實踐研究院辦公室主任等黨、政要職，長期擔任國民黨重要行政幕僚。參見治喪委員會，〈瞿韶華先生生平事略〉，《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20 期（新店，1996.6），頁 275-276。

3 潘振球（1918-2010），江蘇嘉定人。國立藍田師範學院教育系、中央幹部學校研究部畢業。曾任國防部特設杭州青年中學校長、國防部預備幹部訓練團第一總隊少將副總隊長。1949 年中旬來臺，旋任臺中第二中學校長。其後，歷任臺北成功中學校長、臺灣省訓練團教育長、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廳長、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救國團主任等職。1989 年擔任總統府國策顧問。參見朱重聖、張世瑛，〈國史館館長潘振球先生事略〉，《國史館館訊》，6（臺北，2011.6），頁 163-165。

4 薛化元、楊秀菁，〈強人威權體制的建構與轉變（1949-1992）〉，收入李永熾、張炎憲、薛化元主編，《人權理論與歷史論文集》（新店：國史館，2004），頁 306-315。

5 若林正丈著，洪郁如、陳培豐等譯，《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頁 485、488。

國史館的修史成果，以及「國史」的內涵是否隨中華民國逐漸臺灣化而有所轉變。

第一節 國史館定位與存廢爭議

1987 年 7 月 15 日，蔣經國總統宣布臺灣本島及澎湖地區解嚴後，臺灣的政黨政治漸趨活躍，過去的黨政關係及政治案件開始受到檢討，國史館也遭受質疑。1988 年蔣經國總統逝世、李登輝總統繼任後，民進黨立委開始對國史館與黨史會的關係進行猛烈抨擊，國史館本身的定位也在 1990 年代以後，政府制定「檔案法」的過程中被提出檢討，進而引發存廢爭議。為此，國史館人員不得不開始思索將來組織的定位與轉型方向。以下先就立委們對國史館與黨史會的質詢進行討論。

一、與黨史會的職司混淆

最先對國史館與黨史會提出批評的是民進黨立委吳淑珍。1988 年 4 月 26 日，吳淑珍在立法院質詢行政院院長俞國華時，指國民黨政府至今仍存在「黨國分際不明不白」的現象；國史館宛如黨史會的附屬單位，國家重要檔案皆由黨史會收藏、管理及編纂，所謂的「中華民國史」宛如「中國國民黨黨史」的官方紀錄，且兩者職司混淆，國史館淪為提供黨國元老「政治酬庸的養老機構」。因此，她提出兩項具體建議：

（一）將「國民黨黨史會」中的「大溪檔案」歸還總統府，「陽明書屋」歸建政府單位管理，重要國家史料歸諸國史館。

（二）將國民黨黨史會中，干涉國史館職權及行政工作以適當裁抑，以表示政府落實「黨國分際」之誠意。⁶

另一位民進黨立委余政憲也強調，「應讓國史的歸國史，黨史的歸黨史」，並主張國史館館長應由專業人才擔任。他以當時的國史館館長朱匯森在接受新聞媒體採訪時的發言為證，稱國史館因歷史因素及人力財力的不足，「長期以來都屈居在國民黨黨史會之下」，更指出，黨史會主委秦孝儀「黨政關係良好，爭取經費及

⁶ 《立法院公報》，第 77 卷 34 期，1988 年 4 月 26 日，頁 110-112。

其他支援非常容易，許多大型活動如果沒有他，根本辦不起來」，「黨史會的黨和國家的史料比國史館豐富，重要性也比國史館強」，「由於歷史及政治因素影響，目前國史館受到黨史會很大的協助」。⁷

由上可知，民進黨立委關切的重點實為檢討國民黨長期執政以來的「黨國不分」。他們認為，國史館地位低落的原因，在於重要檔案及各項資源幾乎皆由黨史會所把持，加上國史館館長皆非專業史學人才，而是黨政元老，形同政治酬庸。因而國史館應與國民黨、黨史會劃清界線，將原本屬於總統府的檔案歸還總統府，館長一職交由專業人才來擔任。

對此，行政院雖有回應，卻避重就輕，指國史館隸屬於總統府，非該院的職權範圍。⁸不過，從國史館在臺復館後歷任館長的背景來看，民進黨立委們的質疑亦非虛假。根據表 19，第一次政黨輪替前國史館的館長皆為國民黨政要，此外，除了瞿韶華，其餘館長都曾擔任過高中或大學校長；黃季陸與朱匯森更曾擔任教育部部長，潘振球亦曾任臺灣省教育廳廳長；瞿韶華則在國民黨內長期擔任高級行政幕僚，亦曾任考選部部長，朱匯森館長期間曾提出的兩次甲等特考，便是在他任內舉辦的，當時通過考試的錄取者朱重聖，在瞿韶華接任國史館後，又被拔擢為副館長，成為國史館在臺復館後的首位副館長。

單就國史館館長而論，民進黨立委批判的「黨國不分」情形，在第一次政黨輪替以前始終存在；再從這五位館長接掌國史館時的年齡來看，平均年齡高達七十二歲，當中首任館長羅家倫竟是最年輕者，此後的館長皆以七十歲為基準不斷攀升，潘振球上任時已年近八十。另外，就學歷而言，只有羅家倫館長和朱重聖副館長受過專業史學訓練，其他四位館長皆非歷史學出身。這些情形直到政黨輪替後才有明顯改變。

表 19 第一至第五任國史館在臺館長資歷（1957-2000）

任別	任期	姓名	接任館時年齡	學歷	重要經歷
一	1957.6.29- 1969.2.26	羅家倫	61 歲	北京大學文科；美國、德國及法國各	政務：北京清華大學校長、南京中央大學校長、中央政治學校教務主任（1931-1934）、駐印大使（1947-1950）、

⁷ 《立法院公報》，第 77 卷 35 期，1988 年 4 月 30 日，頁 63-64。

⁸ 〈行政院函〉，《立法院公報》，第 77 卷 85 期，1988 年 7 月 26 日，頁 256；〈行政院函〉，《立法院公報》，第 77 卷 80 期，1988 年 7 月 11 日，頁 140。

				大學歷史研究	考試院副院長（1952-1954）、國策顧問（1954-1957） 黨務： 黨史會主任委員（1950-1968）
二	1969.2.26- 1984.6.6	黃季陸	70 歲	美國威斯靈大學政治學	政務： 四川大學校長、內政部部長（1952-1954）、考選部部長（1958-1961）、教育部部長（1961-1965）、國策顧問（1965-1968） 黨務： 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黨史會主任委員（1968-1971）
三	1984.6.6- 1990.9.12	朱匯森	74 歲	南京中央大學師範學院教育系	政務： 臺中師範專科學校校長、臺灣省政府教育廳主任秘書、教育部部長（1978-1984） 黨務： 國民黨臺灣省黨部副主任委員
四	1990.9.12- 1995.3.16	瞿韶華	77 歲	北平朝陽大學法律系	政務：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專門委員兼人事室主任、行政院秘書長、考選部部長（1984-1990） 黨務： 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總幹事、革命實踐研究院辦公室主任、國民黨中央委員
五	1995.3.16- 2000.4.1	潘振球	78 歲	藍田師範學院教育系、中央幹部學校研究部	政務： 臺北成功中學校長、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廳長、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1972-1978）、總統府國策顧問（1987-1995） 黨務： 國民黨中央委員、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中國青年救國團主任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羅志希先生傳記暨著述資料》，頁 113、116-122、131、133、135、140；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黃季陸先生與中國近代史研究》，頁 679、687、689-692；簡筌簧，〈永懷朱館長匯森先生〉，《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40 期（新店，2006.6），頁 176-178；治喪委員會，〈瞿韶華先生生平事略〉，《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20 期（新店，1996.6），頁 275-276；朱重聖、張世瑛，〈國史館館長潘振球先生事略〉，《國史館館訊》，6（臺北，2011.6），頁 163-165。

二、檔案開放問題

政府檔案不開放與國史纂修與否也受到外界質疑。國民黨籍僑選立委許禎祥曾在 1991 年 3 月，就檔案議題質詢當時的行政院院長郝柏村。他認為社會已漸趨自由化，許多過去的重大政治爭議，如二二八、張學良、孫立人及西安事變、

雷震獄中資料被焚等，近來皆重新獲得世人與媒體的關注，卻有不少政治懸案因政府資訊不公開而難以佐證。因此他建議，行政部門儘早建立檔案管理制度，提出「檔案管理法」，設立「國家檔案管理局」，使「政府資訊自由化」。如此一來，或許也能對政府官員的決策與貪汙產生一定的嚇阻作用。⁹另外，許禎祥也批判國史館毫無作為，認為「所謂的正史，大都是為政治服務，未嘗試真正為了歷史研究而修史」。¹⁰可知即便是國民黨籍立委，對國史館的存在價值與學術地位也感懷疑。雖然學界也曾指國史館和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皆非純粹的學術機構」，¹¹然從前文的修史條件來看，國史館在推動中國現代史的研究、檔案徵集與《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的編纂上仍有一定的成果，全盤否定實不盡公允。不過許禎祥對官方修史的質疑，在〈檔案法〉制定時再度成為討論焦點，更與檔案的中央主管機關設置相互糾結，而引發國史館的定位問題與存廢爭議。

三、制定〈檔案法〉的提出

由於國民黨政府一直沒有針對政府檔案予以法律明文規範，僅頒布沒有強制力的行政命令，因此早期公家機關對政府檔案的管理並不重視，對於國史館的檔案移轉與保存作業甚為不利。黃季陸擔任館長時，即曾提議修正〈國史館組織條例〉，主張將國史館的職掌改為「掌理國史及檔案總庫事宜」，認為國史館可增設檔案總庫，掌理全國檔案管理事宜；此外，也建議擬定「檔案保存法」，「明定各機關對保存檔案應有之設施及應負之責任」。¹²以加強公家機關對檔案的重視，方能有助於國史纂修與學術研究。然國民黨政府直到快宣布解嚴才開始正視此問題。

現行〈檔案法〉的制定與國史館有密切關連。1987年6月10日，國史館館長朱匯森在國民黨中常會進行工作報告時，向黨中央呼籲早日制定「國家檔案法」，以「劃定檔案管理權責，建立管理制度，規定移轉程序」，使國史纂修有更多檔案能參考作為依據。¹³該提議獲得會議主席蔣經國總統的贊成，並直接交辦國史

⁹ 《立法院公報》，第80卷24期，1991年3月22日，頁251-252。

¹⁰ 《立法院公報》，第80卷24期，1991年3月22日，頁252。

¹¹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研究在臺灣〉，《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8（臺北，1989.9），頁61、64-66。

¹² 「修正『國史館組織條例』之擬議」（1977年10月20日），〈國史館編纂中華民國國史計劃相關資料（影本）〉，《個人史料》，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1280044910036A。

¹³ 〈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國史館近年重點工作〉，《參考史料》，國史館藏，入藏登

館負責擬定法案內容，國史館遂正式展開〈檔案法〉的草擬工作。然〈檔案法〉的制定過程卻充滿曲折，先是因涉及中央行政管理事務，需交由行政院研訂與修正；送交立法院審議後，又因檔案的中央主管機關問題產生爭論，甚至引發國史館的定位問題與存廢危機，最後總共花費 12 年的時間，經過不斷的開會討論、修正法案內容及黨政、朝野協商，1999 年 12 月 15 日〈檔案法〉始由李登輝總統公布，2002 年 1 月 1 日開始施行，自此政府檔案的管理、保存與公開才有法律的明文規範。¹⁴

國史館最初的構想，係由行政院設置「國家檔案館」，負責主管全國檔案管理事務，國史館則專責纂修國史。然而 1990 年瞿韶華館長上任後，國史館的立場卻有了轉變，轉而向行政院表示願意擔任檔案的中央主管機關，因館內修纂人員擔憂未來國史纂修將無檔案可考，因而提出建議。由於國史館隸屬於總統府，重要決策需獲得總統府的同意，當時總統李登輝卻表示檔案管理屬於行政權，由行政院掌理較為適當。換言之，李登輝不贊同國史館同時掌理全國檔案管理事務，瞿韶華態度轉趨消極，「檔案法草案」遂於 1992 年後進入漫長的立法院審查階段。¹⁵此後長達 7 年的時間，朝野立法爭論的焦點一直圍繞在檔案的中央主管機關問題。由於民進黨立委林濁水的提議，直接引發國史館的定位及存廢爭議。

1996 年 9 月 16 日，林濁水在立法院的法制委員會直接表明國史館可改組為國家檔案局。其主要理由有二：一是國史館與國家檔案局性質相近，因此沒有必要保留國史館，於檔案局中設置國史編纂委員會即可；二是反對官方修史，因民主國家有別於政治掛帥的共產黨，應丟棄意識形態，而首要條件便是「廢除國史館！」。¹⁶由此可知，林濁水的主要目的是藉由國家檔案局的設立，同時裁撤國史館。

國民黨立委劉光華率先表示反對。他認為「國家檔案局的成立，與國史館存廢是兩件事」，且「國史館是依國史館組織條例設立」，該條例未廢除前，不能以

錄號：141000000684A。

¹⁴ 中共政府在 1987 年 9 月時已通過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並於隔年 1 月開始施行。參見廖彩惠，〈我國檔案法立法過程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學位論文，2006），頁 25、43；簡筌簫，〈試論檔案法立法與國史館應對關係—以檔案中央主管機關為中心的探討〉，《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42 期，（新店，2007.6），頁 206-207。

¹⁵ 簡筌簫，〈試論檔案法立法與國史館應對關係—以檔案中央主管機關為中心的探討〉，頁 195、199、202-203。

¹⁶ 《立法院公報》，第 85 卷 44 期，1995 年 9 月 16 日，頁 403-404、406。

檔案法條文變相砍掉國史館。他更指出，「最反對成立國史館的不是民進黨，而是共產黨，因為中共根本不視 1949 年之後的中華民國為合法政府」，因此主張國史館可由民意部門來監督，不應踐踏國史館人員長期以來的努力。¹⁷

當時國史館副館長朱重聖則作出三點回應：首先，「國史館只是檔案的保存者及整理者」，非檔案事務管理單位；其次，國史館所藏檔案，「百分之六十以上都是大陸運臺的舊檔，就檔案四大功能而言，學術研究的功能最大」；其三，國史修纂非我國獨有，其立場必須超然，因此「古今中外的修史機關都是置身在行政機關之外」，如美國國家檔案局下有國史修纂委員會，英國國史由大英博物館負責修纂，法國國史由國家檔案館負責，韓國亦設有國史編纂委員會，這些單位皆是直接向該國總統負責。¹⁸朱重聖以他國政府亦有官方修史為例，反駁林濁水的說法，為國史館的職司作辯護；另外，他亦強調國史館的學術研究性質，主張國史館應繼續隸屬於總統府，不受行政機關的干涉。然而該次會議最終在民進黨立委佔多數的情況下，林濁水的提案獲得通過。〈檔案法〉即將進入二讀，國史館的定位問題與存廢危機也正式被點燃。

1997 年開始，國史館多次召開館內人員座談會並進行問卷調查，討論國史館的組織調整方向。然而館內成員意見分歧，有人反對改組為國家檔案局，希望延續修史職掌，主張國史館可同時管理檔案事務；也有人擔憂國史館被裁撤，而贊同改隸行政院。經過 1 年多的討論，多數館員贊成同時掌理修史與檔案管理事務，機關之層級和名稱亦可配合政府組織架構做調整。這樣的結果，其實反而與林濁水的提案相似。¹⁹

事實上，在國史館定位與存廢爭議正式爆發以前，國史館就曾在 1995 年邀請旅美檔案學專家李長堅至國史館演講，介紹美國國立檔案館的工作與職責。當時他除了呼籲檔案法立法應盡快完成，也建議國史館可改為國立檔案館，因全世界唯獨中華民國還沒有名為國立檔案館的機構。他建議參考美國國立檔案館，設置四個單位，包含國史處（專門著重國史研究）、文件管理處、總統圖書館處、電腦文件處理等。²⁰其構想可謂洞見觀瞻，預示了將來國史館的困境。

¹⁷ 《立法院公報》，第 85 卷 44 期，1995 年 9 月 16 日，頁 405、419。

¹⁸ 《立法院公報》，第 85 卷 44 期，1995 年 9 月 16 日，頁 407。

¹⁹ 簡筌簫，〈試論檔案法立法與國史館應對關係—以檔案中央主管機關為中心的探討〉，頁 213-215。

²⁰ 李長堅主講，陳淑銖紀錄，〈保存美國文化的國立檔案館〉，《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20 期（新店，1996.6），頁 5-6。

遲至 1998 年 7 月，檔案的中央主管機關問題仍爭吵不休，國史館的存廢危機也持續延燒，中研院院士張玉法乃在中研院的院士會議中，發起國史館保衛行動。他希望聯合學術界的力量，呼籲總統府、行政院和立法院排除立法干涉學術，重視國史館的修史與撰史任務。此外，中研院副院長楊國樞也指出，該院的學術諮詢總會將請院長李遠哲致函立法院，呼籲重視學術界意見，同時向行政院院長蕭萬長表達心聲，希望政府能正視國史館的學術地位。他也期盼關心此議題的學者能向媒體投書，形成輿論力量。²¹

並非所有的民進黨立委都贊成林濁水的主張。如曾加入民進黨後獨立參選的無黨籍立委許添財即不反對官方修史。他認為，「國史和檔案根本是兩回事……未來要努力的是如何思考盡速蒐集史料，以呈現真實的歷史面貌」。²²不同於新潮流系的林濁水，民進黨的另一派系「福利國連線」立委李俊毅、柯建銘、蔡同榮等 8 人亦反對將國史館改組為國家檔案館，認為國史應由獨立超然的機構撰寫，否則「將不免淪為政治宣傳的工具」；更稱：

「國無史則亡」，無論這個「國」是中華民國或臺灣共和國，即使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都不能沒有歷史。是故國史館的存在，除了其保存史料的功能外，不但與檔案館沒有職務重疊之處，更沒有裁撤之理由。在這個已經不大重視歷史的社會裡，更有其保留的意義和價值。²³

整體而言，民進黨內部對於官方修史制度的看法並不一致。林濁水的立場充分表明反對官方修史，因此主張國史館應予裁撤；李俊毅、柯建銘等人則傾向保留，否則「中華民國」或「臺灣共和國」將來若不幸滅亡，國家將難以復甦。後者的主張其實和當年的朱希祖、張繼等人欲以國史凝聚中國人民的抗日精神，呼籲國民黨政府重設國史館的理由如出一轍，只是抵抗的對象已從日本轉變成中共。此外，他們的論述也體現了隨著與「中國民族主義」不斷抵抗而成長的「臺灣民族主義」——1970 年代後期開始滋長、1980 年代茁壯，成為黨外人士的核心理念。

²⁴福利國連線立委們則把中華民國與臺灣共和國並列，可以說巧妙地融合了兩種

²¹ 〈捍衛國史館 中研院力挽狂瀾〉，《中國時報》，1998 年 7 月 5 日，第 10 版。

²² 〈國史館存廢 副館長朱重聖盼真實呈現歷史面貌〉，《中央日報》，1998 年 3 月 3 日，第 10 版。

²³ 《立法院公報》，第 87 卷 32 期，1998 年 9 月 11 日，頁 3003。

²⁴ 若林正丈著，洪郁如、陳培豐等譯，《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頁 333-334。

原本意識形態壁壘分明的民族主義，試圖模糊兩者界線，強調內部的團結，以形塑新的臺灣認同，為將來的臺灣獨立建國提供發展空間。

臺灣民族主義的挑戰與政黨政治的衝擊，迫使國民黨政府逐步調整中國本位政策。日本學者若林正丈指出，國民黨在李登輝總統上任後，不論是政府決策或是黨內的非主流派，在中國與臺灣兩大民族主義對抗的意識形態光譜中，皆逐漸往中間靠攏，具體表現在李登輝開始用「臺語」（福佬話）為國民黨候選人站臺造勢，以總統身分對外國媒體訴說「生為臺灣人的悲哀」，另一方面又發起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運動，以及規劃社區總體營造和推動教育改革。這些政策促使臺灣民族主義的位階逐漸被提升至「準官方意識形態」，中國民族主義的官方地位產生動搖，造成許多國民黨員的不安。²⁵黨史會的地位亦受衝擊。對於形勢之變化，前黨史會主委李雲漢曾不禁感嘆：

蔣經國先生於民國七十七年（一九八八）一月逝世後，中國國民黨開始逐漸背離傳統，走向衰落之路，黨史會的地位與功能，不再受到應有的關注，甚至認為是黨的歷史包袱，我親自經歷這段風雲慘淡的歲月，真的有無限憤慨，但卻無力又無奈。²⁶

1999 年 5 月，國民黨內召開黨政協商會議，最終決議保留國史館，同意其繼續隸屬於總統府，同時要求國史館組織必須進行調整。同年 6 月，立法院舉行朝野協商會議，結果包含林濁水立委在內，皆同意刪除「國史館改組為國家檔案局」的條文，〈檔案法〉遂於 10 月完成二讀。隔年（1999）11 月 30 日，三讀通過完成立法。²⁷至此國史館的存廢危機暫時解除，然國史館本身的定位問題仍有待討論。〈檔案法〉完成立法後，國史館必須修訂「國史館組織條例」，調整館內的檔案徵集與保管業務，重新規劃組織架構。此時適逢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因應 1998 年底臺灣省政府精省而同樣面臨組織調整，考量政府組織精簡及兩機構性質相近，兩者的合併成為政策規劃的主要方向。

²⁵ 若林正丈著，洪郁如、陳培豐等譯，《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頁 337-338。

²⁶ 李雲漢，〈黨史會七十年〉，頁 139。

²⁷ 簡笙簧、林秋敏，〈國史館復館 50 週年大事記〉，頁 310；簡笙簧，〈試論檔案法立法與國史館應對關係—以檔案中央主管機關為中心的探討〉，頁 215-217。根據簡笙簧所述，立委林濁水之所以在朝野協商時同意放棄改組國史館，是為了讓首要目標「檔案法」能早日通過，不再延宕，因而選擇退讓。

第二節 積極推動國史修纂

如上節所述，〈檔案法〉是當時國史館館長朱匯森為了修史需要而在黨內會議中所提議，未料反使國史館遭致定位問題與存廢危機。事實上，朱氏在接任國史館後，便立即推動國史纂修工作，指示國史館「今後當以纂修國史工作為重點，行政工作旨在配合纂修工作」，²⁸為此進行不少修史與行政業務方面的改革，俾使修史工作能順利進行。朱氏急於推動修史，一方面固是接任新館長，亟欲有所作為；一方面亦是他擔任教育部部長期間，曾奉命主持編纂《中華民國建國史》，充分了解國史纂修對維護政權法統地位的重要性，亦能符合當時總統蔣經國的執政需求。朱匯森接任館長時所揭櫫的國史纂修方針，即清楚顯示此意圖。他表示應根據國父孫中山的「民生史觀」，記述全體國民致力於國家現代化，以證明「三民主義之正確與成功」。²⁹此一說法，似已意味著「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將已逐漸代替過去的「反攻復國」、「反共抗俄」的「戡亂」訴求，國史纂修應配合當時的國策，強調孫中山創造的三民主義由蔣中正所承繼，領導臺灣現代化發展之成功。此後，在朱匯森的積極推動下，國史館的修史任務加速展開，先是擬定國史編纂計畫，繼而改革內部的修纂與行政業務，期能改善修史品質、提升工作效率。以下先就國史編纂計畫進行討論。

一、「中華民國國史」編撰計畫之擬定

1984年7月，朱匯森在國史館召開睽違近40年的國史體例座談會，商討國史編撰計畫。³⁰隨後國史館擬定「中華民國國史計畫綱要草案」，將國史體例分為政紀、志書、列傳、專題、圖表等五大類別和附錄，內容如下：

（一）政紀：紀載國家重大政事，採編年體。

²⁸ 簡笙簧、林秋敏整理，〈國史館復館50週年大事記〉，頁287。

²⁹ 〈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國史館近年重點工作〉，《參考史料》，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141000000684A。

³⁰ 民國以後有關國史體例的研訂，第一次是在1917至1919年間北京大學附設國史編纂處時期，第二次是在1947年國史館於南京正式成立以後，1984年的討論為第三次。參見朱重聖，〈民國以來國史館之修史工作〉，收入《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二）》（新店：國史館，1998），頁1199-1200。

- (二) 志書：以事為綱，記載靜態之典章經制。
- (三) 專題：亦以事為綱，對重大個案史事作動態深入之研究。
- (四) 列傳：以人為綱，記敘對國家社會具有重大貢獻及影響之人事，分為專傳及類傳兩體。
- (五) 圖表：補充紀、志、傳等文字敘述之不足，除使讀者有明顯之印象外，並對演變複雜史事，獲有概括及比較性之瞭解。
- (六) 附錄：包括編撰經過、詳細目錄、人名地名中外文對照表、索引等。如有獨立成書者，可在各書編列序言、對照表、索引等，以便查考。³¹

由上可見，該體例仍保有中國傳統史書之體裁，如「志書」、「列傳」與「圖表」可分別與《史記》的「志」、「列傳」與「表」作對應。然而，該草案已寓有新的時代精神及史學觀念於其中。如中華民國為共和國體，因此將「本紀」改為「政紀」，敘事主軸由專制君主轉變成國家重要政事；此外，因共和時代不分階級，沒有諸侯，故刪除「世家」，將文武官員及人民皆納入「列傳」。最重要的是，配合近代史學專業化，新增「專題」類別，進行個別專題研究，因此各類史學專著、專題史料彙編與研究論文，皆納入新的國史範疇。³²

1985 年，此計畫獲得總統府的批准並核示：「國史館七十五年會計年度增加工作重點，以加速史事紀要之編撰，擴增專題、志書與人物傳記史料之蒐集整理工作為主」。³³ 修史類別確立後，除了繼續編纂黃季陸館長時期的《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並額外增加志書、傳記及專題史料等項目。此外，朱匯森還延續黃季陸時期的「匪版史籍駁正」及「校註清史稿」兩大工作計畫。黃季陸時期，為了使臺灣成為反共復國的「文化新戰場」，聘請專家學者審訂中共出版之書籍，設置「審校史料研究室」。³⁴ 朱匯森進一步提出「匪版史籍駁正」計畫，聘請館外專

³¹ 「國史館編撰中華民國國史計畫綱要草案」(1984 年 8 月 22 日)，〈國史館編纂中華民國國史計畫相關資料(影本)〉，《個人史料》，國史館藏，1280044910036A。

³² 朱重聖，〈民國以來國史館之修史工作〉，收入《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二)》，頁 1023、1213。

³³ 〈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國史館近年重點工作〉(1987 年 6 月 10 日)，《參考史料》，國史館藏，141000000684A。

³⁴ 黃季陸曾在國史館工作會報時表示希望成立「審校史料研究室」，將留在大陸由中共出版之書籍，詳加審查並予以校正，避免中外歷史研究者誤用中共刻意歪曲過的歷史書刊。後據國史館纂修朱文原的回憶，該研究室黃季陸館長確實有成立，且為了適度開放應用，在 1981 年 4 月，國史館曾研擬「國史館審校史料室圖書閱覽規則」，不過該批史料備受政府重視，臺灣省警備

家學者就中共出版的史籍撰寫書評，將之出版提供外界參考，以避免國內外學界受中共影響，「遂其統戰的陰謀」。³⁵而針對前代史清史方面，採取「校註」方式校註《清史稿》，而非「重修」清史。該計畫源自 1978 年 10 月，當時黃季陸為了早日解決清史編纂問題，³⁶在好友錢穆的建議下，與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蔣復璁簽訂「執行清史稿校註纂修計畫合約」，前期校註工作由故宮組成的「清史稿校註小組」負責，國史館協助徵集史料、負擔費用及完成後期的總集成工作。朱匯森上任時，該計畫已進入後期由國史館校閱審查，即將編印付梓之階段，然又有學者提出重修清史之建議。³⁷除上述二者，朱匯森亦決定恢復《國史館館刊》，以「加強國史研究，介紹重要史料，促進學術交流」。³⁸

總司令部經常不定期派員視察，能經常至該研究調閱者多為黃季陸館長本人及國史館內的編修人員和史料處處長。參見黃季陸演講〈與中華民國同在〉（1975 年 7 月 2 日），收入國史館編，《復館以來的國史館》，頁 49；朱文原，〈驀然回首—我在國史館走過三十年寒暑（上）〉，《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43 期（新店，2007.12），頁 237-238。

³⁵ 〈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國史館近年重點工作〉（1987 年 6 月 10 日），《參考史料》，國史館藏，141000000684A。

³⁶ 1954、1959 與 1960 年，國大代表與監察委員皆曾催促政府盡速纂修清史，因據聞「大陸匪偽機構已決定整理清史稿，交由偽中華書局刊行，為求正確史實，免被共匪歪曲」，認為政府應盡速編纂清史並明定為「二十六史」，以「延續中華民族之正史於不斷」。國史館方面雖曾召開多次史料審查委員會，然考量當時清史材料不齊全，加上人力與經費限制，委員如蕭一山、李宗侗等人皆不贊成重修清史，認為當時唯一可行的是改正《清史稿》之謬誤。不過，在國防研究院主任張其昀獲得該院院長即總統蔣中正的批准下，最後由國防研究院主導、與中國文化研究所合作編纂的《清史》於 1961 年率先發行，然「此書一出，毀譽紛至」，評價不高。郭廷以曾在日記中寫到在國史館開會時，眾人「談及張曉峰新刊清史，姚從吾、羅志希、毛子水等多所譏評」。其實當時張其昀等人是為了與中共進行文化戰而倉促編纂「清史」，其在該書序言中也稱「理想中之清史，則寄望於後來之作家」，說明「清史」之重修仍有待他人日後完成。參見郭廷以，《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頁 240；〈序〉，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臺北：國防研究院，1961）。有關 1960 年以前國大代表及監察委員對重修清史之意見及國史館史料審查委員會之討論過程，可參考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頁 209-233；許師慎編，《有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各方意見匯編》，上下冊（新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79）；另有關國防研究院編纂《清史》之討論，可參考吳明勇的〈戰後臺灣史學的政治處境〉一文，此文對「清史爭修運動」與該書採取的「正統論」的中華民族史觀有強烈的批判，認為當時專家的「學術主體性」在「政治學術關係網絡」中，已成為一種「異化」。吳明勇，〈戰後臺灣史學的政治處境〉，《史耘》，5（臺北，1999.9），頁 151-157。

³⁷ 胡健國，〈清史校註〉，收入國史館編，《復館以來的國史館》，頁 121-122；蔣復璁，〈建議於清史稿校註審查後重修清史〉，《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1 期（新店，1987.1），頁 15。蔣復璁認為《清史稿》最大問題為義例不符，「內清室而外民國，以光緒、宣統二朝之謬誤最為嚴重」。

³⁸ 〈國史館館刊編輯要旨〉，《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1 期（新店，1987.1），頁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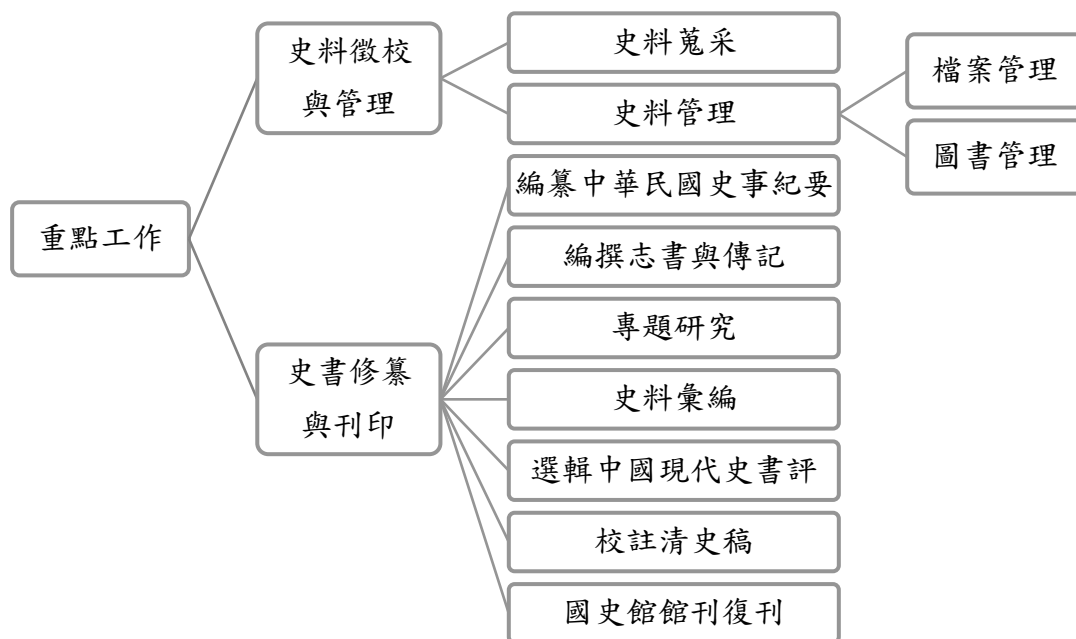


圖 4 國史館現階段重點工作（1987 年）

資料來源：整理自〈國史館現階段重點工作〉，《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2 期（新店，1987.6），頁 329-334。

1987 年，國史館的工作項目已大致確立，如上圖所示，包含史料徵集與管理、史書修纂與刊印兩方面。由於史料是修史的基礎，因此前兩任館長皆偏重史料徵集，朱匯森以後轉向兩者並重、同步進行。自此，國史館的修史職司開始步入正軌，為之後館長所延續。瞿韶華館長時，又漸次開展口述歷史、編纂建國文獻與臺灣史料、召開「中華民國史專題討論會」等工作項目。³⁹潘振球館長時，因受檔案法立法引發的國史館存廢爭議影響，大抵延續前人的計畫。然其任內卻有一重要大事，使國史館獲得國內外學界與媒體的廣大關注，即整理開放「蔣中正總統檔案」，此乃政府檔案開放的重要里程碑。綜上所述，朱匯森上任後，開始強化國史館的修史職掌；瞿韶華、潘振球在此基礎上繼續擴大修史業務。國史館的業務量和過去相比大幅增長，因此在人力、物力、經費與環境設備的需求方面皆相應提高；此外，為提升修史的品質與工作效率，國史館內亟需進行改革，三位館長任內皆有程度大小不一的改革措施。

³⁹ 朱重聖，〈國史館現階段重點工作及展望〉，《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19 期（新店，1995.12），頁 12。

二、相關業務的改革

（一）修纂業務合理化，提升整體學術水準

國史館修纂業務的改革大致朝合理化、學術化的方向前進。其方法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四點：首先，將編修人員進行任務編組。修史項目確立後，為使業務合理分配，朱匯森指示 1986 年 7 月起，編修人員需進行任務編組，分為史事紀要編校、匪版外版史料審鑑、清史稿校註、史料叢書編校、志傳史料蒐集編纂及館刊編校等 6 組。⁴⁰每小組皆有一名主持人，負責該項目之編纂計畫與擬定工作進度。隨著修史項目的增加，任務編組也持續新增。⁴¹其中，因應局勢改變，部份小組與計畫的名稱也有所調整。如「匪版外版史料審鑑」計畫，自 1989 年以後便多次修正計畫名稱，最後改成「中國現代史書評」，⁴²審鑑範圍亦不再侷限於外國書籍，國內著作也包含在內，⁴³與中共進行文化戰的色彩已逐漸淡化。

其次，《史事紀要》編纂合理化。過去《史事紀要》的編纂除年份並未依照時間先後順序，編纂方式又採每個年份多人分攤，編輯成員除了修纂人員、館外特約纂修，有時亦包含館內的行政人員。由於每人的史學專業程度落差，加上書寫筆法不一，且未有專人綜理檢校，導致該書品質參差不齊，⁴⁴曾被外界批評多採錄新聞報紙，不足為信史。⁴⁵朱匯森決定改變編纂方式，使其合理化、單純化，依照年份按部就班進行。其做法是由館內外的修纂人員每人專責一個年份，並落

⁴⁰ 簡筌箴、林秋敏整理，〈國史館復館 50 週年大事記〉，頁 290。

⁴¹ 至潘振球館長時期，國史館的任務編組已有史事紀要、史料叢書、傳記、志書、中國現代史書評、口述歷史、建國文獻及臺灣史料編撰等 8 組。朱重聖，〈國史館現階段重點工作及展望〉，《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19 期（新店，1995.12），頁 12-13。

⁴² 該計畫名稱經過三次變更：1989 年改為「中共版外版史料審鑑與澄清計畫」，1990 年再改為「中共版外版史料蒐集與評述計畫」，1996 年又改成「中國現代史料之蒐集與評述計畫」。朱重聖，〈民國以來國史館之修史工作〉，頁 1222，註釋 79。

⁴³ 〈國史館在臺復館大事記（民國八十二年）〉，《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15 期（新店，1993.12），頁 354。

⁴⁴ 長期負責此一項目的國史館纂修賴啓坦言，因沒有指定專人負責通盤檢校，有些年份「前後文字語式不同」，且「有的部分較簡略」，有時又有「內容重複之感」。此外，《史事紀要》內容涉及太廣，吃力不討好，導致行政人員與館外專家學者後來皆不願再參與是項編纂工作。賴啓，〈《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之編纂工作〉，《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42 期（新店，2007.6），頁 239-240。

⁴⁵ 劉劍寒，〈國史館現階段纂修中華民國史志書工作簡述〉，《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4 期（新店，1988.6），頁 343。

實署名制，以培養負責的態度且提升成就感；⁴⁶此外，為使修纂人員熟悉史料，並能互相支援、自我精進，自 1984 年 9 月起，每月皆舉行一次「史事紀要編纂座談會」，該小組成員須就其負責編纂的年份，輪流發表重要問題研究心得以及史料運用，至 1993 年 3 月為止，總共舉辦 92 次。⁴⁷從館內的工作紀錄可知，每次開會前，報告者必須提供報告大綱及相關參考資料，報告時間為 1 小時，討論時間為 40 分鐘，報告主題包括但不限於中華民國史事，亦有關注中共方面的局勢，如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1950 年代周恩來的外交活動等。⁴⁸

第三，舉行史學講座，擴大舉辦學術討論會。為提升修纂人員的史學專業、開拓其領域視野及激發創作企圖，自 1989 年起，國史館便不定期舉辦史學講座，邀請相關機構首長與海內外學者到館演講，主題多與修史有關，⁴⁹期能在修史方法、修史理念、史料整理及運用等方面給予國史館具體的建議。1993 年，館長瞿紹華將前述的史事紀要編纂座談會擴大為「學術討論會」，要求修纂人員輪流擔任主持人，且「全館修纂同仁一律參加」。⁵⁰學術討論會的形式比照學界標準，有明確的報告主題及指定評論人，且有專人負責紀錄。從下表可知，討論的主題除了軍政、外交，更擴及社會、經濟與法制領域。如 1993 年首次報告主題係以二二八事件為主角，顯然與李登輝總統時代，行政院成立「研究二二八事件專案小組」開始調查該事件及處理後續事宜有關。⁵¹此後，修纂人員學術討論會成為國史館的學術傳統，部分文章亦刊載於國史館出版的期刊中，作為另一種成果展示與學術交流。

⁴⁶ 以 1984 年 12 月出版的《史事紀要》為例，版權頁內容已出現變化，明確列出執行編務、編輯者、校對者之姓名。不同於以往，編輯者僅寫「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

⁴⁷ 賴啓，〈《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之編纂工作〉，頁 240-241。

⁴⁸ 〈國史館編纂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相關資料〉，《個人史料》，國史館藏，1280044910035A。

⁴⁹ 如毛漢光教授講述〈正史之修撰與資料之自動化—清史定稿之理論與實際〉，張玉法教授談論〈對纂修國史的一些看法〉，李雲漢教授〈漫談國史纂修與研究的幾個層面〉，李國祁教授〈漫談史學中的傳記寫法〉，宋晞教授〈談史料考證的重要性〉以及張朋園、沈懷玉兩教授介紹〈大陸民國檔案與民國史研究概況〉等。參見中國歷史學會，〈國史館史學講座〉，《中國歷史學會會訊》，35（新店，1990.1），第 7 版。

⁵⁰ 〈國史館在臺復館大事記（民國八十二年）〉，頁 349、351。

⁵¹ 事實上，在朱匯森館長時期便已開始徵集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檔案，1989 年 8 月 23 日，負責該項業務的國史館纂修洪桂己即以「從檔案看臺灣二二八事件」為主題於史事紀要小組座談會進行報告。〈國史館在臺復館大事記（民國七十八年）〉，《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7 期（新店，1989.12），頁 293。

表 20 國史館學術討論會報告主題（1993 年）

次	日期	報告人	報告主題	評論人	紀錄
1	1993.2.26	徵校處處長 侯坤宏	二二八事件有關史料之分析與研究	助修何鳳嬌	協修賴淑卿
2	1993.3.30	助修陳進金	抗戰前三民主義教育的實施與成效	協修葉惠芬	協修王正華
3	1993.4.27	助修陳清敏	清季自強運動時期「清議」之研究	助修陳亦榮	助修陳進金
4	1993.5.27	協修洪喜美	李烈鈞晚年的政治活動—在「以黨治國」中籲求開放政權	纂修徐鰲潤	秘書黃秀妃
5	1993.6.29	助修林秋敏	抗戰前十人國民政府的放足運動 (1928-1937)	協修高明芳	協修梁惠錦
6	1993.7.27	協修何智霖	張羣入主川政之經過(1938-1940)	協修胡昭容	協修葉劍青
7	1993.8.30	協修陳淑銖	福建龍巖扶植自耕農的土地改革 —1942-1947	處長簡笙簫	助修何鳳嬌
8	1993.10.27	助修吳淑鳳	中共「聯合政府」要求之探源	助修何思暐	纂修徐鰲潤
9	1993.11.29	協修周琇環	中英庚款成立之經過	科長侯坤宏	協修劉筱齡
10	1993.12.30	協修郭鳳明	沈家本與大清新刑律之制定	協修梁惠錦	纂修蕭良章

資料來源：整理自〈國史館在臺復館大事記（民國八十二年）〉，頁 349-360。

第四，與學界加強聯繫，舉辦大型「中華民國史專題討論會」。朱匯森剛上任，便積極與黃季陸時期已建立雙向互動關係的史政研究機構展開聯繫，期能保持交流，增加合作機會。如 1984 年 8 月起，朱氏便邀請呂實強、王曾才、吳圳義、李守孔等各大學歷史系所主任商談如何加強學術聯繫；另宴請素有往來的黨史會、中央研究院與國立故宮博物院等單位主管人員，以維持合作夥伴關係；⁵²派員參加國立政治大學、中研院近史所舉辦的學術討論會，發表文章，參與討論。⁵³同時，與國內會員最多且與官方關係密切的史學團體「中國歷史學會」保持往來，並延續黃季陸時期主持該學會的慣例，朱匯森於 1985 年 6 月被選為該學會副理事長，1989 年 7 月升任理事長。1990 年代以後因解嚴帶動了學術自由化，以臺灣為主體的新興史學團體陸續成立，⁵⁴中國歷史學會也回歸學術本位，改由

⁵² 〈國史館在臺復館大事記（民國四十六年至民國七十五年）〉，《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1 期（新店，1987.1），頁 290-291。

⁵³ 〈國史館在臺復館大事記（民國四十六年至民國七十五年）〉，頁 293-294。

⁵⁴ 最具代表性的有：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1991 年成立與立案登記）、臺灣歷史學會（1995 年成立、2000 年立案登記）。臺灣歷史學會遲至 2000 年才完成立案登記，係因此前受內政部「申請組織全國性社團須知」規定，全國性社團必須冠上「中華民國」、「中華」或「中國」的名稱限制。參見臺灣歷史學會，〈臺灣歷史學會之成立暨「國家認同研討會」〉、〈邁向 21 世紀的臺

學界主持，不過國史館成員仍參與其中，瞿韶華館長、主任秘書朱重聖與纂修遲景德皆為該學會理事；潘振球館長時期，副館長朱重聖與纂修胡健國亦分別擔任該學會的副理事長與秘書長。⁵⁵此外，1994年由政治大學歷史系發起的中國近代史學會，國史館要員也有參與。⁵⁶（中國歷史學會及中國近代史學會主事者名單，參見附錄三、四）

與國史館往來的歷史研究機構中，以研究主題相近的黨史會、中研院近史所最為頻繁。1991年時，國史館與前述兩機構以及教育部合作，召開「建國八十年學術討論會」，慶祝中華民國建國八十週年。該次討論會的總召集人是黨史會主委秦孝儀，籌備工作亦是由黨史會負責，費用則由教育部支出。⁵⁷由於國史館始終扮演協助的角色，其學術地位頗受懷疑，甚至被批評為「外行閒員養老之所，不懂史學與國民外交的重要」。瞿韶華上任後，受到檔案法制定過程的影響，亦體認到國史館學術地位之不足，認為中研院、黨史會主辦的國際漢學會議、現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已辦得有聲有色，國史館卻還未起步，難免遭致譏評。⁵⁸為了改變形象，國史館決定於1992年起，每年定期舉辦大型的「中華民國史專題討論會」，廣邀學界參與。⁵⁹同時，瞿韶華又在中研院近史所舉辦的口述歷史工作會議啟發下，推展國史館的口述歷史計畫，決定於1991年7月開始試辦，並於隔年3月接替中研院舉辦第二次口述歷史工作會議。⁶⁰是以，1992年是國史館首次

灣歷史學—反思與開拓」研討會》，《臺灣歷史學會會訊》，11（臺北，2000.12），頁56、63。

⁵⁵ 〈國史館在臺復館大事記〉，《國史館館刊（民國八十年）》，復刊第11期（新店，1991.12），頁377。

⁵⁶ 中國近代史學會的成立係由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師生所推動，召集人為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張哲郎，籌備委員包含張玉法、蔣永敬、李雲漢、陳三井、張哲郎、林能士、胡平生等人。成立動機與目的為臺灣已有唐史、宋史、明史研究學會，卻無近代史學會，政大為了增強近代史研究者的聯繫，共同推動近代史研究，因此與中研院近史所商議成立。原名為「近代史學會」，表示研究範圍不限於中國近代史，冠上「中國」二字亦是受內政部法規限制。中國近代史學會，〈發刊詞〉、〈中國近代史學會籌備及成立經過〉、〈中國近代史學會成立大會會議記錄〉，《近代史學會通訊》，1（臺北，1995.2），頁2-4。

⁵⁷ 李雲漢，《史學圈裏四十年》，頁295。

⁵⁸ 「業務會議」（1991年4月10日），〈國史館業務會報及史事紀要編纂相關資料〉，《個人史料》，國史館藏，1280044910033A。

⁵⁹ 〈國史館在臺復館大事記（民國八十年）〉，頁378-379。首次討論會於隔年8月6日舉行，為期三天，與會者來自41個單位，共160多名專家學者。〈國史館在臺復館大事記（民國八十一年）〉，《國史館館刊》，復刊第13期（新店，1991.12），頁348。

⁶⁰ 何智霖，〈國史館口述歷史組工作概述〉，《國史館館刊》，復刊第14期（新店，1993.6），頁351；〈國史館在臺復館大事記（民國八十一年）〉，頁343。1992年7月，國史館正式成立口述歷史

主辦大型學術研討會及學術工作會議的重要年份，象徵國史館力圖轉型，嘗試與學界擴大交流，提升國史館的學術地位。

（二）行政管理制度化，提升工作效率

修纂人員的學術專業固然重要，國史館組織效能的提升亦不可或缺，兩者能否互相配合，關鍵在於行政管理是否制度化。朱匯森上任後，隨即邀請教育部委員到館講述「重要工作進度及績效檢核辦法」，指示館內各單位皆須擬定年度工作計畫與進度，由主任秘書負責考核。⁶¹國史館纂修胡健國回憶：從此國史館工作「不再優雅，不復從容」。⁶²除了建立考核制度，其他行政業務也陸續進行改革，期能使行政管理制度化，提升國史館的工作效率。改革重點歸納如下：

其一，增加員額，健全人事制度。由於國史館聘僱人員眾多，⁶³朱匯森因此制定管理辦法，並核定「國史館乙種支酬表」，提高其待遇，並增加雇員名額，增添人力；接著，核定實施「國史館公務人員進用升遷要點」，健全人事制度，⁶⁴讓館內現職人員可透過提交論文，獲得升任之甄審資格。根據館內人員所述，有八成以上的修纂人員獲得升遷機會；⁶⁵另一方面，行政單位主管新陳代謝，將若干行政單位或編纂小組交由館內的青壯年主持，使其熟悉該業務，利於推動修史工作與任務交班；⁶⁶此外，向考試院提出增開公務人員史料編纂科高等考試，

組，纂修遲景德擔任主持人，組員有協修何智霖、助修許秀容、陳進金、林秋敏、吳淑鳳、楊同慧等 6 人，皆具有史學專長，另聘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劉鳳翰為顧問。

⁶¹ 〈國史館在臺復館大事記（民國四十六年至民國七十五年）〉，頁 289。

⁶² 胡健國，〈理想與現實—史館生涯三十年〉，《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43 期（新店，2007.12），頁 218。

⁶³ 根據 1987 年 6 月，朱匯森在國民黨中常會的工作報告，該年國史館的編制員額為 50 人，聘僱人員有 37 人，每年經費約六千餘萬元。其亦表示國史館在工作上經常與黨史會聯繫與合作。〈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國史館近年重點工作〉（1987 年 6 月 10 日），《參考史料》，國史館藏，141000000684A；至 1995 年 11 月時，國史館的編制預算員額已有 105 人。朱重聖，〈國史館現階段重點工作及展望〉，頁 17。

⁶⁴ 〈國史館在臺復館大事記（民國四十六年至民國七十五年）〉，頁 292-294。

⁶⁵ 首次「現職人員升任甄審委員會」於 1987 年 5 月舉行，由主任秘書談龍濱主持，該會決議將館內三人提交之論文，由館長密送館外專家審查及評分，不過後來只有二人通過升任協修。〈國史館在臺復館大事記（民國七十六年）〉，《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3 期（新店，1987.12），頁 295、297；簡笙簫，〈永懷朱館長匯森先生〉，《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40 期（新店，2006.6），頁 182。

⁶⁶ 例如派協修卓遵宏兼任徵集科科長，調助修朱文原為圖書科科長，又先後將助修葉飛鴻、劉筱齡調升時政科科長等。〈國史館在臺復館大事記（民國四十六年至七十五年）〉，頁 290、294；〈國史館在臺復館大事記（民國七十六年）〉，頁 298。

望能增加館內修史人才。不過如下表所示，該科考試並非每年舉辦，且歷屆考試的錄取名額皆很稀少，錄取率亦逐年下滑，顯示在公務體系下，人才的晉用依舊受限，館內修史人才依然不足。⁶⁷

表 21 公務人員高考史料編纂科人數統計（1973-1998）

年分	報考人數	到考人數	錄取或及格人數	錄取率或及格率%	備註
1973	239	155	30	19.35	首次舉辦；錄取率最高
1983	63	44	2	4.55	
1985	96	73	6	8.22	
1988	111	80	5	6.25	
1991	85	52	2	3.85	
1992	120	87	5	5.75	
1993	145	88	3	3.41	
1996	149	97	1	1.03	
1997	164	102	3	2.94	
1998	51	37	1	2.70	

資料來源：整理自考選部編印，《中華民國考選統計》，民國 62 年至 87 年。筆者按：1999 年、2000 年該科考試皆未舉辦。

其二，文書檔案管理制度化、資訊化。有鑑於館藏檔案不斷增加，卻未有效整理，存放情形紊亂、保存狀況不佳，因此朱匯森館長決定整理檔案、統一管理，以提高文書效率。他指示館內人員應積極整理文書檔案，加速整理舊檔作業，並固定史料處檔案科員額，若有人事異動，可按缺遴補，使其人力無虞；⁶⁸此外，重新規劃空間配置，新建具有現代化檔案管理設備的檔案大樓（季陸樓），⁶⁹使檔案、圖書的典藏與管理能分別集中於季陸樓、志希樓；行政及修纂人員則集中於行政大樓，並規劃修纂人員的個人研究室，使其能專心編纂，人力資源配合業務

⁶⁷ 修史人才不足是國史館復館以來就有的難題，即便至 1990 年代，館內修史人才仍相當缺乏。根據 1991 年瞿韶華館長在業務會議報告時指出，當時館內纂修僅有 4 人、協修 10 人、助修 12 人，總共只有 26 人，如此人數與〈國史館組織條例〉中規定的修纂人員編制員額至多可達 75 人相比，差距甚大。「業務會議」（1991 年 4 月 10 日），〈國史館業務會報及史事紀要編纂相關資料〉，《個人史料》，1280044910033A。

⁶⁸ 〈國史館在臺復館大事記（民國四十六年至民國七十五年）〉，頁 291、293。

⁶⁹ 「季陸樓」於 1984 年 12 月動工，1988 年啟用，內有檔案庫房、裱褙室、縮影室、編目室、閱覽室、陳列室和煙燻室。1992 年 7 月起實施檔案庫房設備五年更新計畫。

需求整合運用；⁷⁰圖書管理方面，建立圖書管理出納制度，核定實施「國史館圖書借閱辦法」，開始規定借閱期限，實施催書作業，以改善過去有人借書時間過長、遲不歸還之陋習。⁷¹另一方面，1988年起，開始添購電腦軟體資訊設備，推動初步的文書檔案管理資訊化作業，最初僅限總務處文牘科、史料處圖書科及清史稿校註小組三個單位使用，之後擴及國史編纂及其他行政業務。⁷²此外，復成立「資訊管理發展委員會」，進一步推動圖書檔案管理自動化，至1991年，「國史館圖書管理自動化作業系統」已初步完成；1993年時館內區域網路上線，使書目資料的查詢更為便利。⁷³

綜合上述，三位館長的改革方向大抵朝修纂業務合理化、學術化，行政管理制度化、資訊化的目標前進。雖然改革無法一次到位，尚須館內人員積極配合，不過這些辦法與新增規定皆是為了使國史館的修史業務能順利進行、增加工作效率，進而提升其存在價值與學術地位的重要策略。

第三節 國史纂修成果

在上述種種改革下，本節將檢視國史館的出版品，以了解改革成效，並分析從蔣經國到李登輝主政時代，國史館的修史特色有何轉變。經過史料的歸納整理後發現，從1984年至2000年，國史館的出版品，無論在種類或數量方面，皆有明顯增長，其類型可分為清史、史事紀要、志書與傳記、專著與論文集、史料叢書、期刊與其他等七大類，每類又可再細分為若干項目，其中史料叢書類的成果最多（參見附錄五）；內容方面最大的改變是，由戒嚴時期以反攻復國、反共抗俄為中心的論述模式，轉而強調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積極發展現代化的歷程；此外，民主化與本土化的社會變遷，除了使國史館的黨政關係與定位遭受質疑，也促使政府檔案加速移轉與開放，進而影響國史館整體的修史業務。惟此時期的敘事仍以中國史為框架。以下試就清史與史事紀要、志書與傳記、專著論文與期刊、檔案移轉與史料彙編等四部分說明之。

⁷⁰ 簡筌簞，〈永懷朱館長匯森先生〉，頁181。

⁷¹ 朱文原，〈驀然回首—我在國史館走過三十年寒暑（上）〉，頁240。

⁷² 〈國史館在臺復館大事記（民國七十七年）〉，《國史館館刊》，復刊第5期（新店，1988.12），頁324-325；簡筌簞，〈永懷朱館長匯森先生〉，頁182。

⁷³ 朱文原，〈驀然回首—我在國史館走過三十年寒暑（上）〉，頁244-245。

一、清史與民國史事紀要

清史與史事紀要的修纂計畫皆始於黃季陸時期。當時鑑於人力、物力缺乏，清史部分採《清史稿校註》的形式，中華民國歷史部分則是編纂編年體的《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在國史館看來，歷史有其連續性，校註前代《清史稿》有助於編纂當代的《史事紀要》，後者又有助於維護中華民國政府的法統。⁷⁴是以朱匯森上任後，繼續推動兩項修史工作。有關《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的編纂情形，前已說明，不再贅述，值得一提的是清史部分。國史館至今僅出版了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合作完成的《清史稿校註》及文化大學教授王恢繪製的《新清史地理志圖集》。然而實際上，國史館曾擬定「整修定本清史計畫」，計畫在《清史稿校註》完成出版後整修清史。此因《清史稿校註》出版後，仍有不少學者認為該書「重要義例仍無法糾正，參照引用亦有不便」，因此建議國史館整修清史。為此國史館擬定計畫，⁷⁵預計以三年時間（1990年7月至1993年6月），同樣以《清史稿》為底本，完成「正其義例、勘其謬誤、補其闕漏」的整修清史工作，並請總統府核定頒布為「第二十六部正史」，以彰顯承續之正統。⁷⁶該計畫後來更定名為《新清史》，《新清史地理志圖集》即是配合《新清史·地理志》而繪製。⁷⁷不過，《新清史》至今仍沒有正式出版，而是放在網路供外界參考，徵詢學界意見。

這部由國史館修纂的《新清史》並非定稿，也非官方欽定的正史。就史學史的角度而言，如學者陳熙遠所述，所謂的「正史」，在新史學引入中國及清政權滅亡後，其在思想上的權威性，便已連同絕對政治力量的喪失而失去憑依，因此將來編修的清史亦將被更多的修訂版或新版本所取代，成為另一個《清史稿》。⁷⁸雖然，也有學者表示，中國傳統史學的書寫模式未必不會再度復甦，因此不敢

⁷⁴ 國史館秘書室編，《復館以來的國史館》，頁48-49、121。

⁷⁵ 據國史館纂修胡健國所述，該計畫由當時的主任秘書朱重聖自擬，參與多年《清史稿校註》工作的胡健國本人卻未曾與聞；他更提及當年國史館人員審閱《清史稿校註》時，朱匯森館長以「故宮原稿珍貴」為由，自行秘藏，工作人員因此從未見過原稿，只能以複印版本進行校對。胡健國，〈理想與現實—史館生涯三十年〉，頁218、220。

⁷⁶ 〈整修「定本清史」工作綱要〉，《國史館館刊》，復刊第10期（新店，1991.6），頁611-612、617-618。

⁷⁷ 朱重聖，〈民國以來國史館之修史工作〉，收入《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二）》，頁1213。

⁷⁸ 不過陳熙遠仍肯定傳統史學的價值，認為傳統體裁中的志傳格式，將歷史的複雜性串連起來，有助於讀者選擇任一感興趣的段落閱讀或予以重新編織；同時又可一定程度的反應出從帝國過渡至共和國時期，特定知識分子的集體心態和觀點，就此點而言，《清史稿》將無可取代。

貿然下定論，稱《清史稿》為該書寫模式的最後一個篇章。⁷⁹不過，從後續發展來看，作為官方修史機構的國史館，有關清史編纂的計畫似乎就此告一段落。

二、志書與傳記

（一）志書

志書與傳記是朱匯森館長上任後新增的修史項目。在志書方面，有云「修史之難，無出於志」，修纂志書須熟悉各領域的典章制度及事物發展之軌跡，任務可謂艱鉅。國史館的人力有限，因此採取的辦法是聘請政府機關的正副首長、單位主管與學者專家，共同組成各志書編纂委員會，再從中選出召集人與兼任秘書，擬定編纂綱目、工作計畫，商討分配與審查事宜；國史館則增設「志書組」工作小組，支援行政工作並協助編纂委員蒐集、整理與抄錄資料。⁸⁰換言之，國史館的志書係採館外專家編纂、館內人員協助的方式進行。此方法的好處是與其他行政機構合作，既能補館內人才之不足，亦可結合學術理論與實務經驗；缺點為無法嚴格要求館外編纂委員的撰稿進度，且稿費亦有一定的支付標準；此外，國史館的預算編列與經費報銷也受限於公務機關的年度限制，不僅增添延聘其他撰稿人員之困難，也影響最終修史的品質。⁸¹

編纂計畫方面，根據朱匯森時期的預定計畫，第一期的編撰年份為 1912 年至 1981 年止，即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來之史事，包含地理、民族、社會、法律、公職、內政、外交、國防、交通、實業、財政金融、教育、學術、文化等 14 種項目，各志書預定兩年內完稿，五年內出版，每三十年重修一次；撰寫內容以 1949 年政府遷臺為分水嶺，記述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發展與制度變遷，大陸部分則有待

Hsi-yuan Chen (陳熙遠), "Last Chapter Unfinished: The Making of the Official Qing History and the Cri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Historiography East & West*, 2:2 (Nov.2004), pp.197-199。

⁷⁹ 宋家復，〈現代中國史學中「國史」實作意義的轉變：從章太炎到錢穆〉，《清華學報》，新 49 卷第 4 期（新竹，2019.12），頁 655，註釋 13。

⁸⁰ 劉劍寒，〈國史館現階段纂修中華民國國史志書工作簡述〉，頁 337。

⁸¹ 劉劍寒，〈國史館現階段纂修中華民國國史志書工作簡述〉，頁 344；長期負責志書組的國史館纂修郭鳳明表示，朱匯森館長時期，憑藉其在學術與政界的人脈，撰稿人才的尋覓與志書的推動頗為順利。言下之意，瞿韶華館長以後，志書組的業務推動不如以往順遂。參見郭鳳明，〈中華民國志書之編纂工作〉，《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42 期（新店，2007.6），頁 252。

「光復後再行增補」。⁸²最終國史館僅完成 11 種志書，國防、實業、財政金融等項目並未出版，志書編纂計畫遂告終止。⁸³值得注意的是，瞿韶華時期將志書編撰年份往下延伸至 1991 年，涵蓋解嚴以後的重大政治變革，加以突顯民主轉型前後的時代變化。

表 22 中華民國史各志書出版時間及召集人

No.	書名	出版時間	召集人	備註
1	中華民國史公職志	1990 年 5 月	許師慎	朱匯森館長開始推動，編撰年份為 1912 至 1981 年
2	中華民國史地理志		王洪文	
3	中華民國史教育志	1990 年 6 月	林清江、梁尚勇	
4	中華民國史交通志	1991 年 2 月	陳樹曦、魏巍	
5	中華民國史內政志	1992 年 6 月	劉兆田、居伯均	
6	中華民國史法律志	1994 年 2 月	李模	瞿韶華館長以後，編撰年份延至 1991 年；不再列出編纂委員經歷
7	中華民國史民族志	1995 年 3 月	林恩顯	
8	中華民國史學術志	1996 年 6 月	宋晞	
9	中華民國史文化志	1997 年 5 月	陳奇祿、王振鵠	
10.1	中華民國史社會志（上）	1998 年 6 月	張玉法	編撰年份至 1991 年；格式改為橫書
10.2	中華民國史社會志（下）	1999 年 6 月	張玉法	
11	中華民國史外交志	2002 年 12 月	劉達人、周煦、陳三井	

由於領域不同，各志書編纂成員的組成亦差距甚大。以《公職志》和《地理志》為例。《公職志》主要記述政府組織、文職與軍職制度，因此多聘請曾任中央部會的行政首長或熟悉該業務的單位主管擔任編纂委員，希望國史纂修能與實務經驗結合，且其具備公職身分，公務資料的取得亦較為便利；《地理志》的編

⁸² 劉劍寒，〈國史館現階段纂修中華民國國史志書工作簡述〉，頁 337-338。

⁸³ 負責此項目的國史館特約纂修劉劍寒表示，近代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緊密，外交、內政、國防與經濟等，皆須參考外國史料始能了解實情與經過，但受限於外國政府與國內國防機密檔案不公開，因此史料能否全部獲致，實為纂修志書的最大難題。參見劉劍寒，〈國史館現階段纂修中華民國國史志書工作簡述〉，343。

纂委員則多為學界出身，主要為臺灣大學與文化大學地理系教授。大體而言，朱匯森館長時期編纂的志書種類多與公部門有關，召集人及編纂委員亦多來自公家機關。瞿韶華館長上任後，主要編纂法律、學術、文化與社會類別，故編纂委員除了《法律志》有不少現職法官，其餘志書多為各領域的專家學者，官員比例大幅減少。以《學術志》為例，該書召集人為文化大學歷史系教授宋晞，編纂委員則多為臺大、臺師大及文化大學等各學系的資深教授。⁸⁴由此可知，中華民國史志書的撰寫成員除了有軍公教人員、歷史學家，亦有不少來自其他領域的專家學者，顯示與國史館合作修史的夥伴已不再侷限於黨史會及其他史政研究機構，漸能擴大至其他學科領域，增加聯繫與互動，逐漸跳脫黨國體制之框架。

表 23 《中華民國史》公職志、地理志編纂委員會委員名單及其經歷

	職稱	姓名	經歷	職稱	姓名	經歷
公職志 編纂 委員會	召集人	許師慎	國史館特約纂修	委員	陳炳生	人事行政局副局長
	秘書	劉劍寒	國史館特約纂修	委員	蔡經	前臺北市政府人事處長
	委員	顧守之	教授、前考選部常務次長	委員	姜文奎	行政院文建員會專門委員
	委員	趙其文	銓敘部常務次長	委員	李昊	前臺灣省政府人事處長
	委員	焦仁和	總統府機要室主任	委員	孫溪	前國防部上校人事參謀官
	委員	王錦章	前國民大會人事組長	委員	項達言	前國立政治大學主任秘書
	委員	梁正弘	行政院秘書兼人事室主任	委員	李光雄	臺灣省政府人事處長
	委員	顧錫漢	立法院人事室主任	委員	沈懷玉	中研院近史所館員
	委員	余繩文	監察院主任秘書			
地理志	召集人	王洪文	臺灣大學地理系教授、中國地理學會理事長	委員	李學勇	臺灣大學植物系教授

⁸⁴ 學術志編纂委員名單：尹建中（臺大人類學系教授）、李杜（文化大學哲學系主任）、金榮華（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教授）、臧振華（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范珍輝（臺大三民主義研究所教授）、施建生（臺大經濟系教授）、林子勛（文化大學教授）、李新民（前中央大學校長）、陳卓（臺大物理系教授）、劉廣定（臺大化學系教授）、劉鴻喜（臺師大地理系教授）、林榮耀（臺大生化所教授）、諸亞儂（臺師大生物系教授）、戚啟勳（文化大學氣象系教授）、陳培源（臺師大地科系教授）。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學術志（初稿）》（新店：國史館，1996），版權頁。

編纂委員會	秘書	劉劍寒	國史館特約纂修	委員	梁潤生	臺灣大學動物系教授
	委員	王鑫	臺灣大學地理系教授、中國地理學會秘書長	委員	王恢	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
	委員	張鏡湖	臺灣大學地理系客座教授、文化大學董事長	委員	王宏志	輔仁大學教授
	委員	王秋原	臺灣大學地理系教授			

資料來源：整理自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史公職志（初稿）》（新店：國史館，1990），頁 584-585；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史地理志（初稿）》（新店：國史館，1990），頁 333。

表 24 瞿韶華館長以後各志書編纂委員會委員名單

志書	委員
法律志	李模（召集人兼統編者）、趙公茂、林山田、法治斌、周震歐、唐豫民、康炎村、陳惠馨、陳煥生、楊大器、楊仁壽、劉春堂、戴立寧、蕭亨國、羅成典、蘇永欽
民族志	林恩顯（召集人）、李毓澍（統編者）、辛法春、阮昌銳、桑秀雲、黃維憲、莊吉發、管東貴、劉學銚、蕭金松
文化志	王振鵠（召集人）、邱燮友、莊伯和（以上為統編者）、王更生、王建柱、王壽南、王廣生、王澤恆、方鵬程、皮述民、任兆明、吳明德、何貽謀、金榮華、邱燮友、郎靜山、馬森、梁海強、凌嵩郎、郭軫、張光遠、張植珊、張霄亭、莊伯和、莊芳榮、郭為藩、許常惠、陳國寧、黃肇珩、鄭明嫻、蔣金龍、應裕康、劉毅志、漢寶德、賴光臨、魏子雲、顧乃春
社會志	張玉法（召集人兼統編者）、朱宏源、江東亮、李國祁、呂實強、沈清松、范珍輝、陳清敏、張瑞德、游鑑明、熊秉真、劉翠溶、賴澤涵
外交志	劉達人、周煦、陳三井（以上為召集人）、周煦（統編者）明居正、唐啟華、李恩涵、高朗、許志偉、杜元方、林明德、林秋山、陳鴻瑜、李本京、閻志恆、謝棟樑、魏良才、徐乃力、王秀琦、李國祁、胡祖慶、陳士良、程家瑞、陳雅鴻、蕭曦清、畢英賢、李登科、林文程、張力、鍾博

史觀與書寫筆法的調整，亦能體現從黨國威權體制走向民主化的過渡期轉變。如前所述，前館長朱匯森曾指示國史館應根據「民生史觀……證明三民主義建國方針之成功」。⁸⁵特約纂修劉劍寒亦表示，纂修國史須有「一貫的立場與指導原則」，以和中共的「唯物史觀」做出區隔。⁸⁶是以國史館在志書的〈凡例〉中，清

⁸⁵ 簡笙簧、林秋敏，〈國史館復館 50 週年大事記〉，頁 289-290。

⁸⁶ 劉劍寒，〈國史館現階段纂修中華民國國史志書工作簡述〉，頁 343。

楚表明紀年應以中華民國為正朔，強調中華民國的正統地位；行文至「國父」、「蔣公」時，必須挪抬；有關國民黨的會議、組織與職銜名稱，前面皆須加上「中國國民黨」。⁸⁷可知 1980 年代中期，國史館仍強調正統史觀，以中華民國為本位，中國國民黨則為領導國家的主要政黨。在此框架下，國史纂修自然以中華民國為主體，臺灣史則是在官方正統中國史觀長期壟罩下，一直被視為地方史，未受重視。

以 1987 年開始編纂、1990 年出版的《中華民國史地理志（初稿）》為例，該書仍維持二戰結束後的中華民國版圖，將「臺灣省」列為 35 個行省之一，是為中國東海海域之島嶼，係屬中國東南疆域；該書在描述中國歷代各朝對臺灣的稱呼與治理時，還提到臺灣一度為「荷人所據」，鄭成功「逐退荷人」後，「奠定其開發丕基」。⁸⁸此種筆法向來是國民黨政府對於臺灣歷史敘述的主要模式，一方面從時空上將臺灣置於中國歷史的發展脈絡與版圖中，以「中國大陸」為視角將臺灣視為帝國之邊陲；一方面又以「漢人中心」的中華民族史觀，強調荷人「據臺」及鄭成功的「開發」，忽視臺灣島嶼本身的海洋文化性格與內部多元族群之特性。

不過，1988 年國史館編纂《中華民國史內政志（初稿）》時，書寫筆法已稍加調整，根據〈凡例〉，不再要求「國父」、「蔣公」須挪抬。後續出版的志書，其史觀也出現變化。以《中華民國史社會志（初稿）》為例，該書編纂委員會的召集人為中研院院士張玉法，委員多為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及臺大、政大教授。該書的撰寫融合了學院派與官方的觀點，書寫筆法已從革命史觀，轉而強調臺灣的現代化發展，同時修正抗日史觀，漸能肯定日人對臺灣的治理。如內文提到：日據後期臺灣因醫療衛生改善，使出生率快速增長、死亡率大幅下降，人民的教育程度也不斷提升，這些發展在「光復以後情況更然」。⁸⁹此外，過去被忽視的課題與群體也躍上國史檯面，如婦女解放、社會階層流動、人民團體的形成等，皆有專章介紹，而二二八、臺灣獨立等詞彙亦有提及。⁹⁰雖整體而言，國史志書的編纂仍維持中國本位立場，將中華民國的發展以 1949 年作為分水嶺，強調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的各種現代化變遷，然和戒嚴時期相較，撰寫內容已漸隨臺灣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做出調整，並能反映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發展趨勢。

⁸⁷ 〈凡例〉，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史地理志（初稿）》，頁 1-2。

⁸⁸ 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史地理志（初稿）》，頁 4、6、55。

⁸⁹ 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史社會志（初稿）（上）》（新店：國史館，1998），頁 4-5。

⁹⁰ 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史社會志（初稿）（上）》，頁 759。

（二）傳記

根據朱匯森館長時期擬定的「中華民國國史傳記類編撰凡例草案」，凡是對中華民國有影響力，符合國家現代化的奮鬥事蹟，國史館皆可為之立傳，不限於政府明令褒揚或宣付立傳之人；書寫筆法方面，需融合傳統史學的春秋筆法與新史學的實證精神，秉筆直書且寓褒貶於其中；第一期計畫以 1912 年至 1981 年逝世者為限。⁹¹根據此一方針，國史館增設傳記組，除了繼續編纂《褒揚令集》，⁹²亦蒐集民國以來對國家具有影響力或有貢獻之人的行狀、事略、自述與墓誌銘等，效法中國古代碑傳集，編成《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⁹³同時，草擬傳主名單，聘請館外專家學者撰文擬稿，再經過考證、修正、補刪、整理等工作後，刊布於《國史館館刊》或彙集成《國史擬傳》。⁹⁴1992 年，國史館又增設口述歷史組，訪談當代人物，蒐集與保存當代史料。⁹⁵是以國史館傳記編纂的種類與型式漸趨多元，包含《中華民國褒揚令集》、《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國史擬傳》、其他個別人物傳記史料及口述歷史等五大項目。除了口述歷史為當代人物的訪談紀錄，其餘四項皆為已故之人的傳記史料。

以上各類型傳記所涉人數浩繁，非筆者所能盡述，本文僅以 2000 年之前刊布於《國史館館刊》的〈國史擬傳〉作一觀察，探討這段期間國史館主要編纂的傳記人物，傳主名單整理於表 25。統計結果顯示，第 1 至 27 期的《國史館館刊》總共刊布 141 篇〈國史擬傳〉，所有人物類別中以政治軍事類最多，社會科學類次之，文化創意與經濟實業類又次之，宗教信仰與工程技術類占最少數。⁹⁶其中，

⁹¹ 蔣武雄，〈國史館現階段纂修中華民國史傳記工作簡述〉，《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8 期（新店，1990.6），頁 347-348。

⁹² 《中華民國褒揚令集初編》於 1986 年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收錄 1912 年至 1975 年 1 月，政府頒布之褒揚令共 2978 件、16724 人等褒揚令文及相關文獻、生平附錄，史料多來自民國成立後政府所發行之公報。《中華民國褒揚令集續編》第一輯於 1991 年出版，節錄 1975 年 4 月至 1978 年 12 月之褒揚令，包含褒揚令文 63 件、受褒揚者 35 人及提匾額者 28 件等。參見朱重聖，〈民國以來國史館之修史工作〉，頁 1228。

⁹³ 此類史料雖多為訃聞所錄的事略或行狀，多隱惡揚善，然其優點為人物之生卒年可信度較高，比官方文書可靠。此外，傳記組主持人胡健國亦自詡「資料無立場」、「論斷由後人」，所收史料以「完整、原始、稀有」為優先。胡健國，〈理想與現實—史館生涯三十年〉，頁 226-228。

⁹⁴ 蔣武雄，〈國史館現階段纂修中華民國史傳記工作簡述〉，頁 348。

⁹⁵ 何智霖，〈國史館口述歷史組工作概述〉，頁 351。

⁹⁶ 不少人物橫跨兩種以上類別，本文以該人物最突出之領域作為劃分標準；類別方面，歷史學

政治軍事類的人物多為追隨孫中山、蔣介石，曾參與辛亥革命、北伐、剿共與抗日的同盟會會員及國民黨黨員，且半數以上為軍事將領；其他類別則多為與國民黨態度立場接近，曾出任黨政要職，有助於教育文化學術或戰後臺灣經濟發展之關鍵人物。出生年份方面，以 1839 出生的楊守敬為最早，1921 出生的吳俊才為最晚；死亡年份方面，以 1895 年逝世的陸皓東為最早，1996 年逝世的嚴耕望、吳俊才為最晚，說明在人物選擇上不完全受限於 1912 年以後逝世的規定，人物本身的象徵意義才是取決的重點。此外，這些人當中僅有四人為臺灣出生，包含「半山」黃朝琴、新光集團創辦人吳火獅、《臺灣通史》作者連橫及臺南出生後來落籍福建的作家許地山，與臺灣史有關的人物則為日治時期發起苗栗事件的同盟會成員羅福星。性別方面，僅有一名女性革命家秋瑾。全部 141 人中，有 68 人於 1950 年後逝世，多數人隨中華民國政府一同來臺，僅有國民黨要人張人傑（靜江）留寓美國，「雲南王」龍雲、歷史學者陳寅恪、京劇名旦荀慧生與尚小雲等則留在中國，於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批鬥。

綜上分析可知，1980、90 年代國史館編纂的人物傳記仍是強調政治軍事人物對「革命建國」的功勞，及其他領域人物協助「國家現代化」發展之貢獻。整體而言，依然以國家政權的維護為出發點，鮮少呈現臺灣社會的多重族群特性。然值得注意的是，戒嚴時期被視為世界偉人、民族救星的孫中山與蔣中正，此時皆被納入〈國史擬傳〉中，與他人同列，皆屬於列傳之人物，在稱謂上也都稱作「先生」，不再另外冠上「父」、「公」等敬稱，顯示國史館已逐漸擺脫傳統領袖崇拜之觀點，而能融入共和時代平等之精神。

表 25 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1 至第 27 期〈國史擬傳〉(1987.1-1999.12)

類別	傳主姓名	人數
政治軍事	陳其美、于右任、張一麐、葉楚傖、鄒魯、伍廷芳、胡漢民、邵元沖、陳果夫、王寵惠、莫德惠、彭家珍、徐樹錚、唐繼堯、唐紹儀、張自忠、謝晉元、楊庶堪、蔣作賓、戴笠、陳布雷、黃百韜、戴傳賢、張人傑、何成濬、孫中山、鄒容、林述慶、胡祖玉、石瑛、李家鈺、居正、程其保、蔣中正、徐錫麟、熊成基、田桐、譚延闓、謝持、丁懷瑾、賈景德、秦德純、朱執信、胡景翼、高志航、王芃生、趙家驤、	94

者、教育家、圖書館學家、金石文字學家列在社會科學領域，心理學家、翻譯家、語言學家、思想家、哲學家列在人文科學領域，傳統詩人、文學家、報業圖書出版家、攝影家與京劇演員則歸在文化創意類別。

	蔣鼎文、羅列、朱培德、黃慕松、佟麟閣、鄭介民、王正廷、◎秋瑾、熊希齡、凌鉞、陸皓東、趙聲、林長民、吳佩孚、韓國鈞、馮自由、顧孟餘、林森、張繼、邱清泉、吳敬恆、吳鐵城、★羅福星、程家檉、朱霽青、賴景瑚、趙聚鈺、尤列、徐永昌、閻錫山、謝冠生、李璜、楊亮功、徐世昌、蕭同茲、左舜生、陳大慶、顧祝同、朱家驊、張勳、龍雲、▲黃朝琴、陳濟棠、王文華、楊度、汪兆銘、余漢謀	
宗教信仰	歐陽漸、于斌	2
經濟實業	張謇、陳光甫、錢永銘、張嘉璈、尹仲容、趙棣華、▲吳火獅	7
自然科學	梅貽琦、竺可楨、沈宗瀚	3
社會科學	楊守敬、柯邵忞、王雲五、▲連橫、蔣廷黻、李煜瀛、胡元倓、嚴修、傅斯年、許恪士、劉大中、蔣復璁、錢穆、陳寅恪、張伯苓、吳俊才、嚴耕望、胡適之、羅振玉	19
人文科學	陳大齊、蘇曼殊、黃侃、梅光迪、廖平、牟宗三	6
工程技術	詹天佑	1
文化創意	陳三立、金天翮、嚴復、成舍我、▲許地山、郎靜山、尚小雲、陸費逵、荀慧生	9

圖示：◎女性 ▲臺灣出生 ★臺灣史相關

三、專著、論文與期刊

(一) 專著、論文

國史館出版的專著、論文可分為兩大項目，一是人物、事件與地區等各類型的研究專著，為個人的研究成果；二是《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以及個別專題討論會的論文集等，為多人的研究合輯。在撰寫者方面，除了國史館少數的修纂人員，多為館外的專家學者，以中國近現代史為研究重心。兩大項目中，《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與《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為國史館連續出版超過十五年以上的叢書，前者為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學術討論會的發表論文，發行時間為 1971 年至 2001 年，共出版 22 輯，收錄 272 篇文章；後者是國史館聘請專家學者撰寫之書評，發行時間為 1986 年至 2001 年，共出版 26 輯，收錄 364 篇文章。⁹⁷兩大叢書的發行時間

⁹⁷ 統計整理自〈附錄：第一至二十六輯總目錄〉，《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二十六）》（新店：國史館，2001），頁 543-575；〈附錄：第一至第二十二輯總目錄〉，《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二十二）》（新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2001），頁 921-945。

橫跨多位館長，且皆於張炎憲館長任內初期停止出版。以下僅就兩大叢書所收的論文主題及其撰寫者進行分析，而以國史館館長作分期，黃季陸館長代表戒嚴時期，朱匯森等館長則代表 1980 年代中期逐步民主化以後，觀察國史館的研究焦點及其密切往來學者之變化。茲整理如表 26：

首先是研究主題類別方面。不論戒嚴時期或解嚴以後，「政治軍事史」所佔比例皆為第一，高達總數四成以上；⁹⁸其次為「思想學術史」與「中外關係史」，解嚴前後兩者互有消長，戒嚴時期以「中外關係史」的比例較高，研究主題聚焦在中美關係，應與 1970 年代中華民國政府與美國斷交有關。解嚴後「思想學術史」比例較高，研究主題則以民國初年五四運動及其知識分子的學術思想與政治參與為最多。「社會與婦女史」皆排在第四，研究主題多為太平天國、天地會等秘密社會及海外華人移民，女性研究僅有 5 篇，包括北伐以前的中國婦女活動及秋瑾、宋氏姊妹等人的政治參與。1990 年代以後，「經濟史」和「圖書文獻史」的研究比例大幅增加，此與國史館主辦的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學術研討會有關，當時的討論主題多以戰後臺灣經濟發展及地方文獻史料為重心。⁹⁹此種成果，反映出 1990 年代，國史館不再侷限於中國近現代史與政治軍事史，而是隨臺灣的政治變遷及臺灣史研究日受重視，¹⁰⁰將國史討論範圍延伸至臺灣經濟史與社會史領域。從下表的斷代分期統計亦可看見，解嚴後以臺灣史為主體的研究論文比例大增，是戒嚴時期的 3.5 倍；專題研究方面，在張炎憲館長以後，臺灣史的數量首度超過中國近現代史，說明政黨輪替後，國史研究的主角逐漸不再由中國近現代史所獨佔。

⁹⁸ 統計整理後發現，政治軍事方面以抗戰史研究為最多，共 52 篇；其次為孫中山、蔣中正、蔣經國等三人的討論，共 44 篇；再次為辛亥革命與國民革命的討論，共 31 篇；國共關係、清黨與剿共則有 20 篇；國民黨史與派系的討論有 15 篇；北伐與軍閥的討論亦有 15 篇；西安事變與張學良共 10 篇；鴉片戰爭有 3 篇。其他主題皆為 1-2 篇，不另外列出。

⁹⁹ 「臺灣光復初期史料研討會」(1993 年 12 月 17 日)、「臺灣光復後土地改革研討會」(1994 年 6 月 28 日)、「臺灣光復後經濟發展研討會」(1995 年 2 月 21 日)、「臺灣光復後修纂地方志研討會」(1995 年 7 月 28 日)、「臺灣史料的蒐集與運用學術研討會」(1999 年 9 月 17 日)。簡筌菁、林秋敏，〈國史館復館 50 週年大事記〉，頁 302-304、311。

¹⁰⁰ 彭明輝，〈臺灣史學的中國纏結〉，頁 161-163。

表 26 《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與《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主題分類與斷代分期統計

時期 主題分類	黃季陸		朱匯森、瞿紹華、 潘振球		張炎憲		數量 (不含黃季陸時期)		
	專題	比例%	專題	書評	專題	書評	總數	比例%	排序
史學通論	3	3	3	13	0	1	17	3.2	9
政治軍事史	42	42.4	76	156	4	17	253	47.1	1
制度史	1	1	0	7	0	2	9	1.7	11
社會與婦女史	10	10.1	3	27	3	5	38	7.1	4
宗教與禮俗史	1	1	2	10	1	3	16	3	10
思想與學術史	14	14.1	4	36	1	5	46	8.6	2
科技史	1	1	4	2	0	0	6	1.1	12
經濟史	2	2	21	13	2	1	37	6.9	5
藝術史	0	0	2	0	1	0	3	0.6	13
歷史地理	2	2	2	16	0	1	19	3.5	8
中外關係史	20	20.2	12	21	4	3	40	7.4	3
圖書文獻史	1	1	27	0	0	0	27	5	6
中共史	2	2	1	20	0	5	26	4.8	7
總數	99	100	157	321	16	43	537	100	
斷代分期									
通史	0	0	0	10	0	1	11	2	3
先秦史	0	0	0	1	0	0	1	0.2	5
明清史	0	0	0	2	0	2	4	0.7	4
近現代史	95	96	106	294	7	37	444	82.7	1
臺灣史	4	4	51	14	9	3	77	14.3	2

資料來源：分類方式主要參考自耿立群，〈《漢學研究》歷史類論文計量分析〉，《國家圖書館館刊》（臺北，2010.6），頁 154-155。其中，主題分類中的中共史為筆者所加，內容係以中共為主體，包含中共主政下中國的各種制度與社會變遷，以及 1949 年以前中共自身之發展，但不涉及國共關係與兩岸局勢的變化。

其次為撰寫者方面。根據表 27 的整理，1970 至 1980 年代黃季陸館長時期的撰寫者，除黃館長外，多為黨史會、中研院近史所及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皆為熟悉中國近現代史、中國國民黨黨史及中美關係的專家；1980 年代中期朱匯森館長以後，撰寫者仍多來自中研院近史所、黨史會與政治大學，但也有少數國史館的纂修。大體而言，撰寫文章數較多的人主要集中於中研院近史所，其次為黨史會成員與政治大學教授，亦有部分撰寫者於臺大、臺師大、中央、中正及文

化、淡江、輔仁等各大學的歷史系所任教。這些人多為歷史學、政治學及國際外交方面的專家學者，研究領域與近現代局勢貼近，能體現學術研究與現實政治發展的關聯性，合乎國史館的修史需要。值得一提的是，專題研究部分，以蔣永敬、陳鵬仁、李雲漢及劉鳳翰發表的文章最多，他們與國史館互動頻繁，亦常協助國史館撰寫書評。其中，蔣、陳、李三人皆長期服務於黨史會，擔任主任委員或纂修，蔣、李二人亦長年在彼等母校政治大學任教，也在文化大學、臺灣師範大學授課，他們栽培指導的學生亦有不少成為國史館、黨史會與中研院近史所的生力軍。¹⁰¹歷史教學機構中，又以文化大學、政治大學與國史館、黨史會的關係最緊密，國史館內有不少行政主管與纂修皆畢業於這兩所學校，¹⁰²使黃季陸館長時期隱然成形的國史館—黨史會—文化、政治大學此一學術網絡，在解嚴以後仍持續在國史館內發揮影響力。李雲漢初掌黨史會代理主委時，當時的瞿韶華館長更明確表示「館會之間的關係應一本既往，繼續加強」。¹⁰³顯示國史館與黨史會的合作夥伴關係並未因解嚴而受到影響。

表 27 《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與《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作者統計(1971-2001)

時期 分類	黃季陸	朱匯森、瞿韶華、潘振球	張炎憲
專題	黃季陸(7 篇);胡春惠、秦孝儀、張朋園、陳三井、閻沁恆、薛光前、李本京(以上皆為 2 篇)	蔣永敬(7 篇)、陳鵬仁(6 篇)、劉鳳翰(4 篇)、李雲漢(4 篇)、簡榮聰(3 篇);王壽南、朱匯森、何鳳嬌、呂芳上、李恩涵、李國祁、侯坤宏、張力、張玉法、陳三井、	石之瑜、朱德蘭、江燦騰、吳安家、呂士朋、卓克華、林瑤棋、林德政、柳金財、張世瑛、許毓良、陳信雄、

¹⁰¹ 如國史館的朱文原、王正華、周美華、陳進金等修纂人員，黨史會的邵銘煌、劉維開、高純淑等主管階層與專門委員，以及中研院近史所的呂芳上、張力等研究員，皆曾受李雲漢或蔣永敬指導碩、博士論文。

¹⁰² 據不完全統計，國史館內文化大學研究所畢業的主管與纂修有：朱重聖（史學研究所博士）、郭鳳鳴（史學研究所博士）、簡笙簧（史學研究所碩士）、何智霖（史學研究所碩士）、葉飛鴻（大陸問題研究所碩士）、陳孟堅（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政治大學研究所畢業的有：遲景德（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胡健國（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賴啓（新聞研究所碩士）、洪桂己（新聞研究所碩士）、侯坤宏（歷史研究所博士）。以上資料查詢自下列網站：「國家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國家圖書館—期刊文獻資訊網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及「國史館—組織架構」、「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碩博士班」：<https://crrahs.pccu.edu.tw/files/15-1074-58769.c82-1.php?Lang=zh-tw>。（瀏覽日期：2021 年 8 月 30 日）

¹⁰³ 〈國史館在臺復館大事記（民國八十年）〉，《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11 期（新店，1991.12），頁 374。

		陳在俊、陳存恭、楊維真、鄭彥棻、簡笙簫(以上皆為 2 篇)	陳翠蓮、曾華璧、賴福順、謝敏聰(全部皆為 1 篇)
書評	(無)	孫子和、王章陵(二人為 15 篇); 王成勉(14 篇); 蔣永敬、吳圳義(13 篇); 莊吉發、江金太(12 篇); 陳三井、呂實強、劉鳳翰(以上為 11 篇); 胡春惠(10 篇); 趙洪慈(9 篇); 林明德、陳慈玉、陳鵬仁(以上為 8 篇); 蘇雲峰、馬起華(二人為 7 篇); 吳伯卿、呂芳上、周惠民、許雪姬、陳存恭、謝國興(以上為 6 篇); 林能士(5 篇); 劉維開(4 篇); 張玉法、張力、張朋園(以上為 3 篇); 李雲漢、賴澤涵、邵銘煌、查時傑、陶英惠、楊翠華(以上皆為 2 篇)	莊吉發(4 篇); 胡春惠、彭明輝(3 篇); 王成勉、江金太、吳翎君、林明德、林偉盛、林桶法、許雪姬、陳三井、陳鵬仁、趙洪慈、蔣永敬(以上皆為 2 篇)

(二) 期刊

南京時期的國史館曾發行《國史館館刊》季刊，係由纂修顧頡剛提議創辦，係為供應國人了解中國近百年歷史的刊物，撰寫者多為當時的史學名家，如柳詒徵、顧頡剛、金毓黻等，內容包含論著、專論、國史擬傳、碑傳備采、文藝、館務與附錄等 7 類。該刊於 1947 年 12 月創刊，1949 年 1 月因戰事而中斷，僅出版 5 期。1987 年國史館在臺復館 30 年後，朱匯森館長為了「加強國史研究、溝通館內外之修史意見、介紹重要史料、報導本館工作」，決定恢復發行館刊，改為半年刊，內容方面分為 9 類，保留原本的論著、專著、國史擬傳、碑傳備采與館務報導，刪除文藝，改附錄為其他，並新增書評選載、史料選載、學術簡訊等類別。¹⁰⁴之後隨著業務的增長，類別有所新增。在其〈復刊辭〉中，清楚揭示館刊的編輯目標為使讀者能獲得新意見、新史料與新新聞，編輯原則為延續首任館長張繼的指示，「堅守三民主義的立場」，在義例上嚴格區分「正統、閏統之分」。

¹⁰⁴ 朱匯森，〈復刊辭〉，《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1 期（新店，1987.1），頁 1-2。

¹⁰⁵由上可知，《國史館館刊》的復刊，其目標、原則與國史纂修方向一致，咸以中華民國為本位，推廣提倡中華民國史的學術研究。而就國史館本身而言，《國史館館刊》的復刊也意味著 1980 年代中期政治自由化以後，國史館嘗試掌握社會脈動，以館刊做為交流平臺，吸收採納各界意見。

1987 年 1 月《國史館館刊》正式復刊，至 1999 年 12 月潘振球館長卸任前為止，發行至第 27 期，總計含有 899 篇文章，各類別篇數、比例與主要作者整理如表 28。從表中可知，文章類別以人物傳記為主的「國史擬傳」、「碑傳備采」為最多，占總數近四成，顯然與前述傳記組業務擴張有關。纂修胡健國指出，早期人物傳記作者多為館外「具國學基礎的老輩人物」，他們引用的史料多非原始材料，「拼湊改寫，形同作文」，因此其主持該組業務後，改以專業為優先，經常利用中國歷史學會開會期間，請託專家協助撰寫，然意願不高，多數人僅協助撰寫 1 篇。¹⁰⁶值得注意的是專著部分，篇數排名第 3。該類作者、研究主題之統計整理在表 28、表 29。由下表可知，發表 3 篇以上文章之作者，呂芳上、李齊芳除外，其他皆為國史館的纂修、協修與助修，多為前述館內修纂人員學術討論會所發表的文章。在斷代分期上，以「中華民國史」篇數最多，占總數五成以上，其他依序為「清末民初史」、「明清史」、「臺灣史」與「中共史」；類別方面仍以「政治軍事史」為最多，其次為「中外關係史」、「經濟史」，與前述《專題研究報告》的情形大致相同。不同處為「經濟史」部分較為突出，此與國史館典藏的檔案數量類型有關。

整體而言，國史館的討論焦點為清末民初至中華民國政府撤臺前的史事，聚焦於政治軍事與中外關係，與朱匯森館長揭櫫的國史編纂方針一致。這也顯示，國史館修纂人員的史學專業以中國近現代史居多，臺灣史研究人才相對缺乏，這也成為將來強調臺灣主體性的張炎憲館長，其上任後首要克服之難題。

¹⁰⁵ 朱匯森，〈復刊辭〉，《國史館館刊》，頁 2。

¹⁰⁶ 胡健國，〈理想與現實—史館生涯三十年〉，頁 225。

表 28 《國史館館刊》復刊文章類別與作者統計（第 1 至 27 期）

類別	篇數	比例 %	主要作者
論著	54	6	王恢、王章陵、宋晞、李雲漢、杜維運、侯坤宏、徐文珊、章開沅、蕭良章、錢穆(以上為 2 篇)
專著	163	18.1	洪喜美(9 篇)；郭鳳明、何思璉、蕭良章(以上為 6 篇)；王正華、胡健國、梁惠錦、簡笙簫(以上為 4 篇)；何鳳嬌、呂芳上、李齊芳、卓遵宏、葉飛鴻、劉筱齡、劉鳳翰(以上為 3 篇)
國史擬傳	141	15.7	刁抱石(11 篇)；王恢、王開節(以上為 10 篇)；李猷(9 篇)；何志浩(7 篇)；劉象山、謝鴻軒(4 篇)；李詠湘、關迪潛(以上為 3 篇)
碑傳備采	205	22.8	治喪委員會(64 篇)；王開節(4 篇)；丁中江、方妙才、王大任、史致年、伏嘉謨、李雲漢、韋兼堂、倪搏九、張壽賢、程滄波、黃欣周、談龍濱、謝鴻軒(以上為 2 篇)
館務報導	29	3.2	何思璉、簡笙簫(以上為 2 篇)
書評選載	46	5.1	朱浚源、呂芳上、李雲漢、林明德、林能士、孫廣德、張玉法、莊吉發、陳存恭(以上為 2 篇)
史料選載	84	9.3	侯坤宏(6 篇)、洪桂己(7 篇)、簡笙簫(5 篇)；李少華、卓遵宏、程玉鳳(以上為 4 篇)；葉健青(3 篇)；張鴻銘、蕭良章、藤井志津枝(以上為 2 篇)
學術簡訊	116	12.9	卓遵宏(10 篇)、王成勉(9 篇)、陳捷先(8 篇)、宋晞(5 篇)；簡笙簫、葉鴻灝(以上為 4 篇)；何思璉、陳美蓉、陳進金、湯熙勇、蔣武雄(以上為 3 篇)；卞鳳奎、朱文原、胡健國、張世瑛、許雪姬、陳三井、陳式武、陳憶華、楊維真、遲景德(以上為 2 篇)
史著選譯	2	0.2	陳鵬仁
演講	33	3.7	瞿韶華(3 篇)、朱匯森、潘振球、李登輝、杜維運(以上為 2 篇)；毛漢光、王克文、王國斌、王爾敏、王德毅、布羅夫、朱重聖、宋晞、李元簇、李玉貞、李長堅、李雲漢、汪榮祖、韋慶遠、徐乃力、許倬雲、連戰、陸炳文、曾銳生、黃彥、蔣永敬、戴國輝(各 1 篇)
憶往	4	0.4	王藍、石塵、朱沛蓮、趙寶熙
歷史見證	7	0.8	朱沛蓮(2 篇)；徐亨、陳孟堅、曾虛白、鄭彥棻、蕭良章(各 1 篇)
檔案防護	2	0.2	簡笙簫
檔案管理	7	0.8	簡笙簫(2 篇)；朱重聖、吳哲夫、沈景鴻、邵銘煌、張偉仁(各 1 篇)
總類	4	0.4	朱匯森(2 篇)、蔣復璁、瞿韶華(以上各 1 篇)
附錄	2	0.2	史東遊(1 篇)

表格說明：此表未列入僅撰寫 1 篇之作者。

表 29 《國史館館刊》復刊「專著」類別統計表（第 1 至 27 期）

斷代分期 主題類別	通史	魏晉 南北朝史	明清 史	清末 民初 史	中華 民國 史	臺灣 史	中共 史	總數	比例 %
史 學 通 論	2	1	0	0	1	0	1	5	3.1
政 治 軍 事 史	0	0	5	17	33	3	3	61	37.4
制 度 史	0	0	0	4	1	0	0	5	3.1
社會與婦女史	0	0	3	4	9	1	0	17	10.4
思想與學術史	0	0	0	6	3	2	2	13	8
科 技 史	0	0	0	1	0	0	0	1	0.6
經 濟 史	0	0	0	4	16	2	0	22	13.5
藝 術 史	0	0	0	4	0	0	0	4	2.5
歷 史 地 理	0	0	0	0	4	1	0	5	3.1
中 外 關 係 史	0	0	3	1	21	0	3	28	17.2
圖 書 文 獻 史	0	0	2	0	0	0	0	2	1.2
中 共 史	0	0	0	0	0	0	0	5	3.1
總 數	2	1	13	41	88	9	9	163	100

表格說明：中華民國史係專指發生於 1912 年後之史事，且集中於 1949 年以前，不含清末時期的革命活動。臺灣史部分係以臺灣為主體，所有朝代皆納入。中共史亦是以中共為主體，包含中共建黨至二戰後中國大陸之發展。

四、檔案移轉與史料彙編

國史館獨立完成的史籍，以史料彙編的成果最為豐碩，而史料彙編的類別實與國史館歷年徵集、移轉、保管、典藏的檔案息息相關。自 1972 年起，行政院各部會局處、臺灣省政府及地方縣、市政府等公家單位開始陸續移轉大陸運臺舊檔或在臺已失時效之案卷、公文入國史館典藏。然許多公家機關不甚積極與重視檔案保存，故 1986 年，朱匯森館長又函請行政院秘書處，修正《事務管理手冊》，規定公家機關擬銷毀檔案時，須將清冊送交國史館審選，國史館因此及時搶救與徵集移轉許多重要政府檔案，¹⁰⁷使館內典藏檔案之種類與數量皆大增。國史館即以這些檔案為基礎，展開史料彙編的工作。

根據表 30 與表 31 的整理，可知國史館編纂的史料以中國近現代史居多，其

¹⁰⁷ 許瑞浩，〈國史館在臺復館後的組織變革與業務發展（1957-2017）〉，頁 7、9。

中又以政治軍事外交、經濟財政金融兩類別佔絕大多數，此與前述國史館修纂人員發表的專著類別一致，說明兩者有直接的關聯。值得注意的是，1990 年代以後，國史館亦開始陸續出版政府遷臺初期之臺灣史料彙編，包含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政府接收、二二八事件及美援、土地改革、資源委員會與農復會等政治經濟相關史料。此與瞿紹華館長的方針有關。1993 年 10 月 20 日，瞿紹華館長在主管工作會報中指示，84 年度起，特單獨編列臺灣史料的編纂工作計畫與經費，¹⁰⁸遂有 1994 年新增任務編組—臺灣史料編撰組。自此國史館的修史工作已逐漸能觀照臺灣社會，使「國史」與臺灣的距離不再如此遙遠。

表 30 國史館史料叢書出版品分類表（1984-2000）

類別 \ 斷代分期	中國近現代史	臺灣史	種類數量
政治軍事外交	17	3	20
社會環保警政	2	1	3
教育文化藝術	2	0	2
經濟財政金融	12	4	16

表 31 國史館重要典藏史料一覽表

No.	史料名稱	內容年代	開始移轉年份	備註
1	國民政府檔案	1925-1949	1961	16942 卷
2	國民大會檔案	1938-1960	1992	405 卷
3	行政院檔案	1929-1974	1972	1500 卷
4	司法院檔案	1928-1979	1997	3528 卷
5	考試院檔案	1927-1971	1985	1888 卷
6	內政部檔案	1932-1948	1973	14989 卷
7	外交部檔案	1893-1992	1975	17464 卷
8	財政部檔案	1912-1983	1975	3453 卷
9	交通部檔案	1896-1989	1973	1149 卷
10	教育部檔案	1904-1971	1976	2438 卷
11	糧食部檔案	1941-1949	1991	7960 卷
12	司法行政部檔案	1921-1949	1990	10249 卷
13	資源委員會檔案	1939-1952	1965	27595 卷
14	賠償委員會檔案	1937-1949	1965	10521 卷

¹⁰⁸ 〈國史館在臺復館大事記（民國八十二年）〉，頁 358。

15	衛生署檔案	1935-1987	1975	3302 卷
16	經濟建設委員會檔案	1949-1973	1975	1836 卷
17	國家科學委員會檔案	1959-1983	1975	678 卷
18	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檔案	1948-1979	1989	20426 卷
19	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為檔案	1951-1990	1984	2909 卷
20	臺灣省政府所屬各單位檔案	1868-1991	(單位極多，略)	26949 卷
21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	1945-1947	1973	679 卷
22	臺灣省地政處檔案	1944-1992	1981	2404 卷
23	招商局輪船股份有限公司檔案	1949-1995	1995	4553 卷
24	專藏檔案	分三類：專門性檔案、特藏性史料檔案、各類光碟、唱片		276567 件
25	視聽檔案	錄音帶 1970 捲、錄影帶 953 捲、各類光碟 1321 片、唱片 49 張		
26	數位檔案	1996 年開始典藏數位檔案。 分兩類：國史館自製或委託廠商製作、外購		
27	照片檔案	清末-2000	1957	412234 張
28	微縮影檔案	1980 年開始製成微縮影片，含自製與外來兩種。		
29	人物傳記檔案	分為四項：各方徵集之人物資料、總統府移轉之人事調查資料袋、口述歷史和傳記組移轉資料、總統府函送褒揚令文		185638 件
30	蔣中正總統檔案	1923-1973	1995	分十大類
31	閻錫山檔案	1912-1959	1971	1264 卷
32	館藏重要圖書	含圖書(中文、西文、日文、韓文)、期刊(中外文)、政府出版品、統計資料		245800 件
33	館藏重要報紙	1902-1985	(種類極多，略)	1779 種

資料來源：整理自國史館審編處編，《國史館現藏一史料概述》(新店：國史館，2003)，頁 2、14、19、25、30-31、38、43-44、51、61、69、82-83、90、99、111、116、120、129-130、135、152、160、172、179-180、188、194、213-221、225-226、229-232、241、246、261。筆者按：灰底為朱匯森館長上任後始移轉至國史館之檔案。

潘振球館長上任後，最受矚目的政策即是開放蔣中正總統檔案。蔣中正總統檔案，即學界俗稱的「大溪檔案」，因最早存放於大溪頭寮的檔案庫，故而得名。該批檔案為 1923 年至 1971 年蔣中正統軍主政期間的各類重要文件，由總統府

機要室負責保管。自 1956 年起，該室即成立事略編纂室，編纂《總統蔣公事略》，1958 年時已完成初稿，隨後由蔣中正的侍從秘書秦孝儀擔任總編纂。1979 年時，秦氏擔任黨史會主委，為了加速編輯出版抗戰史料，供學界參考利用，因此將南投的黨史會史料與總統府機要室的大溪檔案統一集中於臺北的陽明書屋存放。¹⁰⁹自此有關國民黨之重要機密檔案皆集中於一地。

大溪檔案的所有權屬於總統府，但在外界看來，能直接利用與保管該批檔案的即為黨史會。如前所述解嚴以後，即有立委呼籲黨史會應開放檔案，供外界使用。1994 年，民進黨立委李進勇更建議行政院，大溪檔案應盡快由國史館接收。¹¹⁰當時的黨史會主委李雲漢，為了慶祝國民黨建黨一百年及弘揚國民黨的「臺灣經驗」，決定於該年 6 月，率先開放該會所藏 1961 年以前的全部檔案。¹¹¹1995 年初，總統府秘書長吳伯雄又裁示，將大溪檔案移轉至國史館典藏。嗣後，國史館成立「中興計畫」任務編組，由國史館副館長朱重聖、史料處長簡筌簧等人負責，於該年 5 月完成移轉，經國史館人員清點、整理及編目後，終於在 1997 年初陸續對外公開。¹¹²當時大溪檔案即將解密的消息甚受矚目，《聯合報》更以頭版新聞刊登此事，¹¹³足見大溪檔案開放所代表的重要意義，意味著威權時代的終結，臺灣終於正式進入自由平等的民主化時代。國史館的修史工作也因此轉向，積極擴大各類史料編纂，朝檔案開放的目標前進。

¹⁰⁹ 許兆瑞，〈許卓修先生對近代史研究之貢獻〉，《近代中國》，125（臺北，1998.6），頁 148-149。

¹¹⁰ 《立法院公報》，第 83 卷 43 期，1994 年 5 月 18 日，頁 167。

¹¹¹ 李雲漢，〈從史料開放談黨史研究〉，《近代中國》，101（臺北，1994.6），頁 12-13。

¹¹² 陳進金，〈國史館典藏「大溪檔案」始末〉，《近代史學會通訊》，4（臺北，1996.10），頁 34-35；林秋敏，〈國史館對於檔案的典藏與運用〉，收入《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二）》（新店：國史館，1998），頁 13。

¹¹³ 〈大溪檔案解密 年底前對外開放〉，《聯合報》，1996 年 8 月 14 日，第 1 版。

第五章 政黨輪替與國史館的轉型

2000年3月，民進黨籍的陳水扁與呂秀蓮當選中華民國第10任正、副總統，政權和平轉移，實現首次政黨輪替。2008年3月，政權再度轉移，國民黨籍的馬英九與蕭萬長當選中華民國第12任正、副總統，國民黨再度重返執政，完成第二次政黨輪替。臺灣的政治發展持續往民主化方向前進，國史館在這過程中的組織定位、功能轉型及修史工作的變遷，將是本章探討的主題。首先了解民進黨政府執政後，國史館的組織再造如何帶動國史館的轉型；接著，觀察政黨輪替對國史館修史工作以及國史的內涵的影響；最後，探討政黨政治與國家認同的分歧，如何影響國史館的組織運作。

第一節 組織之再造

一、組織條例的修訂

前文提及國史館的定位問題與存廢危機係因〈檔案法〉的制定過程而產生，蓋因〈檔案法〉完成立法後，管理檔案之權責歸中央主管機關所有，國史館的業務職掌與組織架構則須配合調整。國史館亦藉此機會，全面檢討既有職掌、員額編制與組織架構，期能「提升與加強修史功能」，並「健全職務結構」。¹1999年，潘振球館長任內，國史館開始研擬修訂〈國史館組織條例〉。2000年6月，張炎憲館長上任後，適逢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研議臺灣省政府精省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的歸屬問題，在經歷「整併」抑或「改隸」的爭議後，行政院最終決議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改隸」國史館。2000年10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組織條例草案」遂與「國史館組織條例部分條文再修正草案」併案送立法院審議，隔年10月三讀通過，2002年1月1日正式施行。²

國史館的組織結構與人員編制在〈國史館組織條例〉修正後，發生相當大的轉變。內部單位設置從原本的三處（史料、徵校、總務）、二室（主計、人事），

¹ 王幸蕙，〈國史館組織再造之路—國史館組織條例之修正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組織條例之制定〉，《國史館館刊》，復刊第31期（新店，2001.12），頁2-4。

² 王幸蕙，〈國史館組織再造之路—國史館組織條例之修正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組織條例之制定〉，頁5-8。

改為四處（修纂、審編、采集、秘書）、三室（會計、政風、人事），並增設新職務（單位副主管、專門委員、專員），員額亦從至多 174 人縮減為 138 人。³值得注意的是，修纂人員已從原本直屬於館長的任務編組，轉為配合修史職掌，獨立設置修纂單位；並在張炎憲館長時期，開始參與科技部的研究計畫。國史館乃成為政府研究機構，修纂人員也因而取得如同大學教授、副教授、助教與講師的身分，同樣領取學術研究費（2014 年時才改為與一般公務人員一樣，領取專業加給）。⁴2004 年 1 月 20 日，國史館又在〈總統副總統文物管理條例〉的公布施行下，新增職掌，成為總統副總統文物的管理主管機關，國史館因此再度調整單位的業務內容與員額配置，後由采集處專責處理該項業務。⁵2006 年，張炎憲館長以成立「總統副總統文物研究中心」為訴求，爭取博愛特區用地做為典藏庫房與展示空間，⁶獲行政院核准，撥給國史館位於總統府後方、原由交通部使用的市定古蹟「遞信部古蹟大樓」。加以整修後，2010 年 4 月起，在林滿紅館長任內，陸續將新店國史館擴遷至此，並做為「總統副總統文物館」使用。⁷至此，國史館的辦公地點從新店山區重返臺北市區，其組織結構、業務職掌皆與前此截然不同，除了繼續整理編纂與研究中華民國史、臺灣史史料，還增加采集、展覽、推廣國家元首的文物與器物，兼具學術研究與博物館寓教於樂性質的社會教育任務，⁸隨臺灣社會的發展持續再造與轉型。

³ 林山本，〈國史館組織現況〉，《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42 期（新店，2007.6），頁 141-142。

⁴ 黃室駿、巫佳穎訪問，〈系友歐素瑛老師訪談〉，《臺師大歷史系電子報》，52（臺北，2016.10），網址：<http://mail.his.ntnu.edu.tw/E-Paper/052/052-fl.htm>，檢索日期：2021/10/25。

⁵ 林山本，〈國史館組織現況〉，頁 141-143。

⁶ 黃秀妃，〈飛越 2000—秘書處 89～95 年業務推動與發展〉，《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42 期（新店，2007.6），頁 13。

⁷ 蘇芷萱，〈從遞信部到國史館—建築的歷史〉（臺北：國史館，2011），頁 71。

⁸ 〈林滿紅館長主持「總統副總統文物館」開幕典禮致詞〉，《國史館館訊》，5（新店，2010.12），頁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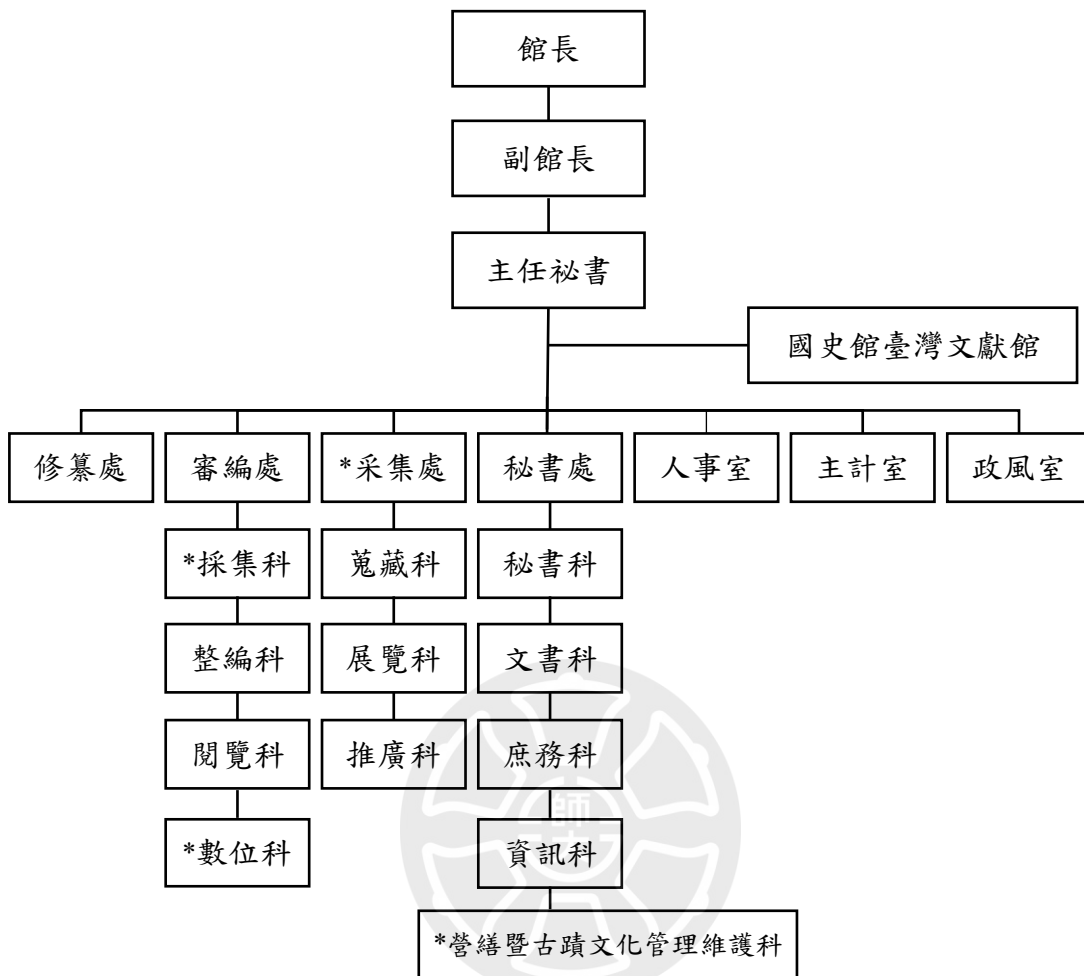


圖 5 國史館組織架構圖（2002 年 1 月—）

資料來源：葉飛鴻，〈審編處的第一個五年—成長與茁壯〉，《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42 期（新店，2007.6），頁 53、81；黃秀妃，〈飛越 2000—秘書處 89～95 年業務推動與發展〉，頁 11。*2002 年，審編處原設有整編、典藏與閱覽三科，采集處亦設有史料、圖書、文物等三科。2007 年起，采集處專責處理新增的總統、副總統文物業務，因該處原本的史料採集和圖書管理等業務移撥至審編處，審編處因此設置「採集科」。「數位科」與秘書處的「營繕暨古蹟文化管理維護科」等亦於 2007 年增設。

二、學者執掌館務

除了組織結構與職掌的改變，國史館另一項重大變化是，主持該機構的首長已不再是過去被批評為政治酬庸的的國民黨黨政要員，而是依執政黨需要，選擇

與其理念相符或相近的學者，出任國史館館長。根據表 32 的整理，從 2000 年至 2016 年，國史館歷經三任館長，其中民進黨政府時代（2000-2008），館長始終由張炎憲⁹擔任；國民黨馬英九總統任內（2008-2016），前後經歷林滿紅¹⁰、呂芳上¹¹兩位館長。

三位館長皆為學者出身，亦皆為國家最高學術機構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員，其學術專長與關懷則是各有不同，張炎憲館長的研究範圍為臺灣史，林滿紅、呂芳上館長則為中國近現代史。三位館長皆出生於戰後臺灣，上任時的年齡分別為 53 歲、57 歲及 65 歲，皆為長期在學術界耕耘的學者。張炎憲長年關注二二八事件與從事口述歷史工作，其核心理念為強調臺灣主體性的臺灣史研究；林滿紅的研

⁹ 張炎憲（1947-2014），臺灣嘉義人。1974 年獲臺灣大學歷史系碩士後，入國史館工作。1975 年赴日本留學，1983 年取得日本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學位。1984 年回國後，入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前身）擔任副研究員，1993 年升任研究員。其後，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從事口述歷史訪談工作。1986 年起，擔任《臺灣風物》雜誌總編輯（至 2014 年 9 月），參與籌畫中研院「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致力於學院內推動臺灣史研究。同時參與創辦民間學會與基金會，歷任現代學術基金會董事（1988-2014，2011 年任董事長）、臺灣教授協會創會會員（1990，2011-2012 年任會長）、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董事（1990，2010-2014 年任秘書長）、臺灣歷史學會首任秘書長（1995，1998-2000、2010-2012 年任會長）、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2001-2009）。亦曾擔任《首都早報》主筆（1989）、宜蘭縣史系列總編纂（1992-2004）與創辦《臺灣史料研究》期刊（1993）。參見〈張炎憲教授年表〉，戴寶村主編，《治史起造臺灣國：張炎憲全集 1》（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17），頁 520-524。

¹⁰ 林滿紅（1951-），臺灣臺中人。1976 年獲臺灣大學歷史系碩士後，1977 年入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就讀博士班，1979 年入中研院近史所擔任助理研究員，1980 年赴美國哈佛大學留學，先後於 1985 年、1989 年取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與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文研究所博士學位，隔年升任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1991 年起，陸續在臺灣師範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與京都大學擔任客座教授。期間獲邀任中華民國陸委會諮詢委員（1995-2000）。2009 年任國史館館長期間，同時出任首任中華民國口述歷史學會理事長（至 2011 年）。參見李宇平訪問、王超然記錄，〈林滿紅女士訪問紀錄〉，收入黃克武等主訪，沈懷玉等紀錄，《近代史一甲子：同仁憶往錄（下）》（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頁 133、138-139、141、16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人員——林滿紅〉，網址：<http://www.mh.sinica.edu.tw/UserDetail.aspx?userID=69&mid=53&tmid=2>，檢索日期：2021/9/17。

¹¹ 呂芳上（1944-），臺灣桃園人。1967 年東海大學歷史系畢業後，1969 年入國民黨黨史會擔任助理幹事，並陸續升任幹事、總幹事（至 1984 年）。期間於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就讀研究所，1975 年取得碩士學位，1985 年獲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後，離開黨史會，入中研院近史所擔任副研究員、研究員，1997 年升任所長（至 2002 年）。同年出任中國近代史學會理事長（至 2003 年），2000 年起，又擔任中華軍史學會副理事長（至 2004 年）。曾在美國史丹福大學、哈佛大學、英國倫敦大學、日本慶應大學擔任訪問學人，並於臺灣師範大學、天主教輔仁大學擔任兼任教授。〈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網站——社長簡介〉，網址：<http://www.rchcs.com.tw/about.php>，檢索日期：2020/9/29。

究焦點，從清末的臺灣經濟變遷，到從全球史角度探討近代臺灣與周邊國家的經貿關係，近年則關注〈中日和約〉與中華民國的主權議題；¹²呂芳上在黨史會服務多年後，進入中研院近史所，研究領域為中國近現代史、中國國民黨黨史，除了國民革命與抗戰，中國近代婦女亦是其關懷的對象。三人的治史理念皆在下述國史館修史與業務重心轉移上，而有不同程度的實踐。

表 32 第六至第八任國史館在臺館長資歷（2000-2016）

任別	任期	姓名	學歷	重要經歷
六	2000.5.20- 2008.5.19	張炎憲	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碩士；日本東京大學文學博士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臺灣歷史學會會長、臺灣教授學會會長、宜蘭縣史系列總編纂、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真相研究小組召集人
七	2008.5.20- 2010.12.15	林滿紅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士、碩士；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美國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文研究所博士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華民國陸委會諮詢委員、中華民國口述歷史學會理事長
八	2011.1.20- 2016.5.19	呂芳上	東海大學歷史學系學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博士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中國近代史學會理事長、中華軍史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總幹事

資料來源：整理自〈張炎憲教授年表〉，戴寶村主編，《治史起造臺灣國：張炎憲全集 1》（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17），頁 520-52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人員—林滿紅〉，網址：<http://www.mh.sinica.edu.tw/UserDetail.aspx?userID=69&mid=53&tmid=2>，檢索日期：2021/9/17；〈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網站—社長簡介〉，網址：<http://www.rchcs.com.tw/about.php>，檢索日期：2020/9/29。

第二節 國史編纂重心之移轉

一、「臺灣史」躋升國史的一環

張炎憲出任國史館館長前，即感嘆臺灣史仍不受重視，臺灣歷史被國民黨政

¹² 李宇平訪問、王超然記錄，〈林滿紅女士訪問紀錄〉，收入黃克武等主訪，沈懷玉等紀錄，《近代史一甲子：同仁憶往錄（下）》，頁 162-163。

府割裂，失去連續性與主體性；並認為臺灣人民的國家認同歧異，係因長期受到外來政權的統治，處在日本與中國兩大民族主義的夾縫中，加上受到血緣地緣關係產生的漢族意識以及官方以中華文化為本位的影響，致使臺灣人民缺乏主體意識，臺灣仍無法成為獨立自主的國家。張氏因此曾在 1993 年民進黨內的文化會議報告中，批判國史館、中研院近史所、中國歷史學會等三個史學研究單位，認為三單位受到國民黨的掌控和影響，其歷史意識不脫中國本位與國民黨正統史觀，因而建議將國史館改名為「中國現代史館」或直接廢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也反對另外成立以臺灣史為主的國史館，理由為避免史學被官方控制。¹³

2000 年 5 月，國史館新、舊任館長交接。張炎憲甫一上任，即表明「反對修國史」，並將國史館的未來定位在「歷史研究」與「史料蒐集」，同時主張國史館應改變研究方向，掌握臺灣的社會脈動，反映臺灣的社會變遷。¹⁴由此可知，張炎憲以臺灣史學者身份接掌國史館，乃亟欲扭轉該機構的組織定位與體質，希望國史館能從官方修史機構轉型為學術研究機構；業務重心亦能從中國近現代史料編纂轉為臺灣史料的蒐編，促進國史館的在地化，加深與臺灣土地、人民的連結。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改隸為「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一事，即是依照其所期望，使國史館朝「本土化」方向轉型的重要指標。¹⁵張氏曾多次表明，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的位階從地方上升到中央，表示臺灣史已從「地方史」轉變成「國家歷史」；他亦指出，該機構保存許多日治時代的臺灣總督府檔案，將來或能成為「日本統治時代的臺灣史料中心」。其後，他亦將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及臺灣省政府、縣市檔案移入臺灣文獻館，使其真正成為臺灣史的學術研究機構。可見他確實希望能將其理念落實於國史館的轉型中。然而，在另一方面，張炎憲也不認為，國史館應就此停止民國史料的編纂與研究，相反地，他認為民國史研究仍不可偏廢，需繼續提倡，如此才能理解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現代史。¹⁶換言之，張炎憲館長時代，

¹³ 張炎憲，〈割裂與重生—臺灣史研究的定位與簡史〉，收入戴寶村主編，《治史起造臺灣國：張炎憲全集 1》，頁 25-27；張炎憲，〈歷史意識與臺灣國家定位〉，收入戴寶村主編，《治史起造臺灣國：張炎憲全集 3》（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17），頁 67-73、76。

¹⁴ 〈張炎憲接國史館長 反對修國史〉，《聯合報》，2000 年 5 月 24 日，14 版。報導中指出，中研院院士曹永和、臺大歷史系教授鄭欽仁、臺灣教授學會會長黃宗樂、民進黨立委林濁水與翁金珠等，都參與此次監交儀式，皆肯定國史館新時代的來臨，認為國史館的任務也應隨民主化時代而改變。

¹⁵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下月併入 國史館將本土化〉，《中國時報》，2001 年 12 月 4 日，第 14 版。

¹⁶ 張炎憲，〈口述歷史與臺灣史的重建〉，收入戴寶村主編，《治史起造臺灣國：張炎憲全集 1》，頁 192-193。

雖致力於提升臺灣史的地位，使之躋升為國史的一環，但並非取代中華民國史，而是兩者同時並存。

在臺灣史地位的提升與學術研究機構的轉型目標下，張炎憲具體揭示國史館的四點發展方針：（一）與外界加強聯繫，與地方文史工作室及各縣市文化中心展開交流與合作；（二）提升學術研究水準，修纂單位應與各大學及研究機構合辦「關懷本土歷史文化」的學術研討會，成立學術諮詢委員會，與專家學者共同規劃研究方向；（三）合乎國際潮流，將檔案照片資訊化，並定期公布於網路，開放外界使用與討論；（四）調整組織結構，暢通人事升遷管道，提供有尊嚴的工作環境。¹⁷國史館於是在政黨輪替後首位學者館長的主持下，逐漸往學術專業化、在地化，及檔案史料數位化、公開化的方向進行組織再造。張炎憲上任不久，即重新調整修纂單位，將其業務整併為史料叢書、臺灣史編撰、人物傳記與專題研究等四個任務編組。¹⁸2002 年 1 月，在〈國史館組織條例〉修訂施行後，任務編組得以合併，正式成立修纂處。國史館的修纂業務於是能集中展開。

大體而言，張炎憲館長任內，有關修纂業務及其相關學術活動，有延續也有創新。如學術活動方面，瞿韶華館長時期開始舉辦的修纂人員學術討論會與中華民國史專題討論會，兩者皆有助於提升修纂人員的史學專業，並與學界增加交流，張炎憲館長皆予以延續；部分原有的修史計畫，也賡續進行，如黃季陸館長時期以「提供史料，便利研究」為宗旨開展的《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持續編纂至 1984 年份，於 2007 年出版；朱匯森館長時期開始發行的《國史館館刊》復刊，持續發行至 2008 年，2001 年時另新增學術性質的《國史館學術集刊》，同樣發行至卸任為止；《中華民國褒揚令集續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國史擬傳》等人物傳記類史料，也分別接續出版至第 16、31 與 11 輯。至於潘振球館長時期全力加速整理編目的「蔣中正總統檔案」，也以編印《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的形式，於 2003 年出版首冊，加速檔案的開放。另外，在既有的檔案基礎上，持續編印國民政府時期的史料，如《閻錫山檔案一要電錄存》、《國民政府禁煙史料》、《戰後華僑史料彙編》等，此外，由於電子資訊日益普遍，國史館也與時俱進，主動爭取參加「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將學界使用頻繁的重要檔案數位化，建置「國家歷史資料庫」，並將部分史料以數位方式創意加

¹⁷ 張炎憲，〈營造國史館美麗願景〉，《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28 期（新店，2000.6），頁 2-4。

¹⁸ 簡筌簧、林秋敏，〈國史館復館 50 週年大事記〉，頁 311。

值，推廣檔案史料，便利運用。¹⁹

以上種種，皆說明張炎憲館長並未因政黨輪替而全盤否定國史館的既有傳統與修史業務，反而能從促進學術研究的角度予以保留，並加強史料數位化，賦予檔案新生命。值得一提的是，瞿韶華館長時代開展的口述歷史工作，其規模在張館長上任後，更大幅擴張。訪談對象也從過去偏重的政治、軍事與經濟領袖，擴及宗教、教育文化、財政經濟、民主運動、社會醫療，以及各行各業等臺灣各階層、各領域的社會菁英。其中，國史館對民主運動人士的口述訪談，亦表示異議人士的聲音不再被官方機構摒除在外，具體呈現臺灣從威權走向民主的政治變遷。上述變化顯示出，國史館已從外界認為只重視與黨政關係親近的上層少數精英之刻板印象，轉向關注臺灣全體住民的生活樣態，留意臺灣人民對自我歷史的詮釋，體現張館長所希望的，國史館與臺灣土地、人民生活親近的目標。

值得注意的是，民進黨政府的理念也透過張館長的業務推動而具體呈現。政黨輪替後，國史館與總統府的關係，和過去相比，增加許多互動。不僅舉辦活動時會邀請陳水扁總統到館致詞，²⁰陳總統也親自到館視察，並直接指示國史館的業務發展方向，進而成為國史館未來轉型的目標，這在過去可是前所未見。²¹根據 1999 年 5 月 9 日，民進黨修正通過的〈行動綱領〉第 48 條指示：「公布二二八事件真相，興建二二八烈士館」。²²2001 年，陳水扁總統特意選在二二八和平紀念日前夕前往國史館視察，指示國史館擴大解密兩蔣檔案，徵集白色恐怖、美

¹⁹ 簡筌簧、朱文原，〈國史館修纂業務的回顧與展望〉，《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42 期（新店，2007.6），頁 134-135；許瑞浩，〈國史館在臺復館後的組織變革與業務發展（1957-2017）〉，頁 17。

²⁰ 陳水扁總統曾多次參與國史館舉辦的新書發表會及研討會，從《國史館館刊》可見其致詞內容。其曾參與的活動有：2002 年的二二八事件檔案、雷震案史料彙編新書發表會，2003 年的「二十世紀臺灣民主發展—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七屆討論會」，2005 年「陳副總統辭修先生文物捐贈暨石叟叢書線上啟用發表會」，以及 2006 年的「臺灣 1950-1950 年代的歷史省思：中華民國史專題第八屆討論會」。

²¹ 此點和戒嚴時期差距甚大，翻閱歷年《國史館館刊》所附大事記與《國史館紀要》、《國史館概況》等介紹書刊，未曾見到蔣中正、蔣經國總統赴國史館視察的任何文字或相關影像紀錄，僅有嚴家淦總統任內曾親自前往視察乙次，並留有照片為證。相反的，黨史會出版的紀念書刊則能見到羅家倫擔任主委時代，即有蔣中正總統參觀該會舉辦展覽之活動照片。參見劉偉鵬，《汗青一甲子》，頁 80-81。

²² 〈民主進步黨一黨綱〉，頁 26，下載自民主進步黨網站，網址：<https://www.dpp.org.tw/download>，下載日期：2021/8/31。

麗島事件史料，並交代國防部成立專案小組，協尋雷震回憶錄。²³同時，囑託國史館統籌總統副總統文物，期盼國史館成為典藏歷任總統文物檔案的專責機構。

²⁴2001年3月起，國史館即配合將總統府「空間解嚴」的政策，在陳總統的命令下，開始在總統府內策展，首次策展主題為「總統的故事——從蔣中正到蔣經國」。

²⁵此後，戰後臺灣史料的編纂（特別是戒嚴時期政治禁忌檔案）與總統副總統文物的徵集典藏與展示，成為國史館的業務發展重點。2000年起，國史館陸續出版的《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二二八辭典》、《雷震案史料彙編》及《戰後臺灣政治案件》等政治檔案史料彙編，即是此一脈絡下的出版成果。此外，國史館亦成立李登輝口述歷史小組，²⁶首創國內訪談卸任總統之先例，陸續出版《見證臺灣：蔣經國總統與我》、《李登輝總統照片集》、《李登輝總統訪談錄》等書籍。²⁷

整體而言，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國史館的組織與業務發展也呈現嶄新的風貌，不僅學術地位持續提升，加深與臺灣土地人民的聯繫，和總統府的關係也更加緊密，徹底取代了過去黨史會在官方史政機構中所扮演的角色。²⁸可以說，政黨輪替後，國史館已逐漸轉型為學術研究機構及總統副總統文物典藏機關，臺灣史的地位也獲得提升，成為國史的一環。

²³ 〈陳水扁：徵集美麗島專檔 赴國史館參觀〉，《聯合晚報》，2001年2月27日，第4版；〈陳總統促公開兩蔣檔案〉，《民生報》，2001年2月28日，A2版；〈陳總統參訪國史館談史料解密〉，《中央日報》，2001年2月28日，第4版。

²⁴ 〈國史館將統籌整理歷任總統文物〉，《中國時報》，2001年2月28日，版3；〈國史館走廊 陳列扁文宣 陳水扁盼國史館專責典藏歷任總統資料〉，《聯合報》，2001年2月28日，第9版。

²⁵ 吳淑鳳，〈遷臺後國史館的昔與今〉，頁37。

²⁶ 張炎憲，〈國史館與臺灣史研究〉，收入戴寶村主編，《治史起造臺灣國：張炎憲全集1》，頁229。

²⁷ 許瑞浩，〈國史館在臺復館後的組織變革與業務發展（1957-2017）〉，頁16。

²⁸ 1991年，國民黨實施黨務精簡後，黨史會的委員制度被取消；1995年，陳水扁當選臺北市市長後，開始處理陽明書屋的土地產權問題，黨史會因此在1997年將陽明書屋交還內政部，由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管理，黨史會本身則遷入位於臺北市的國民黨中央黨部大樓；2000年總統大選國民黨敗選後，改造黨內組織，黨史會被降級成二級單位，併入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並改名為「黨史館」，正式員額僅剩8人。李雲漢因此稱秦孝儀擔任主委時，是黨史會的「黃金時代」，之後開始走下坡，其勢力大不如前。參見李雲漢，《懷元廬存稿之一：雲漢悠悠九十年》（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130；李雲漢，〈黨史會七十年〉，頁119、126。

二、「中華民國史」地位的再確立

2008 年總統副總統選舉，馬英九、蕭萬長組合當選後，該年 5 月國民黨重返執政。馬英九總統指定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林滿紅接任新館長，國史館首度由女性主持。馬英九之所以屬意林滿紅，除了兩人同為美國哈佛大學校友，有此一學緣關係外，更重要的是，林氏曾於 2008 年 3 月，出版《獵巫、叫魂與認同危機——臺灣定位新論》一書，該書從國際法的角度，探討〈中日和約〉的簽訂，提出有關臺灣主權歸屬的國家定位新論述，為中華民國的主權獨立及其有效統治範圍建立了合乎法理的解釋，因而深獲其青睞。²⁹

事實上，國史館在張炎憲館長時代，曾出版過一系列有關「一個中國」、「臺灣主權」、「中華民國與聯合國」的論述資料選集，意在呈現多元的政治觀點，使臺灣人民重新思考國家認同與國家定位問題，並能了解臺灣在國際地位上的危機。³⁰張氏亦曾明白表示「臺灣地位未定」，認為臺灣主權的認定，應根據 1951 年日本與同盟國成員簽訂的〈舊金山和約〉，而非不具法律效力的〈開羅宣言〉或日本降書。³¹林滿紅的論點可說是一種回應。她反對臺灣地位未定論的說法，認為日本在〈舊金山和約〉中，雖僅表示「放棄」臺澎等地區的主權，未指明放棄的對象，然 1952 年日本與中華民國簽訂的〈中日和約〉中，將臺澎財產處理的對象指名為中華民國政府，臺澎的自然人及法人亦照中華民國法律，視為中華民國國民，等同日本政府是在兩國具有外交關係的狀況下，承認中華民國有效統治臺澎金馬地區，因此臺灣地位實非未定。³²

由上可知，分屬民進黨政府與國民黨政府總統派任的前後任國史館館長，在「臺灣地位」的看法上相當分歧，間接反映出學界對於中華民國與臺灣歷史的認知有所差異，進而影響對兩者的詮釋。以臺灣為本位的論者認為，臺灣主權未定，因此應從臺灣的角度，以曹永和提出的「臺灣島史觀」或杜正勝提出的「同心圓史觀」重新詮釋臺灣史，有別於延續中國歷史發展脈絡下的中華民國史；以中華

²⁹ 〈國史館首位女館長 林滿紅：臺灣是大東亞的中心〉，《中國時報》，2008 年 5 月 12 日，第 A6 版；〈臺北賓館重現中日和約場景 林滿紅：中華民國有效統治臺澎金馬〉，《中國時報》，2009 年 4 月 14 日，第 A11 版。

³⁰ 張炎憲，〈從地方史到國史〉，收入戴寶村主編，《治史起造臺灣國：張炎憲全集 1》，頁 219。

³¹ 〈前國史館長 張炎憲主張臺灣地位未定〉，《自由時報》，2009 年 5 月 24 日，A2 版。

³² 〈國史館長：齋藤凸顯日本困境〉，《聯合報》，2009 年 5 月 3 日，A4 版；〈臺北賓館重現中日和約場景 林滿紅：中華民國有效統治臺澎金馬〉，《中國時報》，2009 年 4 月 14 日，A11 版。

民國為本位的論者則認為，中華民國擁有臺灣的主權，具有統治合法性。姑且不論兩種史觀在國家定位上的歧異，兩者實為站在不同的角度，思索臺灣的未來出路，臺灣內部的族群該如何彼此共存，如何凝聚國人的共識，進而在國際立足，成為關心國家議題的各領域學者共同思索的課題。因此，林滿紅館長亦曾表示「臺灣是大東亞的中心」，應以更宏觀的角度看待臺灣與周邊國家乃至與國際社會的互動，找出自我的定位。此當表示，兩種史觀並非全然對立，仍有對話的空間。

林滿紅館長上任後，即表明希望國史館的工作能從史料編纂，轉往書寫國家整體的歷史方向前進。首先她期盼歷史研究能與社會結合，檔案史料能支援總統副總統博物館的展示；其次，與國內外學者合作交流，提升中華民國史在國際學界的地位；最後，摒除官方立場，推動全民寫史的任務，³³目的是從人民的角度，重新書寫國史，凝聚國人的共識。

2010 年末，國史館為迎接即將到來的民國建國一百周年，於該年國慶日當天，在網路舉辦「民國百大人物誌票選」活動，期能與民眾增加互動。根據當時國史館副館長朱重聖的說明，國史館列出的百人名單共分為政治、財經、軍事、外交、社會、宗教、學術與藝文等八大類，人物名單採取三大原則，包含中國大陸與臺灣的人數比例為 4：6，因政府遷臺已六十年，且「活人不談、非本國人不談」。³⁴由於中共領導人毛澤東、鄧小平、周恩來與在臺灣極具爭議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陳儀亦被列入百大名單中，鄧小平更獲得「軍事類」最高票（票數多於蔣中正），在臺灣政壇引起軒然大波。國民黨立委周守訓率先在立法院發難，指「鄧小平對中華民國無顯赫戰功，甚至是嚴重傷害中華民國」，「國軍情何以堪？」；³⁵民進黨立委蔡煌瑯亦批評國史館決策過於草率，傷害臺灣人民歷史感情；更有民眾質疑此舉是「為匪宣傳」；中研院近史所所長黃克武則指出，若從「史學」角度看，毛澤東對民國歷史確實相當有影響力，然而從「國家定位」或「歷史」角度看，將毛、鄧放上榜，「對國人情何以堪」。³⁶國史館雖立即將網站下架，林滿紅館長卻為此辭職。由此可見，國史館雖已逐漸轉型為學術研究機構，然而因其直屬於總統府的官方特性，在有關國家論述、人物歷史地位的議題上，與執政者的政治理念與意識形態自是無法切割。林滿紅館長在任時間僅有兩年半，其重

³³ 林滿紅，〈國史館的現在與未來〉，《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44 期（新店，2008.6），頁 6。

³⁴ 〈毛鄧列百大 國史館坦言 選人經驗不足〉，《聯合報》，2010 年 12 月 9 日，A3 版。

³⁵ 〈民國百人選 赫見毛澤東鄧小平〉，《自由時報》，2010 年 12 月 9 日，A1 版。

³⁶ 〈草率 毛澤東鄧小平列民國百大〉，《蘋果日報》，2010 年 12 月 9 日，A10 版。

寫國史的構想也因此未能實現。

2011 年 1 月，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呂芳上就任館長職務，任期至 2016 年 5 月，第三次政黨輪替民進黨再度執政為止。由於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擔任研究人員且執掌所務多年，呂芳上館長上任後，除了將其在中研院近史所的經驗帶入國史館，更立即宣示展開長期的「創新修史」計畫，力圖編纂出兼具客觀、真實、可讀與說服力的《民國百年通鑑》，以及採「Y 字形」觀點，以中華民國為主體編纂的《中華民國在臺灣六十年》，期能跳脫黨派、凝聚國人共識，形塑出中華民國「近代國家」發展的歷史論述，進而「取得主動的歷史發言權」。³⁷值得注意的是，「取得主動的歷史發言權」此一宣示，實有與中共政權爭奪中華民國的歷史論述權，強調國家主體性的意涵。他曾指出，中國政府將中華民國的歷史結束於 1949 年，又把臺灣定位為地方史，並多次召開辛亥革命一百週年的研討會，這些都「多少有點統戰意味」。他認為，臺灣正逐漸喪失中華民國歷史的論述權，在此危機下，「自己的歷史應該自己來修」。³⁸因此，在此一目標下，國史館的修史業務又再度發生轉變。除了重拾「纂修國史」的職掌，並以「寫民國史」為重點，³⁹修史重心也從臺灣本土轉向中華民國整體的歷史發展變遷，中華民國史的國史地位得以再確立。

由於秉持「創新修史」的精神，國史館相當具有指標性的《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纂工作也遂告終止，改以「客觀秉實」、「拓展取材範圍」的態度與方法，重新編纂《中華民國國史紀要》，⁴⁰並新增《中華民國近六十年發展史》、《中華民

³⁷ 所謂的「Y 型史觀」係以 1949 年為關鍵年份，表示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臺灣史」與「中華民國史」已經匯流，共同創造出「中華民國在臺灣」此一發展主軸，今日臺灣的體制實際上同時繼承了日本統治的遺產與 1949 年以前中國大陸的發展。參見黃克武，〈民國史研究的現狀與幾點反思〉，《國史研究通訊》，3（臺北，2012.12），頁 40；呂芳上，〈建國百年、創新修史—就任國史館館長講詞〉，《國史館館訊》，6（臺北，2011.6），頁 4。然而，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所長許雪姬曾批評「Y 字型共創論」，認為此說只從文化面向考量戰後的臺灣社會，缺乏長時間跨度與忽視文化多元性。參見許雪姬，〈序〉，收入王泰升，《臺灣法律現代化歷程：從「內地延長」到「自主繼受」》（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頁 viii。

³⁸ 〈國史館長交接 呂芳上：自己的歷史應該自己修〉，《自由時報》，2011 年 1 月 21 日，第 A4 版。

³⁹ 〈呂芳上接任 專長民國史 新國史館長：寫民國史 未來重點〉，《聯合報》，2011 年 1 月 12 日，第 A4 版。

⁴⁰ 共發行 3 冊，第一冊為 1912 年至 1921 年，第二冊為 1922 年至 1931 年，第三冊為 1932 年至 1941 年，每十年一冊，每冊皆能呈現不同階段的時代特徵，並能關注與國民切身相關之政府政策規劃，因此取材範圍擴及至社會各領域階層，不再侷限於政治與經濟範疇，呈現內容亦能

《國建國百年大事記》及《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史畫》等項目，這些新修纂的國史大多係配合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週年慶祝活動，而於 2012 年出版。其中，《中華民國近六十年發展史》係以專題的方式撰寫 1949 年至 2011 年間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發展過程，分為上下兩冊。為了避免政治爭議，呂芳上館長特別在該書的〈序〉裏強調，本書書寫力求「客觀持平，論述有據，不曲筆、不護短，所謂『秉筆直書』」。⁴¹該書的各章標題亦可清楚看出呂館長所欲傳達之精神，即中華民國遷臺後的發展過程之曲折與艱辛，從「風雨飄搖」、「轉危為安」，到「經濟起飛」、「革新保臺」，再到「邁向民主」、「多元並呈」，然後走向「全球脈動」，此一從威權走向民主的獨特歷史經驗，值得「國人認識與珍惜」。就此點而言，該書已打破過去的中國本位之框架，凸顯出以臺灣為生存發展空間的中華民國史。

另一方面，從附錄七可知，呂芳上館長時代，不少前人開展的修史工作項目得以延續。如人物方面：《中華民國褒揚令集續編》、《國史館現藏人物傳記史料彙編》、《出類拔萃人物訪談錄》等，皆持續進行與深化，宗教人物的訪談更已從佛教類別擴及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重要人士；史料方面：《戰後遣送外僑返國史料彙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日治時期臺灣高等官履歷》等中國近現代、戰後臺灣與日治臺灣等史料，也持續編纂。總統副總統文物方面，《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更加速完成全部出版，蔣經國總統與陳誠副總統的書信、日記與相關史料的編纂也繼續進行。凡此皆可說明，即便政黨再度輪替，在學者主持與學術研究風氣自由的時代，國史館的學術自主性也相對提高。然而，必須指出的是，國史館的集體修史項目仍不免受執政黨的政治理念影響，此點不論是之前的陳水扁總統時代，抑或是馬英九總統時代，皆是如此，而這又與解嚴以後臺海兩岸關係的局勢變化與臺灣內部的國家認同分歧有關，下節的討論能清楚看到此一情形。

如實體現國民黨政府措施失當之處。吳淑鳳，〈書訊：《中華民國國史紀要》第 3 冊簡介〉，《國史研究通訊》，10（臺北，2016.6），頁 304-306。

⁴¹ 呂芳上總纂，《中華民國近六十年發展史（上）》（臺北：國史館，2012），〈序〉，VI。

第三節 修纂人才甄選與國史解釋

一、高考「史料編纂科」的考試科目異動

國史纂修除了需有充足的檔案史料，更要有專業的修史人才。然而，從前章的討論可知，國史館受限於公務體系，長期以來修史人才相當欠缺，即使作為公務人員高普考「史料編纂科」的主要用人機關，至 1990 年代後期，當時的副館長朱重聖仍表示當前最大的問題為「修史人才之晉用與栽培」。⁴²嗣後，由於館內史學人才不足，加上多數纂修人員的研究專長為中國近現代史領域，臺灣史專長的人相對稀少，致使張炎憲館長上任後，亟欲增加館內的臺灣史研究人才。2001 年初，張氏以需要整理臺灣近代史以及日本總督府檔案的人才為由，向考試院提出要求，希望公務人員高普考史料編纂科考試科目，能將「中國史學史」及「史學方法論」合併為一科，另將「中國政治制度史」改為「臺灣近代史」，並增考「日本近代史」。⁴³

消息一出，隨即引來在野陣營的批評，認為民進黨政府企圖「從史料著手的方式，進行『綠化運動』」、「從考試中轉化歷史認知」，是為「司馬昭之心」。⁴⁴考試院會也為此討論多時，絕大多數考試委員認為，「中國近代史」實已涵蓋「臺灣近代史」，因此考試科目無須修改，否則考生會準備不及；亦有委員提議，若有必要，可增設特考，或由國史館自主加強人員訓練；此外，更有許多委員議論，此一提案是因民進黨政府想要「臺獨」。⁴⁵考試院最終決議，保留原有的考試科目，另外將考科中的「中國近代史」改名為「中國近代史（含臺灣近代史）」，否定了張炎憲的要求。其中，「統獨」問題遂成為了國史館用人的爭議，其背後反映的是政府官員對「臺灣」、「中華民國」、「中國」的認知差距以及國家認同歧異。張館長曾為此解釋，他的要求是基於學術上整理史料的需要，否認政治意識形態。其並指出，國史館取才應隨時空而改變。⁴⁶

2002 年舉辦的公務人員「史料編纂科」高等考試中，該科考試科目已有改變，「中國近代史」的名稱改為「中國近代史（含臺灣近代史）」，「中國政治制度

⁴² 朱重聖，〈民國以來國史館之修史工作〉，頁 1245。

⁴³ 〈高普考增考臺、日近代史？試院否決〉，《聯合晚報》，2001 年 2 月 15 日，第 7 版。

⁴⁴ 〈國史館 臺灣史料風雲變色〉，《中央日報》，2001 年 3 月 12 日，第 3 版。

⁴⁵ 〈高普考增考臺、日近代史？試院否決〉，《聯合晚報》，2001 年 2 月 15 日，第 7 版。

⁴⁶ 〈國史館：取才應隨時空變遷〉，《中國時報》，2001 年 2 月 16 日，第 4 版。

史」改為「日本近代史」，其他如「西洋近代史」、「中國史學史」、「史學方法論」、「圖書檔案管理」及「國文」等科目則維持不變。其中，「中國近代史」一科的考試內容最能體現不同執政黨在國家考試中，對中華民國史、臺灣史的重心之轉移，僅先從科目名稱的改變即能看出端倪。如前所述，2002 年，「中國近代史」一科首次改名為「中國近代史（含臺灣近代史）」，2003 年，該科又被改為「本國近代史研究」，2004 年取消「研究」二字，且連同原本的中國史學史亦被改為「本國史學史」，至 2010 年，第四度改名為「中華民國史研究（包括臺灣史研究）」，2012 年，又改回「本國近代史」，並持續至今。這短短十年間，「中國近代史」科目的名稱竟歷經五次變化，由此可知，考試科目名稱亦涉及國家認同與統獨爭議，考試院最後去除「中國」、「臺灣」、「中華民國」等字眼，統一改以詮釋空間較有彈性的「本國」來稱之。如此一來，單從字面上便無法得知該科考試的題目偏重比例，需實際檢視歷屆試題，方能了解考試題目的重心。

從表 33 的整理可知，從 1998 年至 2016 年間，「中國近代史」各次考試題目加總，共有 69 題，其中臺灣史有 31 題，佔總數四成四比例。從考試年份來看，2002 年至 2007 年期間，臺灣史比重明顯較中國近現代史高出許多，20 題中，僅有 6 題非臺灣史範疇，2007 年時更只有臺灣史。此點可明顯看出民進黨政府時代，以「臺灣史」為優先。此外，2003 年以後，雷震、二二八事件、美麗島事件、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及戰後族群社會運動入題，這些都與當時國史館的史料編纂主題重點一致，說明該科考試方向，頗能合乎張炎憲館長時期國史館的用人需求。2008 年以後，中國近現代史的比重又逐漸回升。尤其在 2011 年以後，民國史料、南京臨時政府、北洋政府、國府奠都南京、九一八到盧溝橋事變、中日和約與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兩岸抗戰歷史解釋等都入題，顯示出國民黨政府時代，「國史」的重點又從臺灣史拉回至中國近現代史，尤其是中華民國史的範疇，顯然與當時的國史館館長呂芳上以中華民國為主體來創新修史的政策方針有關。

綜上所述，可知從公務人員「史料編纂科」的高等考試，亦能展現不同政府執政下，「國史」重心的轉移，具體反映在考試重點與修史人才的選擇上。考試科目的名稱與考試範圍又會受到政府官員「國家認同」的影響而不得不改變策略，使用字面意義較模糊的字眼，使外界有不同的解讀空間。這些皆能反映出臺灣內部國家認同的歧異，如何對國史館的修史工作與用人取才產生影響。

表 33 1998 年至 2016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中國近代史」考科試題

1998 年公務人員高等一、二級考試暨初等、高等三級及普考第二試 一、試述清同治年間日本侵臺造成「牡丹社事件」的經過及其結果。 二、試述庚子義和團之亂後慈禧變法的原因及主要成效。 三、試說明國民政府實行法幣政策的背景及其要點與重要成果。 四、何謂史迪威事件？其對抗戰末期的中美關係有何影響？
2002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暨二級考試 一、試比較清朝自強運動與日本明治維新，並論述對兩國的影響。 二、試論述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九年，國共鬥爭的演變發展。 三、試論述一九二〇年代，臺灣文化協會成立的背景、主張、分裂及其對臺灣的影響。 四、試論述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之間，臺灣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變遷。
2003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暨二級考試 一、一八七四年日軍發動侵臺之役的理由為何？其後日方放棄佔領而與清廷談判撤軍，其原因又為何？試討論之。 二、日治時期臺灣菁英的政治訴求，從廢除「六三法」漸次轉變為要求成立臺灣議會。請說明此一轉變的原因與意義。 三、關於中華民國憲法中行政院與總統的權責劃分問題，在學界頗具爭議性。試從制憲的過程，加以討論。 四、試論雷震及《自由中國》何以成為一九五〇年代臺灣自由主義思想的代表。
2004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第二試 一、試述中華民國成立的背景及成立之後至國民革命軍北伐前的政局。 二、試論二十世紀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之間權力爭逐的關係。 三、試論一八九五年日本領有臺灣之後，對臺灣教育的改變及其影響。 四、試述一九五二年中日和平條約簽訂的背景、主要內容及對臺灣的影響。
2004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暨二級考試 一、試論一九二六年國民黨北伐之後至一九四五年，國民黨如何處理其與共產黨、日本的關係。 二、試論日本統治臺灣時，如何將臺灣建設成為南進的基地。 三、試比較二二八事件與美麗島事件之性質、異同及其影響。 四、一九五〇年代至一九七一年「中國代表權」在聯合國屢有爭議，試論其爭議之背景、轉變過程及對臺灣的影響。
2007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暨二級考試 一、十九世紀後期臺灣涉外事件頻仍，試舉五項具有代表性的史蹟，並略述其歷史意涵。 二、試比較論析清治末期劉銘傳治臺新政及日治初期後藤新平的施政作為。 三、1920 年代臺灣轉為非武裝抵抗日本運動，試述其背景與發展概況。 四、1980 年代臺灣社會運動勃興，亦有族群運動之類，有關客家族群運動的狀況如何？有何重要成果？
2008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

一、試述近代思想史上支持「五四運動」與反對「五四運動」之學者，主要有那些人？雙方討論焦點與各自主張為何？

二、1905 年廢除科舉制度，對中國社會產生何種影響？

三、試比較胡適與魯迅思想的異同。

四、1949 年之後臺灣在實施民主政治上，有何階段性的成就與困境？

2008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暨二級考試

一、何謂清季之自強運動（1861~1894）？其得失為何？

二、清末立憲運動之推動始末為何？因何未竟其功？其影響又如何？

三、甲午戰敗臺灣割讓而有乙未抗日運動之爆發，其影響所及對臺灣總督府而言乃有所謂衛生政策之確立，該一政策之重要內容為何？

2009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

一、對中國近代史的歷史解釋，學者們提出一些不同的理論，如西力的挑戰與回應，士人的經世思想，中國的內政與自改革思潮，請略述其相關討論。

二、民國史學受到多方面的影響，包括新史料的發現，歐美史學的引介；請略述民國史學引介的歐美史學方法與方法論，及新發現的史料。

三、中國現代史上有部分學者被列為文化保守主義者，包括：柳詒徵、吳宓、王國維、張蔭麟、陳寅恪、錢穆等人，他們與新派學者胡適、傅斯年、陳獨秀、魯迅等人，無論就思想、學術、主張，均有所異，請略述文化保守主義者的思想取向與學術主張。

四、臺灣民間信仰的祭祀圈和信仰圈，其理論為何？試舉出祭祀圈和信仰圈的例證，並略述其內容。

2010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暨二級考試

一、試論連橫之史學成就及其歷史地位之演變。

二、1927 年國民政府在南京建立，而後有所謂「黃金十年」，然當時仍陸續有數個疏離中央政府成立，試敘述之。

三、美援對現代臺灣歷史發展影響甚大，試述其過程與對臺灣之影響。

四、1980 年代之後，臺灣民主化的變革劇烈，有那些重要的成果？試論述之。

2011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暨二級考試

一、歷史研究需要史料作為依據，新史料的出現，往往會發展新的研究方向，或對以往的研究成果有所修正，請問近十餘年來在民國史方面，出現那些新史料，對於民國史研究產生什麼影響？

二、南京臨時政府雖然僅有三個月，但是在這麼短的時間中，仍然提出不少具有改革性、開創性的措施，展現開國的新氣象，請問有那些措施？列舉說明。

三、從民國二十年的九一八事變到民國二十六年的盧溝橋事變，日本對中國藉故發動多次挑釁或侵略行動，政府及知識份子如何因應？請說明。

四、民國四十一年簽訂的中日和平條約及民國四十三年簽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對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生存發展有何重要意義，請說明。

2012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

一、中西接觸是近代中國歷史的重要特色，當時外國人扮演何種角色？試舉三位不同身分的

在華外國人士為例，具體說明其重要事蹟與影響。

二、請說明戊戌變法發生的背景、變法內容及其影響。

三、清末民初社會變遷劇烈，新興通商口岸都市，尤其是外國租界區，更是率先大幅變動。試以上海為例，說明其都市化的發展及其對中國社會的影響。

四、日治時期，臺灣民眾如何以非武力方式對抗日本的殖民統治？有何成效與影響？

2015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

一、1840 年發生鴉片戰爭，之後簽訂南京條約，歐美列強也關注到臺灣，此時期至 1850 年代，英國與美國持續對臺灣有那些作為？

二、清日簽訂馬關條約臺灣割讓給日本，1930 年代之後日本更強化其殖民統治，進行所謂「皇民化運動」，其主要內容為何？

三、民國 16 年中央政府奠都南京，完成形式上的統一，但二〇年代之後受內外情勢或戰爭等因素，到中日戰爭結束這段時間，中國境內產生那些不同型態的政府？

四、1980 年代臺灣社會運動興起，有何種族群屬性的社會運動？並各達成那些成果？

2016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

一、請說明晚清新政的內容、失敗的原因及其影響。

二、請說明海峽兩岸學者對於抗戰歷史解釋的共識與分歧。

三、中華民國建國初期以北京為首都，由北洋系人士掌權，故稱為「北洋政府」。請說明北洋政府時期的歷史特點，過去學界對北洋政府之解釋，以及近年來學界對北洋政府時期歷史意義的重估。

四、韋伯（Max Weber）採用社會文化比較的分析方式，將中國儒教定義成一種妨礙中國發展出西方理性化、從而使中國無法產生資本主義的文化傳統。後來有不少學者重新評估韋伯的命題，請舉例說明這些學者對儒家傳統的不同評估。

2016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暨二級考試（吳密察館長時代）

一、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政府機關檔案是近代史重要的史料之一。請介紹臺灣史研究中極為重要的「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之性質、內容及其作為史料的重要性（包括利用它可以做什麼主題的研究）。

二、1930 年代之後，臺灣總督府在臺灣發展工業，並因此帶動新一波的臺灣都市開發建設。請說明 1930 年至 1945 年間臺灣總督府推動的工業化之內容，並說明這次工業化如何帶動臺灣都市開發建設。

三、1970 年代晚期起，臺灣逐漸出現「黨外」所推動的政治、民主運動，並在 1980 年代晚期集結組成政黨。請說明這個時期「黨外」之政治、民主運動的重要主張及其得以壯大的國內外與主客觀因素。

四、中國國民黨所領導的抗戰，在 1945 年結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勝日本，但不過數年，即在 1949 年被中國共產黨逼退到臺灣來。請說明 1945 年至 1949 年，中國國民黨政權潰敗如此迅速的原因。

資料來源：整理自考選部網站—「考畢試題查詢平臺」，網址：

<https://wwwq.moex.gov.tw/exam/wFrmExamQandASearch.aspx>，檢索日期：2021/9/30。

筆者按：灰底為臺灣史題目。

二、抗戰歷史的解釋

前文提到，2011 年初，呂芳上館長上任時曾表示「自己的歷史應該自己來修」，係因臺灣方面對於中華民國歷史的論述權正逐漸喪失的緣故。其擔憂不無道理。確實，同年 8 月 30 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與北京中華書局即趕在辛亥革命一百週年前夕，聯合舉辦《中華民國史》出版座談會，正式宣告中共方面自 1972 年擬定的「中華民國史」編纂計畫，在將近四十年後終於全部完成，全書共有 36 卷，時間起迄為 1895 年興中會成立至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⁴⁷關於這套書的評價，臺灣學者劉維開曾表示，此書編纂橫跨多年，且由多位學者同時進行，在書寫史觀、撰寫筆法與引用史料方面，已有很大的轉變，呈現「半新半舊」的特色。其中近年撰寫的篇章，更能擴大蒐集臺、美、日等國的新開放檔案，書寫筆法也逐漸淡化意識形態，有助於釐清歷史事實，而給與肯定的評價。⁴⁸然該書仍維持最初「中華民國興亡史」的宗旨將中華民國的時間斷在 1949 年，意味著中華民國已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呂芳上館長予以批評，指出中國政府仍以政治干預學術，這樣的中華民國史研究並不全面也不完整。他強調，國史館應從史料方面，提供更具權威性的史料，方能有助釐清歷史、還原真相，給予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客觀的評價。⁴⁹國史館的史料編纂重心與舉辦的學務研討會、學術講座之主題，遂又以中華民國史為中心，其中由於適逢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又以「抗戰」相關的歷史事件與人物討論最為突出。（參見表 34）

表 34 2011 年 9 月至 2016 年 4 月國史館舉辦之學術活動

年月	主題
2011 年 9 月至 2012 年 8 月	回眸世紀路——建國百年歷史系列講座（14 場）
2011 年 10 月	戴笠先生與抗戰時期情報作戰學術研討會

⁴⁷ 《中華民國史》總共包含三大部分，分別是：融合紀、傳、編年通史性質的《中華民國史》（12 卷 16 冊）及《中華民國史人物傳》（共 8 冊）與《中華民國史大事記》（共 12 冊）。參見葉鶯，〈橫跨四十載 幾代出版人辛勤耕耘 國家出版基金大力扶持〉，《全國新書目》，（北京，2012.2），頁 40-41。

⁴⁸ 劉維開，〈《中華民國史》與民國派系政治研究〉，《近代史研究》，2012 年 1 期（北京，2012.1），頁 146。

⁴⁹ 〈《戴笠與抗戰》解密 還原歷史真相〉，《中國時報》，2011 年 9 月 27 日，第 A12 版。

2012 年 3 月	抗戰史之研究學術座談會
2012 年 5 月	白崇禧將軍與民國學術座談會、吳鐵城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
2012 年 8 月	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生效 60 週年紀念座談會
2012 年 9 月	近代國家的形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學術討論會
2013 年 5 月	抗戰中國學術座談會
2013 年 3-11 月	臺灣民主發展試系列講座（10 場）
2013 年 12 月	嚴家淦先生與臺灣經濟發展國際學術討論會、開羅宣言 7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4 年 4-11 月	近代中國宗教發展史系列講座（6 場）
2014 年 5-6 月	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回顧與展望系列工作坊（4 場）
2014 年 6 月	國軍與現代中國：黃埔建軍九十年國際學術討論會
2014 年 9 月	多元視角下的南海議題與學術研討會、近代中國的宗教發展學術研討會
2014 年 12 月	海峽安定・臺灣安全—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約六十週年學術討論會
2015 年 3 月	中華民國關鍵二十年（1971-1990）學術研討會
2015 年 7 月	戰爭的歷史與記憶：抗戰勝利七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
2015 年 8 月	抗戰史座談會、近代中印關係史國際學術討論會
2015 年 11 月	傳承與創新：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 150 歲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5 年 11-12 月	紀念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七十周年—戰爭的省思（8 場演講、2 場座談）
2016 年 3 月	胡宗南將軍與民國學術研討會
2016 年 4 月	互動與新局：三十年來兩岸近代史學交流的回顧與展望討論會

資料整理自：許瑞浩，〈國史館在臺復館後的組織變革與業務發展（1957-2017）〉，頁 21-22。

有關抗戰的歷史解釋，生活在臺灣島內與中國大陸的人民，因身處不同的時空環境，在二戰期間有著截然不同的戰爭經驗，對於戰爭的記憶與詮釋，因視角不同而產生歧異。其中，二戰期間的「臺灣大空襲」便是鮮明的例子。臺灣學者薛化元在 2015 年日本愛知大學舉辦的一場演講中指出，從臺灣史的角度，作為日本國民的臺灣人正遭受同盟國的攻擊；從中國現代史的角度，中國大陸人民則是在對日抗戰，視美國為盟軍。現在臺灣許多接受過去國民黨政府歷史教育的世代，普遍受到抗日史觀的影響，對此段歷史相當陌生。如今臺灣歷史課綱的微調，卻又脫離臺灣歷史原有的歷史脈絡，重新從中國現代史的角度，強調臺灣人民在

二戰期間參與抗戰的歷史，易使人產生時空錯亂。⁵⁰他的說法，顯然是站在臺灣史為主體的觀點，從臺灣人民的角度來詮釋第二次中日戰爭。然若從國民黨或中華民國政府的角度來看，其對中日戰爭乃至對日本政府的態度，實會隨著兩岸局勢與中華民國在國際地位的改變，而有不同的詮釋。

日本學者深串徹曾對國民黨政府的抗戰歷史認識作出分析。他指出，1960年代末期中華民國與日本雙方關係惡化以前，對日本的態度基本上是採取抽象化日本侵略者的形象，強調「以德報怨」的傳統儒家美德，凸顯中國人浴血奮戰的精神與寬大包容，對日本政府的態度相對溫和，目的是當時國民黨政府為了與日美同盟，共同反對中共與蘇俄，確保自身的正統地位；然1960年代末期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國際社會的關係逐漸正常化，逐漸擠壓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生存空間，威脅其統治正當性，中華民國與日本的關係逐漸趨惡化，如1970年代初期的釣魚臺保衛運動、1972年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皆使國民黨政府為捍衛其正統地位，而改變對抗戰歷史的態度，從「以德報怨」，轉而強調「反日」與敵我意識，使抗戰的記憶反而在戰爭結束三十年後變得鮮明。⁵¹國民黨政府開始強調臺人的抗日精神與赴中國戰場協力國軍對日作戰，試圖重塑臺灣人民的戰爭記憶。從呂芳上館長早期有關臺灣與中華民國關係的文章，即能看到臺灣經常被放在國民革命的脈絡中，呈現日人統治下臺灣人民的民族精神，以及參與「祖國」對日抗戰，最終臺灣得以「光復」之事跡。⁵²此種重塑臺人「抗日」記憶以及宣傳「祖國復歸」的歷史敘事，在馬英九總統時代仍不斷被強調。

⁵⁰ 薛化元，〈戰後七〇年回顧—日治時期臺灣歷史的記憶及其歷史意義〉，《國研紀要》，148（名古屋，2016.10），頁1-2。

⁵¹ 深串徹，〈中華民國の公定歴史認識と政治外交—一九五〇—一九七五年〉，《國際政治》，187（東京，2017.3），頁54-55、58-59。

⁵² 如：〈抗戰時期在祖國的臺灣光復運動〉，《新知雜誌》，5（臺北，1971.10），頁21-28；〈臺灣革命同盟會與臺灣光復運動〉，《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五）》，（新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73），頁255-316；〈從光復臺灣到光復大陸〉，《中央月刊》，12：12（臺北，1980.10），頁54-58；〈抗戰時期在大陸的臺灣抗日團體及其活動〉，《近代中國》，49（臺北，1985.10），頁11-25；〈蔣中正先生與臺灣光復〉，《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論集（五）》，（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6），頁40-82；〈抗戰與臺灣光復〉，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浴火風雲 勝利光華：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五十週年專輯》，（臺北：新中國出版社，1995），頁64-73；〈臺灣同胞參與抗戰的歷史及其意義〉，《中華軍史學會會刊》，1（臺北，1995.12），頁124-132；〈《臺灣民報》有關孫中山先生逝世及奉安的記載〉，孫中山紀念館編，《大同道路：孫中山研究》，（南京：南京出版社，2010），頁11-15；〈臺灣から見た辛亥革命〉，《現代中國》，86（東京，日本現代中國學會，2012.9），頁1-21。

曾為留美學生、在美國參加保釣運動的總統馬英九，在 2010 年出席國史館「總統副總統文物館」的開幕典禮時，除了提到 1943 年的〈開羅宣言〉、1952 年的〈中日和約〉，更特別提及對日抗戰，認為此戰役不容被遺忘，歷史不容被扭曲。⁵³2015 年 10 月 25 日出席「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七十週年紀念大會」時，更強調國軍保衛中華民族，堅持對日作戰，宣稱「臺灣抗日比大陸早 42 年」。馬總統更臚列具體史事，指出臺灣人民自 1895 年乙未割臺即展現抗日精神，1920 年代的非武裝抗日，以及抗戰期間臺人組織「臺灣義勇隊」、「臺灣革命同盟會」等，皆顯示臺灣人「透過抗日展現臺灣主體性」，最後提到〈開羅宣言〉是臺灣光復的關鍵，而〈中日和約〉、〈照會第一號〉則使「『中華民國光復臺灣』獲得再確認」。⁵⁴此段論述，可以說是延續 1970 年代以來國民黨政府的官方立場，再融合了林滿紅館長與呂芳上館長曾發表過的文章之觀點，將抗日、光復、開羅宣言與中日和約等連貫起來，藉此強調中華民國的統治合法性。呂芳上館長上任後，適逢抗戰七十週年，便多次舉辦各種規模的抗戰史學術研討會，並編纂多部有關抗戰歷史與相關軍事領袖的史料彙編，更與蔣中正紀念堂管理處、中正文教基金會與中國近代史學會等合作，開展《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與《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兩大計畫。這些一連串的學術編纂活動，使臺灣的抗戰史研究，從解嚴以後的逐漸式微、民進黨陳水扁政府時期的低潮，到國民黨馬英九總統上任後，得以擴大研究範圍、再度復甦，並與中國的史學界加強學術交流與合作。⁵⁵2016 年中旬再度政黨輪替後，情況才又發生轉變。

⁵³ 〈總統出席國史館「總統副總統文物館」開幕典禮〉，檢索自中華民國總統府網站，網址：<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14728>，檢索日期：2021/9/15。

⁵⁴ 〈總統出席「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七十週年紀念大會」〉，檢索自中華民國總統府網站，網址：<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19869>，檢索日期：2021/9/15。

⁵⁵ 蘇聖雄，〈世變與史學：臺灣學界抗戰史研究的興起與發展〉，《抗日戰爭研究》，2021 年第 1 期（北京，2021.1），頁 33-34。然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從中共的統戰策略角度指出，中共自 1980 年代中期以後，改變國民黨在八年抗戰中的評價，從否定到逐漸肯定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上的貢獻，試圖與國民黨展開政治聯姻。尤其在 2000 年民進黨政府取得執政權後，中共更採兩面手法，對民進黨政府施加軍事壓力，對泛藍陣營發動和平攻勢，不斷強調國共兩黨團結抗日，其目的是試圖與國民黨建立關係，強調臺海兩岸民族的團結與和諧，以和平統一臺灣為終極目標。此一策略在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任後得到加強，但同時也產生反效果，中國內部逐漸出現同情國民黨老兵的聲音，更有人譴責中共在游擊戰中的行動。參見 R. Weatherley and Q. Zhang, "Consensual Nationalism: The KMT and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History and Nationalist Legitimacy in Contemporary China*,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17), p.119、121、141.

由上可知，抗戰歷史的解釋歧異亦能反映國史編纂中有臺灣與中華民國的國家認同紛歧問題。政黨輪替後的國史館，雖已逐漸轉型為兼具學術研究性質與管理典藏總統副總統文物的機構，其學術地位及修纂人員的專業自主性皆已大幅提升，然在不同政黨的執政下，其集體修史工作的重點仍無可避免受到執政者與治史專業領域不同的學者館長所影響，而呈現不同的發展樣貌。



第六章 結論

本論文旨在透過國史館在臺復館後的組織與修史工作變遷，考察戰後臺灣國家、政黨與史學的關係，以及該機構在國家治理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從本文討論可知，作為官方修史機構的國史館，其存在本身即與政權的統治權威有密切的關聯。因此即使二十世紀初，中國掀起史學革命，傳統史學備受抨擊，1912 年中華民國建立後，孫中山仍是贊同胡漢民等人的提案，同意設立國史「院」，希望藉由撰寫國史，塑造革命正當性與鞏固新政權的統治合法性。不過，民國時期國史館的成立是在袁世凱主政時期。1914 年 5 月，國史館於北京成立。成立後的國史館發展並不順遂，先是於 1917 年 4 月由教育部接收，改為「北京大學附設國史編纂處」；後又在 1919 年 9 月，改隸國務院，成為「國務院附屬國史編纂處」；1927 年 9 月，張作霖又以大元帥名義，重新頒布〈國史館官制〉，重設「國史館」，直至 1928 年 6 月，國民政府北伐至北京，國史館於是解散。這段期間政局紛亂，修史工作難有進展，因而未見具體纂修成果。然而「北京大學附設國史編纂處」期間，身兼北大校長與該處處長的蔡元培，曾向孫中山請示國史編纂之意見，孫中山詳細回覆並表示願意協助徵集材料，說明北京政府時期，位在南方的革命黨人仍能透過書信與北方的教育機構主事者產生聯繫，進而提供修史建議，期能影響國史纂修的內涵。

國民政府北伐完成後，南京方面的國民黨地方黨部與官員屢有建請中央政府重設國史館之議。國民政府雖曾決議設立「國史館籌備處」，然而直到 1937 年對日戰爭爆發，國史館皆未獲得重視。相反地，在訓政時期國民黨以黨治國體制下，1930 年 5 月，直屬黨中央的「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先行成立；又於 1935 年 2 月，在南京建造「中央黨史史料陳列館」，使黨史會有了固定場所，得以擴大規模，舉辦經常性展覽。相比之下，「國史館籌備委員會」則是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後，為了團結國人、加強民族精神，在黨史會主委張繼等人的提案下，1940 年 2 月於重慶成立，主任委員由張繼擔任。籌備委員會期間，除了將新舊史學融入修史工作，為將來國史館的成立建立良好基礎，亦結合檔案館與傳統史館，推動了該機構的轉型。抗日戰爭結束後，1947 年 1 月，同樣在黨史會主委張繼的提案下，「國史館」於南京正式成立，首任館長在總統蔣中正的特任下，仍由黨史會主委張繼兼任。

由上可知，國史館逐漸得到國民黨當局的重視，係因抗戰期間，在民族主義強調愛國精神的需要下獲准籌設，而從提案、籌設到正式成立，皆與黨史會主委張繼的提議有關，顯示國史館成立伊始，即與黨史會有所關聯。此點從籌備委員會期間，7名委員有5人兼具黨史會委員身分；抗戰結束後，兩會組成聯合辦事處，共同徵集檔案；國史館成立後，黨史會被縮編，改以「國史館史料編纂委員會」的名義，由國史館請領政府經費等情形，皆可得到證實。國史館與黨史會在大陸時期關係密切，國民黨政府遷臺後尤有過之。

1949年初，國共內戰戰局急轉直下。蔣中正總統下野後，開始有計畫疏遷，黨史會史料與部分人員隨即分批撤臺；國史館方面，則依照代總統李宗仁的指示西遷，因而留在大陸，與黨史會分途。1949年底國民黨政府遷臺後，將臺灣作為反共復國基地，延續國共內戰的戰時體制。由於國家財務狀況吃緊，經費多投入軍事活動，無暇顧及學術事業，因此曾一度考量取消國史館的編制，簡化中央政府機構。嗣後在革命元老于右任等人的決定下，將國史館予以保留。黨史會則是持續，以「國史館史料編纂委員會」的名義，具領政府經費，兼辦國史館職務。此種黨政不分的狀況卻使黨史會主委羅家倫甚感困擾，因為該會經費無法自主，經常受到中央改造委員會秘書長張其昀的干預，兩人的教育與學術理念又多有不合，加上黨史會的史料保存狀況又屢屢遭受質疑，致使羅家倫對現實政治充滿無奈。不過，黨史會的史料保存問題，反而成為國民黨中央開始處理黨史會與國史館合併或分設問題的關鍵。

1957年初，國民黨決議將黨史會與國史館分設，並決定於該年度將國史館正式在臺恢復建置。國民黨政府之所以決定在1957年恢復國史館，主要原因有二：其一，〈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後，國民黨政權在臺局勢逐漸穩定，有餘力發展學術事業，國家最高學術機構中央研究院的發展始步入正軌。研究主題與民國成立距離最近的近代史研究所籌備處的成立，更有將學術研究與國家發展結合的考量，一則可觀察近代以來國際局勢的變遷，一則可回應美國學界對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史料需求；其二，則與中共方面宣布即將編纂中華民國史有關。國民黨成立國史館亦是可作為象徵性的宣示，表示中華民國政府才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權。

由於僅是作為象徵性的宣示，國史館正式復館後，其組織仍舊延續南京時期的結構，經費亦未有明顯增加，且在戒嚴時期的黨國體制下，館長一職仍係由黨史會主委兼任。對國民黨政權實際扮演重要角色的仍是黨史會，與中國大陸時期

情況相同。羅家倫主持期間，所秉持的是「無徵不信」的實證精神，因此在國史館、黨史會的業務方面皆著重於蒐編史料。國史館的修史工作方面，雖曾計畫編纂「開國實錄」與「抗戰實錄」，然而因為史料、經費不足，加上公務體系的限制，不易獲致史學人才；此外，辦公環境不佳、人事管理不彰，也都導致國史館的修史成效低落，未有具體成果。黃季陸館長上任後，國史館的經費、職員素質與辦公環境皆有明顯改善，使修史業務得以開展。然而不變的是，國史館與黨史會仍維持緊密的合作夥伴關係，黨史會仍是國民黨政府主政下，主導官方史學的主要負責單位，此點從戒嚴時期官方的史學活動即可看出。

1960 年代，國民黨政府舉辦的官方史學活動多以戡亂復國的基本國策為中心，且多以黨史會為主導單位，負責在國家重要節慶時配合舉辦展覽，出版與中華民國、國民黨有關的學術出版品。如《開國五十年文獻》、《國父百年誕辰學術論著》等，皆是為強調反共抗俄與國民革命精神而編纂，一方面將臺灣歷史與國民革命作連結，強化臺人的中國認同，又將總統蔣中正形塑為國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傳統中華文化的繼承者，塑造革命偉人形象，藉以強調中華民國的法統與道統，為之後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建立基礎；一方面亦是為了與中共作思想文化上的鬥爭，藉由公布革命建國史料，以捍衛國民黨從革命開國到領導抗戰的國民革命事蹟，避免國際學界受到中共對近代歷史解釋的影響，從而打擊國民黨政府在國際上的聲譽。1960 年代末期以後，國民黨政府的統治正當性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而漸受質疑，為了與中共爭奪民國歷史的解釋權，以及提升中華民國在國際史學研究中的地位，國史館遂與黨史會合作成立「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以「公開史料，便利研究」為宗旨，推廣民國史研究。另外，國史館也打破「後朝人修前朝史」的觀念，編纂當代的《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期能透過此書公布原始史料，鼓勵學子研究民國史，以與中共在文化戰場中展開學術鬥爭。1978 年中共宣布改革開放後，重新展開中華民國史纂修工作，消息傳來引起島內震撼，引發纂修國史之爭議。1980 年在教育部主導下，由黨史會主委秦孝儀擔任召集人，開始籌備編纂《中華民國建國史》。大體而言，戒嚴時期國民黨政府的官方史學活動幾乎都是由黨史會主導，即便羅家倫、黃季陸館長皆曾同時兼任黨史會主委，然而實際執行任務的仍是黨史會成員，國史館始終扮演協助的角色。

1980 年代中期以後，隨著政治民主化的衝擊與「臺灣民族主義」對「中國民族主義」的挑戰，國史館的地位及其與黨史會的關係成為在野黨立委質疑的對象，認為黨國不分，黨史會地位凌駕於國史館；此外，1990 年代以後，國史館又因

「檔案法」的立法過程而引發民主時代是否仍需保留官方修史的爭議，致使國史館的定位遭受懷疑並造成存廢危機。在臺灣政治變遷的衝擊下，國史館不得不重新尋求自我定位，步入轉型以延續發展空間。然而，在事實上，1980年代中期以後，國史館已開始為了修史需要而逐步改革修纂與行政業務，期能增加行政單位的工作效率，並提升國史館的學術地位。從這時期國史館的出版成果與新增業務，確實能看到國史館在增加與學界交流，擴大修史範圍與增加成果方面的努力，無論在數量、類型或品質方面，皆有所提升，且亦漸能擺脫政治禁忌，編纂有關戰後臺灣的政治史料。然而大致上，此時期國史館的修史重心仍是以中國近現代史為主，臺灣歷史仍是陪襯。

2000年以後，臺灣首次政黨輪替，改由民進黨執政。〈國史館組織條例〉、〈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組織條例〉與〈總統副總統文物管理條例〉陸續修正通過後，國史館的組織與職掌皆發生劇變，除了修纂單位獨立設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改隸，還增加徵集管理總統副總統文物的任務。2010年時，國史館的主要辦公地點從新店山區遷回臺北市區，鄰近總統府，重回大眾視野，有助於加強與外界的聯繫。民進黨政府首度執政後，國史館館長改由歷史學者出任。在張炎憲館長表明反對官方修史、加強臺灣史主體性的理念下，國史館的修史業務遂從中華民國史為重心，逐漸轉為戰後臺灣史料的編纂，尤其加強與在地連結，大力進行臺灣人物的口述歷史訪談工作。然而過去的編纂計畫並未就此中斷，有助於了解國共關係的修史工作仍持續進行，大抵而言，國史館在張炎憲館長時代，臺灣史雖已擺脫地方史的從屬地位，躋升為國史的一環，但不表示中華民國史的纂修隨即取消。

2008年再度政黨輪替，由國民黨執政。林滿紅、呂芳上館長的理念受到馬英九總統的青睞，先後接掌國史館，國史館的修史重心重回中華民國史，然而此時已不是強調反共抗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和中共爭奪「正統」，而是從國家主權的角度，捍衛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統治合法性。此時期有關戰後的國史敘述也不再以中國大陸為框架，而是強調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治理與主權獨立之事實。因此有關臺灣史料的編纂仍是不可偏廢。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代中期以後，黨史會的勢力隨著臺灣民主化逐漸衰微，國史館的學術地位也逐漸提升。至政黨輪替民進黨政府執政後，國史館直接取代了過去黨史會在官方史學活動中扮演的角色，成為傳達官方史學思想的主要機構。雖然國史館修纂成員在個人研究主題上已能不受政治力量所干預，然而在大型集體的編纂計畫與相關的展覽與學術研討會上，國史館仍是受到執政者對國家定位與認同的影響，而有不同的詮釋。此點從公務

員人員高考「史料編纂科」考試科目類型與有關對日戰爭的歷史詮釋可窺知一二。

國史館直屬於總統府，原是以不受行政機關的干涉，能夠秉筆直書、獨立修史為原則。然而，從本文的討論可知，戒嚴時期在黨國體制下，國史館與黨史會始終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且官方史學活動多由黨史會所主導，國史館扮演協助角色，致使學術獨立性與地位遭受外界質疑。解嚴以後至政黨輪替前，國史館開始力圖擺脫從屬地位，嘗試主動與學界交流並提升修史品質，國史館的修史成果確實大幅增加，然其組織結構、修史重心仍未有明顯改變，依然無法跳脫從中國角度看待戰後歷史發展的思維，呈現的仍是以中國大陸為主體的中華民國史觀。政黨輪替後，臺灣史在強調臺灣主體性的新館長主持下，地位得到提升。國史館也在幾屆學者館長的主持下，繼續強化其學術研究機構的定位。大體而言，在民主化的政黨政治時代，國史館的修史活動，除了受到各館長治史專業領域與「國史」修纂理念差異的影響，與執政黨的政治理念實有密切的關聯。

二十世紀上半葉以來，在中國蔚為風潮的民族主義歷史敘事，隨著國民黨政府的遷臺，持續在官方的歷史書寫中發揮影響力。國民黨政府遷臺後，以大一統的中華民族史觀與中共的中華民國史論述對抗，以確立其政權的合法性。此外，在作為反攻抗俄民族復興基地的臺灣，強調國民黨革命建國的事跡與臺灣人民的抗日精神，將臺灣納入國民革命的歷史敘事中，藉以形塑臺灣人民對中華民國的國家認同。然而至 1980 年代，臺灣意識與臺灣主體性的建構崛起，使中華民國史的官方正統地位動搖，對國史的詮釋造成了影響。由於不同的時空與政治的民主化，國史館的修史活動與組織有所變遷，且在不同政治理念之政黨的導引下，「國史」修纂的重心也出現了轉移。

參考文獻

一、檔案、史料彙編

〈國史館現任人員簡歷冊〉，《總統府》，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11000001856A。

〈一般資料—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記錄（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02000001994A。

〈中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業務會報紀錄〉，《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02000003128A。

〈中國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八）〉，《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08000000724A。

〈任行政院長時：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等件〉，《嚴家淦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06000000223A。

〈任臺灣省政府主席時：立法院第十九會期議事錄〉，《嚴家淦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06000000030A。

〈國史館沿革史（一）〉，《國民政府》，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01000002172A。

〈國民政府委員會會議紀錄（三）〉，《國民政府》，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01000004309A。

〈國史館編纂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相關資料〉，《個人史料》，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1280044910035A。

〈國史館編纂中華民國國史計劃相關資料（影本）〉，《個人史料》，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1280044910036A。

〈國史館業務會報及史事紀要編纂相關資料〉，《個人史料》，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1280044910033A。

〈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國史館近年重點工作〉，《參考史料》，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141000000684A。

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一）》（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8）

秦孝儀主編，《中國國民黨歷屆歷次中全會重要決議案彙編（一）》，臺北：中央委員會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79。

陳鵬仁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非常委員會及總裁辦公室資料彙

編》，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9。

陳鵬仁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黨史史料編纂工作（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9。

陳鵬仁、喬寶泰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黨史史料編纂工作（下）》，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

二、年表、職名錄

國史館，〈國史館在臺復館大事記（民國四十六年至民國七十五年）〉，《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1 期（新店，1987.1）。

國史館，〈國史館在臺復館大事記（民國七十六年）〉，《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3 期（新店，1987.12）。

國史館，〈國史館在臺復館大事記（民國七十七年）〉，《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5 期（新店，1988.12）。

國史館，〈國史館在臺復館大事記（民國七十八年）〉，《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7 期（新店，1989.12）。

國史館，〈國史館在臺復館大事記（民國八十年）〉，《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11 期（新店，1991.12）。

國史館，〈國史館在臺復館大事記（民國八十一年）〉，《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13 期（新店，1991.12）。

國史館，〈國史館在臺復館大事記（民國八十二年）〉，《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15 期（新店，1993.12）。

國史館，〈本館 97 年 1 至 6 月份大事記〉，《國史館館訊》，1（臺北，2008.12）。

國史館，〈國史研究大事紀事（2011.1-2011.10）〉，《國史研究通訊》1（臺北，2011.12）。

國史館徵校處時政科，《中華民國行憲政府職名錄—自行憲至民國六十七年五月》，新店：國史館，1988。

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臺北：國民黨黨史會出版，近代中國發行，1994。

簡笙簫、林秋敏，〈國史館復館 50 週年大事記〉，《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42 期

(新店, 2007.6)。

三、日記、文集、回憶錄、訪談錄

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編，《張溥泉先生全集（續編）》，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2。

王仰清、許映湖編，《邵元冲日記（1924-193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朱文原，〈驀然回首—我在國史館走過三十年寒暑（上）〉，《國史館館刊》，復刊第43期（新店，2007.12）。

李雲漢，《史學圈裏四十年》，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6。

李雲漢，《懷元廬存稿之一：雲漢悠悠九十年》，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

林滿紅訪問，曹慧如紀錄，〈復館初期的國史館—李雲漢先生訪問記錄〉，《國史館館訊》，5（臺北，2010.12）。

胡健國，〈理想與現實—史館生涯三十年〉，《國史館館刊》，復刊第43期（新店，2007.12）。

國史館編，《黃季陸先生論學論政文集（一）》，新店：國史館，1986。

國史館編，《黃季陸先生論學論政文集（二）》，新店：國史館，1986。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全編（三）》，上海：廣益書局，1948。

郭廷以，《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陳儀深等訪問，王景玲等紀錄，《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臺北：中研院近代史所，2004。

陶英惠，〈在國史館服務雜憶〉，《國史館館刊》，復刊第42期，（新店，2007.6）。

黃克武等主訪，沈懷玉等紀錄，《近代史一甲子：同仁憶往錄（下）》，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

黃季陸著，傳記文學雜誌社編，《黃季陸先生往懷文集》，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6。

蔣永敬，〈黨史會十年「學徒」〉，《近代中國》，149（臺北，2003.6）。

錢穆，〈回憶黃季陸先生（選載）〉，《傳記文學》，48：4（臺北，1986.4）。

戴寶村主編，《治史起造臺灣國：張炎憲全集 1》，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17。

戴寶村主編，《治史起造臺灣國：張炎憲全集 3》（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17）。

簡笙簧口述，田南萍、洪宜嬪紀錄，〈羅家倫館長時期國史館同仁群像（一）〉，《國史館館訊》，3（臺北，2009.12）。

羅久芳、羅久蓉編，《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

羅家倫先生文存編輯委員會，《羅家倫先生文存（一）》，臺北：國史館、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76。

羅家倫先生文存編輯委員會，《羅家倫先生文存（二）》，臺北：國史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6。

四、公報

《臨時政府公報》，南京，1912 年。

《政府公報》，北京，1912 年。

《教育公報》，北京，1917 年。

《總統府公報》，臺北，1956 年、2001、2016 年。

《立法院公報》，臺北，1981、1988、1991、1994、1995、1998 年。

五、報紙

《中央日報》，南京、重慶、臺北，1948 年、1957、1961、1973、1986、1988、1998、2001 年。

《聯合報》，臺北，1996、2000、2001、2009、2010、2011 年。

《考選周刊》，臺北，1989 年。

《中國時報》，臺北，1980、1998、2001、2008、2009、2011 年。

《聯合晚報》臺北，2001 年。

《民生報》，臺北，2001 年。

《自由時報》，臺北，2009、2010、2011 年。

《蘋果日報》，臺北，2010 年。

六、專書

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編，《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總目》，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9。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黃季陸先生與中國近代史研究》，新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86。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羅志希先生傳記暨著述資料》，新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76。

王世儒編，《蔡元培先生年譜（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王汎森，《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

王聿均、孫斌編，《朱家驊先生言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

王晴佳，《臺灣史學五十年（1950-2000）：傳承、方法、趨向》，臺北：麥田，2002。

田弘茂著，李晴暉、丁連財譯，《大轉型—中華民國的政治和社會變遷》，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78 年初版、1991 年初版二刷。

朱希祖著，羅香林、朱倓編，《史館論議》，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8。

行政院主計處編，《中華民國統計提要》，民國四十七年度至民國六十八年度。

吳宇凡，《存史到資政：民國以來檔案館政策與制度變革（1912-1987）》，臺北：國史館，2019。

呂芳上總纂，《中華民國近六十年發展史（上）》，臺北：國史館，2012。

李新主編，《中華民國史第一編：中華民國的創立（上）》，北京：中華書局，1981。

杜維運，《憂患與史學》，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

杜維運，《中國史學與世界史學》，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8。

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著，王憲明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周俊宇，《黨國與象徵：中華民國國定節日的歷史》，臺北：國史館，2013。

若林正丈著，洪金珠、許佩賢譯，《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臺北：月旦出版，1994。

若林正丈著，洪郁如、陳培豐等譯，《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

家近亮子著，王士花譯，《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秦孝儀主編，《第一至第一〇一輯 革命文獻總目》，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5。

秦孝儀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三十二卷》，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4。

秦孝儀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三十三卷》，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4。

財政部編，《中華民國四十六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臺北：財政部，1957。

國父百年誕辰紀念實錄編輯小組，《國父百年誕辰紀念實錄》，臺北：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1966。

國史館史事紀要組，《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十至十二月份》，新店：國史館，1997。

國史館史事紀要組，《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六十年（一九七一）十至十二月份》，新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74。

國史館史事紀要組，《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綱文備覽（三）（下）》，新店：國史館，1993。

國史館史事紀要組，《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二十九年一至六月份》，新店：國史館，1993。

國史館秘書室編，《復館以來的國史館》，新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80年，二版。

國史館審編處編，《國史館現藏一史料概述》，新店：國史館，2003。

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史公職志（初稿）》，新店：國史館，1990。

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史地理志（初稿）》，新店：國史館，1990。

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史社會志（初稿）（上）》，新店：國史館，1998。

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學術志（初稿）》，新店：國史館，1996。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下）》，臺北：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初

版、1983 年第五版。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臺北：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1。

教育部主編，《中華民國建國史第一篇革命開國（一）》（臺北：國立編譯館，1985）。

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臺北：國防研究院，1961。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上下冊，臺北：唐山，1996。

許師慎編，《有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各方意見匯編》，上下冊（新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79）。

許師慎編，《國史館紀要（初稿）》，新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77。

陳三井主編，《走過憂患的歲月—近史所的故事》，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

喬治忠，《中國史學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喬治忠，《中國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

彭明輝，《臺灣史學的中國纏結》，臺北：麥田出版，2001。

黃季陸、秦孝儀增訂，《國父年譜（下）》，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85。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臺北：麥田，城邦文化出版，2007。

黃麗安，《朱家驊與中央研究院》，臺北：國史館，2010。

劉偉鵬主編，《汗青一甲子》，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0。

劉維開編，《羅家倫年譜》，臺北：國民黨黨史會出版，近代中國發行，1996。

劉龍心，《知識生產與傳播—近代中國史學的轉型》，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

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臺北：遠流，2002。

歷史研究編輯部，《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討論集》，北京：三聯書店，1957。

蘇芷萱，《從遞信部到國史館—建築的歷史》，臺北：國史館，2011。

七、論文（專書論文、期刊論文、學位論文）

中國近代史學會，〈中國近代史學會成立大會會議記錄〉，《近代史學會通訊》，1（臺北，1995.2）。

中國近代史學會，〈中國近代史學會籌備及成立經過〉，《近代史學會通訊》，1（臺北，1995.2）。

中國近代史學會，〈發刊詞〉，《近代史學會通訊》，1（臺北，1995.2）。

中國歷史學會，〈國史館史學講座〉，《中國歷史學會會訊》，35（新店，1990.1），第7版。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附錄：第一至第二十二輯總目錄〉，《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二十二）》（新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2001）。

王文隆，〈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及其檔案遷臺〉，《臺灣文獻》，66：4（南投，2015.12）。

王幸蕙，〈國史館組織再造之路—國史館組織條例之修正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組織條例之制定〉，《國史館館刊》，復刊第31期（新店，2001.12）。

王紀錄，〈百餘年來中國古代史館制度研究述評〉，《殷都學刊》，2007：2（安陽，2007.6）。

王剛，〈50年曲折《民國史》〉，《看歷史（先鋒國家歷史）》，2008：8（成都，2008.8）。

石劍峰，〈《中華民國史》：從「險」學到「顯」學〉，《源流》，2011：21（廣州，2011.11）。

如俠，〈從中共竄改歷史談到中國現代史的編寫問題〉，《近代中國》，20（臺北，1980.12）。

朱希祖，〈史官名稱議〉，《說文月刊》，3：8（重慶，1942.9）。

朱重聖，〈民國以來國史館之修史工作〉，收入《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二）》，新店：國史館，1998。

朱重聖，〈國史館現階段重點工作及展望〉，《國史館館刊》，復刊第19期（新店，1995.12）。

朱重聖、張世瑛，〈國史館館長潘振球先生事略〉，《國史館館訊》，6（臺北，2011.6）。

朱匯森，〈復刊辭〉，《國史館館刊》，復刊第1期（新店，1987.1）。

何智霖，〈國史館口述歷史組工作概述〉，《國史館館刊》，復刊第14期（新店，1993.6）。

吳昌廉，〈中國文化學院研究所史學系學術活動報導〉，《近代中國》，2（臺北，1977.6）。

吳明勇，〈戰後臺灣史學的政治處境〉，《史耘》，5（臺北，1999.9）。

吳相湘，〈增強信心，培植人才：民國百人傳自序〉，《傳記文學》，18：1（臺北，1971.1）。

吳淑鳳，〈書訊：《中華民國國史紀要》第3冊簡介〉，《國史研究通訊》，10（臺北，2016.6）。

吳淑鳳，〈遷臺後國史館的昔與今〉，《國史研究通訊》，13（臺北，2017.12）。

呂芳上，〈《臺灣民報》有關孫中山先生逝世及奉安的記載〉，孫中山紀念館編，《大同道路：孫中山研究》，（南京：南京出版社，2010）。

呂芳上，〈抗戰時期在大陸的臺灣抗日團體及其活動〉，《近代中國》，49（臺北，1985.10）。

呂芳上，〈抗戰時期在祖國的臺灣光復運動〉，《新知雜誌》，5（臺北，1971.10）。

呂芳上，〈抗戰與臺灣光復〉，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浴火風雲 勝利光華：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五十週年專輯》，（臺北：新中國出版社，1995）。

呂芳上，〈建國百年、創新修史—就任國史館館長講詞〉，《國史館館訊》，6（臺北，2011.6）。

呂芳上，〈從光復臺灣到光復大陸〉，《中央月刊》，12：12（臺北，1980.10）。

呂芳上，〈臺灣から見た辛亥革命〉，《現代中國》，86（東京，日本現代中國學會，2012.9）。

呂芳上，〈臺灣同胞參與抗戰的歷史及其意義〉，《中華軍史學會會刊》，1（臺北，1995.12）。

呂芳上，〈臺灣革命同盟會與臺灣光復運動〉，《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五）》，（新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73）。

呂芳上，〈蔣中正先生與臺灣光復〉，《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論集（五）》，（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6）。

宋家復，〈現代中國史學中「國史」實作意義的轉變：從章太炎到錢穆〉，《清華學報》，新49卷第4期（新竹，2019.12）。

李仕德，〈提倡出版事業以謀中華文化復興的張其昀〉，《國史研究通訊》，10（臺北，2016.6）。

- 李長堅主講，陳淑銖紀錄，〈保存美國文化的國立檔案館〉，《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20 期（新店，1996.6）。
- 李庭瑜，〈從史料局到史政局：戰後臺灣軍方史政制度之演變及其編纂事業（1946-1973）〉，臺北：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3。
- 李雲漢，〈從史料開放談黨史研究〉，《近代中國》，101（臺北，1994.6）。
- 李雲漢，〈黨史會七十年〉，《近代中國》，140（臺北，2000.12）。
- 李雲漢，〈黨史會與民國史研究〉，《近代中國》，84（臺北，1991.8）。
- 汪朝光，〈50 年來的中華民國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5（北京，1999.5）。
- 周振剛，〈中華民國史研究及其在海內外反映〉，《貴州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3（貴陽，1986.3）。
- 周惠民，〈傳承與轉型：「《中華民國發展史》撰寫計畫」簡介〉，《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3：1（臺北，2011.12）。
- 林山本，〈國史館組織現況〉，《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42 期（新店，2007.6）。
- 林正珍，〈臺灣五十年來「史學理論」的變遷與發展：1950-2000〉，《漢學研究通訊》，20：4（臺北，2001.11）。
- 林正慧，〈遷臺後民國史之定位及思考〉，收入吳淑鳳等編，《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下）》，臺北：國史館，2013。
- 林果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之研究（1966-1975）〉，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研究部碩士論文，2001。
- 林映汝，〈舊瓶裝新酒：朱希祖與國史館籌備委員會（1939-1942）〉，《國史館館刊》，65（臺北，2020.9）。
- 林秋敏，〈國史館對於檔案的典藏與運用〉，收入《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二）》（新店：國史館，1998）。
- 林桶法，〈政府機關的遷臺問題〉，《國史館館訊》，5（臺北，2010.12）。
- 林滿紅，〈國史館的現在與未來〉，《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44 期（新店，2008.6）。
- 治喪委員會，〈瞿韶華先生生平事略〉，《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20 期（新店，1996.6）。
- 邵銘煌演講，葉高樹紀錄，〈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史料之典藏與運

- 用》，收入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史政學術講演專輯（四）》，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7。
- 金毓黻，〈舊京史館述聞〉，《國史館館刊》，1：2（南京，1948.3）。
- 施正鋒，〈臺灣人的國家認同〉，收入臺灣歷史學會編輯委員會編，《國家認同論文集》，板橋：稻鄉出版社，2001。
- 倪道善，〈古代史館述評〉，《歷史教學（下半月刊）》，1988：8（天津，1988.8）。
- 唐豐姣，〈國史館裡的人與事〉，《書屋》，2019：6（長沙，2019.6）。
- 夏雨，〈民國國史館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6。
- 孫子和，〈教育部主編「中華民國建國史」簡介〉，《近代中國》，93（臺北，1993.2）。
- 秦孝儀，〈對中共編寫「中華民國史」及其相關問題之研究〉，《近代中國》，18（臺北，1980.8）。
- 耿立群，〈《漢學研究》歷史類論文計量分析〉，《國家圖書館館刊》（臺北，2010.6）。
- 國史館，〈林滿紅館長主持「總統副總統文物館」開幕典禮致詞〉，《國史館館訊》，5（新店，2010.12）。
- 國史館，〈國史館館刊編輯要旨〉，《國史館館刊》，復刊第1期（新店，1987.1）。
- 國史館，〈國史館纂修人員第一次座談會紀錄〉，《國史館館刊》，1（南京，1947.12）。
- 國史館，〈整修「定本清史」工作綱要〉，《國史館館刊》，復刊第10期（新店，1991.6）。
- 國史館，〈附錄：第一至二十六輯總目錄〉，《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二十六）》（新店：國史館，2001）。
-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研究在臺灣〉，《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8（臺北，1989.9）。
- 張炎憲，〈營造國史館美麗願景〉，《國史館館刊》，復刊第28期（新店，2000.6）。
- 張隆志，〈當代臺灣史學史論綱〉，《臺灣史研究》，16:4（臺北，2009.12）。
- 深串徹，〈中華民國の公定歴史認識と政治外交——一九五〇——一九七五年〉，《国

- 際政治》，187（東京，2017.3）。
- 習之，〈民國時期的國史館〉，《檔案與史學》，1996：5（上海，1996.10）。
- 許兆瑞，〈許卓修先生對近代史研究之貢獻〉，《近代中國》，125（臺北，1998.6）。
- 許雪姬，〈序〉，收入王泰升，《臺灣法律現代化歷程：從「內地延長」到「自主繼受」》，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
- 許瑞浩，〈國史館在臺復館後的組織變革與業務發展（1957-2017）〉，《國史研究通訊》，13（臺北，2017.12）。
- 郭鳳明，〈中華民國志書之編纂工作〉，《國史館館刊》，復刊第42期（新店，2007.6）。
- 陳木杉，〈從中共控制下之文史刊物觀其史學之演展〉，《近代中國》，42（臺北，1984.8）。
- 陳光，〈民國國史館述略〉，《民國春秋》，1998：1（南京，1998.2）。
- 陳惠芬，〈抗戰前陶希聖的中國社會史研究〉，《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學報》，3（臺北，1995.7）。
- 陳進金，〈國史館典藏「大溪檔案」始末〉，《近代史學會通訊》，4（臺北，1996.10）。
- 陳進金，〈現代中國的建構：蔣介石及其《中國之命運》〉，《國史館館刊》，42（臺北，2014.12）。
- 陳嘉翎，〈國家文化政策與國立歷史博物館的演化〉，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美術行政與管理組博士論文，2019。
- 陳曉慧，〈由上而下的革命：中國國民黨改造之研究（1950-1952）〉，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
- 黃大受，〈「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評介〉，《傳記文學》，18：3（臺北，1971.3）。
- 黃克武，〈民國史研究的現狀與幾點反思〉，《國史研究通訊》，3（臺北，2012.12）。
- 黃秀妃，〈飛越2000—秘書處89～95年業務推動與發展〉，《國史館館刊》，復刊第42期（新店，2007.6）。
- 黃俊傑，〈錢賓四史學中的「國史」觀：內涵、方法與意義〉，《臺大歷史學報》，26（臺北，2000.12）。

- 楊金華，〈郭廷以與吳相湘緣何走向對立〉，《傳記文學》，116：1（臺北，2020.1）。
- 葉飛鴻，〈審編處的第一個五年—成長與茁壯〉，《國史館館刊》，復刊第42期（新店，2007.6）。
- 葉鶯，〈橫跨四十載 幾代出版人辛勤耕耘 國家出版基金大力扶持〉，《全國新書目》，（北京，2012.2）。
- 賈紅霞，〈民國時期金毓黻在國史館的修史活動述論〉，《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2017：1（北京，2017.8）。
- 廖彩惠，〈我國檔案法立法過程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學位論文，2006。
- 臺灣歷史學會，〈「邁向21世紀的臺灣歷史學—反思與開拓」研討會〉，《臺灣歷史學會會訊》，11（臺北，2000.12）。
- 臺灣歷史學會，〈臺灣歷史學會之成立暨「國家認同研討會」〉，《臺灣歷史學會會訊》，11（臺北，2000.12）。
- 劉永祥，〈民國時期國史館的變遷〉，《學術研究》，2015：2（廣州，2015.2）。
- 劉紹唐，〈寄望於「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會者〉，《傳記文學》，39：2（臺北，1981.8）。
- 劉維開，〈《中華民國史》與民國派系政治研究〉，《近代史研究》，2012年1期（北京，2012.1）。
- 劉維開，〈蔣中正第三次下野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7期，分冊（臺北，2000.6）。
- 劉劍寒，〈國史館現階段纂修中華民國史志書工作簡述〉，《國史館館刊》，復刊第4期（新店，1988.6）。
- 劉寶璋，〈國史館成立與民國史體例之爭〉，《東岳論叢》，2019：11（濟南，2019.11）。
- 蔣武雄，〈國史館現階段纂修中華民國史傳記工作簡述〉，《國史館館刊》，復刊第8期（新店，1990.6）。
- 蔣復璁，〈建議於清史稿校註審查後重修清史〉，《國史館館刊》，復刊第1期（新店，1987.1）。
- 蕭良章，〈黃前館長季陸先生的國史修纂方針與實踐〉，《國史館館刊》，復刊第4期（新店，1988.6）。

- 蕭金松，〈歐陽無畏教授（君庇亟美喇嘛）的學術貢獻與影響〉，《蒙藏季刊》，20：1（臺北，2011.4）。
- 賴啓，〈《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之編纂工作〉，《國史館館刊》，復刊第42期（新店，2007.6）。
- 戴寶村，〈歷史教育與國家認同—國民中小學臺灣史教育之檢討〉，收入財團法人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編，《國家認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稻香出版社，1993年）。
- 薛化元，〈中華民國與臺灣國家定位的再檢討—以「兩國論」為中心的討論〉，收入現代學術專刊編輯委員會編，《戰後臺灣歷史省思》，臺北：稻香出版社，2004。
- 薛化元，〈戰後七〇年回顧—日治時期臺灣歷史的記憶及其歷史意義〉，《國研紀要》，148（名古屋，2016.10）。
- 薛化元、楊秀菁，〈強人威權體制的建構與轉變（1949-1992）〉，收入李永熾、張炎憲、薛化元主編，《人權理論與歷史論文集》，新店：國史館，2004。
- 簡筌簫，〈永懷朱館長匯森先生〉，《國史館館刊》，復刊第40期（新店，2006.6）。
- 簡筌簫，〈國史館早期館舍爭取與修建之探討—從北平路到北宜路（1957-1973）〉，《國史館館訊》，5（臺北，2010.12）。
- 簡筌簫，〈國史館歷任館長、主管、纂修任期一覽表〉，《國史館館刊》，復刊第42期（臺北，2007.6）。
- 簡筌簫，〈試論檔案法立法與國史館應對關係—以檔案中央主管機關為中心的探討〉，《國史館館刊》，復刊第42期，（新店，2007.6）。
- 簡筌簫、朱文原，〈國史館修纂業務的回顧與展望〉，《國史館館刊》，復刊第42期（新店，2007.6）。
- 蘇聖雄，〈世變與史學：臺灣學界抗戰史研究的興起與發展〉，《抗日戰爭研究》，2021年第1期（北京，2021.1）。
- Hsi-yuan Chen（陳熙遠），“Last Chapter Unfinished: The Making of the Official Qing History and the Cri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Historiography East & West*，2:2 (Nov.2004).
- R. Weatherley and Q. Zhang, “Consensual Nationalism: The KMT and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History and Nationalist Legitimacy in Contemporary*

China,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17).

Yü Ying-shih (余英時),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in Erik Lönnroth, Karl Molin and Ragnar Björk (eds.),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94).

八、網路資源

《臺師大歷史系電子報》，網址：<http://mail.his.ntnu.edu.tw/E-Paper/052/052-f1.htm>。

<https://lis.ly.gov.tw/lymtsysc/lymtsystp?@@0.0968220240621875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網址：<http://www.mh.sinica.edu.tw/index.aspx>。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碩博士班，網址：<https://crrahs.pccu.edu.tw/files/15-1074-58769,c82-1.php?Lang=zh-tw>。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網址：<https://www1.stat.gov.tw/mp.asp?mp=3>。

中華民國總統府網站，網址：<https://www.president.gov.tw>。

民主進步黨網站，網址：<https://www.dpp.org.tw>。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網站，網址：<http://www.rchcs.com.tw>。

立法院智庫整合檢索系統，網址：

<https://lis.ly.gov.tw/lydbc/lydbkmout?.04910B11000000E00000000010001081100000000109C0008F2003c20>。

立法院議事日程及議事錄檢索系統，網址：

<https://lis.ly.gov.tw/lymtsysc/lymtsystp?@@0.8596067573332595>。

考選部一考畢試題查詢平臺，網址：

<https://wwwq.moex.gov.tw/exam/wFrmExamQandASearch.aspx>。

國史館，網址：<https://www.drnh.gov.tw>。

國家圖書館一期刊文獻資訊網中國文化研究論文目錄，網址：

<https://tpl.ncl.edu.tw/NclService/chineseCultureQuery>。

國家圖書館一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網址：<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web.cgi?o=d>。

附錄

附錄一 國史館組織條例（1946年11月23日公布、1956年5月10日修正）

	1946年11月23日公布	1956年5月10日修正
第一條	國史館隸屬於國民政府，掌理撰修國史事宜。	國史館隸屬於總統府，掌理撰修國史事宜。
第二條	國史館置館長一人，特任，綜理館務，監督所屬職員。副館長一人，簡任，襄助館長處理館務。	國史館置館長一人，特任，綜理館務，監督所屬職員。副館長一人，簡任，襄助館長處理館務。
第三條	國史館置纂修二十人至二十五人，聘任或簡任。協修二十五人至三十人，其中十人得為簡任，餘薦任。助修十五人至二十人，薦任。	國史館置纂修二十人至二十五人，聘任或簡任。協修二十五人至三十人，其中十人得為簡任，餘薦任。助修十五人至二十人，薦任。
第四條	國史館置主任秘書一人，簡任。秘書三人，薦任。處長三人，簡任。科長八人，薦任。科員二十五人至三十人，書記官十五人至二十人，均委任。並得酌用雇員二十人至三十人。	國史館置主任秘書一人，簡任。秘書三人，薦任。處長三人，簡任。科長八人，薦任。科員二十五人至三十人，書記官十五人至二十人，均委任。並得酌用雇員二十人至三十人。
第五條	國史館設下列各處： 一、史料處：分檔案、圖書二科，辦理整理檔案、保管圖書事項。 二、徵校處：分時政、實錄、徵集、校對四科，辦理時政、實錄、徵集、校對事項。 三、總務處：分文牘、庶務二科，辦理收發文書庶務及出納事項。	國史館設下列各處： 一、史料處：分檔案、圖書二科，辦理整理檔案、保管圖書事項。 二、徵校處：分時政、實錄、徵集、校對四科，辦理時政實錄徵集校對事項。 三、總務處：分文牘、庶務二科，辦理收發文書、庶務及出納事項。
第六條	國史館為審查史料，得設史料審查委員會，由館長指定纂修、協修若干人，並聘館外專家若干人組織之。前項專家，開會時得支出席費。	國史館為審查史料，得設史料審查委員會，由館長指定纂修、協修若干人，並聘館外專家若干人組織之。前項專家，開會時得支出席費。
第七條	凡有關史料文件，各機關應抄送國史館，國史館向各機關徵集或調閱有關資料時，各機關不得拒絕。	凡有關史料文件，各機關應抄送國史館，國史館向各機關徵集或調閱有關資料時，各機關不得拒絕。
第八條	國史館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薦任，依國民政府主計處組織法之規定，辦理歲計會計事務。	國史館設主計室，置主計主任一人，薦任，依法律之規定，辦理歲計、會計、統計事務。
第九條	國史館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薦任，依人事管理條例之規定，辦理人事管理事務。	國史館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薦任，依人事管理條例之規定，辦理人事管理事務。
第十條	國史館為徵集史料，得委託各省市教育廳局、通志局或大學代辦。	國史館為徵集史料，得委託各省市教育廳局、通志局或大學代辦。
第十一條	國史館辦事細則，由館擬定，呈請國民政府核定之。	國史館辦事細則，由國史館定之。
第十二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資料來源：〈重要法規〉，《國史館館刊》，復刊第42期（新店，2007.6），頁269-271。

附錄二 現行國史館組織條例（2001 年 10 月 24 日修正）

第一條	國史館隸屬於總統府，掌理纂修國史事宜。
第二條	國史館（以下簡稱本館）掌理下列事項： 一、政紀、志書、傳記、專題之研究、撰述、彙編事項。 二、歷史圖表之製作、彙整事項。 三、史學集刊、專刊之編印、工具書之編製、資料庫之建立事項。 四、史料、史實之研究、考訂、史著之介述事項。 五、史料之蒐集、整理、複製事項。 六、史料之典藏、應用、展覽、管理、參考諮詢事項。 七、國史、地方史之研究、修纂及重要史料之審訂、彙編事宜。 八、其他有關纂修國史事項。
第三條	本館設修纂處、審編處、采集處，分別掌理前條所列事項，並得分科辦事。
第四條	本館設秘書處，掌理研考、議事、公共關係、文書、印信、出納、庶務、資訊及其他不屬於各處、室事項，並得分科辦事。
第五條	本館置館長一人，特任，綜理館務，並指揮、監督所屬人員；副館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四職等，襄助館長處理館務。
第六條	本館置主任秘書一人，處長四人，職務均列簡任第十二職等；纂修十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二職等；副處長四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四人，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協修十八人，秘書三人，職務均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其中協修九人，秘書一人，職務得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科長十三人至十五人，職務列薦任第九職等；專員十人，分析師一人，職務均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設計師一人，職務列薦任第六職等至第八職等；助修十四人，職務列薦任第七職等；科員二十二人至二十四人，職務列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助理設計師二人，職務列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其中一人，職務得列薦任第六職等；辦事員十五人至十七人，職務列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書記三人至五人，職務列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本館原依雇員管理規則僱用之現職雇員，其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得占用前項書記職缺繼續僱用至離職時為止。
第七條	本館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八條	本館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九條	本館設政風室，置主任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依法辦理政風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十條	第五條至第九條所定各職稱列有官等、職等人員，其職務所適用之職系，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八條之規定，就有關職系選用之。
第十一條	本館為加強臺灣史之研究、修纂及重要史料之審訂、彙編，設臺灣文獻館，其組織另以法律定之。
第十二條	本館得設各種委員會，由館長聘請專家學者或指定纂修、協修為委員，辦理有關業務之審議事項。
第十三條	本館為辦理國史、地方史之研究、修纂，得向檔案中央主管機關調閱相關檔案文件；其調閱規定，由本館與檔案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定之。
第十四條	本館辦事細則，由本館定之。
第十五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修正條文施行日期，由總統府會同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資料來源：〈重要法規〉，《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42 期（新店，2007.6），頁 271-273。

附錄三 中國歷史學會歷屆理、副理事長、總幹事名單

屆次	票選日期	理事長	副理事長	總幹事	備註
1	1954.3.7	沈剛伯		方豪	沈剛伯為臺灣大學文學院院長
2	1961.4.22	姚從吾		張貴永	姚從吾為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3	1966.9.18	方豪		陳捷先	方豪為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4	1968.3.17	方豪		陳捷先	
5	1969.3.31	方豪		札奇斯欽	
6	1970.4.26	黃季陸		札奇斯欽	
7	1971.5.9	黃季陸		李守孔	
8	1972.5.7	黃季陸		李守孔	
9	1973.5.20	黃季陸		李守孔	
10	1974.5.26	黃季陸		李守孔	
11	1975.5.25	黃季陸		李守孔	
12	1976.5.30	黃季陸		李守孔	
13	1977.4.17	黃季陸		李守孔	
14	1978.5.21	黃季陸		閻沁恆	
15	1979.5.27	黃季陸	秦孝儀	李雲漢	秦孝儀時任黨史會主委
16	1980.5.25	黃季陸	秦孝儀	李雲漢	國史館主任秘書遲景德擔任副總幹事；國史館協修胡健國擔任秘書
17	1981.5.24	黃季陸	秦孝儀	李雲漢	
18	1982.5.30	黃季陸	秦孝儀	李雲漢	
19	1983.5.7	秦孝儀		王壽南	秦孝儀時任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
20	1984.7.7	秦孝儀		王壽南	
21	1985.5.26	秦孝儀	朱匯森	王壽南	
22	1986.7.13	秦孝儀	朱匯森	王壽南	
23	1987.7.12	秦孝儀	朱匯森	王壽南	
24	1988.6.3	秦孝儀	朱匯森	王壽南	
25	1989.7.9	朱匯森	王壽南	遲景德	
26	1990.7.16	朱匯森	王壽南	遲景德	
27	1991.7.21	王壽南	陳三井	遲景德	王壽南時任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院長
28	1992.7.12	宋晞	陳三井	王吉林	宋晞時任中國文化大學文學院院長；王吉林為該校史研所所長
29	1993.9.19	宋晞	陳三井	王吉林	總幹事改為秘書長
30	1994.9.26	李雲漢	王仲孚	邵銘煌	李雲漢時任黨史會主委；邵銘煌為黨史會秘書；另聘請黨史會專門委員高純淑與師範大學歷史所助教葉高樹擔任學會秘書。
31	1995.9.17	李雲漢	王仲孚	邵銘煌	
32	1996.9.22	張玉法	朱重聖	胡健國	
33	1997.9.	張玉法	朱重聖	胡健國	

資料來源：李雲漢，《史學圈裏四十年》，頁 514-530；李雲漢，〈會務報告〉，《中國歷史學會會訊》，

1（新店，1980.1），第九版；〈中國歷史學會第十六屆理監事暨候補理監事名錄〉，《中國歷史學會會訊》，3（新店，1980.9），第十三版；〈中國歷史學會第三十二屆理監事暨候補理監事名錄〉，《中國歷史學會會訊》，56（新店，1996.12），第十版。；〈中國歷史學會第三十三屆理監事暨候補理監事簡歷冊〉，《中國歷史學會會訊》，60（新店，1998.2），第八版；李雲漢，《史學圈裏四十年》，頁 508。

附錄四 中國近代史學會第一、三屆理監事名單

屆次	票選日期	職稱	姓名
一	1994.11	理事長	張玉法
		秘書長	張哲郎
		理事	王壽南、王綱領、古偉瀛、朱重聖、余文堂、呂芳上、李國祁、李雲漢、林能士、邵臺新、胡春惠、胡平生、涂永清、張玉法、張榮芳、陳華、陳三井、鄭梓、賴澤涵、遲景德、周宗賢
		候補理事	古鴻廷、吳圳義、周惠民、杜維運、王慶琳、段昌國
		常務監事	呂士朋
		監事	呂士朋、呂實強、李守孔、黃福慶、遼耀東、蔣永敬、閻沁恆
		候補監事	陳鵬仁、瞿韶華
三	1998.12	理事長	呂芳上
		秘書長	吳文星
		理事	王綱領、朱重聖、余文堂、林能士、胡春惠、張玉法、陳三井、賴澤涵、張哲郎、張力、戴晉新、陳鵬仁、周惠民、徐泓、閻沁恆、邵銘煌、陳華、張瑞德、劉翠溶
		常務監事	李國祁
		監事	呂士朋、呂實強、蔣永敬、王壽南、李雲漢、杜維運

資料來源：〈中國近代史學會第一屆理監事名單〉，《近代史學會通訊》，1（臺北，1995.2），頁15；

呂芳上，〈會務報告〉，《近代史學會通訊》，9（臺北，1999.7），頁1。

◎《近代史學會通訊》第1至16期發刊資訊

期數	發刊日期	理事長	秘書長	會址	備註
1	1995.2	張玉法	張哲郎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所	
2	1995.10	張玉法	張哲郎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所	
3	1996.4	張玉法	張哲郎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所	
4	1996.10	張玉法	張哲郎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所	
5	1997.6	張玉法	林能士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所	
6	1997.10	張玉法	林能士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所	
7	1998.4	張玉法	林能士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所	
8	1998.10	張玉法	林能士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所	
9	1999.7	呂芳上	吳文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10	1999.12	呂芳上	吳文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11	2000.7	呂芳上	吳文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12	2000.11	呂芳上	吳文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13	2001.6	呂芳上	林美莉	中研院近史所	
14	2001.12	呂芳上	林美莉	中研院近史所	
15	2002.6	呂芳上	林美莉	中研院近史所	
16	2002.12	呂芳上	林美莉	中研院近史所	停刊

附錄五 1984 年至 2000 年國史館出版品

類別	種別	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份	備註
(一) 清史	清史稿校註	清史稿校註	國史館清史組	1986-1990	全 16 冊
	圖集	新清史地理志圖集		1993	
(二) 史事紀要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國史館史事紀要編輯小組	1985-2000	94 冊；1984 年後有編者署名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綱文備覽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綱文備覽(民國 46 年至民國 55 年)	國史館史事紀要編輯小組	1990-1999	9 冊；每十年份一編
(三) 志書·傳記	志書	中華民國史(公職、地理、教育、交通、內政、法律、民族、學術、文化、社會)志	國史館各志書編輯委員會	1990-1999	11 冊；社會志分上下冊
	褒揚令集	中華民國褒揚令初編(全十三冊)、續編(一-五)		1986-1997	
	傳記史料彙編	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	胡健國、洪溫臨	1988-2000	1-20 輯
	國史擬傳	國史擬傳	胡健國、洪溫臨	1988-2000	1-8 輯
	傳記史料個人人物	黃季陸先生與中國近代史研究/論學論政文集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1986	1-3 冊
		羅家倫先生文存	編輯小組	1988-1990	5-12 冊
		張其昀先生文集	文化大學主編	1991	國史館與黨史會共同出版
		平凡的我	黎東方	1998	1-2 集
	口述歷史	汪敬煦、姚恆修、韋永寧、賴名湯(上、下)、夏功權、劉先雲、梁肅戎、林衡道、劉脩如、薛人仰、劉達人、張寒松等、徐亨、陳寶川先生；鄭玉麗女士	國史館口述歷史組	1993-2000	15 人等
(四) 專著·論文集	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		國史館	1986-1999	1-23 輯
	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1987-2000	12-21 輯
	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		國史館	1992-1998	1-4 次討論會
	個別專題論文集	中國國民黨黨史資料與研究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1989	
		近百年中日關係論文集	蔣永敬等	1992	
		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編輯組	1997	
		陳立夫回憶錄討論會論文集	蔣永敬	1997	
		華僑與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論文集	張希哲、陳三井	1997	
		臺灣開發史論文集	周宗賢	1997	
		近代中國歷史檔案研討會論文集	編輯委員會	1998	
		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	籌備委員	1998	全 2 冊

專著	論文集	會		
	淡水學學術研討會－過去、現在、未來論文集	周宗賢	1999	
	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編輯委員會	2000	
	日本在華暴行錄(1928-1945)	洪桂己	1985	
	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上中下)	孫常煒	1985-1987	
	中國近代幣制改革史(1887-1937)	卓遵宏	1986	
	國民政府六年禁煙計畫及其成效(1935-1940)	賴淑卿	1986	
	中國對日抗戰損失調查史述	遲景德	1987	
	日本出兵山東與中國排日運動(1927-1929)	樂炳南	1988	
	中共黨史	蔡國裕	1988-1994	中共相關專著
	戴傳賢與現代中國	簡筌簫	1989	
	長沙三次會戰	容鑑光	1990	
	宋子文與戰時外交	陳立文	1991	
	七三一部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日本細菌戰	吳天威	1992	
	孫連仲先生年譜長編	劉鳳翰	1993	全 6 冊
	楊增新在新疆(1912-1928)	李信成	1993	
	李烈鈞評傳	洪喜美	1994	
	吳景濂與民初國會	管美蓉	1995	
	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從九一八到七七	劉維開	1995	
	清代竹塹地區的家族與地域社會：以鄭、林兩家為中心	黃朝進	1995	臺灣相關專著
	浙江省土地問題與二五減租：1927-1937	陳淑銖	1996	
	水利開發與清代嘉南平原的發展	陳鴻圖	1996	臺灣相關專著
	清末民初美國在華的企業投資(1818-1937)	羅志平	1996	
	張嘉璈與中國銀行的經營與發展	毛知礪	1996	
	范鴻仙年譜	蔣永敬	1996	
	曾琦先生年譜	陳正茂	1996	
	從甲午戰爭到中日戰爭	陳鵬仁	1997	
	抗戰時期專賣事業(1941-1945)	何思暕	1997	
	洪棄生及其作品考述	程玉凰	1997	臺灣相關專著
	華僑政策與海外民族主義(1912-1949)	李盈慧	1997	
	日軍在臺灣(全 2 冊)	劉鳳翰	1997	臺灣相關專著
	戰前日本在華北的走私活動(1933-1937)	孫準植	1997	
	中日戰爭與鴉片：以內蒙古地區為中心	朴樞	1998	
	左舜生年譜	陳正茂	1998	
	民國以來的中國史學論集	宋晞	1999	
	戴笠與抗戰	張霽芝	1999	
	汪兆銘與國民政府：1931 至 1936 年對日問題下的政治變動	許育銘	1999	
	英國與中國的外交關係(1929-1937)	李仕德	1999	
	所傳為何？基督教在華宣教的檢討	魯珍晞	2000	
	從合作到決裂：論龍雲與中央的關係 1927-1949	楊維真	2000	

		中華民國外交行政史略	劉達人	2000	
(五) 史料 叢書	重刊舊史料	中國青年黨史料叢刊(含醒獅週報、新路半月刊、民聲週報、國論月刊、國論週刊、國光旬刊、民憲半月刊、青年生活半月刊、青年中國週報、剏共、中青、風雲、青年臺灣合刊本)		1993-2000	11輯,共20冊
	彙編建國文獻	中華民國建國文獻—革命開國文獻		1995-1998	3輯,共6冊
		中華民國建國文獻—民初時期文獻		1997	2輯,共6冊
	職名錄與年表	中華民國行憲政府職名錄	徵校處時政科	1988-1998	1-4冊; 1947-1996年
		近代日本政軍外交人員職名錄	陳鵬仁	1994	
		中國近百年憲政大事年表	簡筌簫	1992	
	政治軍事外交	臺兒莊會戰	國史館	1984	
		近代中國外諜與內奸史料彙編:清末民初至抗戰勝利時期(1871-1947)	洪桂己	1986	
		近代中韓關係史資料彙編	胡春惠、趙中孚、張存武	1986-1990	1-12冊
		江蘇省及六十四縣市志略	朱沛蓮	1987	
		中國制憲史資料彙編:憲法篇	繆全吉	1989	
		航政史料	葉健青	1989	
		役政史料	侯坤宏	1990	上下冊
		政府接收臺灣史料彙編	何鳳嬌	1990	1-2冊;臺灣史料
		航空史料	葉健青	1991	
		排華史料彙編:墨西哥	何鳳嬌	1991-1993	上下冊
		馬歇爾使華調處日誌(1945年11月-1947年1月)	王成勉	1992	
		西安事變史料	朱文原	1993-1997	1-6冊
		捐獻史料	姜明清	1993	上下冊
		國民政府軍政組織史料	周美華	1996-1999	1-4冊
		臺灣省政府檔案史料彙編行政長官公署時期(一)(二)(三)	薛月順	1996-1999	臺灣史料
		國史館藏二二八檔案史料(1-3冊)	侯坤宏	1997	
		兩次鴉片戰爭與香港的割讓:史實與史料	黃宇和	1998	
		國民政府時期外交部工作報告(民國二十二至二十六年)	周琇環	1999	
		東南亞華僑資料彙編	何鳳嬌	1999	第一冊
		國民政府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	洪喜美	1999-2000	一二冊
	社會環保警政	警政史料	賴淑卿	1989-1993	1-5冊
		臺灣省警務檔案彙編:民俗宗教篇	何鳳嬌	1996	臺灣史料
		中華民國人民團體調查錄(1912至1995年)	張玉法、李榮泰	1999	
	教育文化藝術	有關清史稿編印經過及各方意見彙編第三編	張惠珠	1990	
		抗戰時期我國留學教育史料第一冊:各省考選留學生	林清芬	1994-1999	1-6冊
	經濟財政金融	資源委員會檔案史料初編	程玉鳳、程玉凰	1984	上下冊

	抗戰前十年貨幣史資料	卓遵宏、 陳憶華、 董淑賢	1985- 1988	1-3 冊
	糧政史料	侯坤宏	1988- 1992	1-6 冊
	土地改革史料(民國十六年至四十九年)	侯坤宏	1988	
	資源委員會技術人員赴美實習史料：民國三十一年會議	程玉鳳、 程玉凰	1988	上中下冊
	電信史料	葉健青	1990	
	抗戰時期專賣史料	何思暐	1991	
	資源委員會檔案史料彙編（電業部份）	薛月順	1992	
	鐵路史料	姜明清	1992	
	中英庚款史料彙編	周琇環	1992- 1993	上中下冊
	資委會檔案史料彙編光復初期臺灣經濟建設	薛月順	1993- 1995	上中下冊；臺灣史料
	臺灣土地資料彙編	何鳳嬌	1993- 1998	1-2 輯，4 冊；臺灣史料
	國民政府時期的鹽政史料	江鳳蘭	1993	
	抗戰時期美國援華史料	何思暐	1994	
	農復會史料第一冊組織沿革	周琇環	1995	一二冊；臺灣史料
	臺灣光復後美援史料	周琇環	1995- 1998	1-3 冊；臺灣史料
(六)期刊	國史館館刊復刊	館刊編輯 委員會	1987- 1999	1-27 期
(七)其他	國家檔案分類表	路守常	1985	
	國史館概況	國史館	1985	
	國史館概況	國史館	1991	

附錄六 張炎憲館長時期國史館紙本出版品（2000 年 5 月至 2008 年 5 月）

種別	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備註
(一)史事紀要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簡筌簑等	2000-2007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網文備覽(民國 46 年至 55 年)	簡筌簑等	2001-2002	
(二)志書·傳記				
志書	中華民國史外交志	國史館	2002	
褒揚令集	中華民國褒揚令集續編(6)-(16)	胡健國等	2000-2006	
傳記史料彙編	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21)-(31)	胡健國等	2000-2007	
	近代華人生卒簡歷表	胡健國	2004	
國史擬傳	國史擬傳第九輯(9)-(11)	胡健國等	2000-2004	
口述歷史	趙自齊先生訪談錄	遲景德等	2000	黨政軍界
	臺籍首位上將總司令：陳守山口述歷史	劉鳳翰等	2002	
	不再流浪的孤軍：忠貞新村訪談錄	葉健青等	2002	
	孔令晟先生訪談錄	遲景德等	2002	
	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1)(2)(3)	董群廉等	2003-2004	
	留越軍民訪談錄(1)(2)	黃翔瑜	2007	
	臺灣佛教一甲子：吳老擇先生訪談錄	卓遵宏等	2003	宗教界人物
	成一法師訪談錄	卓遵宏等	2006	
	臺灣經懺佛事縱橫談：源靈法師訪談錄	闕正宗等	2006	
	杏壇衲履：恆清法師訪談錄	侯坤宏	2007	
	臺灣佛教人物訪談錄(1)	卓遵宏等	2007	
	人間比丘之路：宏印法師訪談錄	卓遵宏等	2007	
	陳梅生先生訪談錄	遲景德等	2000	教育文化界
	洪樵榕先生訪談錄	卓遵宏等	2001	
	澄懷觀道：陳奇祿先生訪談錄	陳怡真	2004	
	潘振球先生訪談錄	朱重聖等	2004	
	鄭欽仁先生訪談錄	薛化元等	2004	
	固園黃家：黃天橫先生訪談錄	陳美蓉等	2008	
	學海悠遊：劉枝萬先生訪談錄	林美容等	2008	
	謝森中先生訪談錄	卓遵宏等	2001	財政經濟界
	計政與國家發展：汪錕先生訪談錄	卓遵宏	2004	
	縱橫臺灣石油工業半世紀：胡新南先生訪談錄	程玉鳳	2005	
	顧紹昌先生訪談錄	潘光哲等	2002	民主運動界、社會醫療界
	勇者的身影：江鵬堅先生行誼訪談錄	張世瑛	2004	
	一九六〇年代的獨立運動：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事件訪談錄	曾品滄	2004	
	100 行動聯盟與言論自由	張炎憲等	2008	
	郭雨新先生行誼訪談錄	張文隆等	2008	
	臺灣自救宣言：謝聰敏先生訪談錄	張炎憲等	2008	
	民主崛起：1980 年代臺灣民主化運動訪談錄(1)(2)	張炎憲等	2008	
	臺灣免疫學拓荒者：韓韶華先生訪談錄	喻蓉蓉	2004	
	杜聰明與我：杜淑純女士訪談錄	曾秋美等	2005	
	01 觀光教育：黃溪海、李福登訪談錄	簡筌簑等	2006	出類拔萃人物訪談
	02 農業種苗：陳文郁、林俊義訪談錄	簡筌簑等	2006	

	03 農業外交：謝順景訪談錄	歐素瑛	2006	錄
	04 水產養殖：黃丁郎、林烈堂訪談錄	薛月順等	2006	
	05 農田水利：徐金錫、甘俊二訪談錄	林清芬等	2006	
(三)專著·論文集				
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22)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2001	最後一輯
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24)(25)(26)		國史館	2000-2001	最後一輯
中華民國史專題討論會論文集(5)-(8)		國史館	2000-2008	
個別 專題 論文集	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何智霖	2000	
	臺灣主權論述論文集(上)(下)	編輯小組	2001	
	2001 年淡水學學術研討會：歷史·生態·人文論文集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003	
	人權理論與歷史論文集	李永熾等	2004	
專著	中國抗日政策的形成：從九一八到七七	周美華	2000	中國近現代史
	抗戰時期的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	侯坤宏	2000	
	孫中山與中國革命	蔣永敬	2000	
	近代中國企業管理思想與制度的演變	劉文賓	2001	
	汪精衛·國民黨·南京政權	王克文	2001	
	地方實力派與中原大戰	陳進金	2002	
	中共意識形態的變遷與持續	吳安家	2004	
	昭和天皇備忘錄	栗原健	2000	
	臺灣的日本農業移民：以官營移民為中心	張素玢	2001	臺灣史
	臺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上)(下)	戴國輝	2002	
	楊青矗與美麗島事件	陳世宏	2007	
	方豪先生年譜	李東華	2001	
	印順法師年譜	侯坤宏	2008	
(四)史料叢書				
年表	臺灣主權與一個中國論述大事記	編輯小組	2002	
	戰後臺灣人權年表(1945-1960)	薛化元等	2008	
政治 軍事 外交	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彙編	張存武等	2000	接續前計畫
	中華民國行憲政府職名錄(5)民國八十六年至民國八十八年	葉飛鴻等	2001	
	中共教導旅 陝北作戰日誌	薛月順	2001	
	國民政府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3)	洪喜美	2001	
	國民政府檔案(3)：國民政府著作權法令史料	國史館	2002	
	東南亞華僑資料彙編(2)	何鳳嬌	2003	
	戰後遣返華僑史料彙編(1)-(3)	謝培屏	2003-2005	
	戰後遣送旅外華僑回國史料彙編(1)-(3)	謝培屏	2007	
	戰後外交部工作報告(1)-(3)	周琇環	2001、2006	
	戰後外交史料彙編：韓戰與反共義士篇	周琇環	2005-2007	
	一個中國論述史料彙編：史料文件(1)(2)	編輯小組	2000	
	臺灣主權論述資料選編(上)(下)	編輯小組	2001	
	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1)-(12)	薛月順等	2000-2004	
	中華民國與聯合國史料彙編(1)-(4)	葉惠芬等	2001-2002	
	臺灣省參議會資料彙編：行政區域規劃	何鳳嬌	2001	
	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1)-(18)	侯坤宏等	2002-2008	
	二二八事件辭典(含別冊)	朱重聖	2008	
	雷震案史料彙編(1)-(4)	陳世宏等	2002-2003	
	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1)-(10)	何智霖等	2003-2005	
	臺灣重要歷史文件選編(1895~1945)(1)(2)	許進發	2004	

	日治時期臺灣高等官履歷(1)-(3)	何鳳嬌	2004-2006	
	富國島留越國軍史料彙編(1)-(3)	黃翔瑜	2006-2007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1)-(13)	張炎憲等	2008	
	郭雨新先生照片暨史料集	郭惠娜等	2008	
教育 文化 藝術	九年國民教育資料彙編	何鳳嬌	2000	
	臺灣戰後初期留學教育史料彙編(1)-(5)	林清芬	2001-2007	
	許常惠音樂史料(1)-(3)	梁翠苹	2002	
	楊雲萍藏臺灣古文書	張炎憲等	2003	
	臺灣省參議會史料彙編：教育篇(1)-(3)	歐素瑛	2004-2006	
	林維朝詩文集	陳素雲	2006	
	楊基振日記附書簡·詩文(上)(下)	黃英哲等	2007	
	臺語文運動訪談暨史料彙編	楊允言等	2008	
	李景暘藏臺灣古文書	林正慧等	2008	
經濟 財政 金融	臺灣省貿易局史料彙編(1)-(3)	薛月順	2001-2004	
社會 環保 警政	笨港古文書選輯	曾品滄	2001	
	(水沙連)埔社古文書選輯	曾品滄等	2002	
	國民政府禁煙史料：組織法令(1)-(4)	朱文原	2003-2006	
	戰後臺灣勞工運動史料彙編(1)-(3)	范雅鈞	2004-2008	
	臺灣環保運動史料彙編(1)	施信民	2006-2007	
	臺灣原住民族運動史料彙編(1)(2)	夷將·拔路兒	2008	
(五)總統副總統文物				
蔣中正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29)	王正華等	2003-2007	接續前計畫
蔣經國	蔣經國總統照片集(2)	吳恭全	2002	
李登輝	見證臺灣：蔣經國總統與我	李登輝口述歷史小組	2004	允晨文化出版
	李登輝總統照片集		2005	
	李登輝總統訪談錄		2008	
謝東閔	謝東閔先生全集(1)-(3)	胡健國	2004-2005	
陳誠	陳誠先生回憶錄(1)-(4)	何智霖等	2004-2005	
	陳誠先生書信集(1)-(4)	何智霖等	2006-2007	
	陳誠先生從政史料選輯：臺灣省政府委員會會議記錄(1)(2)	葉惠芬	2007	

附錄七 林滿紅、呂芳上館長時期國史館紙本出版品（2008 年 5 月
至 2016 年 5 月）

種別	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	備註
(一)國史紀要				
	中華民國國史紀要(1)元年～十年；(2)十一年～二十年；(3)二十一年～三十年	吳淑鳳等	2012-2016	
(二)志書・傳記				
褒揚令集	中華民國褒揚令集續編(11)-(16)	胡健國等	2008-2016	接續前計畫
傳記史料	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32)-(37)	胡健國等	2008-2014	接續前計畫
	董翔飛大法官回憶錄	董翔飛	2010	
	艱難奮鬥的歲月：許新枝回憶錄	許新枝	2013	
	無盡的感恩：喬寶泰自述	喬寶泰	2014	
	雲煙集：余傳韜回憶錄	余傳韜	2014	
	北上南下記滄桑：胡春惠回憶錄	胡春惠	2016	
	畢生奉獻兩韓關係：林秋山回憶錄	林秋山	2016	
口述歷史	06：水產養殖廖一久訪談錄	林清芬等	2008	接續前計畫；出類拔萃人物訪談錄
	07 科技產業：吳振和訪談錄	林清芬等	2008	
	08 自然保育：林曜松、徐國士訪談錄	簡笙簫	2008	
	09 資訊科技：鄭紹良、簡明仁訪談錄	簡笙簫等	2008	
	10 畜牧產業：洪嘉謨訪談錄	薛月順等	2008	
	11 國際漁業的推手：曲銘訪談錄	簡笙簫等	2010	
	12 臺灣生技產業的開路先鋒：蘇遠志訪談錄	薛月順等	2015	
	13 臺灣漁業推手：闕壯狄訪談錄	薛月順	2015	
	菩妙老和尚訪談錄	卓遵宏等	2008	宗教界人物
	如悟法師訪談錄	卓遵宏等	2008	
	方甯書先生訪談錄	卓遵宏等	2009	
	圓香居士訪談錄	卓遵宏等	2009	
	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傳道法師訪談錄	闕正宗等	2009	
	基督與召會：李常受先生行誼訪談錄；增訂版	卓遵宏等	2009、2010	
	政府遷臺與臺灣女性修行者：十八位「出家人」訪談錄	釋見曄等	2010	
	臺灣佛教人物訪談錄(2)	卓遵宏等	2011	
	百年佛緣(星雲大師口述)	佛光山	2012	
	周聯華牧師訪談錄	朱重聖等	2012	
	道海老和尚訪談錄	卓遵宏等	2013	
	浮塵掠影：李志夫先生訪談錄	卓遵宏等	2013	
	樂崇輝居士訪談錄	卓遵宏等	2013	
	我與中華佛寺協會：林蓉芝居士訪談錄	侯坤宏等	2014	
	六十感恩紀：惠敏法師訪談錄	侯坤宏等	2014	
	天方學涯：趙錫麟先生訪談錄	張中復	2014	
	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訪談錄	張炎憲等	2009	黨政軍警界
	大風將軍：郭宗清先生訪談錄(2 版)	許瑞浩等	2011	
	賴名湯先生訪談錄(再版)	賴啓等	2011	
	從一線一星到警政署長：盧毓鈞先生訪談錄	張瑞德等	2011	
	韓戰反共義士訪談錄	周琇環等	2013	
	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行誼口述訪談錄	陳立文	2014	
	獅吼：《雄獅美術》發展史口述訪談(2 版)	陳曼華	2011	教育文化
	臺灣茶業人士訪談錄	簡笙簫等	2012	
	王紹堉先生訪談錄	蔡盛琦等	2015	財政經濟界

	海外黑名單相關人物口述訪談錄	歐素瑛等	2014	民主運動
	國際明星王珏先生演藝生涯訪談錄	林德政	2010	演藝界
(三)專著・論文集				
中華民國史專題討論會論文集(第九屆)		黃翔瑜	2008	
個別 專題 論文集	不可忽視的戰場－抗戰時期的軍統局	吳淑鳳等	2012	
	回眸世紀路：建國百年歷史講座	呂芳上	2012	
	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吳淑鳳等	2013	
	轉型關鍵：嚴家淦先生與臺灣經濟發展	吳淑鳳等	2014	
	戰爭的歷史與記憶	呂芳上	2015	
	戰後初期的臺灣（1945-1960s）	呂芳上	2015	
	近代中國的宗教發展論文集	丁仁傑等	2015	
	戰爭的歷史與記憶(1)-(4)	呂芳上	2015	
專著	美援與臺灣的職業教育(1950-1965)	安後暉	2010	臺灣史
	戰後臺灣佛教的僧俗關係：以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為背景	黃詩茹	2010	
	原住民參選立法委員之研究(1972-2004 年)	海樹兒· 戈刺拉菲	2010	
	一九五〇年代臺灣學生軍訓之研究	李泰翰	2011	
	香港僑資與臺灣紡織業(1951-1965)	彭琪庭	2011	
	海軍與臺灣沉船打撈事業(1945-1972)	劉芳瑜	2011	
	國民黨政權與地方菁英：1950 年代的農會改組	黃仁姿	2011	
	從 Basay 到金雞紹：臺灣原住民社群關係之性質與變遷	吳佳芸	2011	
	臺灣省議會會史	歐素瑛等	2011	
	日治時期臺灣的教育財政：以初等教育費為探討中心	李鎧揚	2012	
	日治時期臺灣熱帶景象之形塑：以椰子樹為中心的研究	周湘雲	2012	
	帝國之守：日治時期臺灣的郡制與地方統治	藍奕青	2012	
	一代天師：張恩溥與臺灣道教	李麗涼	2012	
	軍艦旗下：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	陳柏棕	2013	
	關鍵的七十一：二次大戰結束前後的臺灣社會與臺灣人之動向	阿部賢介	2013	
	日治時期臺灣監獄制度與其實踐	林政佑	2014	
	淡水地方社會之信仰重構與發展：以清水祖師信仰為論述中心（1945 年以前）	王怡茹	2014	
	戰後臺灣農業科學化的推手：以農業推廣體系為中心（1945-1965）	曾獻緯	2015	
	水利秩序之形成與挑戰：以後村圳灌溉區為中心之考察（1763-1970）	李進億	2015	
	卡那卡那富部落史	陳英杰等	2016	
	魯凱族好茶部落歷史研究	臺邦·撒沙勒	2016	
	中國國民黨婦女工作之研究(1924-1949)	洪宜嬪	2010	中華民國 史、中國 近現代 史、中國 國民黨史
	朱家驊與中央研究院	黃麗安	2010	
	製造戰爭陰影：論滿洲國的婦女動員(1932-1945)	蔡雅祺	2010	
	國民革命軍與近代中國男性氣概的形塑(1924-1945)	王詩穎	2011	
	自由的代價：中華民國與香港調景嶺難民營(1950-1961)	林芝諺	2011	
	尋覓良伴：近代中國的徵婚廣告(1912-1949)	陳湘涵	2011	
	1930 年代國民政府的造林事業：以華北平原為個案研究	侯嘉星	2011	
	前進朝鮮：與北韓交流二十年	林秋山	2011	
	你也可以當總統	銀劍玲等	2012	
	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史畫	侯坤宏等	2012	
	中華民國近六十年發展史(上)(下)	呂芳上	2012- 2013	

	一萬四千個證人－韓戰時期「反共義士」之研究	沈幸儀	2013	
	黨國與象徵：中華民國國定節日的歷史	周俊宇	2013	
	從復員救濟到內戰軍運：戰後中國變局下的民航空運隊	張興民	2013	
	戰後中國憲政之路：以行憲前後的黨派協商為中心的探討(1946-1948)	邱炳翰	2014	
	中華民國四健會的成立與臺美青年交流(1951-1965)	林杰民	2014	
	東北流通券：戰後區域性的貨幣措施(1945-1948)	陳昶安	2014	
	無法迴避的政治：以文化保守主義者吳宓為例(1927-1949)	嵇國鳳	2014	
	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	呂芳上	2015	
	1950年代初期國軍軍事反攻之研究	陳鴻獻	2015	
	中華民國政府對海外臺灣獨立運動之因應：以美國為中心(1956-1972)	陳昱齊	2015	
	抗戰時期的中國軍醫	楊善堯	2015	
(四)史料叢書				
年表	中華民國重要史事簡表	國史館	2010	接續前計畫
	中華民國建國百年大事記	朱文原等	2012	
政治 軍事 外交	戰後遣送外僑返國史料彙編(1)-(5)	謝培屏	2008-2010	
	戰後臺灣政治案件(14)-(19)	蕭李居等	2008-2014	
	日治時期臺灣高等官履歷(4)	何鳳嬌	2014	
	西藏史料彙編：班禪返藏之路(民國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	葉健青	2009	
	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1)-(7)	吳淑鳳等	2011-2012	
	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史料彙編：中國遠征軍	周琇環等	2015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期重要史料彙編(1)-(7)	吳淑鳳等	2013-2015	
	沈昌煥日記：戰後第一年 1946	周琇環等	2013	
	胡宗南先生日記	蔡盛琦等	2015	
	吉星文先生日記	何鳳嬌等	2015	
	賴名湯日記(1)(2)	葉惠芬等	2016	
教育 文化 藝術	戰後初期中國各省圖書館史料彙編	蔡盛琦	2009	
	霧峰林家文書集(1)-(5)	何鳳嬌等	2013-2016	
	蔣渭水先生全集(復刻·別冊)	蔣朝根	2014	
經濟 財政 金融	日治時代茶商公會業務成績報告書(1917-1944)	許賢瑤編譯	2008	
	臺灣省參議會史料彙編：日產篇(1)(2)	歐素瑛	2009	
	臺灣省參議會史料彙編：農林篇	歐素瑛	2009	
(五)總統副總統文物				
蔣中正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30)-(82)	高素蘭等	2008-2013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 40、42 補編	張世瑛	2015	
	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1)-(12)	呂芳上	2014-2015	
	蔣中正總統五記	黃自進等	2014	初版三刷
蔣經國	贛南與淞滬笈記	何智霖	2009	
	蔣經國書信集：與宋美齡往來函電(全 2 冊)	周美華等	2009	
陳誠	陳誠先生從政史料選輯：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會議紀錄(1)-(3)	葉惠芬	2009	
	陳誠先生書信集：與友人書	何智霖	2009	
	陳誠先生從軍史料選輯：整軍紀要	何智霖	2010	
	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	何智霖	2012	
	陳誠先生日記	林秋敏等	2015	
	嚴家淦總統行誼訪談錄	陳立文等	2013	
	非典型副總統呂秀蓮	呂秀蓮	2016	

附錄八 臺灣及香港地區歷史研究與教學機構一覽表（1945-2000）

年份	歷史教學機構	歷史研究機構
1945	臺大歷史系	
1946	臺師院史地學系	
1949	臺大文科研究所	
1955	東海歷史系；香港新亞書院研究所	中研院近史所籌備處
1957	臺大歷史學研究所（只招收碩士班）	國防部史政處擴編為史政局
1962	臺師大歷史學系單獨設立；文化史學研究所（碩士班）	
1963	文化史學系；輔仁歷史系	
1965		中研院近史所正式設所
1966	淡大歷史系	
1967	臺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政大歷史系；文化史學研究所博士班；輔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	
1968	中興歷史系	
1969	成大歷史系；香港珠海大學中國文史研究所	
1970	臺師大歷史學系研究所碩士班；東海歷史研究所碩士班	
1971	香港珠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	
1972	東吳歷史系	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改名黨史委員會
1973		國防部史政局和編譯局合併
1974	香港珠海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史學組	
1976	政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	
1979	臺師大歷史學系研究所博士班	
1981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史學組博士班	
1985	成大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班）；清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	
1988		中研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
1987	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	
1991	中正歷史研究所；中興歷史研究所（碩士班）	
1993	中央歷史研究所碩士班；中正歷史系；成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	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1996	清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暨南歷史研究所	
1997	中興歷史研究所博士班；成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	
1998	淡大歷史研究所	
1999	暨南歷史系（學士班）；東華歷史學系；東吳史學與文獻學碩士班	
2000	臺北大學歷史學系	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改制為黨史館

資料整理自：國史館中華民國史學術志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史學術志（初稿）》（新店：

國史館，1996），頁 89；彭明輝，〈臺灣地區的歷史研究機構與歷史系課程（1945-2000）〉，收入氏著，《臺灣史學的中國纏結》（臺北：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1），頁 120-133；孫同勛，〈臺大歷史學系暨歷史學研究所簡介〉，《近代中國》，2（臺北：1977.6），頁 190-191；李庭瑜，〈從史料局到史政局：戰後臺灣軍方史政制度之演變及其編纂事業（1946-1973）〉，臺北：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3，頁 3。